
金日成
回忆录
与世纪同行
2

金 日 成

与世纪同行

2

外 文 出 版 社
朝 鲜・平 壤
1 9 9 4



第一部

抗 日 革 命

（2）

민족의 운명은 나라를
사랑하고 민족을 귀중히
여기는 모든 애국력량의
단합과 거족적인 투쟁에
의해서만 구원될 수 있다.

김일성

（前页的译文）

民族的命运，只有依靠所有热爱祖国、珍视民族的爱国力量的团结和全民族的斗争， 才能得到挽救。

金　日　成



和吉林时代的故旧在一起（1991.5）

1930 年夏，我在离开吉林前登过这座北山公园。



孙贞道牧师的家和他的女儿

1930 年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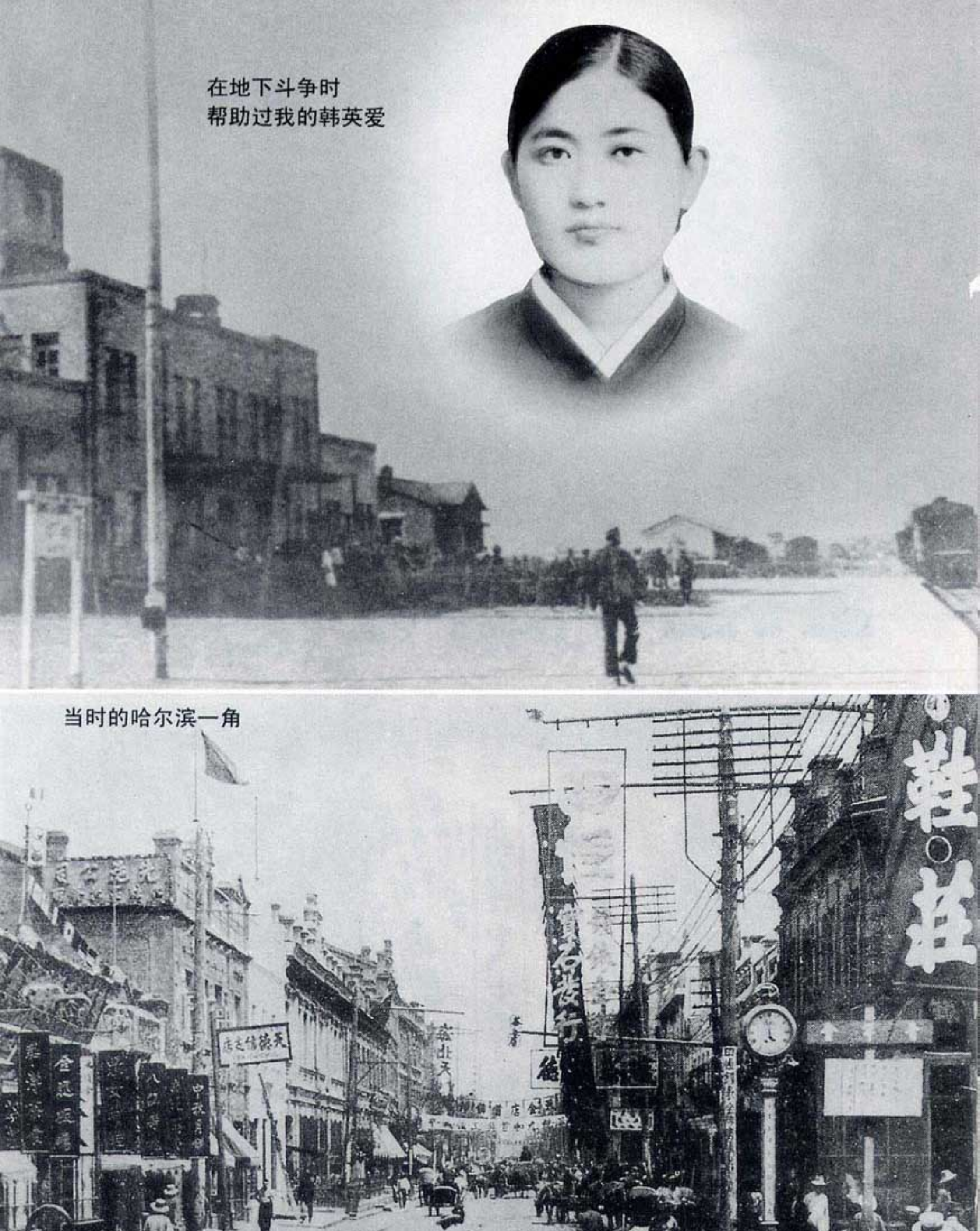
宋桂心大娘和
她的儿子高在凤



当时的敦化市街一角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和掠夺情况





在地下斗争时
帮助过我的韩英爱

当时的哈尔滨一角



弟弟哲杜和张蔚华

当时的海龙一角

朝鮮○○軍

男女三名被捉

길림성 이통현에서 잡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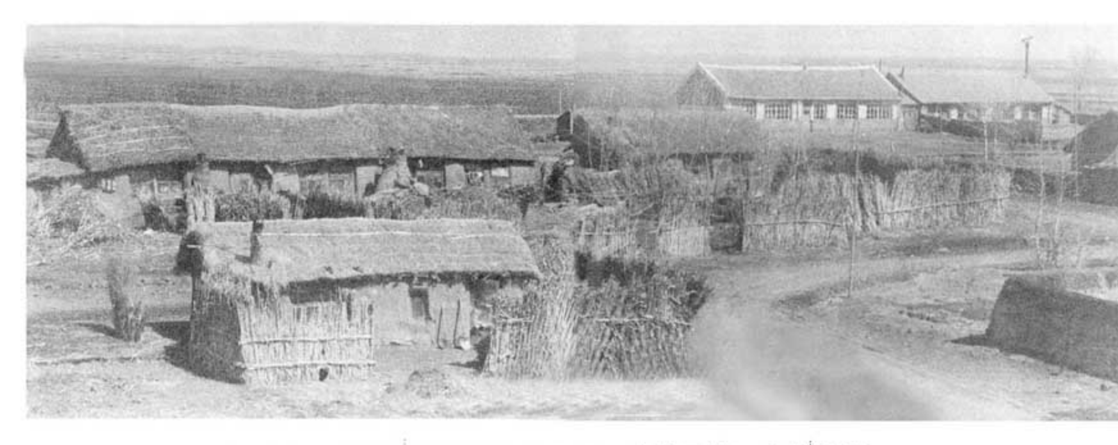
武器도押收되엇다

【장춘】근일에 길림성이통현(吉林省伊通縣)중국공안국（中國公安局)손에 조선○○군（朝鮮○○軍)[illegible] 三명이 피착되어 방금엄중한 취조를받는중이라는데 그사실을 탐문한바에 의하면 전긔 피착된 三명중에 녀자한명이 잇다하며 그들은 전긔이통현고유수(伊通縣孤楡樹)라는동모가

거류하는 촌에 잠입하야 모[illegible] 회을 하든중이던바 그만 전긔 중국공안국에서 탐지한바 되야 공안국에서는 국원六명을 출[illegible] 시켜서 그들의 잠입처소를수색하야 체포하는동시에 무긔도 압수하얏다는데 그들의 씨명은 알에와갓다고한다

金一成 崔得英 류봉화 (女子)

《东亚日报》报道我被捕的事件
（1931 年 3 月 26 日）



贾家屯。在这里举行了卡伦会议，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

卡伦站



我在卡伦住过的房子



第一个党组织的机关刊物
《布尔什维克》

孤榆树李家屯全景。在这里建立了朝鲜革命军。



金　赫



铁岭一角



公　主　岭



孔　荣



崔 昌 杰



金 园 宇





桂 永 春



朴 根 源



长春一角



金亨权叔叔



武装小组缴获并使用过的汽车"咸南 268"

豐山에突現한武裝團四名

巡查部長射殺逃走

自働車를쌔서타고山中潛跡

武裝警官二十名急行

離婚못할가悲觀하고

節婦岩路上에怪青年

誥問하자拳銃發射

豐山拳銃團檢擧當時光景

負傷警官은重態

挺进国内的武装小组
用过几天的利原守墓房



崔 孝 一

把拔里的内中警察
派出所旧址

报道朝鲜革命军挺进
国内消息的报刊



北青大德山的庙。挺进国内的

头娄峰。在这里第一次召开了
建立国内党组织的会议。

这是当时挂在正面的旗。



全 长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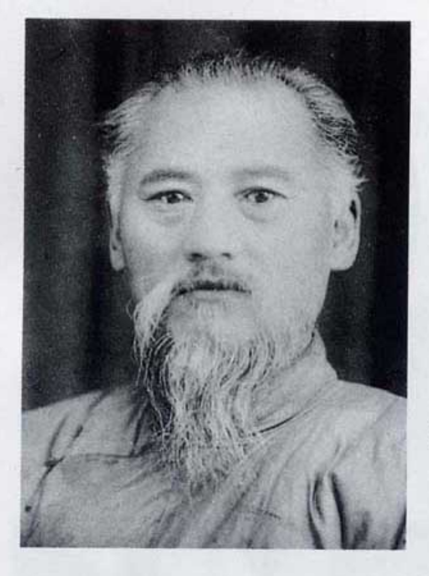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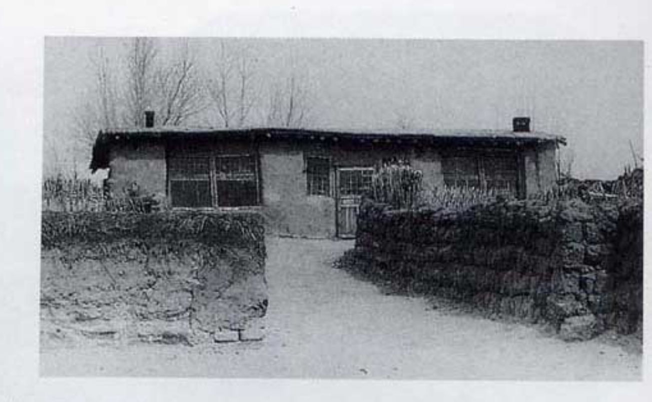


吴 仲 和

蔡 洙 恒



进明书塾。
1930 年 10 月我在这里
会见了国内革命者。

边大愚和他的家



边 达 焕



独立军中队长金保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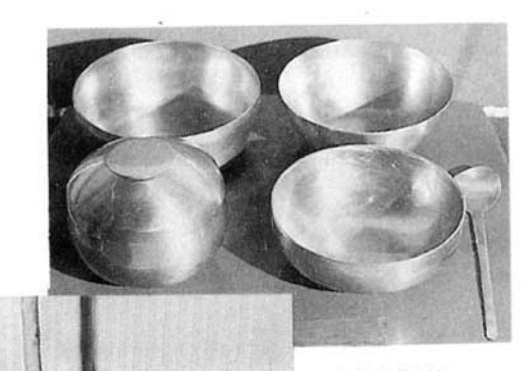
曾建设成革命村的五家子



玄 河 竹（玄正卿）



金 顺 玉



引人缅怀的
饭碗和石磨



崔一泉和他的妻子承少玉



我在五家子用过的
书桌和胡椒面瓶子



组织武装队伍的时期（1932年）



日军在柳条沟附近制造爆炸事件的现场

从日本和朝鲜向中国东北入侵的日本军

日军装甲车

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报道

日军的野蛮暴行

九·一八事变后，陷于血泊中的中国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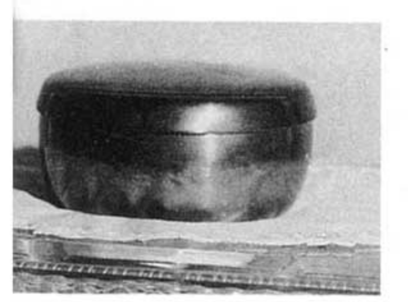
以 武 装 对 抗 武 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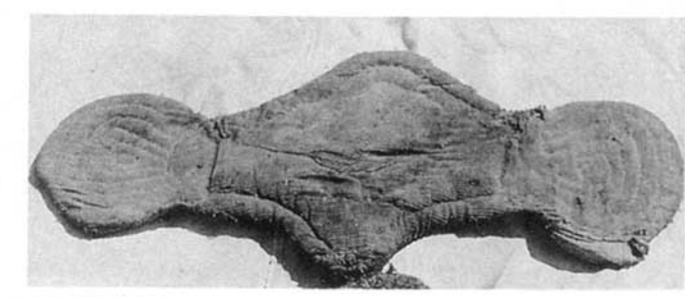


安图一角



为建立游击队作准备时的秘密联络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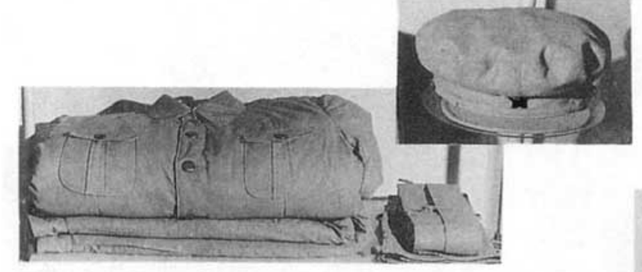
我当时用过的铜碗和马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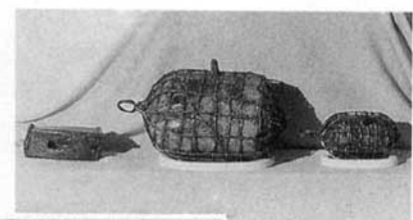
父亲留给我的手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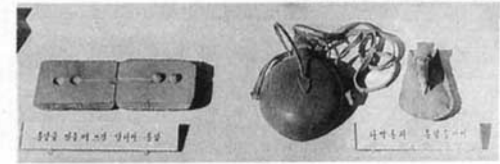
第一支游击队伍用过的旗帜



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军服和武器









游击队在五・一节行进的安图一条街



曾宣布游击队成立的小沙河木条屯全景



有关游击队的成立和活动的出版物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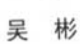


李　光



金　重　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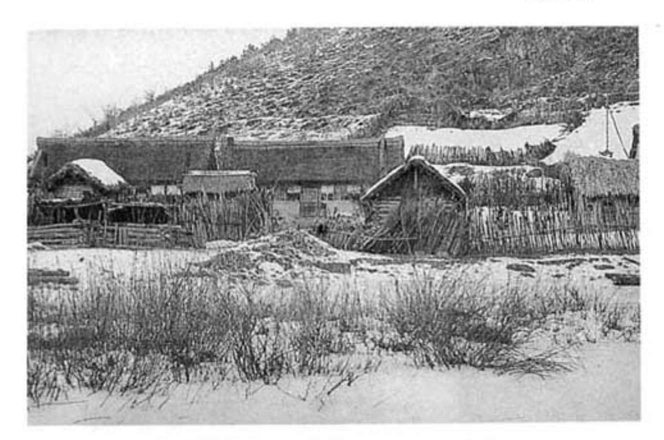
吴　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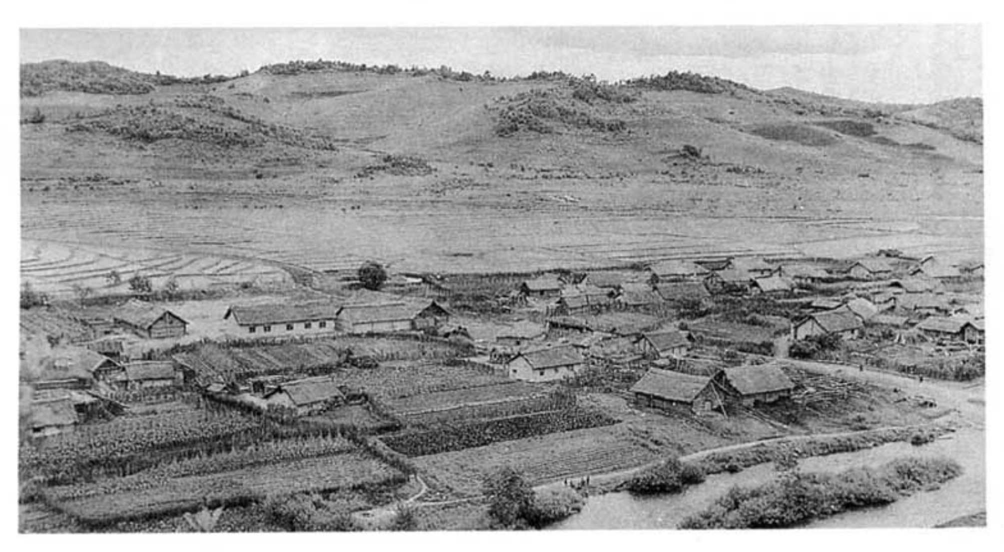
金　正　龙



两江口



哲柱弟做共青工作时用过的联络站



兴隆村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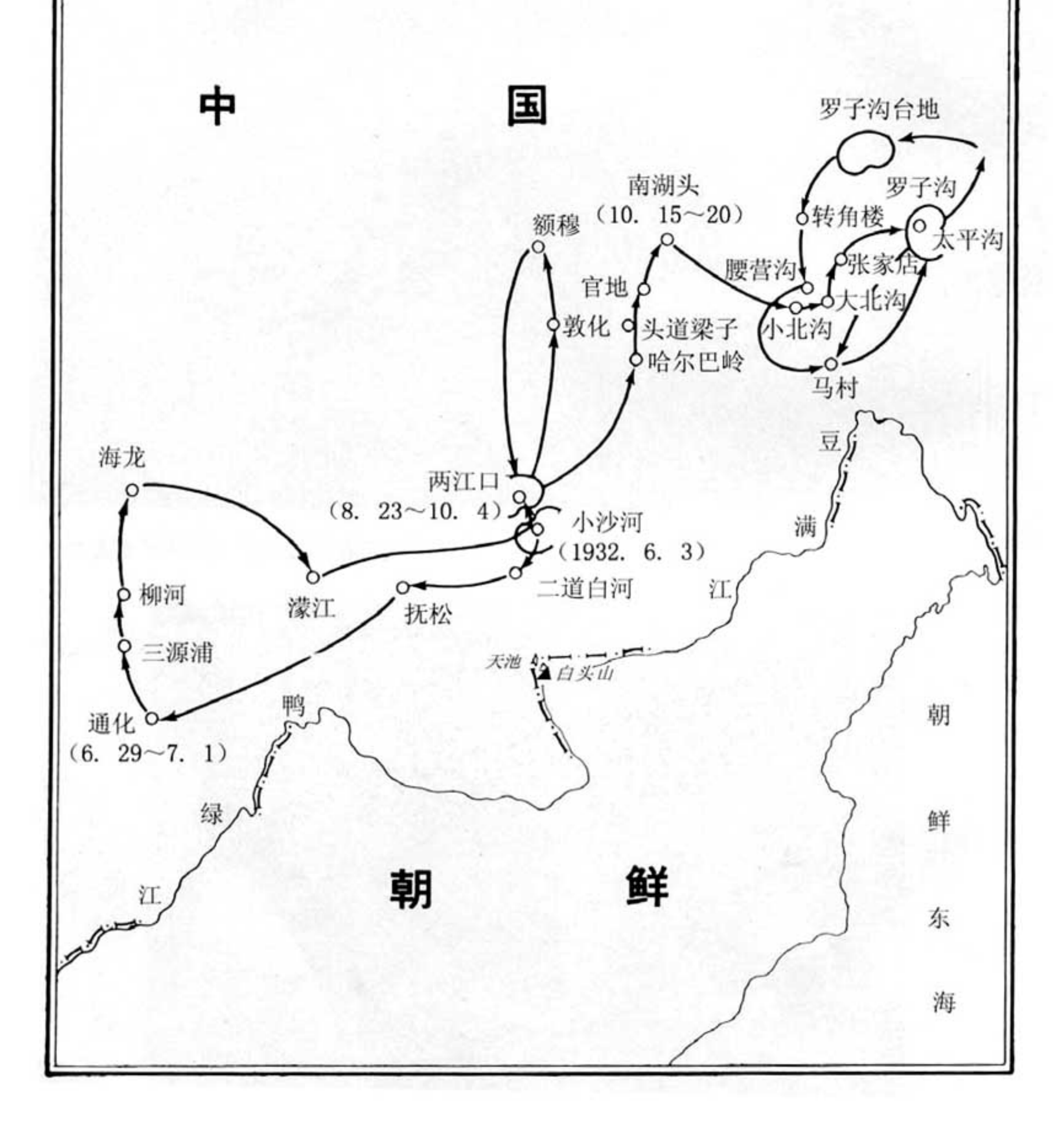


母亲在这座房子里指导妇女会工作

母亲在小沙河的这座房子里逝世

在小沙河的母亲的墓碑

反日人民游击队进军南、北满的行程



我和梁世凤的夫人（前排右第一人）以及抗日女战士们在一起
（1958年8月）



独立军司令梁世凤



爱国烈士陵园的梁世凤墓碑

目　　录

第四章

在探索新的前进道路的日子里

时期：1930.5~1930.12

一　孙贞道牧师

在满洲的形势极为险恶的时候，我获释出狱了。

像反日读书会事件轰动全市的1929年秋天那样，当时的吉林市空气紧张，仿佛处在戒严状态之中。岔路口和官厅周围都有督军署的宪兵盘查行人。还有持枪的军警在到处搜查住宅。

这正是由于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整个满洲经历着阵痛的时期，呈现着杀气腾腾的气氛。那时，满洲地方正在进行着五·三〇暴动。

我国历史学家们把这一斗争称为五·三〇暴动，而中国人则称为“红5月斗争”。我们之所以将这一斗争称为五·三〇暴动，是因为这一斗争是在上海五卅惨案五周年的时候发生的,而且斗争在5月30日达到了顶峰。

当时掌握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李立三向全党发出指示，为纪念1925年5月上海市人民的英勇斗争，工人、学生、市民三界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同时展开暴动形式的斗争，以建立苏维埃游击队。

这条路线一提出来，满洲省委所属各革命组织就在李立三提倡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各地举行飞行集会，掀起暴动。东满的城市和村庄都贴出了鼓动暴动的传单和号召书。

五·三〇暴动一开始，敌人对共产主义者的攻势就空前加强了。

其影响已经波及吉林市。

出狱后我首先去的是在牛马巷的孙贞道牧师家。我是想先到他家去，向七个月来一直为我探监送衣食的孙贞道一家人致谢，然后再离开吉林市，这才合乎道理。

孙贞道牧师好像是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出狱似的，高兴地迎接了我。

“我们怕军阀把你交给日本鬼子，心里多么着急呀！你没有被判处徒刑，获得了释放，真是万幸啊！”

“多亏牧师先生后援，我的狱中生活过得还算顺利。听说，您为我还给狱吏送了很多钱。真不知道该怎样报答您才好。牧师先生的恩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那时，牧师正准备到中国关内去。

我问他为什么忽然想离开吉林。

孙牧师长叹一声，凄凉地笑了笑说：

“张作相也萎靡不振了，在吉林已经没有可以庇护我们，支援我们的力量了。如果张作相不帮助朝鲜人，日本鬼子打进来就糟糕了。我以为三府合并，独立运动就会龙马添翼。可是，别说什么龙马了。他们还那么老是自家吵架，一天也不得安宁。我也无意再待在这里啦。”

关内有一些他在临时政府任议政院副议长和议长时亲密相处过的人士，还有他兴士团时的团友。我想，孙贞道决心要去中国关内，其动机可能是要同这些人重新取得联系，更积极地投身于独立运动。

孙贞道牧师问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看来已经是时间问题了，成柱你准备怎么办？

“我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呢？我准备组织一支大军，同日本帝国主义决一胜负。”

孙牧师惊愕地望着我，说：

“要拿枪同日本拼吗？”

“是的，除了这条路外，不是没有别的出路吗？”

“你可要记住日本是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呀。义兵和独立军都在日本的新式武器面前无能为力，瘫了。不过，你既然下了决心，就大张旗鼓地干吧！”

我看着比我初到吉林时显得寂寞冷落的牧师家庭，禁不住心情惆怅。从前，到他家来，可以听到留声机放出的音乐声，也可以看到独立运动者们热烈议论时局；可以看到来找孙牧师的虔诚信徒，还可以听到少年会会员们唱《风啊，你不要吹》的悲戚戚的歌。

可是，现在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经常围着牧师打转的常客，都销声匿迹，逃到了柳河、兴京、上海或北京等地。曾悲切地放出《皇城旧址》和《流浪歌》的留声机也悄然不响了。

在那以后，孙贞道牧师本人也有一段时间到北京去过。北京有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成立初期与孙贞道牧师志同道合共过事的著名历史家和文人申采浩，除他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孙牧师的同志。

牧师到达北京时，申采浩已经因为做东方联盟的工作而在登陆台湾时被捕并被押送到旅顺监狱。申采浩不在的北京，他觉得很孤寂，冷清。牧师和申采浩的友情是那么深厚，以致撕不断割不开。

申采浩一心为向后代介绍我们民族悠久的爱国传统和灿烂文化，

鼓吹爱国精神，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编撰国史。为民族的启蒙，有一段时期他对出版活动也倾注了热情。《海潮新闻》就是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流亡时出版的受欢迎的报纸。朴素心之所以常为《海潮新闻》写一些论文，是因为主办这家报纸的申采浩的名字在侨胞社会中广为知晓，许多人崇拜他的人格和文章的缘故。

在路线上，申采浩是武装抗战的提倡者。他认为，李承晚的“外交论”和安昌浩的“准备论”都是没有现实性的危险的路线；并极力主张，在以朝鲜民众为一方，以日本强盗为另一方，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情况下，我们两千万民众应该团结一致走暴力破坏的道路。

部分人士把李承晚推为上海临时政府的首脑时，申采浩抑制不住激愤，正面加以反对，也是因为他平时对李承晚的“委任统治论”和“自治论”感到不满的缘故。

“李承晚是比李完用更坏的逆贼。李完用出卖了尚存在的国家，而李承晚却在祖国尚未光复时就把祖国出卖了。”

这是他在临时政府组阁会上像投出炸弹一样投出的一句有名的话。他在退出临时政府后发表的《朝鲜革命宣言》中也严厉批判了李承晚。

孙贞道牧师有时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申采浩是个性格像刀刃，主张像铁锭一样的人。当他谴责李承晚是比李完用更坏的逆贼时，我心里痛快极了。申采浩的话是代表了民心的。申采浩的心情，也就是我的心情。所以，我就和申采浩一道与临时政府诀别了。”

我想，参考他的这种言论，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出孙牧师的政

见了。他断定，不论是自治论还是“委任统治论”，都是妄想。对安昌浩的“培养实力论”，他采取了半信半疑的立场，而对我们的要发动群众开展全民族的斗争来实现祖国的独立这一全民抗战论，则表示绝对的支持。这种革新的立场，使他不再感到有必要作为阁员留在以像李承晚那样的事大主义者、野心家为首脑的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而果断地把活动舞台转移到了吉林。

孙牧师到吉林后，同日本警察规定为“第三势力”的革新派人物取得联系，积极地参与了独立运动。他同新一代的青年也十分融洽，只要是青年人做的事，不管是什么，他都真心实意地给予支援。他任神职的大东门外的教堂，就等于是我们的专用集会场所。我常到这个教堂去弹风琴，指导演艺宣传队的活动。孙贞道牧师给我们解决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又真心支持我们的革命活动，所以，我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爱戴他，尊敬他。

孙贞道牧师也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疼爱我。我在监狱里受苦的时候，向张作相行贿，开展请愿运动，要求释放我，这个主动人物也正是孙牧师。

孙牧师不仅把我作为他朋友的儿子看待，而且把我当做具有一家之见的革命家对待。连在独立运动者中议论纷纷，而又未能解决的困难的家庭问题，他也毫不犹豫地向我和盘托出，征求我的意见。

当时，孙牧师正为大女儿孙真实和尹致昌的婚姻问题大伤脑筋。吉林的独立运动者无论谁都反对这门亲事。孙牧师也感到不满意，认为女儿选错了对象。他认为，如果女儿嫁给了尹致昌，就有辱门楣。

因为尹致昌是亲日派、买办资本家尹致昊的弟弟。当牧师为说服不了女儿而十分着急的时候，独立军保守派为了从尹致昌那里索取资金，把他扣留了一个星期。

“成柱，这事怎么办才好呢？”孙贞道牧师征求我的意见。

我觉得干预大人们的婚事不太合适，便踌躇了一会儿，小心地回答说：

“既然他们搞恋爱，爱上了，不是没办法分开吗？我看最好让他们随自己的意思办吧!”

我在这样进言之后，说服独立军保守派人物释放了尹致昌。

孙贞道牧师到了北京后，第二年又回到了吉林。有些人说，这是应吴仁华、高远岩等革新派人士的邀请而来的。不知这种判断有多大的真实性。不管怎么说，孙牧师直到去世仍留在吉林，可见北京方面的独立运动情况不能令人乐观，他的健康状况看来也不太好。

当我出狱见到孙贞道牧师时，他为我脸庞消瘦而担心，但我却为他满面病容而担心。他旧疾复发，连吃饭都感觉困难。

“国家沦亡，人也病了，只是日夜长叹啊。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给我赐福。都是那流放生活造的孽呀。”孙贞道牧师说。

1912年牧师在满洲进行传教活动时，因阴谋暗杀桂太郎的嫌疑被捕，在珍岛过了两年的流放生活。在这期间，他得了病。说也奇怪，群众爱戴的人，常常容易受病魔侵犯。

第二年春，我在明月沟听到了孙贞道牧师病逝的噩耗。向我传达这一噩耗的人说，孙牧师在吉林的东洋医院死于非命。

起初我以为那不过是谣传。我怎么也不能相信牧师会因病暴亡。我想，半年前见面的时候，他还没有卧床，而是谈论独立运动的未来，怎么能因胃溃疡，就像烛火那样轻易熄灭呢？不幸，那确是事实。据地下组织了解，牧师在住院那天就口吐鲜血，当场死去。

当时，侨胞社会有不少人把孙牧师之死看做谋杀。这样看的第一个理由是住院前孙牧师的病势还没有危及生命。第二个有力的理由是，东洋医院是日本人经营的。日本鬼子甚至毫无顾忌地把朝鲜人当做细菌战的实验对象，别说是谋杀，比这更凶恶的阴谋也能搞得出来，这是侨胞们共同的看法。

最确实的理由是这一点：孙贞道牧师是著名的爱国志士。孙牧师是日本警察片刻也未放松过监视的黑名单中的人。他不仅有暗杀桂太郎的嫌疑，而且又曾任上海临时政府的议政院议长、临时政府交通总长、时事策进会成员、兴士团团员、劳兵会理事，他的这种一贯抗日的经历，不能不使日本警察把他看做眼中钉。孙牧师暴亡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特地拟一份题为《关于不法朝鲜人孙贞道的死亡》的文件上报他们的外务大臣，可见日本人是多么严密地注视着孙贞道牧师的。

孙贞道牧师的号海石。有些人说他的号如实地反映了他的特征。他并不怎么公开露面，可是以神职人员的身分，把一生献给了抗日的神圣事业，是一位节操坚贞、具有良心的独立运动者。孙牧师来到吉林后，又同正义府的革新派人士一道，为适应时代的变迁改变独立运动的方向，为爱国力量的团结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我们组织朝鲜人吉林少年会和朝鲜人留吉学友会的时候，他作为建立满洲农民互助社

的发起人，为它们的成功做出了努力。

孙贞道牧师以他弟弟（孙敬道）的名义在额穆县镜泊湖一带买下50垧土地，经营农业公社。

也可以说是安昌浩提倡的“理想村”的一角吧。镜泊湖畔是有个时期安昌浩先生最眼红的建设理想村的后备地。牧师用农业公社的收入筹措了独立运动资金。

孙贞道牧师的葬礼在奉天会馆按基督教方式庄严举行。据说，由于日本警察的阻挠，从韩日合并以前起历经几十年的风霜献身于独立抗战的牧师灵前，只有40多个吊丧的。想到牧师生前用爱国精神教育过那么多人，受到那么多人的拥戴，这样的永别是太冷清，太孤寂了。可以想象到有警察在场的葬礼，怎么能随便流泪、尽情痛哭呢！那是国父死了也不许随便哭的世道啊！

我遥望着吉林市方向的天空，悲伤地流着眼泪，在间岛土地上祈祷亡人的冥福。

我怀念着孙牧师，怀念着父亲，我悲泣。我发誓为守父辈的英灵，一定要为他们报仇，光复祖国。

我认为，只有光复祖国的道路，才是向恩人报恩的道路，才是消除他们的灾难的道路，才是打碎人民身上镣铐的道路。

从那以后，我和孙贞道牧师的遗属走了不同的道路。直到本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仍未消除的分裂的悲剧，以铁丝网、混凝土壁障和波涛汹涌的大洋，无情地把我们分开：我在平壤，孙仁实在汉城，孙元泰在奥马哈（美国）。我们半个多世纪没能互通音信。

但是，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孙贞道牧师和他的遗属。对他们的回忆，与岁月一道绵绵不断于我的心中，虽经时间和空间的不断交替，也没有风化或污染。

民族的悲剧越深化，把我们分开的壁障越高，对那些为这块土地流了热泪，为这个国家洒下了鲜血的恩人和烈士的缅怀，就越痛切地深入我们的心田。

历史对这一缅怀之情并没有置之不理。

1991年5月，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当病理学医师的孙元泰——孙贞道牧师的小儿子，应我国侨胞事务部的邀请，偕夫人（李有信）前来我国访问。当年在松花江畔的沙滩上，少年会会员和留吉学友会会员分成“地”队和“海”队搞军事游戏时，孙元泰总是缠着要跟我在一个队里，那个十几岁的软弱小学生孙元泰，现在变成年近80的白发老人出现在我面前。60年风霜的恶作剧也没能抹掉清楚地印在他白发下面的吉林时代的痕迹。

孙元泰喊了一声“主席”，就扑在我的怀里紧紧拥抱我，泪如雨下。这集中了千言万语的眼泪，的确是包含着无数情由的眼泪呀！在漫长的岁月里，缅怀之情烧焦了我们的心，可我们为什么已经白发苍苍才重逢，是什么东西把我们的重逢拖了半个多世纪呢？

60年，是几乎等于一个人一生的漫长岁月。在超音速飞机满天飞的文明时代，十几岁离别的人，快80了才重见面，那么，不断地把我们推向老年的那个时间的累积，不就太无情，太空虚了吗？

“孙先生，你的头发怎么这么白了？”我不是用对待过去的少年

会会员，而是用对待一位具有美国公民权的老学者的口气问他。

孙元泰像在吉林时代那样用有点娇气的表情望着我说：

“我一心想见到金主席，想得我头发都白了。”

他说：“我在吉林时代就像跟哥哥一样紧跟主席，主席也像待亲兄弟一样爱护我，恳求您免了‘先生’这个称呼吧。”

“好，那就像当年一样叫元泰吧！”我笑着说。

有些拘束的感情顿时云消雾散。我们好像回到了吉林时代。我甚至觉得这不是在平壤的会客室，而是在吉林当年的住处见到他。在吉林时代，我常常到孙牧师家去，孙元泰也常到我住宿的人家来。

像车光秀那样经常歪着脑袋，身材矮小、沉默寡言的少年，可是一旦开口，就不断讲出富于机智的玩笑和幽默，使对方不由得发笑的第四省立学校小学生孙元泰，现在成了病理学医师，这使我感到惊异，不知不觉地他已成为处于人生黄昏时期的白发老人，这更使我惊讶。我不由得大有隔世之感。在吉林离别好像是昨天的事，可是那么多情善感的少年时代已不知去向，我们已经变成了老人，把那时的往事当做故事来讲。

我一个接一个地回忆起在吉林同孙元泰相处的日日夜夜。不仅是少年会的生活，连在街上赚小孩兜里零碎钱的块糖贩子，也都成了我们的话题。

吉林的糖贩子可实在刁滑，他想吃糖，就从木盆里拿出一块来放在嘴里舔，舔够了再吐出来放在盆里卖。那些买糖吃的孩子，哪里知道那块糖是糖贩子舔过的。

我们回忆着这些，忘记了一切忧愁，大声笑起来。

孙元泰说，和在西方流传的风闻不同，主席神采奕奕，说着还无拘无束地把我的手拉过去，看了好一会儿手纹。

这着实把我弄糊涂了。

“命纹这么好，一定会万年长寿，总统纹又这么清楚，所以，作为国家的领袖受到高度的尊敬。”孙元泰笑着说。

我在一生中头一次见到给我看手纹的人，也头一次听说人的手纹中还有总统纹。我想，孙元泰看我的手纹，说命纹长，可能就是他祝我长寿的心情的表达；说总统纹清楚，就是他对我们事业的支持的表示。

孙元泰毫不拘于会见一国元首的礼法观念，甚至还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请求：

“主席，什么时候给我买浆汁果子呀？在吉林的时候跟主席一块吃过的冰糖葫芦，也想吃呢！”

我听了他这话，心情十分激动。

因为他提出了不是亲兄弟就很难提出的要求。他是真地把我当做亲哥哥来对待的。我忽然想起他已经没有哥哥了。他的哥哥孙元一在南朝鲜当过国防部长官，几年前作古了。

我无论怎样真诚地招待孙元泰，也是达不到孙元一照顾自己弟弟的那种爱的高度的。

不过，想吃“浆汁果子”和“冰糖葫芦”的愿望，还是可以给解决的。所谓“浆汁果子”就是豆浆和油炸的麻花样的中国食物。在吉

林的时候，我领着孙元泰和孙仁实逛街，给他们买过几次“浆汁果子”。

我给他们买“浆汁果子”，他们小兄妹每次都吃得那么香。想到孙贞道先生给予我的帮助，就是把我所有的钱全掏出来，也要给他们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这是我当时的心情。可是，我手中的钱还不足交学费呀！

我认为孙元泰不是真的想吃“浆汁果子”才提出这种要求的。他只是用“浆汁果子”这个词来表达了对我们像亲兄弟、亲兄妹一样亲密相处的吉林时代的怀念罢了。

“你要是想吃‘浆汁果子’，下次给你做。”

虽然孙元泰是开玩笑说的，可是我却想真地给他做“浆汁果子”吃。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做，而不是下次。他毫无拘束地问我什么时候给他买“浆汁果子”，这使我受到了极大的感动。

两天后，我们的厨师做的“浆汁果子”送到了孙元泰夫妇面前。听说，孙元泰在早饭前收到“浆汁果子”，咽着眼泪说，多蒙金主席关怀，吃到了小时候喜欢吃的“浆汁果子”啦。

人情具有比时间的力量强大得多的力量。在时间面前一切都要褪色、凋落，只有人情是无法埋没的。真诚的友情和爱是不会衰落，也不会变质的。

由于走的路不同暂时中断的我们的友情，越过60年的时间空白，又连接起来了。

我们久别重逢，合唱了在吉林时唱过的《思乡歌》。令人惊奇的是，我竟然没有忘记歌词，他也全都记得。

孙元泰说，他没有为民族做什么事情，没有脸见我。不过，这是他谦虚的话。他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作为学生会监察部长参加过学生运动，也参加过排斥日货运动，是个爱国青年。

这成为后来把他押送到长崎监狱去的根据。

他一生与政治隔了一道墙，从他的面貌中仍然可以看出他在吉林时代的那清白纯真的风格。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的环境中，一个人要不失有良心的人的体面，清白廉洁地生活，是不容易的。

孙元泰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衷心地表示赞同，极度赞扬我们祖国是“美丽高尚的国家，为子孙万代建设的国家”。

虽然他来得太晚了，但我还是为他前来访问我们，回顾吉林时代的往事，感到万幸。

孙元泰洋溢着的爱祖国、爱民族、爱人民的精神面貌，就是孙贞道的面貌，就是孙仁实的面貌。他每当见我总是说“主席，您可不要老，长寿啊！”他衷心地为我的健康担心的面貌，和60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的孙贞道牧师的面貌相仿佛。

那天，孙牧师送我时说：

“形势险恶，你不要再待在吉林了。这里的情况确实非同寻常呀。时局严重，你不论到哪里去都要注意安全啊。到间岛去最好还是暂时隐蔽在偏僻山村休养吧。”

为我的安全担心的体贴的情义，使我感激不尽。九·一八事变后的满洲形势雄辩地证明了，孙牧师的劝告是多么适时。占领了吉林的日本军警，从那时起就搜捕我。他们翻着吉林监狱的名册，要求军阀

把金成柱交给他们。如果不是依靠孙贞道牧师和高远岩、吴仁华、黄白河等独立运动者的后援，及时被释放出狱，我就会被日本帝国主义者逮捕，再过十年左右的狱中生活。如果在监狱里再待十年的话，那么开展武装斗争就会成为不可能了。

我说孙牧师是我的救命恩人，理由就在这里。

要数起我在吉林的时候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革命斗争的人，那实在是数不胜数了。他们当中有崔万荣、吴尚宪、金基丰、李基八、崔日等上一代的独立运动者，有崔重渊、申永根、安信英、玄淑子、李东华、崔峰、韩周彬、刘振东、崔真恩、金学锡、禹锡允、金温顺、李德荣、金昌述、崔宽实、刘绣景等同年辈的先觉，也有李东鲜、李敬恩、尹善湖、黄贵轩、金炳淑、郭然奉、全恩深、安炳玉、尹玉彩、朴正元、郭基世、郑行正等爱国少年。

从形势发展的趋势来看，我感觉到不能再待在吉林市了。这是我在监狱里有所预料的。孙牧师为不能把我留在他家保养而要送走，感到抱歉。但是，我以感激的心情接受牧师的劝告，在他家吃了午饭就动身奔向新安屯了。

二　严峻的春天

没想到我在路上碰到了车光秀。“愣头儿青”的眼睛在高度近视镜后面闪着喜悦的光。我也高兴得从老远就欢呼起来。

车光秀说，他正要到孙贞道牧师家去打听我的消息，说着把我抱起来转了几圈。

他说，为革命奔走的人都被抓走了，孤寂得简直要发疯。在谈了一阵吉林的消息后，他忽然说：

“成柱，朝鲜的工人运动在各方面都有了飞跃的发展。斗争口号、斗争方法、斗争情形……一切都是新的。我想，3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斗争的形式会有很大的变化，你说呢？现在，我们的革命不是应该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打出新的旗帜前进了吗？”

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

在那别说是革命家的理想，就是一己的生命都难保的杀气腾腾的时代，他并没有在敌人的攻势面前畏缩或吓破胆，反而化了装到处寻找同志，作为共产主义者继续进行着摸索。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我们的革命应该举起新的旗帜前进，对光秀同志的这一看法，我也有同感。不过，这个旗帜是什么呢？就这个问题，我在狱中想了

很多，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者要建立新型的党，斗争要过渡到武装斗争。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救国，才能获得民族的解放。朝鲜人民进行的一切斗争都应该发展成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轴，全民族总动员的举族抗战。”

我把我在狱中的想法照实说出来了。

车光秀对我的想法表示了绝对的支持。到了新安屯，同金赫、朴素心等同志们商量，他们也都表示同感。不拿起武器就不能挽救朝鲜，不依靠新的路线就不能推进革命，这是青年共产主义者们一致的主张。

武装斗争是朝鲜的具体现实提出的成熟的要求。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强权统治达到了顶点。朝鲜民族的无权和贫穷达到了极限。从1929年开始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已经波及日本。日本帝国主义把对亚洲大陆的侵略看做摆脱大危机的出路，一面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一面强化对朝鲜的殖民压迫和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把对朝鲜民族的掠夺和压迫当做富国强兵的道路，而我们民族则把反日斗争当做民族复兴的道路。偏重于经济斗争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群众运动，开始逐渐带上暴动性质，这并不是偶然的。

当时，我很感兴趣地关注新兴煤矿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最后也发展成暴动了。好几百名工人在罢工团的领导下，袭击并破坏了煤矿的验煤所、办公楼、机械室、发电室和经理住宅，切断了煤矿的所有电线，破坏了卷扬机、泵等生产设备。罢工的工人们给公司造成了巨

大的损失，以至经营煤矿的日本人发出悲鸣，说花两个月时间才能恢复煤矿。

这次暴动由于武装警察队的介入出现了逮捕一百几十人的可怕情形，震撼了全国。

因为这次暴动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后来我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曾冒着危险到新兴地区去会见了工人运动领导人。

朝鲜工人阶级的斗争，在组织力、团结力、持久性和互相支援方面也比从前有了质的发展。

加入了元山劳动联合会的两千多名工人，在劳动联合会的领导下，同一万多名家属一起，顽强地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罢工。

全国的工人和农民听到元山总罢工的消息后，从各地发去鼓励电和号召书，送去了捐款，还派代表支持和声援他们的斗争。

不消说洪原、会宁等国内各地的劳动组合，就是在远离元山几千里的吉林，也有我们组建的反日劳动组合所属汗诚会的成员征集捐款送给元山劳动联合会。可见当时我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多么高。

元山总罢工是标志着20年代我国工人运动顶点的事件，它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浮雕式地显示了朝鲜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和革命性。

我在狱中深切地注视着元山总罢工的整个过程，认为这一斗争是值得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大书特书的，他们的经验是朝鲜的社会运动者都应参考和学习的有价值的经验。

如果当时更新的劳动联合会领导班子没有下复工指示，而坚持了罢工，或者全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与这次罢工相呼应，开展大

规模的实力斗争，那么，元山工人阶级的斗争就会以胜利结束。

通过元山总罢工的失败，我再一次迫切地感到在朝鲜尽快建立一个能够胜利地组织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马列主义政党的必要性，并且确信当武装斗争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大力开展的时候，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的斗争也将在这个背景下更激烈地展开。

在敌人用铁拳野蛮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况下，朝鲜人民的斗争就将不可避免地朝暴力化的方向发展。革命的暴力才是能够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反革命暴力的最有把握的斗争手段。在敌人动武的情况下，朝鲜民族也不能不把自己武装起来。对武装，必须以武装来对付。

用旨在振兴教育、文化和经济的纯粹的“培养实力运动”，用工农群众的抗议或外交活动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祖国独立的。通过元山总罢工和新兴煤矿矿工的暴动，我们无比信赖朝鲜工人阶级，我在这过程中怀着深厚的爱和自豪的心情，感到我国工人阶级是优秀的工人阶级，朝鲜民族的确是战斗的民族。

问题是路线和领导。我有了只要有符合时代趋势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任何强大敌人都能战胜的坚定信心。必须迅速恢复和整顿遭到破坏的组织，不断地开展使群众意识化、组织化的工作，以使群众尽快作好同日本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我为此心急如焚。

其间，分散的同志们得悉我已获释，便一个接一个地找我来了。

我同吉林地区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反日劳动组合和农民同盟的骨干分子坐在一起讨论了在敌人的白色恐怖强化的情况下怎样才

能迅速恢复和整顿组织，团结群众的问题。

使车光秀兴奋的“武装”这个词，在这里也得到了青年们的支持。这一支持大大鼓舞了我。

我们讨论了在间岛和朝鲜的北部边境一带加强共青同盟的工作，迅速实现这一地区的革命化的措施，同时还讨论了扎实地进行建党准备工作等当前的几项任务，然后为执行这些任务，向各地派了工作员。

我也在新安屯住了一宿就前往敦化了。

我所以把敦化定为工作地点，是因为那里便于同东满各县取得联系，而且那里有几位亲友可以帮助我。我打算在那里住一段时间，给各组织提出对付正在激烈进行暴动的东满事态的活动方针，并制定把在狱中酝酿成熟的构想付诸实践的具体措施。

离开吉林时，使我感到最遗憾的是没能遵守父亲要我无论如何也得念完中学的遗嘱。

朴一波劝我说，他将让他父亲出面向毓文中学当局交涉我的复学事宜，要我念完中学。

他是在吉林办《同友》杂志的民族主义者朴起伯的儿子。朴宇天是他的笔名。我上毓文中学时，他上吉林法政大学，帮助留吉学友会工作。他的希望是进入司法界。当时他说要学俄语，老跟白俄军官在一起。我们的同志认为同白党军官接触是对新兴俄罗斯的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所以他们劝我断绝同他的来往。

我对这些人说：“学了外语，可以为革命积累很大资本，如果因为

他老跟着白党军官就加以排斥，那就未免太狭隘了。”解放后，朴一波所以能翻译出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等许多名著介绍给读者，可以说是因为他在学生时代坚持不懈地学了俄语。

和朴一波一样，金赫和朴素心也劝我，如有可能，还是要复学，再学一年，学完中学课程。他们说，李光汉校长是位对共产主义有理解的人，如果金成柱提出再学一年的请求，他是不会拒绝的。

我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告。我说，学习嘛，完全可以自学，人民在等我们，遭到破坏的组织在等着我们，怎么能撇开面临困难局面的革命，回到学校去呢。

打消了继续上学的念头，真地要离开吉林市了，我禁不住思绪万千：父亲生前为了让我到祖国学习，数九寒天让我孤身一人回故乡；我放学回来就让我坐在书桌前给我讲朝鲜历史和朝鲜地理；临终给母亲留下遗言说，我本想无论如何也要让成柱上中学，现在却要由你来继承我的意志，即使一天三顿用草充饥，也一定要送成柱上中学……这些往事浮现在脑海里，使我心绪纷乱。

三年来不眠不休地给人洗衣、做针线，月月给我送学费的母亲，听到我离毕业仅一年却要中途退学的消息，该多么失望啊，弟弟们又该多么难过呀，还有那些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爱护我，补贴过我学费的父亲的朋友和我的同学们，又该感到多么惋惜呀！

但是，我想母亲是会理解我的。父亲从崇实中学中途退学时，母亲也无条件地顺从和支持了父亲要退学做职业革命家的意志。所以我相信，儿子即使不是从中学而是从大学中途退学，只要是为了革命，

为了祖国，母亲就不会反对。

从毓文中学辍学，深入到人民中去，这在我的人生中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我开始了地下活动，开始了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新的人生。

出狱后未能给家里写一封问安的信就要前往敦化，我心乱如麻。虽说是专心于革命，可是一两行问候的信不是可以写的吗？我这样自己责备过自己，可是不知怎么总也写不下去。

入狱后，我也怕母亲担心，没有把这事告诉她。可是到我们家去过1929年寒假的同学们，竟把我入狱的始末告诉了母亲。

母亲听了这事以后也没有到吉林来。一般母亲得知儿子坐了牢就会不远千里带着个包袱赶到监狱哀求看守允许她跟儿子见面的。可是我母亲并没有那么做。母亲是发挥了相当大的忍耐性。当父亲在平壤监狱里受苦的时候，母亲多次去探监，甚至连我也带着去，可是十年后儿子被抓进监狱却一次也没去探监，人们可能觉得奇怪。

后来她在安图见到我时，也没给我说明没有去探监的理由。

可是，我认为母亲的真正的爱就表现在没有去探监上。

在监狱里见了妈妈，我的成柱反而会难过；我去探监，能给那孩子多大的安慰和帮助呢；前面有很多山岗要过，如果从第一步起就囿于人情，那么那孩子将来能走正路吗；宁可让他在狱中感到孤独，也不去探监，对那孩子是会有好处的……

看来，母亲是出于这种心情，果断地打消了探监的念头。

我从这一事实中发现了母亲已由纯粹的普通妇女成长为刚强的革

命者的母亲。

结束狱中生活走上了广阔的世界，我心里产生过这样的念头：现在不受学校的约束了，不是应该回家去，照料照料母亲就是短短几天也好吗？可是我毅然决然地朝着敦化迈开了步子。

从敦化朝西南方向走60来里路有个叫四道荒沟的山村。这就是我负责的工作地点。

在我入狱后，为了预防在吉林掀起的逮捕旋风波及抚松，许多加入共青同盟、白山青年同盟、妇女会等组织进行活动的人家搬到安图、敦化方面去了。母亲也在寒冷的冬天和亨权叔一起带着弟弟们搬到了安图。

当时，几十户移居东满的人家中有六户在四道荒沟安家落户。在这六户中有高在凤一家。

高在凤靠正义府的助学金从抚松师范学校毕业后，在白山学校任过教，后来又参加了独立军，任抚松地区别动队指挥员。他是反日群众团体的骨干分子。

他的弟弟高在龙是我在华成义塾时的同学。后来，他参加了杨靖宇部队，在濛江或是在临江阵亡了。

高在凤最小的弟弟高在林在白山学校毕业后，上了吉林毓文中学，和我一起进行过共青活动，从1930年春起在满铁医专学习。他在吉林时常常帮助我。

高家的人原来在抚松的时候就跟我们家格外亲近。他们奋不顾身地帮助了我的父母。他们开个旅店，给了我父亲和母亲很多帮助。

当时，在小南门街的我们家，随时都有许多爱国志士和独立运动者来找。其中有些人在我们家食宿。母亲为了招待这些人，手里总是放不下淘米盆和水罐。这不能不引起军阀的注意。

高在凤的母亲（宋桂心）知道警察在监视我父亲之后，有一天到我们家来说：

“金先生，今后你家就不要接待客人了。你家像现在来人这样多，金先生就可能遇到不祥的事。来抚松的独立军客人都由我们包下了。请你把那些来找抚林医院家的客人都送到我们家去吧！”

因此，我父亲就非常信任高在凤的母亲，我也跟高在凤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白山学校停办后，我母亲为了解决作教室用的房子四处奔走，高在凤家又慷慨地腾出上屋用作教室。

高在凤搬到四道荒沟不到半年,就已经设立东兴义塾来教育孩子，还利用副百家长的身分在四道荒沟及其附近村庄组织了共青同盟和白山青年同盟，接着又准备组织反日妇女会和农民同盟。

高在凤的母亲见到我，高兴地流着眼泪，回忆起在抚松时的往事。我告诉她，我去年秋天坐了牢，不久前出狱，便径直来到四道荒沟。她端详着我的脸说，模样没变，可是有点浮肿，一脸病容，你母亲知道了，该多么痛心呀。我在她家住了一个来月。

高在凤的母亲为了保养我的身体，费了不少心血。

她精心地给我做饭菜，有大麦米、小米做的饭，还有拌山菜，每餐还给我单开一桌。可是她却抱歉地说，没什么好吃的，对不起。一

想到她家搬到这陌生的山沟里来，不能开客店，刚种上头一年庄稼，外孙们又来投靠她家，我就咽不下饭。

宋桂心大娘在抚松的时候就熟悉我的口味，所以把村里唯一的一架压面机借来，给我做冷面吃，高在凤又到敦化县城去买来腌鳟鱼放在我的饭桌上。高在凤的妹夫为捉治浮肿有特效的“尚蝈”，每天大清早就到泉边去。在他们一家的真诚护理下，我的健康迅速地得到了恢复。

高在凤专程到安图去见了我母亲。四道荒沟到安图有200里路左右，这么远的路他一天就走到了。据说，高在凤像小说《林巨正》里的黄天王童那样一天能走300里路。

哲柱听到我已出狱正在敦化的消息，便跟着高在凤到四道荒沟来找我。哲柱给我带来了母亲的信和我的内衣。我看了那封信才知道，我家原住在旧安图（松江）西门外马春旭的家里，后来搬到了兴隆村。母亲住在马春旭的家时租了一台缝纫机做针线活，吃了很多苦；到了兴隆村，继续做针线活，以维持生计。

直到那时，哲柱对新的地方还没有产生感情。他一直住在中江、临江、八道沟、抚松等滨江的城市里，在他看来，远离平原和铁路的安图是过于冷清的乡村，是需要新开拓的又一个生疏的地方。

“哥，你出狱后去过抚松没有？”哲柱突然问我。

“很想去，可是没有去成。我连家都没能回，就径直来到敦化，怎么去抚松呢？”

“抚松的人都很想看哥哥呀，蔚华哥每天都来我们家一次打听哥哥的消息哪。抚松的人可真好！”

弟弟的声音里满含着对抚松的怀念。

“是啊，真好啊!”

“我老是想念那些留在抚松的朋友。哥哥如有机会到那边去，一定要见见我的朋友们。”

“好吧。你来到安图也交了很多朋友吧？”

“还没有交多少。安图没有多少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

我觉察到，哲柱到新的地方后仍然怀念着抚松，正因为这种怀念，不能深入到安图的生活中去，糊里糊涂过日子。弟弟那好像充满哀愁的眼睛和凄凉的表情，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这是他这个年纪的望乡少年中常见的对现实的一种反感的表示吧。弟弟的不安定的精神状态，不知怎么，使我的心绪也乱了。

“哲柱，在勤勉的庄稼汉手下，地无好坏，同样，对优秀的革命者来说，地方没有好坏。安图怎么就会没有好同志呢？看你怎么找吧。父亲不是常说，同志不是从天上凭空掉下来的，要像开采宝石那样找出来吗？你要多找出些好同志来，把安图很好地开拓一番。你不是也已经到了该过共青生活的年纪了吗？”

我再三向弟弟强调，要作好加入共青同盟的准备。

“我懂了。让哥哥操心了，对不起。”弟弟振作起精神，表情严肃地望着我。

在那以后，哲柱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同盟。

在四道荒沟逗留期间，我帮助高在凤、高在龙等同志组织了少年探险队、农民同盟和反日妇女会，同时还为同分散在东、南满各地的

革命组织成员取得联系做出了努力。我通过高在凤给龙井、和龙、吉林的联络站发出了信。金赫、车光秀、桂永春、金俊、蔡洙恒、金重权等十多名同志接到这封信后来到四道荒沟。他们都是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领导成员。

我通过他们了解到，震撼东满一带的暴动比预想的更激烈。

这一暴动的主力正是居住满洲的朝鲜人，鼓动和引导他们投入暴动的是韩斌、朴允世等朝鲜人。他们号召人们参加暴动，说要想转入中国共产党，就要在实际斗争中立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承认。

当时正是在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根据共产国际提出的一国一党制原则，放弃重建党的运动，为转入中国共产党而开展猛烈活动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也宣布，经过实际斗争考验和个别审查，在只可以个人资格入党的原则下接收朝鲜的共产主义者。

这样的时候，连共产国际派来的人也到处去鼓动暴动，因此，一心想转入中国共产党的满洲总局所属朝鲜共产主义者们，便把自己的政治野心和名利放在首位，驱赶人民投入了冒险的暴动。

他们连那些不该清算的对象也给清算了，甚至放火烧了学校和发电站。

五·三〇暴动给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军阀提供了在满洲地区镇压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日爱国斗争的借口。在满洲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成了残酷的白色恐怖的对象。

群众付出巨大的牺牲，被赶到农村和偏僻山区。与庚申年大“讨

伐”[1]相仿佛的惨案，在东满各地发生。拘留所和监狱都关满了暴动群众。许许多多与暴动有关的人被押送回朝鲜去。他们被押送到汉城后，都被判处极刑和重刑。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离间朝中人民，宣传什么朝鲜人在东满举行暴动是为了夺取满洲土地。奉天军阀也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奸计，残酷地镇压了暴动群众。

军阀头子们听信这种宣传，大肆杀害暴动群众，说什么朝鲜人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应该都杀掉。愚蠢的军阀竟把共产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等同看待。

五·三〇暴动期间被捕被杀的人实达几千，其中大多数是朝鲜人。被逮捕的人中，有不少的人被处以死刑。由于暴动，我们的革命组织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暴动使朝鲜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恶化。

后来，李立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被定为“盲动主义路线”、“小资产阶级狂热症”。

李立三的苏维埃红军路线是不符合东北地区实际情况的冒险主义路线。

那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严厉地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共产国际也通过11月16日的信，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满洲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和联席会议，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

我们也在1931年5月春季明月沟会议上批判了李立三路线，采取了

克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措施。

但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流毒，在那以后也没有彻底被清算，连续几年对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发生了影响。

聚集到四道荒沟的青年们痛惜地说“朝鲜民族的鲜血可惜”，焦急得捶胸顿足，说“我们的革命要在混乱中彷徨到什么时候啊”。

我想到应该给他们以力量，便说：

“暴动的后果严重是事实。但是，因为后果严重，就只坐在那里叹息，有什么用呢？不要只是叹气，而要到各地去恢复组织，处理善后。重要的是揭露宗派分子的野心，使群众摆脱他们的影响。为此，就要给他们指出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虽然暴动以流血告终，但是群众会通过这一过程大大得到锻炼，提高觉悟。朝鲜民族通过这次暴动充分发挥了战斗力和革命性。我从我们民族的伟大的忘我的斗争精神中得到了巨大的力量。如果教给这种人民科学的斗争方法和策略，给他们指明民族应走的道路，那么，我们的革命就将出现新的变化。”

同志们听了这一号召，也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一星同志说得对。不过，能使群众共鸣的新的前进道路在哪里？”他们以着急的心情望着我说。（一星，指金日成同志。本卷第97页有详细说明——译注）

我对他们说：“那种路线不会从天上自动掉下来，也不会有谁制订出来献给我们。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制订出来。我在狱中想过，现在提出来，想征求同志们的意见。”

于是，我把曾经同车光秀、金赫、朴素心等同志讨论过的朝鲜革命的路线问题提出来，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就是四道荒沟

会议。我提出的方案在这次会议上也得到了同志们的支持。

在东满的各个角落酿成的惨绝人寰的流血，再一次使我激愤和觉醒。我想象着在这一动乱当中人民捂着胸膛倒下去的情景，一直在思索，怎样才能把朝鲜的革命群众从血泊中拯救出来，怎样才能把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从逆境中挽救出来，引导它成为乘胜长驱的革命。

革命在等待着武装。革命在等待着很好地组织起来的、训练有素的革命军队和人民，等待着能够引导两千万人民走向胜利的纲领和能够执行这一纲领的政治参谋部。

内外形势要求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在解放祖国和民族的神圣战争中来一个变化。如果没有这种变化，我们民族就要流更多的鲜血，遭受更多的灾难。

我抱着这种变化的突破口要由我们来打开，并在1930年夏实现这种变化的决心，不断地把思索的要点记在本子上。

我们同离开四道荒沟的组织成员和工作员约定，各自完成所担负的任务之后，6月下旬在卡伦重新会合。

在那以后，在敦化召开了吉东地区党的会议。

会上讨论了有关暴动的问题。专事派别斗争的分子们计划再发动一次像五·三〇暴动那样的暴动。

我批判五·三〇暴动是冒险的暴动，并反对了他们的计划。

那年，我继狱中生活之后又经历了五·三〇暴动，有很多体会。

1930年春，的确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成长之春、考验之春。在这个春季里，我国革命为新的变化作了准备。

三　卡伦会议

6月下旬，同志们按照约定陆续来到卡伦。卡伦早已有了我们的革命组织。1927年起，我们就感到有必要在较便于往来满洲各地的交通分岔点上设一个活动基地，便派共青骨干分子开拓了这一带。

我们决定在卡伦召开会议，是因为考虑到这里交通方便，又是一个能够绝对保证与会者安全和保密的隐蔽的活动基地。卡伦虽然是反日运动者来往频繁的地方，但还没有被敌人发觉。这里的人民又不惜一切地支援我们的工作，所以，作为会议场所是理想的。

我抵达卡伦时，早有少年探险队总队长郑行正在车站等着我。我每次到卡伦，他总是到车站迎接我，和我同行。

我到卡伦一看，这里的空气比敦化和吉林稍平稳些。

因为当时是五·三〇暴动过后，间岛的空气非常险恶。加上，日本军向东满出兵迫在眉睫，使形势更为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出兵间岛的目的，是要镇压这一带迅速扩大的革命运动，确保占领满蒙，使之成为进攻苏联的桥头堡。为此目的，驻扎罗南的日军19师师长河岛中将正在巡视龙井、延吉、百草沟、头道沟等地。在同一时间，国民党吉林军参谋长和民政厅厅长也视察了东满。

间岛地区的革命组织号召从东满赶走日军中将、国民党参谋长和

民政厅厅长，也是在这个时候。

那时，我到卡伦把住处定在进明学校教师刘永宣和张小峰家。

张小峰一面在进明学校教书，一面又兼任《东亚日报》支局局长。他和车光秀一样，善于写文章，见识高，工作又好，受到同志们的爱戴。他的缺点是回家后常常跟妻子吵架。同志们劝他，他总是埋怨说，老婆太封建，合不来。为了让张小峰对家庭生活感兴趣，我对他进行了多次说服和批评，可是没怎么见效。

朝鲜革命军成立后，张小峰到长春购买武器时被捕转向了。据说，他还参与过要我“归顺”的工作。

在卡伦的革命化方面，金赫和张小峰的功劳特别多。他们同此地有志者合作，建立了学校和夜校，以此为据点开展教育运动，将农民会、青年会、少年会、妇人会等从前的启蒙团体，改组为农民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少年探险队、妇女会等革命组织，把各阶层群众出色地教育成为抗日革命的战士。

金赫主持创刊《布尔什维克》杂志的地点，也是卡伦。

我到了卡伦也和在四道荒沟时一样，继续探索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探索了一个月左右，整理好写出来，便成了很长的文章。

我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深切地感到我国民族解放斗争要求新的指导理论的迫切性。

没有新的指导理论，革命就寸步难行。

被压迫人民要求自主性的革命斗争，进入30年代在全世界越来越扩大。在地球上，被压迫人民的反帝、解放斗争最激烈的大陆是亚洲。

亚洲之所以成为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舞台，是因为帝国主义到了这个时期更加加紧了对亚洲后进国家的侵略，也是因为东方许多国家的人民勇敢地站起来，在各地为维护民族主权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东方人民为驱逐外来势力，在自由的、民主的新社会里生活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

与苏联革命和蒙古革命的发展相呼应，在中国、印度、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等亚洲许多国家，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在以非暴力不服从运动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印度，纺织工人打着红旗举行示威，也发生在这个时期。

中国人民在第二次国内战争的烈火中迎来了30年代。

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开展的革命斗争和国内人民的积极斗争，使我们无比兴奋和奋发起来。

只要建立起党，提出正确的指导理论，就完全能够把人民发动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信心作为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

到了这个时期，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上，仍有代表各党各派的立场和利害关系的各种主义和主张登场，把群众引向这一边或那一边。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难免都带有这样那样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在那时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我们认为最高形式的斗争是独立军的武装斗争。民族主义左翼阵营中最积极的反日独立运动者和爱国者参

加了这一斗争。他们组织起独立军部队，开展了武装斗争，他们相信只有进行独立战争才能光复祖国。

有些人认为只有开展大部队的军事活动才能取得独立；有些人主张只有直接的恐怖战术，才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好的办法；还有些人说，先把军队训练好，等到苏联、中国、美国等大国同日本开战时，再同他们联合起来争取独立，这才是符合朝鲜实际的战略。

所有这些主张，无论哪一种都是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血战的。

但是，独立军的斗争，没有具备能够切实贯彻这一宗旨的科学的战略策略；没有具备能够把独立战争打到底的强有力的、老练的领导班子；又没能打下能够从人力、物力、财政方面支援这一斗争的牢固的群众基础。

在改良主义理论中，称为“培养实力论”的安昌浩的“准备论”成为独立运动者们议论的话题。

我们尊敬安昌浩，认为他是把一生完全献给了独立运动的清白廉洁的有良心的爱国志士，但对他的理论，我们并不赞同。

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非暴力独立运动路线，也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共鸣。

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之所以在成立后不久就令人失望，也是因为它始终乞求于连一线希望都没有的非暴力外交路线而虚度岁月的缘故。因此，把军事路线绝对化的独立军，对此态度十分冷淡。

至于李承晚哀求国际联盟将朝鲜置于其委任统治下的请愿，则说不上是什么路线；民族主义右派所提倡的“自治论”，也只不过是一种

与民族的独立精神相违背的梦想而已。

1925年成立的朝鲜共产党，也还没有制定出符合朝鲜实际的科学的战略策略就不存在了。

总的来说，前一代的战略和路线的普遍弱点是不相信和无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前一代的运动者们，都无视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人，推动革命的力量也在于人民群众这一真理。只有依靠千百万群众组织起来的力量，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我国的反日运动者们却认为，革命也好，独立战争也好，都只能是由几个特殊人才搞的。

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也站在这种立场上，不怎么做打基础的工作，用由几个上层人物组成党中央加以宣布的方法制造了党，而不深入到群众中去，致使三人一党、五人一派地分裂成好几派，搞了好几年夺取领导权的争斗。

前一代的路线和战略还有一个严重的弱点，就是没有扎实地立足于朝鲜活生生的现实。

我认为，要想提出符合朝鲜活生生的现实的正确的指导理论，就不要将经典著作和别国的经验加以绝对化，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独立自主地、用独创性的方式解决一切问题。确定指导理论，既不能囫囵吞枣地吸收十月革命的经验，也不能袖手坐在那里光指望共产国际给你带来万应灵丹式的处方。

“我们可以相信的只有人民群众的力量。要相信两千万人民的力量，把这个力量团结成一体，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血战吧。”

在我的心里常常发出这一呼声。

我抱着这种冲动，努力把今天我们命名为主体的那个思想反映到报告的每个字句中去。报告要反映的内容都是些有关我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

那时，我对武装斗争问题想得特别多。

我们在报告中，把用武装力量全面开展抗日战争作为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路线，作为朝鲜共产主义者头等重要的任务提了出来。

决心开展武装斗争，并把它确定为方针，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在卡伦把这作为方针通过时，我们还只是赤手空拳。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主张，要开展武装斗争，就要用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双手去建立新型的军队。

那时，有些人提出异议说，独立军既然存在着，那么加入独立军进行活动就行了，何必另建军队呢？那样不就招致反日军事力量的分裂吗？

在独立军趋向右倾和反动的情况下，用到那里去更新军队的方法开展武装斗争，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

1930年，当时独立军的兵力是非常薄弱的。虽说国民府属下有独立军的兵力，但也不过只有九个中队。连这点兵力也因上层的分裂，分成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互相对立。

所谓国民府派是把独立军十多年来坚持的既有方针绝对化的保守势力；而反国民府派是反对既有方针，追求新的路线的革新势力。反国民府派人物对共产主义表示赞成，也曾企图与共产主义者携手。日

本帝国主义把他们视为“第三势力”。意思是说，他们既不是民族主义者，又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一种中间势力。在民族运动内部出现了像反国民府派这样的“第三势力”，这证明，要把这一运动的方向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愿望，已进入了实践阶段。

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的对立，造成了独立军力量的分裂，民族运动内部陷入了混乱。

独立军的各中队大体上都驻扎在不利于打游击战的平原地区的村庄。他们武器低劣，军纪紊乱，训练不力，又没有搞好同群众的关系。

独立军已不同于像青山里战斗[2]、凤梧洞战斗[3]那样痛快地歼灭日寇大部队的20年代初的全盛时期了，它已经走上了逐渐衰落的道路。

我为参加南满青总大会到旺清门的时候，同玄默观谈到国民府时曾问过他：

“先生，用国民府的力量战胜日本，有把握吗？”

我这样提问，是因为他太夸耀国民府了，所以才刺激他一下。

“哪里有什么胜算，就这样挺下去，等大国给予帮助，就独立嘛。”

听了他的回答，我不觉愕然了。我想，连战胜敌人的胆量都没有，只是坐等大国给予援助，盲目作战，这样的军队能有什么作为呢？于是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国民府的先生们可不可以把武器都交给我们？只要把武器交给我们，我们就将在三四年内把日本鬼子赶走。

在对大会筹备委员进行白色恐怖之前，还可以开这样的玩笑。在吉林市时，我跟玄默观开玩笑，他也不见怪。

他没有回答，只是苦笑着。也许他在想，这个孩子在作幼稚的空

想吧。

靠国民府的军队，连维持现状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才想建立一支新型的军队。

我确信，只有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武装斗争，才是真正的最彻底、最革命的反日抗战。因为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把工人、农民等广大反日爱国力量集结到自己的武装队伍里来，才能以正确反映群众利益的科学的战略策略，认真负责地把武装抗战进行到底，领导整个朝鲜革命走向胜利。

我们要打倒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在中日、俄日两次战争中轻松地战胜了领土比自己大几十倍的大国的新兴军事强国。要战胜这样的强国，光复祖国，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意味着要战胜世界公认的日本的军事力量，意味着要战胜他们迷信的皇道精神，意味着要在同明治维新后新兴的日本将近70年来积蓄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战中成为胜利者。

但是，我们认为，只要开展武装斗争，就能在三四年左右的时间内打败日本。不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是很难这样设想的；日本军阀听了，也会捧腹大笑的。

若问那种想法有什么保证，那就无话可说了。因为当时我们两手空空，能有什么保证呢？

我们只有爱国精神和年轻人的血气。我们说三四年左右，并不是因为我们轻视了日本的力量，而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爱国精神比它更强，因为我们是正义的。如果说我们有保证，那就是两千万民众的

力量。当时我们有这样一种气概：只要把两千万民众训练好，到处打击日本军警，就能争取国家的独立。

因此，我们认为，要蓬勃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打好群众基础。

可以说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想，就是由此产生的。

我第一次认识到组织的必要性，是在华成义塾时期；而第一次感觉到民族的力量，把它记在脑子里，是在三·一人民起义的时候；我有了要深入到人民中去，把他们组织起来，依靠他们的力量进行革命的决心，是在吉林市的时候。

不进行两千万民众总动员的举族抗战，就不能摆脱殖民地奴隶的枷锁。如果是纯粹的阶级革命，那么只有工人、农民群众才是革命的动力；但我国革命的性质本身就是反对封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因此，我们主张，不仅是工人、农民，而且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爱国的宗教徒、民族资本家也都可以成为革命的动力。我们的原则是，把那些对民族解放具有利害关系的反日爱国力量都集结起来，都动员起来。

当我们提出了这一路线时，有些人摇着头说，这是经典著作里没有的。这些人说，共产主义者要同除工人、农民以外的阶层结成同盟，是一种梦想；同宗教徒、企业家阶层更是不能携起手来的。火曜派以金灿曾经有一个时期同国民府的几个人物有过来往为理由，撤了他的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负责人的职务，因为火曜派有这样的观点。

在民族主义者当中，也有不少人对待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冷淡。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民族主义是“违禁品”；而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

共产主义则是“违禁品”。这种倾向，招致了把民族的力量分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阵营的后果。

凡是具有理性的人，都为此感到痛心。在这些人的努力下，从20年代中叶起开展了争取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阵营合作的运动。这一运动在1927年取得了成果，成立了新干会。新干会的出现，说明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虽然信念不同，但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道路上是可以团结一致的。民众都对此表示热烈欢迎。

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破坏活动和被它收买和利用的改良主义者的瓦解活动，这个团体在1931年不得不宣告解散。

如果两种力量在爱国的大前提下形成了巩固的结合，那么，即便有内外的破坏，也不会那么轻易地垮下去的。

好不容易实现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合作，由于新干会的解散而流产，这使我们非常气愤。不把民族放在首位，只把信念绝对化，那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合作。如果把民族解放这一大前提放在首位，就能同任何阶层携起手来，这就是我当时的看法。

我们站在这种立场上，解放后同毕生反共的金九也进行了合作，现在我们也向所有同胞呼吁，要实现民族的大团结。实现了民族的大团结，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外来势力和卖国贼了。

民族的大团结是如此宝贵的至高无上的课题和经纶，所以，当毕生在反共第一线上同我枪对枪的崔泓熙、崔德新[4]等先生来到平壤时，我们也没有过问他们的过去，而以亲骨肉之情高兴地迎接了他们。

那时，我对崔德新先生说，无论是在北方生活的还是在南方生活

的，都应该把民族放在首位，为统一问题着想，不是有了民族，才有阶级，才有主义吗？没有了民族，搞共产主义有什么用！搞民族主义有什么用！信仰“上帝”又有什么用呢！

60多年前，我们在卡伦摸索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也是这样呼吁的。

政治应该容量大，政治家应该度量大。如果政治容量不大，就不能把群众都容纳下来；如果政治家度量不大，群众就会不理睬那个政治家。

报告叙述了建党问题和朝鲜革命的性质与任务，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在斗争中应坚持的根本立场。

报告草案一写成，我就马上把它交给从各地来参加卡伦会议的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领导干部进行讨论。那时，我们在白天下地干活，抽出时间在地头或雾开河畔柳树丛里进行讨论，夜里就在进明学校值班室里，把白天综合的意见，再一条条深入地进行讨论。

在群众性讨论时提出来的意见中,有不少令人感兴趣的实际问题。

首先在规定朝鲜革命的性质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大家就报告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一规定，议论纷纷。争论的焦点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个对革命性质的新的规定，会不会同革命的普遍原理和规律性相矛盾。因为这个规定，经典著作里没有，而且任何一个国家也还没有提出过。当时，青年们以为改变了近代历史的革命，只有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我们提出的既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又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一新的概念，

所以，有人怀疑这一革命的性质也是难怪的。

我们把朝鲜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从我国的阶级关系和我国革命面临的任务中得出的结论。朝鲜民族面临的最迫切的革命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清除束缚我国人民的封建关系，实行民主。由此出发，我们把朝鲜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硬套人家制造的模式去规定自己国家革命的性质，就要犯教条主义的毛病。模式并不是首要的，具体的现实才是首要的。即使是经典著作里没有的定义，别人没有的规定，如果它是符合本国实际的科学的规定，共产主义者就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它。

这才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态度。

我们以上述内容说明了把朝鲜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宗旨，代表们不仅表示理解，而且表示热烈支持。

讨论得最活跃的是关于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问题，当时被公认为是在理论上、实践上都不好公开说的复杂问题。共产国际的一部分人，以中国的国共合作失败为理由，把支持统一战线政策的人一棍子打成了改良主义者，因此，我们周围的人也大抵都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

这样的时候，没有极大的勇气，是不能把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为路线提出来的。因为如果把它作为路线提出来，就有可能被认为是对共产国际立场的挑衅。

那时，同志们还提出了很多问题：

地主的儿子支持革命时，应该怎样看待他？

为独立出了很多资金，对独立军也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援，而对共产主义者却根本不理会，这样的资本家应该怎样对待？

善于跟日本鬼子交往，同人民群众也合得来，这样的面长，是否也可以吸收到革命中来？

对这些问题，我就用一句话回答：要以本人的思想动向为主来对人进行评价。

当时的这种看法，后来在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中具体化了，解放后又在二十条政纲中作了明文规定，成为国家政策。

我们在卡伦提出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正确性，后来通过实际斗争得到了证实。

同志们的意见，对完成报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卡伦会议正式召开是在1930年6月30日夜晚。

卡伦的同志们在进明学校的教室布置了会场。在教室地板上铺了草席，天花板上吊了几盏煤油灯。

第一天会议听取我作的报告，从第二天起下地帮助农民干活，抽出时间来在河边或柳树林里，分组或全体代表聚在一起讨论执行报告提出的任务的措施，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会议方式。

卡伦的革命组织对村子的警戒非常严密,所以我们开会非常放心。特别是少年探险队员们在整个会议期间把我们保护得很好。

日本帝国主义得到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大部队在满洲中部地区集结的情报，便向我们活动的地区——长春县、怀德县、伊通县一

带，派出了大量的密探。有些密探还带着我的照片探听我的去向。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日本驻满洲领事馆的爪牙和朝鲜总督府警务局的密探，探听到与从前的共产主义者系统不同，活动方式也不同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出现在以吉林为中心的满洲地区，正在扩大力量；便从开始就紧张地为逮捕其领导核心，顽固地追踪我们。我们不声张，不宣扬，却扎扎实实地深入到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中去，所以，敌人也好像把我们看得不是那么好惹。

那时，在卡伦负责布置村子的警戒、统率少年探险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的是金园宇。他时而从会场悄悄地溜出去，在村里转一圈了解警备情况，然后回到会场。有时我因工作忙不能回住处，在进明学校教室里熬夜，他也在外面彻夜保卫我们的安全。有时他还在学校值班室的灶坑里烧些土豆给我们做夜宵。

在开拓卡伦、孤榆树、五家子等地的工作方面，金园宇的功劳很大。在吉林开展青年学生运动时，他也做了很多工作。

1928年春，我们为了长春地区农村的革命化，派金园宇去了。那时，金园宇一面在进明学校任教，一面走访卡伦、孤榆树一带教育了青年。1930年春起，他又帮助车光秀参与建立朝鲜革命军的筹备工作。因为金园宇长得漂亮，有时我们还让他穿上女装，和玄均扮作一对夫妇去进行地下工作。

朝鲜革命军成立后，金园宇为购买武器奔走时被敌人逮捕，坐了几年牢。他在狱中没有动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战后内外形势复杂的时候，金园宇在地方上为维护党的路线而斗

争，遭到宗派分子的迫害。当时，宗派分子们用各种方法陷害忠于党的人。

金园宇的本名是边默声。

卡伦成为我们可靠的活动基地，变成实现我们的思想的革命村，这是金园宇、金利甲、车光秀、金赫等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很早以来就为开拓这个村做出了积极努力的结果。

在我们来到这里以前，这里的人们还分成南道派和北道派，互相对立。有个时期，这两个派还围绕着雾开河的水利问题打过群架。南道派为了开田堵住水口，北道派就拿着锹跑来捅开水口，说他们的水田要干了。后来，连孩子们也分成北道派和南道派，造成可悲的对峙状态，连玩都不在一块玩。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金赫、金园宇、金利甲、张小峰等做了很大的努力。他们说服群众，杜绝了打群架，在卡伦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办了免费教育的学校。

7月2日夜，代表们重新聚集到进明学校教室继续开会。这天会议宣布分工方案。会议要结束的时候，主持会议的车光秀忽地站起来，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的性格很特殊，有时愣头愣脑，以至得了个“愣头儿青”的绰号，又好激动，可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他也不失理性，反而以充满激情的雄辩，使人们惊叹不已。他挥动着拳头喊道：

“人们捶胸慨叹朝鲜共产主义者受挫的时候，我们在卡伦发出了宣告朝鲜革命新开端的历史性宣言。随着这个黎明的钟声，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将沿着新的轨道迈进！

“同志们，让我们立即拿起武器投入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决战吧！”

我们听了他的讲话，都发出了欢呼声，接着大家就齐唱《革命歌》。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卡伦宣布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是因为在吉林市已经通过搞青年学生运动的过程，确立了对朝鲜革命的主体立场和态度，开拓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道路。我只不过是把在斗争的年月产生并在狱中酝酿成熟的那个思想和立场，以《朝鲜革命前进的道路》的名义发表而已。

这便成为我国革命的路线和指导思想。

可以说我们在这篇论文中展开的内容，都是以主体思想为核心的。

这个思想，后来经过抗日武装斗争等许多阶段的革命，在艰苦复杂的实践斗争中，得到不断的发展和丰富，成为像今天这样具备了思想、理论、方法的统一体系的一个哲学思想。

解放后，我们特别强调树立主体，是在战后进行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的时候。

1955年，我对党的宣传鼓动工作者发表了关于克服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树立主体的讲话，这篇讲话就以《关于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主体》为题的著作公诸于世。

关于树立主体，在那以后每有机会我都强调。

关于主体思想的本质，创立这一思想的经过，以及如何贯彻这一思想，我通过同外国人的谈话多次作了说明。

可是，我未曾想将它体系化，编成一本书。我国人民只要把它作为正确的思想接受下来，在革命实践中加以贯彻，我就感到满足了。

后来，金正日同志把这一思想全面地加以体系化，写成以《关于主体思想》为题的论文发表了。

卡伦会议后，我们在进行抗日武装斗争时，确信我们在那次会议上提出的路线是正确的。敌人说，我们是“沧海一粟”，可是我们的背后是具有无穷无尽力量的人民的海洋。我们提出什么路线时，人民就很快理解并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路线，将成千上万的子女和兄弟姊妹输送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从物质和精神上支援我们。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满洲零下40℃上下的严寒中，同武装到牙齿的强敌进行历时15年的斗争，并且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有着人民这个强大的堡垒，有着人民群众这一无限广大的沧海的缘故。

四　第一个党组织——建设同志社

1930年7月3日，也就是卡伦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我们创建了新型的党组织。这件事，在几年前已公开，我在会上作的讲话也已公布于世。

大家知道，党在革命中起参谋部的作用，革命胜败取决于党的作用。如果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那么，可以说，党是革命的火车头。正因为如此，革命者都重视党，并为建党工作呕心沥血。

马克思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后，作为实践斗争的第一项工作，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是他的活动中的最大功绩，他的这一功绩所以至今得到人们的赞扬，是因为党在共产主义者改造世界的斗争中所负的使命和作用有着重大意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终究都是从对党的观点和立场上的错误起始的。

自共产主义作为新的时代思潮出现于工人运动舞台直到今天，共产主义者在这地球上掀起的一切世纪性的变革，没有一件不是与党这个神圣的名称连在一起的。

我们为了把卡伦会议提出的任务付诸实施，首先着手进行了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我们听到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开除的消息后，就下定决心，建立新型的党，并开始全面地摸索建设这种党的途径。

我国的共产党是在1925年4月成立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在各国陆续出现，并领导着群众的时候，在没有任何政治活动的自由和权利的我国配合着这一世界趋势建立了共产主义政党，这一事实证实了朝鲜人对新思潮和时代趋势的政治感受性有多么敏锐和丰富。

朝鲜共产党的成立，是朝鲜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合乎规律的。

朝鲜共产党成立后，在工人、农民等广大群众中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领导了工人运动，写下了由共产主义者领导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新的一页。在朝鲜共产党存在的期间，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了如同六·一〇独立万岁示威斗争那样的大规模的斗争，显示了民族的气概；还同民族主义者合作，组织了新干会这样的群众团体，对集结反日爱国力量的工作做出了贡献。

朝鲜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各阶层的群众运动在它的领导下开展起来，这是一个开创了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点的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和共产党上层人物的派系斗争，1928年，朝鲜共产党便结束了它作为组织力量的存在。

共产国际在1928年夏举行的第六次大会上宣布取消它对朝鲜共产党的承认。这实际上意味着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开除了。

当然，在朝鲜共产党存在的时候，我们对它的专事派系斗争的上

层人物就没有什么好感。可是，即使是这样的党，当我们听到它被共产国际除了名时，也不禁感到气愤和羞耻。当时，我们对共产国际这样的处事，不无惋惜。从那时我就想：自己虽然年少，而且搞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也少，但是一定要由我们自己来做主人，为创建新型的党开展积极的斗争。

为了建立一个纯洁的、崭新的新型政党，必须闯过种种艰难险阻。

最大的难题是，共产主义队伍里仍然存在着宗派主义。因为没有消除宗派主义，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们才未能统一地进行重建党的工作，而分裂成好几个派系分别进行这项工作。

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除名后，我国共产主义者在国内外猛烈地开展了重建党的运动。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镇压和阻挠活动，任何一个派系的重建党的工作都未获得成功。火曜派和ＭＬ派抛弃重建党的运动，宣布解散在满洲建立的总局，之后，汉上派在国内大搞重建活动，但这个活动暴露了，许多党员被监禁，运动也就此告吹。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认清了这样的问题：用重建已解散的党的办法或依靠染上派系斗争恶习的前一代人去建立革命政党，是绝不可能的。

在建党方面另一个困难是，由于共产国际规定的一国一党的原则，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满洲地方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成了不可能的事。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通过的章程总则中规定了这样的一国一党原则：每一个属于共产国际的党的名称应是各该国家的共产党（共产国

际支部），各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存在。

1930年5月，共产国际东洋宣传部在哈巴罗夫斯克召开朝中共产党代表会议，通告共产国际关于朝鲜共产党组织问题的决定。共产国际在这项决定中指出，在满洲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应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共党员进行活动。

于是，热中于开展重建党的运动的共产主义者就改变态度，发表了解散的声明，掀起了一股转入中国共产党之风，由于这股风，五·三〇暴动的烈火席卷了东满。

朝鲜党员转入中共进行活动的问题，大大刺激了民族自豪感格外强的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就这一原则，我们的同志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的青年非难说，共产国际的指令是不负责任的、不可理解的，也有的青年认为这是光明正大的措施；有的青年义愤填膺，禁不住痛苦地说，共产国际要求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于是永远排除了重建党的可能性。

同志们谈论着这个问题，想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我明确地对他们说，共产国际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要求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无可非议的，这个要求并不剥夺朝鲜共产主义者重建党的可能性。

“在目前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提出这样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朝鲜共产主义者有自己独立的政党，何必要我们去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呢。因此应当尊重共产国际的决定。这才是国际主义的立场。就是戴上了中共党员的帽子，只要不忘记朝鲜，为朝鲜革

命而斗争就行。但是，不能为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完全抛弃建立独立政党的工作，无限期地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朝鲜人应该有朝鲜人的党。”

这就是我对转党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然而，这个看法与共产国际关于一国一党原则的解释是否一致，我是没有把握的。

我为了深入理解一国一党原则，早日确定建党方针，1930年6月下旬，在贾家屯会见了共产国际的联络员金光烈（金烈）。金光烈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在苏联呆过的知识分子。他在我们的活动地区孤榆树、五家子、卡伦等地呆过较长时间。他以联络员的身份，为使我们同共产国际接上关系做出了努力。张小峰和李钟洛说他是在苏联灌了不少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对他赞不绝口。因此，我怀着一种期望去见了他。名不虚传，他的确是博学多识的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和日语，跳起苏联舞来就和苏联人差不多，他还很会演说。那时，金光烈对我说，与其听他个人的见解，不如到共产国际去一趟，他要给我介绍在哈尔滨的共产国际联络处，认为最好到那里去讨论一国一党原则问题。

见过金光烈以后，我和同志们就一国一党原则反复地进行了讨论。

我们对一国一党原则的要求作了这样的解释：在一个国家里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只能有一个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在一个国家里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中央，不能有多于一个的共产党中央。

这个原则的实质是，在一个国家里，不可以有利害关系和目的相同的一个以上的党中央存在。

共产国际提出一国一党原则，并要求严格遵守这个原则。这样做的基本目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清除宗派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保证队伍的统一和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要求共产国际提出一国一党原则，严防各种异己因素潜入共产主义运动内部。

促使共产国际提出一国一党原则的另一个原因，是与敌人为从内部分裂和瓦解共产主义队伍进行恶毒的阴谋活动有关的。

然而，共产国际的章程只提出了一国一党原则，却没有阐明，到别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人转入驻在国的党的方法以及转党后怎样规定他们的革命任务的问题。这也就是在满洲地方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转入中共的问题引起群众纷纷议论的原由所在。由于这种原因，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党组织，是与一国一党原则相矛盾的。

由于对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朝鲜共产主义者争取祖国解放的活动就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和动摇，甚至产生了朝鲜的革命者到底有没有权利为祖国而斗争这样的疑问。在这样的时期，我一直不懈地摸索着建党的方法。

难道真的就没有既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又能大力促进朝鲜革命的途径吗？

经过苦心摸索，我找到的出路就是，根据先前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不是以匆忙宣布党中央的方法建党，而要扎扎实实地奠定建党

的组织、思想上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名副其实地起到我国革命的参谋部的作用的党。培养阶级觉悟高，经过锻炼的骨干；实现队伍的思想意志的统一；奠定党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如不做好这些工作，单靠主观愿望是不能建立党的。

我认为，以同宗派毫无关系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为骨干，用首先建立基层党组织，然后再扩大和加强这些组织的方法去建党，这是最符合现实的切实可行的建党方法。我确信，用这种方法建党，共产国际也会欢迎的。

我认为，先由我们培养出来的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建立党组织，不断地加强它的作用，在我们所到之处都扩大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就能既保证对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又能圆满地履行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

只要不在中国境内另设我们的党中央去同中国共产党并存，就不会有同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发生矛盾的问题了。

我们确定了这样的思想，在卡伦会议上提出了建党方针，并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

建立革命的党组织，是我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

因为朝鲜没有党，端川农民暴动的领导者们为征求策略问题上的意见，甚至找到共产国际去了。如果朝鲜有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革命政党，有老练的领导力量，他们就不会花路费去找共产国际的。

本世纪30年代初期我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论其深广，远非往日的反日斗争所能比拟。

我们的斗争也比初期大大前进了。活动范围超出吉林，远远地扩大到东满和北部朝鲜一带。原来只限于青年学生运动的我们的革命斗争，以地下活动的方式渗入到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中去。等到积累了经验，军事政治上的准备成熟了，就需要组织常备的革命军队，以大部队的力量去开展积极的游击战争，但共青同盟是承担不了这一切领导工作的。过去，共青同盟领导各群众团体，是一个过渡现象，不能成为永久的做法。

如今，必须建立一个党了，需要由这个党去掌握和领导共青同盟等各群众团体，全面领导民族解放运动，需要由这个党去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去同共产国际做工作。打着共青同盟这个牌子，是不可能圆满地同共产国际进行工作的。

早先的共产主义者们都说自己的一派是“正统派”，都要求承认他们，闹得共产国际也弄不清头绪。共产国际逐渐认识到，在朝鲜除非完全消除宗派，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为了清除宗派，建立新的党，就需要有不搞派系斗争、没有掌权野心的新的一代登场。于是，他们开始注意我们的斗争，并为同我们取得联系，从各方面建立了渠道。

我们通过多年的革命活动，奠定了能够建立新型革命政党的基础。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立，在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建立与早先的党不同的新型革命政党的出发点。一切都是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开始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发展成为反帝青年同盟，进而又发展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

共青同盟培养的我国革命的骨干部队、反帝青年同盟打下的我国革命的群众基础，成了建党的基础。共青同盟成立后，在它作为强有力的先锋组织领导革命运动的日子里，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们克服前一代共产主义者们所犯的错误，在争取群众和领导艺术方面开辟了新的境地。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发扬的英勇的斗争精神和革命的战斗气概，成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原动力，成了我们党的灵魂和气概。

新一代共产主义者的活动的一个高峰，是以卡伦会议为契机，创立了朝鲜革命的指导思想。卡伦会议的决定阐明了，共产主义者在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共青同盟纲领的道路上应当作为原则的战略。它成了建立新型政党的思想基础，成了长期以来在失败和挫折的阵痛中摸索前进道路的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方针。

指导思想、领导核心、群众基础，可以说是建立党组织必不可少的因素。我们具备了这三种因素。

1930年7月3日，在卡伦的进明学校教室里，由车光秀、金赫、崔昌杰、桂永春、金园宇、崔孝一等同志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当时没能参加会议的金利甲、金亨权、朴根源、李济宇等同志以及内定为朝鲜革命军队长的李钟洛、朴且石等，也都是第一个党组织的成员。

进明学校坐落在离村庄有500米左右的贾家屯前面的平野上。学校的东边和南边有一片五六町步的柳树甸子，中间有一条叫雾开河的小河绕过学校朝东南方流去。学校的东边沼泽地一直连到村庄。能来往这所学校的通路，只有西边的一条路。只要把好路口，在学校里干什么，外边都不会知道，如果发生危险，就可以穿过柳树甸子逃出去，

保证连踪影都找不到。

那天晚上，我们在这所学校开会，在可能出现密探的西边关口设了好几重岗哨。水田里的蛙鸣彻夜不停，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仿佛至今还在耳边回响。

建立第一个党组织时留下的印象中，令人难忘的是金园宇挺费劲地把一杆红旗立在讲桌旁的事。那面旗帜的鲜红颜色，反映了我们要为革命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决心。

就是现在，一提到第一个党组织，我就联想到进明学校，想起进明学校，那面斜立在讲桌旁的红旗就浮现在眼前。

那天，我没做长篇讲话。关于建立第一个党组织的问题，在卡伦会议期间已多次进行了讨论，没有必要再具体说明它的宗旨了。

我只提出了党组织的成员必须执行的几项任务:扩大基层党组织，树立统一领导这些基层组织的体系；巩固队伍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统一和同志式的团结；牢固地奠定革命的群众基础。同时强调了完成这些任务的途径：党组织在一切活动中必须坚持自主立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与反日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我们没有另行制定党的纲领和章程，因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已经明确地规定了我们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标和当前的斗争任务，卡伦会议通过的革命路线和战略方针，具体地阐明了我们应走的道路和应遵守的行动规范。

我们给这第一个党组织起了“建设同志社”这样一个极平凡的名称。这个名称包含着我们的远大抱负和意志，那就是从寻找同志开始

迈出了革命的第一步的我们,要继续不断地争取能够生死与共的同志,团结他们去推动革命深入发展，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加入建设同志社的同志们都站起来，满腔激情地吐露了亢奋的心情。金赫吟咏了即兴诗,大致内容是:“启航了。我们的船驶离了港口。我们将摇橹前进，冲过惊涛骇浪驶向远海。”

金赫的诗朗诵结束，崔孝一站起来讲了话。讲话结束时他对我说:

“成柱,如果这里不是教室,是山里,我真想放几响礼炮作纪念!”

我对他说，同日本鬼子较量的日子不远了，到那时候再尽情地放好了。当时，我们真想开大炮而不是开手枪，好好庆祝第一个党组织的成立。我们建立起自己的党组织，作为朝鲜的党员，在时代和历史面前严肃地发誓要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生，当时的激动和自豪，真是语言难表，文字难绘。

15年后，在解放了的祖国建立了我们党之后，我回到尚可闻到我儿时的气息的旧居，躺到铺着草席子的炕上，放下一切心事的时候，不由得感怀万千地回忆起了在卡伦建立第一个党组织的情景。

第一个党组织——建设同志社，它是我们党的幼胎，是我们党的种子，它在组织和扩大基层组织方面具有母体的意义。自从第一个党组织建立以后，我国革命就由没有沾染宗派习气的，白纸一样纯洁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来领导，从胜利走向了胜利。从此，朝鲜共产主义者建立自主的政党的斗争，就随着抗日大战的滔滔洪流，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此后，我们把建设同志社的成员派到各地去，在豆满江沿岸的北

部朝鲜一带和满洲各地建立了党组织。

我承担了到国内建立党组织的工作。1930年秋，我到了受我们影响较多的咸镜北道稳城郡，在那里建立了国内党组织。

我们年轻的党组织同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一向站在群众的前头，开辟了抗日战争的进军路，并在这个过程中锻炼成了钢铁的先锋队，博得了群众的爱戴和绝对信任，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

我们在依靠自己独立的组织开展活动的同时，还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共同进行了工作。我们朝鲜共产主义者，从朝中两国人民历史长久的善邻关系和两国所处的相似的境遇、两国革命者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共同点出发，始终一贯地支持了中国革命，为维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进行了斗争。每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解放本国人民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就像自己的事一样高兴；当他们遭到一时的失败或发生波折的时候，我们就同他们一起感到痛心。

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土地上开展活动，不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就不能得到中国人民的帮助，就不能牢牢地维持反帝联合战线。

我们重视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也同满洲省委下属党组织里有许多朝鲜人的情况有关系。东满特委里也有许多朝鲜人，东满地区的县党委员会和区党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朝鲜人，从党员比例来看，朝鲜人占90%以上。他们在东满地区党组织里，起了主导作用和骨干作用。

在满洲地方，朝鲜人党员所以多，是因为在间岛地方开始进行共

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大多数是朝鲜人。

我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是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满洲以后。

在华成义塾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时候，和在吉林、五家子等地进行活动的时候，我同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联系。

本来革命并不是有谁叫你干才干的，而是根据自己的信念和目的自主地进行的。从这种要求出发，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创立了革命的指导思想，独立自主地组织了我国革命的最初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霸占满洲所造成的新的形势，和日本帝国主义已成为朝中人民共同敌人的新的环境，使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成为成熟的要求。

1931年冬的明月沟会议前后时期，我住在曹亚范的家里，第一次开始同中国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曹亚范在吉林念书的时候，和我一起做过共青同盟工作，后来在和龙地区一面教书一面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后来我组织了游击队，在汪清等地进行活动的时候，同担任宁安县党委的负责职务、兼管东满地区的王润成取得了联系。童长荣从大连被派到东满特委时，我又同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我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干部进行活动。童长荣牺牲后，我又同魏拯民取得了联系。另外，我还同共产国际巡视员潘同志也取得了联系。

我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整个时期保持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关系，

这对扩大抗日联合战线，发展共同斗争做出了贡献。

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联系下发展了共同斗争，这是主动的、灵活的措施，符合当时朝鲜共产主义者不得不在别国土地上进行革命斗争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也符合共产国际关于一国一党制的要求。我们积极发展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共同斗争，同时始终一贯地坚持并胜利贯彻了朝鲜解放的旗帜，朝鲜革命的主体路线。对于我们的这种原则立场和真诚的努力，中国战友们真心赞扬说，这是革命的民族义务和国际主义义务正确结合的生动典范。

朝鲜人民的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同中国共产主义者一道参加了艰苦卓绝、考验重重的抗日大长征。

1963年，崔庸健同志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曾在沈阳设宴祝贺他的生日，作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祝寿讲话。周总理指出，在开拓东北革命方面，朝鲜同志起了主导作用。所以说，中朝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是永恒的。抗日联军是中朝人民的优秀儿女联合起来的革命武装力量。

在开拓东北革命方面，朝鲜人的功劳很大，对于这一点，杨靖宇、周保中、魏拯民诸同志也常谈及。

因为我们无私地支援了中国革命，所以，只要是我们的事情，中国人民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全心全意地帮助了我们。

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后，我们在游击队里建立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员会。这是在卡伦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扩大发展的结果。在那以后，我们的自主的党组织深入到祖国光复会的国内

组织朝鲜民族解放同盟以及各农民组合和劳动组合，扎下了根。

我们凯旋祖国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建党工作，这是因为在长久的抗日革命的日子里，通过实现建党大业的斗争，取得了成果，积累了经验。

五　朝鲜革命军

卡伦会议提出的重要任务之一建设党组织的工作，以建立第一个党组织——建设同志社，迈出了第一步。

我们不能因此而满足，我们还面临着必须加紧准备武装斗争的繁重任务。

作为准备武装斗争的第一步工作，我们在孤榆树组建了朝鲜革命军。

我们准备过一二年后组建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在此以前先组建了朝鲜革命军这一过渡性的政治及半军事组织，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它的活动，为组建大规模的游击部队作好准备。我们的意图是，通过朝鲜革命军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打下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积累开展武装斗争所需的经验。

实际上，我们对武装斗争没有什么知识。我们不是在本国，而是要在别国领土上进行武装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需要与此相适应的经验。但是，哪里也没有我们可以仿效的军事操典或经验。

要说我们有什么底子，也不过是有几个独立军出身的同志和若干名念过华成义塾的同志，还有几支手枪而已。此外，一无所有。武器，需要我们自己解决；军事经验，也需要我们自己去创造。

朝鲜革命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组建的一个过渡性组织。

开始时，由金园宇、李钟洛在孤榆树做了组建革命军的筹备工作，以后又派车光秀去完成了这项工作。

组建革命军的筹备工作，在几个地区分头进行。

筹备工作的基本任务是，选拔加入革命军的青年和置备武器。

我们提出的一个办法是，做好独立军的工作，把向往进步思想的精明强干的军人争取过来，解决人的问题和武器问题。革命军里，军人出身的多起来，就可以以他们为母体，把那些没有军事知识的青年加以训练。为此，我们的同志们对国民府所属的独立军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的方针是，教育那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独立军军人，把他们争取到我们阵营里来，根据他们的思想觉悟水平，吸收他们加入朝鲜革命军。

这个时期，国民府分裂为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继续进行争权夺利的争斗。当时，国民府派掌握了对在满洲的朝鲜人的领导权，反国民府派则掌握了对独立军的统率权。这种局面招致了民众和军队分裂的结果。到了1930年夏，两派的对立愈演愈烈，变成了双方互相暗杀对方干部的恐怖战。恐怖战达到了极点，双方完全决裂了。

因为情况到了这种地步，在独立军内部，不仅是队员，连小队长、中队长也不相信他们的上层领导，上级指示也不大服从。对我们派去的工作员的话，他们倒更爱听。

车光秀在通化、辉南、宽西一带做独立军的工作；李钟洛在孤榆树教育他所部的队员，准备收为革命军。

李钟洛原来在孤榆树的正义府所属独立军一中队，后来到华成义

塾学习，并加入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同李钟洛一道从一中队保送到华成义塾来的学生有朴且石、朴根源、朴炳华、李顺浩等好几个青年人。

李钟洛在义塾废止后，回到自己原来的中队当副中队长，后来升为中队长。那时候跟现在不同，因为武装力量很少，一个中队也算是较大的军事力量。在满洲算是势力最强的国民府所属的兵力也不过是九个中队而已。因此，在独立军中，中队长自然被当做大人物来对待。在孤榆树，李钟洛的威信的确了不起。

金赫、车光秀、朴素心等同志从1928年到1929年期间，在柳河地区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时，受到了崔昌杰影响下的独立军的保护；同样，派到孤榆树的同志也受到了李钟洛指挥下的独立军部队的保护。

那时，李钟洛要干革命的觉悟和热情非常高。华成义塾废止后，他回到原来的中队，按照我们在桦甸分派的任务，出色地进行了对独立军队员的工作。大胆果决、判断迅速、统率力强，这些素质是他的优点。可是，他缺乏冷静的理性和思考能力，好感情用事，处事偏激，而且个人英雄主义较重。我想，后来使他背叛革命的主要病根就是这一点。

有的人主张，独立军没有严密的指挥体系，而且内部也很混乱，干脆把分散在各地的中队的武装缴下来，肃清国民府的反动分子；还说，要脱掉独立军的外衣，公开进行活动，筹办武器，同国民府较量。

我们对这种倾向严加警戒，防止在对待独立军的工作中犯左倾错误。

亨权叔也编成两个工作小组到长白地区去了。他以芝阳盖后山为据点，在长白的许多地方组织了白山青年同盟支部以及农民同盟、反日妇女会、少年探险队，进行了筹办武器和实现群众意识化的活动，还吸收地方青年进行了军事训练。由于亨权叔工作努力，长白地区的独立军力量就归到我们的影响之下了。

不仅是选拔队员、培养后备的工作进行得好，而且筹办武器的工作也蓬勃地开展起来。

在解决武器方面，最有功的是崔孝一。他原是在铁岭日本人开的武器商店里当店员。当时，日本人在满洲大做武器买卖，把枪卖给土匪，也卖给中国地主。崔孝一只念过小学，可是日语讲得很流利。他讲日语，简直辨不出他是朝鲜人还是日本人。因为他精明能干，又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人们说他当店员有点屈才，所以店老板对他很信任。

最先争取崔孝一的是张小峰。他在卡伦开拓工作时，常来往于长春、铁岭、公主岭一带，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崔孝一。通过几次的交往，张小峰了解到崔孝一为人诚实、耿直，便吸收他加入了反帝青年同盟，并给他介绍了李钟洛。从此，崔孝一在铁岭开始了敌后斗争。他同李钟洛取得联系，偷偷地把武器卖给独立军中队。老板明知崔孝一把武器转卖给朝鲜人，却装不知道，只顾赚他的钱。

崔孝一先是把武器卖给中国人，后来又卖给独立军，最后把铁岭的日本人武器商店变成了专为共产主义者提供和搬运武器的地方。在这过程中，他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李钟洛和张小峰每当见到我，就向我夸耀他们在铁岭吸收了一个呱呱叫的青年崔孝一。于是，我心里也对他抱了很大的期望。

记不清是1928年还是1929年，崔孝一特地到吉林来见我。我一看，原来他长得像姑娘一般白净、清秀。可是他酒量很大，和他的相貌很不相称。以革命者的标准来衡量，这倒是个缺点。那时，我们在旅馆一起吃饭，谈话谈了很长时间。他学着日本娘们儿的腔调，把日本天皇、高级军政人物和我国的五个卖国大臣痛骂了一通，逗得我大笑了好几次。

人们说，崔孝一的妻子是罕见的美人，可是他对家庭生活的乐趣全不放在心上，是个对这方面漫不经心的人。在革命斗争中，他胆大得令人吃惊，意志刚强，和他那姑娘一样的长相正相反。

在卡伦会议前夕，他从日本人武器商店搞出十来支枪，带着妻子投奔到孤榆树来了。那时，正是我们为建设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作为过渡性的措施，加紧准备组建一个小规模军事政治组织的时候，因此，崔孝一的来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通过同志们的汇报，我们知道了组建革命军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我到孤榆树一看，队员名单和武器都已准备好，举行成立仪式的地点和与会人也都已确定。

1930年7月6日，在三光学校操场举行了朝鲜革命军成立仪式。

在授予武器之前，我作了简短的讲话，规定朝鲜革命军是朝鲜共产主义者为组织和准备抗日武装斗争建立的政治及半军事组织，宣布将要以朝鲜革命军为基础，建立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

朝鲜革命军的基本使命是，进入城市和农村，教育人民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同时，积累武装斗争的经验，为将来建设一支正式的武装队伍作好准备。

在讲话中，作为朝鲜革命军的当前任务提出了如下几件事：培养能够组织抗日武装队伍的骨干；奠定革命军队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为开展武装斗争作好一切军事准备。

我们把朝鲜革命军编成第一队、第二队、第三队……，这样编成了许多个队。

根据我的建议，把军事经验多，统率能力强的李钟洛推荐为朝鲜革命军队长。

有的历史学者把国民府组织的朝鲜革命军和我们在孤榆树组建的同名的朝鲜革命军混为一谈，当做是同一个军事组织。国民府组织的朝鲜革命军成员中有不少人加入了我们的革命军，因此作这样的推测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其实，这两个军事组织，虽然名称相同，但指导思想却各不相同，使命也不一样。

由国民府组织的所谓朝鲜革命军如实地反映了国民府本身的内部矛盾，在实际活动中经常发生内部的对立纠纷，其名称和干部也随之三天两头地更换，简直无法弄清它的实际面貌。

我们组建的朝鲜革命军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既做群众政治工作，又进行军事活动的政治及半军事组织。

在组建朝鲜革命军的时候，对它的名称问题，作了很多讨论。大

家都热烈发言，说这是朝鲜共产主义者组建的第一个武装力量，它的名称应该是新颖的。大家提出了很多方案。

当时，我说服他们，我们的武装力量应当照用国民府组织的朝鲜革命军这个名称。我对他们说，在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为了不刺激民族主义者的神经，没有使用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名称，而起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这个名称，我们组建的军队，也披上朝鲜革命军这个外衣，就不会遭到民族主义者的白眼，活动上也会有很多方便之处。

后来，我们这个军因为披着朝鲜革命军这个外衣，在实际活动中得到了很多好处。

朝鲜革命军建成后，编成许多小组，派到了各地。国内也派去了几个小组。

当时，我们派革命军小组到朝鲜去的目的，是要奠定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把国内革命斗争引向高潮，同时要了解一下，国内有没有可能开展武装斗争。

我们决定在没能参加朝鲜革命军成立仪式的人当中，以李济宇、孔荣、朴振荣等人为中心组织一个国内工作小组，并任命李济宇为组长，让他们经过新坡，沿着狼林山脉进入平安北道一带，在广大群众中建立革命组织。

早在1928年，我们就让他们把活动据点从抚松和奶头山一带转移到朝鲜居民多的长白地区去。李济宇接到这个任务后，就到长白县一带去做组织群众的工作，还不断地深入到国内去进行使群众意识化的

活动。

我们决定，再派一个由亨权叔任组长，有崔孝一和朴且石等人参加的工作小组到国内去。这个小组的任务是，从长白渡过鸭绿江，经过丰山、端川、咸兴、向平壤附近挺进。

朴且石加入这个小组，是因为他和亨权叔有深厚的友情。朴且石本来在吉林近郊的农村，打着教员的牌子做地下工作。

1928年冬，他和桂永春、高一凤等人一道在抚松一带参加了建立革命组织的工作。就在那时候，他和亨权叔成了莫逆之友。他一听到亨权叔要上朝鲜去，便要求同去，我们体谅他的心情，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朝鲜革命军队员们到了自己的活动区域,开展了无比英勇的活动。

以四平街和公主岭一带为活动区域进行工作的朝鲜革命军队员中，有一个叫玄大洪的人。他在四平街进行群众工作时被捕，押到了长春。他在被捕的瞬间，把身上的武器偷偷地交给了同志。

警察们野蛮地拷打他，逼他说出藏武器的地方。

玄大洪就说把枪埋在某个火车站附近的一棵白杨树底下。他是想造成一个可以逃脱的机会。

警察信以为真，就带他坐火车到他埋手枪的地方去。火车正奔驰的时候，玄大洪用卡在他手腕上的手铐打倒了两名押送他的警察，跳下火车，用两肘和两膝爬到卡伦来找革命组织。卡伦的同志们用锉刀费了好大劲才给他卸掉了手铐。

他虽然经历了如此可怕的苦难,但康复后又到公主岭去开展活动。

这回，他被日本警察逮捕了。公主岭是日本从中国割让来的租借地，归日本人管辖。玄大洪在法庭上的斗争也很坚决。他被判无期徒刑，在汉城西大门监狱受尽了苦，终于因日寇的严刑拷打而得了重病，与世长辞。

进入30年代，李济宇的小组扩大到数十人。由于他们的努力，长白地区陆续建立了反日组织，各村都办了学校和夜校，还常常举行演讲大会、文艺演出、体育大会，使人们充满了革命热情。

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耍了一出把戏，他们派一股兵力化装成土匪团去袭击朝鲜人村落，诱出了李济宇他们。但是，因为我们事先告诉过他们要注意土匪，所以他们没有上敌人的当，只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冲突，伤了几个人，没有扩大为全面的战斗。

后来，李济宇他们遭到日本鬼子豢养的土匪团和同他们相勾结的反动军阀部队的突然袭击，受到了很大损失。朴振荣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李济宇不幸被捕。

李济宇想用一死来洗雪被捕的耻辱，虽然手脚都被捆绑着不能动，还是用菜刀刺了自己的脖子，可是未能遂愿。他当场被移交到日本警察手里。他被押送到汉城后，被判死刑，不久就在狱中牺牲。孔荣因未能识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骗局而牺牲。

日本鬼子为了诱杀满洲地方的反日运动者，指使一些人装作共产主义者。孔荣要去同这些假共产主义者搞统一战线，却被他们杀害了。

我们接到关于孔荣、李济宇、朴振荣诸同志牺牲的悲痛消息，是

刚发生过端川农民群众性暴动的时候。我听了联络员的报告，好久不能平静，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在父亲面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不孝之罪。

他们都是我父亲最爱惜的独立军队员，是最先实现了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人。

我为李济宇、孔荣、朴振荣的悲剧性的牺牲感到极大的痛苦，固然是因为失掉了一个执行卡伦会议决定的得力的国内工作小组，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失掉了为实现我父亲的遗志而斗争的改变方向的先驱。

为我父亲出殡的时候，孔荣和朴振荣是在最前头抬灵柩的。他们还让我母亲不要给我穿丧服，要由他们来服丧。可能是因为要我这个才14岁的孩子穿丧服，看着怪可怜吧。从这天起，他们戴着孝帽，服了三年丧。

当时，独立军训练所设在离抚松市街里有一段距离的万里河。孔荣每星期总有一两次要背上一背架柴火到我家来，向我母亲问安。他的妻子也常常带一些刺龙牙、大叶芹之类的野菜到我家来。有时，孔荣还扛着米袋子来。他这样的诚意，对我家的生活是不小的贴补。

我母亲待他们也像待亲弟妹一样亲。有时，就像亲姐姐一样严厉地指责他们的错处。

孔荣为搞独立运动到了满洲后，他的妻子一个人住在碧潼。有一年，她到抚松来找丈夫。那时，孔荣看到妻子做面汤时不慎烫伤了的脸，老大不高兴，说她脸变丑了，不想跟她过了。

我母亲火了，厉声斥责他说：

“兄弟，你说这话岂不是发疯吗？你媳妇不远千里来找你这个丈夫，你不给她铺花缀锦不说，还说什么不想跟她过，你这不是想邪了吗！”

孔荣本来就很听我母亲的话，对我母亲从不敢怠慢。这天，他向我母亲鞠了一躬，承认自己错了。

我第一次得知到国内去的亨权叔他们那个武装小组的活动情况，是在报纸上。现在记不清我当时是在哈尔滨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同志们兴奋地拿报纸来给我看。报纸报道说，丰山出现四名武装团击毙警察部长，夺取从北青过来的汽车，向厚峙岭驶去。

拿报纸给我看的同志高兴得连嘴都合不拢。他说，在国内响起了枪声，真痛快。可是我却为那个枪声感到不安。我心里思忖着：为什么在挺进国内的入口丰山打响了呢？

当时，我不由得想到了我叔叔那火暴性子，总觉得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暴脾气而打了枪。

我叔叔从小就有把墙当门踹的男子汉气质。

一提到亨权叔，我首先就会联想到稀粥的轶事。那是我在万景台的时候，叔叔也不过是十一二岁，我家天天晚饭吃高粱米稀粥。那是把没去皮的高粱粗粗地磨过之后熬的粥，不好吃不说，往肚里咽时高粱皮子直扎喉咙，很难受。所以我也最不喜欢吃这种稀粥。

有一天，亨权叔坐在饭桌前，看祖母给他端来了一碗滚热的稀粥，就用头狠劲地撞了它一下，粥碗立时被摔到了地下，他额头上也撞出了一个口子，流出了血。那时候他还不大懂事，受不了天天吃稀粥的穷日子，就拿粥碗发起狠来了。

祖母骂他说：“看你吃饭还这么挑剔，长大了准没出息！”祖母厉声骂了叔叔，转过身去却抹了眼泪。

亨权叔长大懂事后，对他额头上的伤疤挺费神，到中国住在我家时，他把前额上的头发留长一些盖住了脑门上的伤疤。

他是我们住在临江时到中国来的。我父亲叫他到我家来住，是为了教他功课。因为我父亲是教育者，叔叔住在我家，就是不上学也能学完中学课程，往后能培养成一个革命者。

我父亲在世时，亨权叔在我父亲的影响和管束下，过得还算很正经。但是我父亲去世后，他就管不住自己了，风风火火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那小时候用额头撞粥碗的脾气又复发，把我们都弄傻了。我父亲一去世，他就像脱缰的马，再也稳不住神了，临江、沈阳、大连，到处乱跑。

对我们家里的事有一些了解的人们就说，叔叔是自从回家乡去和一个父母给定的姑娘订了婚之后，因为那个未婚妻不合他的意，才这样心神不定到处瞎逛的。

当然，这也可以算个理由。不过，使我叔叔心神不定的主要原因，是我父亲的逝世带给他的绝望和难忍的悲愤。

当我在华成义塾退学后回家来时，叔叔仍然像一个酒醉的人，过着心神漂浮的日子。那时候，家里只靠我母亲一个人给人家浆洗衣物或缝制衣服得来的微不足道的收入过活，非常困难。可能是因为我家的情况实在看不过去，李宽麟带了些钱和粮食到我家来，帮我母亲的忙。我的叔叔理应代替我去世的父亲当一家之长。家里也并不是没有

他应该做的事情。当时，我家还有个父亲留下的小药房，药虽不多，只要用心经营，多少能贴补点家用。可是，叔叔从不过问那个药房。

说句老实话，我对当时叔叔的作为真有些不满意。因此，有一天我蹲在家里写了一封留给叔叔的长信。因为是正当正义感最强的中学时代，见了不合情理的事，不管他是长辈还是晚辈，不说句话就受不了。当时我把那封信放在叔叔的枕头底下，就到吉林去了。

当时我母亲看到我写信批评叔叔，很不以为然地说：

“你别看你叔叔现在像没了主心骨，浮云似地东逛逛西走走，到时候他会走他自己该走的路。可不是，难道你叔叔还能忘了本吗？等他逛腻了，自然会回到家里来的，不用你批评。哪有侄子训叔叔的。”

母亲这样说服我。这的确是我母亲才会有的思想方法。可是，我到底还是把信给叔叔留下了。

一年后，我放假从吉林毓文中学回到抚松。到了家，我惊异地发现，亨权叔叔的生活完全稳定下来了。事实证明了母亲的预言是正确的。叔叔虽然对我写的信只字未提，但我可以看出那封信给他的刺激是不小的。那年冬天，他加入了白山青年同盟。

我们离开抚松后，叔叔完全投身于扩大白山青年同盟的工作。第二年，同志们介绍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他就这样站到革命队伍里来。从1928年开始，根据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指示，他领导了抚松、长白、临江、安图地方的白山青年同盟的工作。

在万景台，由于邻居们看了报，大谈丰山发生了击毙日本鬼子警察部长的事件，老家的祖父他们才知道亨权叔被捕了。

我祖父听到这个消息后，说：“哎，他大哥是那样，这回弟弟也来打死日本鬼子喽。不管以后怎么样，干的还是好啊。”

过了一些年月，我才弄到一些材料，知道了国内工作小组在丰山进行活动的全貌。

1930年8月的一天，小组渡过鸭绿江就朝端川方向走。14日，他们来到丰山把拔里附近的黄水院地芬子地稍事休息。正巧恶霸警察部长“大马蜂”（本名松山）骑自行车从这里经过，对他们起了疑心。他是从1919年就到丰山地方来管束朝鲜人的恶霸警官。当地人们给他起了外号叫“大马蜂”。当地群众对这个“大马蜂”真是怨声载道。

当小组成员们路过警察驻在所时，“大马蜂”喊他们进了驻在所。

亨权叔一跨进驻在所就把“大马蜂”处决了。然后，公开地在群众面前作了反日演说。那天，有几十名群众听了他的演说。

据说，在南朝鲜被囚禁了34年之久而没有屈服，因而名闻世界的前朝鲜人民军随军记者李仁模，当时也在把拔里听过他的演说。

小组虽然受到敌人的追击，还是设法接近曾燃起农民暴动烈火的地方。

当时，我们很重视端川农民暴动。暴动席卷的地区必有群众运动的领导人，也必有政治思想觉悟高的动员起来的革命群众和他们有组织的大部队。敌人为了在暴动地区搜出主动分子急红了眼，而我们是要从暴动群众中找出像汪清的吴仲和、龙井的金俊、稳城的全长元那样的骨干分子。只要同这些骨干分子接上关系，给他们以积极的影响，就可以奠定把国内革命斗争引向高潮的基础。如果能成功地开辟端川

地区，就可以经过那里挺进到城津、吉州、清津方面，再经过咸兴、兴南、元山，进入平壤。

我们把去找端川农民暴动领导人的任务交给亨权叔率领的国内工作小组的目的就在于此。

在把拔里发出了枪声的武装小组一行来到凤梧洞入口，在这里拦截一辆小汽车，解除了坐在车里的丰山警察署司法主任的武装，向坐在汽车里的乘客作了反日宣传。接着，他们到利原郡文仰里一带，在培德洞和大岩洞等地点，对那里的烧炭工人做了政治工作。尽管情况很困难，他们还是积极地进行了斗争。

后来，武装小组向北青方面挺进，途中把队伍分成了两路，亨权叔和郑雄是一个组，崔孝一和朴且石是一个组。两个组约定在洪原邑集合，然后，分别朝不同的方向前进。

9月初，亨权叔和郑雄一道袭击了敌人搜索队盘据的北青郡大德山广济寺，然后往洪原、景浦方向前进，途中在节妇岩附近与敌人遭遇，打死了前津警察官驻在所所长。

叔叔当天就到了定为集结地点的洪原邑崔辰庸的家。

崔辰庸这个人，我也很熟悉，他是和独立军有关系的人。他在抚松的安松总管所当总管的时候，常到我家来。他原来在朝鲜当面长时贪污公款的事被揭发，人们指着他的后脑勺骂他，于是他逃到东北，跟着正义府做了点事。有一个时期，他住在我家，吃了几个月我母亲给做的饭。崔辰庸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要打进满洲来的兆头，就借口年纪大了，帮独立军做事力不从心了，离开了抚松。他走时说，他要置

一个小小的果园，清白地度过余生。但他到了洪原后不久，就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密探。

亨权叔当然无从知道这一事实。崔辰庸借口敌人的警戒森严，把我叔叔藏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就跑到警察署去告了密，说从满洲过来的武装团就在他家里。

叔叔被抓到警察署，看见崔孝一也被捕了。崔孝一也是被崔辰庸告发的。

我叔叔这时才知道崔辰庸是日本鬼子的走狗。崔辰庸叛变，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也很突然。他曾口头禅似地说过，一天三顿热饭外加酒肴，成柱母亲这样盛情款待，我就是进了棺材也忘不了。谁能料到这样的人竟会滚落到卑鄙的背信弃义的路上去呢。当我听说，是崔辰庸出卖亨权叔的时候，我甚至怀疑过自己的耳朵是否听错了。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也说，相信人是好的，不过不能抱幻想。幻想本来就是不科学的，所以若为幻想所俘虏，就是具有非凡的千里慧眼的人也会犯下无可挽回的过错。

那时，逃出了敌人包围的只有郑雄一个人。郑雄是叔叔到国内去时吸收他做带路人的。他的家乡是利原，对东海岸一带的地形很熟悉。后来，他在春川由于密探告密而被捕。

亨权叔被捕后，在洪原警察署的牢里呆了一些时候，后来转到咸兴监狱，在那里又受到了中世纪式的严刑拷打。

他在咸兴地方法院的法庭上进行斗争的消息，经过许多人的口，传到了我们这里。

据说，那时亨权叔在法庭上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高声疾呼，对武装的强盗要用武装去斗争。

他能在法庭上如此正气凛然，其力量是哪里来的呢？我想，那是他对革命的信念和忠诚给他带来的。如果说，对叔叔说来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背弃使人成为正义的勇敢的人的信念，背弃使人成为世上最尊严的存在的信念。

法庭上，崔孝一被判处死刑，叔叔被判处15年徒刑。

叔叔和他的战友们在法庭上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

小组成员们为了延长进行法庭斗争的时间，向汉城复审法院提出了上诉。

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在咸兴审判时尝够了苦头，在汉城进行了秘密审判，一名旁听者也没让参加。敌人完全认可了咸兴地方法院的判决。

对崔孝一的绞刑，判决后不久便执行了。他留下了要战友们好好坚持斗争的遗嘱，从容地走向了刑场。

亨权叔被监禁在主要是收容被判10年以上长期徒刑的囚徒的汉城麻浦监狱。在监狱里，他仍没有停止斗争。当敌人逼迫被判了重刑的“政治犯”转向的时候，亨权叔就向许多囚徒发表反对转向的喷焰吐火般的演说，激励大家的斗争精神，他还为争取改善对囚徒的待遇，站在大家的前头不顾一切地进行了斗争。所有这些事实已经有广泛的介绍了。

敌人当时加紧进行战备，强迫囚犯做制造子弹箱的作业。囚犯吃的是最次的七等饭，被迫做的是累死人的重活。

为此而激怒的亨权叔，在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领导监狱工厂的囚犯举行罢工，反对刽子手们强迫他们做这种苦活。很多囚犯参加了这次罢工。

敌人为了阻止我叔叔的影响力，把他关在黑窑洞似的单间牢里，而且给他的手脚戴上了镣铐，他只要动一动，那镣铐就卡进肉里去。每天只给他吃一块像小孩儿拳头般大的掺豆子的饭团儿。

因为我叔叔在那样残酷的不堪忍受的情况下坚持不断地进行斗争，监狱当局发出悲鸣说，金亨权在赤化麻浦监狱。有一天，朴且石在监狱工厂做工的时候，听到我们在满洲各地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消息，便把这消息告诉了叔叔。

我叔叔听到这消息，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他握着朴且石的手，哽咽着说：

“我是挺不了几天了。活着的同志们要斗争到底呀。你要是能刑满活着出去，一定到万景台去看看我的母亲，告诉她我的消息……如果以后能见到成柱，把我的消息告诉他，还告诉他我在狱中不屈不挠地坚持了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我最后的嘱托。”

这是我叔叔极度衰弱，卧病不起的时候说的。

监狱当局见亨权叔快要死了，才允许万景台的我们家来探监。

亨禄叔叔当时借了40圆钱，同亲戚金凤周一道去汉城，和亨权叔见了最后一面。

当我凯旋祖国后回到旧居时，亨禄叔叔告诉我说：

“我们到了监狱，看守把我们领到病监去了。别的囚犯都坐着，

可是，成了残废，只剩下一口气的亨权却躺在地上，像骷髅一样。我一想起当时那个令人心寒的情景，就忍不住……那时候他一看见我，光是嘴唇在翕动，发不出声来，那样子太惨了，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我弟弟。可是，他反倒笑着对我说，‘哥，我不能遂愿就要走了，可是，日本鬼子是一定会完蛋的’。我听了他这话，心里想，不错，到底是咱们的亨权呐。”

我听着他的回忆，怀念着亨权叔叔，流下了眼泪。我对曾经写信批评叔叔的事深感后悔。

当时，亨禄叔叔看到弟弟惨不忍睹的形状，不禁昏过去了。他勉强提起精神向看守提出了要求。

“让我把弟弟领回家去治病吧。”

看守一听，便说：“不行。你弟弟活要活在牢里，死也要死在这地方，要成牢中之鬼。不许带回家去。”

“那，我替弟弟坐牢。让弟弟回家治病，等病好了再回来坐牢不就行了吗？”

“混帐东西，哪有替人坐牢的法？”

“法还不是由你们定的吗，有什么不行啊。你就答应了吧。”

“你这混帐东西，竟敢在这里胡闹。弟弟是个坏蛋，你这当哥哥的也不是好东西。你们统统是孬种。快给我滚出去!”

看守们大声吆喝着把亨禄叔叔撵出了监狱。

亨禄叔叔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办法，便拿出16圆钱交给看守，说：“请求你，好好照顾我们的亨权。”他留下这样的嘱托，就回到了

万景台。其实，那点钱怎能买得动刽子手的心啊，可是，亨禄叔叔还是把手中的钱全拿出来塞给了看守。

亨禄叔叔探监回来后，整整一个月没睡好觉。他一闭眼，弟弟那惨不忍睹的形状就浮现在眼前，使他不能成眠。

在那以后又过了三个月，亨权叔叔终于在监狱里去世。那是1936年初，也就是我结束第二次远征北满，同部队一起开往南湖头地方的时候。那时，我二叔只有30岁。

我父亲去世，我母亲去世，我弟弟也走了，连我二叔也走了，为革命不惜粉身碎骨的我的这些亲骨肉都走了，再也没有了。我在山里听到二叔去世的消息，就下定决心，我无论如何要活下来，光复祖国，为怀着亡国恨，变成无主孤魂被葬在故国一个不知名的岗子上的二叔报仇雪恨。

当时，我们家虽然收到我二叔去世的通知书，却因为没有路费，没能去把遗体领回来，亨权叔叔就被埋在麻浦监狱的乱葬岗子里了。这一令人心痛的事，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亨权叔叔在他快要咽气的最后时刻，才把他藏在心底的话讲给了同牢的人们。

“金日成是我的侄子。现在他在满洲率领革命大军打日本鬼子。那个部队打进国内来的日子不远了。为迎接他们，要拿起武器战斗。只有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才能赶走日本鬼子，解放祖国!”

每当我想起亨权叔叔的时候，脑子里就浮现出许许多多在贯彻卡伦会议决定的道路上毫不吝惜地献出了青春的战友。

亨权叔叔有一个叫英实的女儿，解放后在万景台革命学院念书。我本想无论如何要把她好好培养起来，让她继承父亲的遗志。不料，连她这个我二叔唯一的骨肉，也在战争时期美机的狂轰滥炸之下牺牲了。

用鲜血开拓了我国革命前进道路的朝鲜革命军队员的业绩，是无比神圣而崇高的。在他们这些英雄积累的宝贵的斗争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作为他们付出了神圣鲜血的代价，朝鲜人民革命军诞生了，作为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

六　革命诗人金赫

革命，是从寻得同志开始的。

资本家的资本是钱，而革命者的资本是人。如果说，资本家是以钱为资本去筑成致富之塔的话，那么，革命者则是以同志为资本去变革和改造社会的。

青年时代，我曾有很多同志。他们当中，有基于人情相交的至友，也有在斗争中志同道合而成了同志的。那一个个同志都是用亿万金钱也换不到的宝贵的人。

被我们的后代称之为革命诗人的金赫，便是这些同志中的一个。金赫是在我青年时期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人，他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可是我至今仍不能忘记他。

这是我和金赫第一次见面时的事。

那天，刚上完汉文课，我正和尚钺老师在走廊上说话，权泰硕跑来告诉我有客人来找我。他说，是个没见过面的生人，正和戴眼镜的车光秀站在大门那边等着。

我跑去一看，果然，有个面容像女人一样秀气的陌生青年，手提一只皮箱，正和车光秀站在一起。他就是车光秀时常向我提起的才子金赫。他没等车光秀向我介绍，就很随和地向我伸出了手，握着我的

手说：“我是金赫！”

我也握住他的手，作了自我介绍。

我对金赫有格外亲切之感，这和车光秀常向我介绍他的情况有关；另一个原因是，他的脸长得很像金园宇。

“你把金赫兄请到宿舍去等我一个小时，我下了课就来，好不好？如果是别的课，我可以旷一堂课，可巧是尚钺老师讲的文学课。”

我向金赫求得谅解后，托车光秀替我陪他。

“噢，尚钺老师的文学课，人人都听入迷了。成柱，你是不是也像金赫一样要当一个文学家呀？”

车光秀扶了扶眼镜架，开玩笑说。

“难道我这个金成柱就不能当文学家吗？依我看，干革命还非得懂文学不可哩。你说呢？金赫兄，是不是这样？”

金赫一听我这话，几乎欢喜得叫起来：

“来到吉林，这才听到一句令人耳目一新的话哩。如把文学撇开，还有什么革命好谈。革命本身就是文学的对象，又是文学的母体。那位文学老师那么叫人倾倒，那我也想见见哩。”

“那，后日我给你介绍就是了。”我说。

我跟金赫说过这句约定的话以后，就到教室去了。

我听完课出来，车光秀和金赫还在校门前一面等我，一面谈论着不变资本如何，可变资本如何。

两个人话声中都洋溢着热情，那热情自然地也传到我身上。我想起车光秀极力称赞金赫是天生的热血男儿的话，心里不由得为得到又

一个好同志而高兴。

“我不是让你们到宿舍等我吗，怎么还在这里呀？”

金赫眯起一只眼，望着阳光金灿灿的高空，说：

“这么好的天气，像蟑螂似地蹲在屋里干什么？干脆到吉林市街上走走，边遛边谈，谈他一整天。”

我说：“常言说，就是金刚山（朝鲜山名，景色秀丽——译注）也是饭后的景致。我们何不吃完午饭，再到北山，或江南公园去。金赫兄不远千里从上海来找我们，对初到的人连饭都不请吃一顿，岂不是过于怠慢了。”

金赫说：

“来到吉林，见了成柱同志，就是饿他几顿，也不会觉得哩!”

金赫不仅是火热性子，言行也豁达。

那时，不巧我手中没有钱。因此，我把他们带到三丰旅馆，到那里就是拿不出钱，他们也会欢迎我们。开那个旅馆的人，心地善良，而且冷面做得很好吃。到了旅馆，我向那家大婶说明了情况，于是她给我们端来了六碗冷面，一人两碗。

金赫在我寄宿的房间里和我整整谈了三个通宵。第四天，他为了了解吉林一带的情况，到车光秀所在的新安屯去了。

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了他是具有火一般热情的人。如果说，车光秀是个风风火火的人，金赫就是个火一般热情的人。平时，他像女孩子一样温存安静，可是给他一点冲击，他就会热情奔放，不可抑止。他也和车光秀一样，是走遍东洋三国，饱尝人间酸甜苦辣的风云人物，

但为人高洁。和他谈过话以后，便知他见识广，理论水平也高。尤其对文学和艺术，造诣很深。

我们就文学和艺术的使命谈了很多。他力主文学和艺术应该成为对人的颂歌。后来，他在“吉林风”的熏陶下，把自己的见解发展了一步，说文学、艺术要成为对革命的赞歌了。他的文学观很有革新的意味。我们考虑到他的这种长处，有一个时期，把很多与群众文化启蒙工作有关的任务都交给了他。因此，他常去指导演艺宣传队的活动。

因为金赫很会作诗，有些同志叫他“鲍狄埃”，也有管他叫“海涅”的。金赫真地对鲍狄埃和海涅给予了比任何其他诗人都高的评价。我国的诗人当中，他最喜欢的是李相和[5]。他喜欢的诗，也是以革命为题材的、激昂慷慨的诗。奇怪的是，在小说方面，他更喜欢抒情色彩浓的罗稻香[6]的作品，而不是倾向性强的崔曙海[7]的作品。

我们从金赫这种情趣中感到世间的情理，的确有它的奇妙难测之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结合得很融洽的现象是多么多呀。车光秀把这种现象作了个恰当的比喻：“阴阳结合”。他说，金赫的例子就是阴和阳和谐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学个性。

金赫尽管投身于艰巨、复杂的革命工作，但还是抽空不断写出了出色的诗作。参加我们组织的吉林的女学生们，喜欢把他的诗抄在手册里吟诵。

金赫不像别人那样在创作时写了又涂，涂了又写，而是从头到尾，全在脑子里修润。他认为再无须改动时，就一拳敲在桌子上，奋笔疾

书，一挥而就。

我们知道他拳头一敲桌子，就有一篇诗出世，所以一见他敲桌子，就高兴地说："金赫又下了一个蛋（诗）。"金赫的诗一脱稿，我们大家就把它当做一件喜事。

金赫曾有一个名叫承少玉的俊美的爱人，是共青同盟的成员。她身材苗条，相貌可爱，还具有为了正义不怕上断头台的气概和胆量。她对共青同盟生活非常忠诚。

在进行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斗争的那年秋天，我听过她在街道上作宣传演说，讲得十分带劲。

最喜欢把金赫的诗抄在手册里，随身带着，随时吟诵的就是承少玉。她对朗诵诗、唱歌、作演说，都很拿手，加上她不管是什么季节，总是穿白袄黑裙子，所以一提起承少玉，吉林市的青年几乎没有不认识她的。

金赫一向满腔热情地感受生活，而且把生活诗化了。他的爱情生活也很炽烈。青年共产主义者搞革命，也谈恋爱。不像有的人说的，好像共产主义者没有人情味，没有人的生活，没有人间爱情。说这种话的人是对共产主义者毫不了解的人。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找到了爱情；在枪林弹雨中，建立了家庭。

一到假期，我们就把几项群众工作任务交给金赫和承少玉，把他们派到承少玉的家乡孤榆树去。

他们乘着做群众工作的间隙，常到柳树葱茏茂盛的伊通河畔散步或钓鱼。金赫钓鱼，承少玉就帮着把钓上来的鱼摘下来，再把鱼饵穿

在钓上。在景致优美的北山和松花江畔以及伊通河畔，他们的爱情也和革命一道日益成熟了。

然而，不知是什么缘故，承少玉的父亲承春学，对他们相爱不大高兴。

承春学是三光学校的前身彰信学校的创办者，又是校长。他曾到苏联去过几年，在滨海省读过书，因此，在当时来说，可算是相当开明的人物了。当我们到孤榆树，把彰信学校改造成三光学校，把民族主义者组织的群众组织改编为共产主义组织、革命组织的时候，他最先对我们所做的工作表示理解，并积极地帮助了我们。

像承春学这样的人，竟对他俩的相爱持冷淡态度，金赫虽是男子汉大丈夫，也不免感到有些惶恐。

承少玉的母亲对金赫倒是称心的，认为金赫将来是个好女婿，所以对他俩的关系持默认的态度，而且在丈夫面前尽量庇护他们。后来，承春学经过对金赫较长时间的仔细观察，知道了他是出色的革命者，终于随了女儿的意思。承春学允许他们订婚那天，金赫和承少玉照了相。那时，承少玉家还有照相机。

当金赫牺牲的消息传来，承少玉完全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她甚至想投河自尽，我们的同志们好容易才把她从伊通河畔拉回来，使她镇静下来。

承少玉在那以后，仍全心全意地参加革命活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的作者崔一泉丧偶后，承少玉嫁给了他。宁愿做继母抚养别人生的孩子，也要同跟金赫一样的革命者度过一生，这是她作为女性

的理想。

金赫的火一般的性格在革命实践中，表现为火热的忠诚。他是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忠诚的革命者。他比我大五岁，曾到日本读过书，但他从不表现自己，总是诚恳地接受我们交给他的任务。因此，我格外珍重和爱护金赫。

1928年夏，金赫同车光秀一道在柳河县一带进行活动。就是在这个时期，由他们指导，在孤山子东盛学校办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特别班），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那时，金赫讲授人类进化史、世界政治地理、文学和音乐科目。他在孤山子的青年学生中是个大红人。

当我出狱后向东满方面出发时，金赫往返于孤榆树和吉林之间，执行组织分派的任务。就在我去敦化时，我们用书面交给了他一项任务，让他去指导江东、吉林、新安屯的革命组织，同时为出版新刊物做准备。

过了一些时候，我在敦化办完事，回卡伦的途中去找金赫，见他正扎扎实实地执行我们交给他的任务。当我向他谈及我在狱中酝酿成熟的问题和要到卡伦去做的工作内容时，他兴奋地要马上和我同去卡伦。我告诉他，先别急着去卡伦，把任务完成后再来。金赫感到很遗憾，但是他还是按照我的话，在新安屯促进了新刊物出版的准备工作后，才到卡伦来。

卡伦会议以后，我们全面地加紧进行发行新刊物的筹备工作。新的革命路线提到了日程上；组织和动员群众将其路线付诸实现的第一个党组织诞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一个能够起到思想代言人作用的刊物，便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金赫很了解这种情况，因此他到卡伦后，通宵达旦地赶写稿子。根据他的提议，把新出的刊物定名为《布尔什维克》。

我们计划，先以杂志形式出版《布尔什维克》，借此用革命思想牢牢地武装群众，等到有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后，逐步改成报纸形式，印发份数也要逐渐增加。1930年7月10日，《布尔什维克》创刊号问世了。

我们这个杂志分发到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各支部、各反日革命组织、朝鲜革命军各小组，还发到我们掌握的学校当教材用。那份杂志上，还登载了解释我在卡伦做的报告的文章。《布尔什维克》在介绍和宣传卡伦会议方针方面，的确起到了巨大作用。起初一个时期，《布尔什维克》以月刊形式出版，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读者的要求，改成了周报。

金赫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任总编辑，几乎每天都通宵地写稿子，直到离开卡伦。他那火一样的热情，没有让他平静地休息一下。

1930年8月初，他作为朝鲜革命军小组负责人被派到哈尔滨去了。在这以前，他主要在吉林、长春、柳河、兴京、怀德、伊通一带活动，哈尔滨对他来说是生疏的地方。我对这个城市也没有什么了解。

我们在吉林时就重视哈尔滨的工作。这个城市的居民，工人阶级居多。要想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就要大胆地到长春或哈尔滨那样的大城市去培养我们的力量。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和反对军阀攻击中东铁路的背信弃义的反苏行为的斗争过程，说明哈尔滨的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的革命性是很强的。到这样的地方去，如能部署好组织线，就可以把很多群众团结到组织里来。

我们所以重视哈尔滨，再就是因为共产国际的联络处在那里。我在吉林毓文中学组织的共青同盟曾接上了关系的共产国际所属的共青组织，也在哈尔滨。要想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我们就必须在这个城市开辟自己的渠道，以便随意出入这座城市。

把金赫派往哈尔滨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哈尔滨一带扩大我们的组织，同时也为了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金赫欣然接受我们交给他的任务，当时，他那显得非常兴奋的面孔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金光烈（金烈）给他写了去共产国际的介绍信。

金赫出发时，久久地握着我的手不放。他对我们交给他的任务，从不计较轻重，总是怀着火一般的热情去完成；可是每当他为单独出去执行任务离开我们时，又总表现出深深的惜别之请。他不管做什么，喜欢很多人在一起干，最不喜欢孤独。

有一次，我问他，一个诗人时常体验孤独的心境，对磨练文学修养是没有坏处的，为什么你那么惧怕孤独？金赫坦白地说，过去满腔郁愤，像浮云一样游历四方时，孤独曾是个贴心的旅伴，可是自从结束了那种生活，就不喜欢它了。他说他在江东过了几个月孤独的生活，来到卡伦和同志们在一起熬夜工作，正在兴头上，又要分手了，他感到很惋惜。

我握住他的手，像哄孩子似地说：

“金赫，还不是因为要干革命才有这样的离别呀。等你从哈尔滨回来，咱们一同到东满去工作吧。”

金赫苦笑一下说：

“成柱，哈尔滨的事你别担心。无论如何，我要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笑着回到同志们身边来。以后到东满去时，要最先叫我同去。”

这就是我同金赫的最后离别。

同他分手后，我自己也不禁感到惆怅。

我们的组织线是从1927年末开始伸向哈尔滨的。当时发生过这样的事：有几个在吉林第一中学勤工俭学的学生，同讲课时侮辱了朝鲜民族的反动的历史教员大闹了一场以后，逃往哈尔滨。在那些学生中有几名受我们领导的留吉学友会成员。

我们把到哈尔滨建立组织的任务交给了他们。他们以在哈尔滨学院、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哈尔滨医专读书的朝鲜青年学生为中心，组织了朝鲜人学友亲睦会和读书会。1928年秋，以这些组织的骨干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哈尔滨支部。1930年初，组织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哈尔滨支部。每当假期，我们派韩英爱去指导哈尔滨的组织。当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席卷满洲的时候，哈尔滨的青年学生起来响应，并开展了大规模的斗争，就是因为那些组织发挥了作用的缘故。

哈尔滨的革命组织中，朝气蓬勃的青年挺多。现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徐哲同志，那时就曾在哈尔滨共青同盟支部工作。

由金赫负责的朝鲜革命军小组到达哈尔滨时，那里的空气非常紧张。当时的情况，是连学友亲睦会、读书会那样的合法组织也要被迫转入地下。共青同盟等非法组织必须彻底伪装起来。

金赫同哈尔滨的同志们一起，讨论了保卫组织、保护组织成员的

办法。根据他的意见，这个城市的所有革命组织，都分散成许多个组，更严密地转入了地下。

金赫和武装小组成员一道，深入码头工人和青年学生等各界群众，积极地解释卡伦会议方针。他以熟练的组织手段和胆量，教育青年，扩大组织，同时还大力推进了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准备工作和筹措武器的工作。他避开敌人严密的监视网，同共产国际联络处也接上了关系。

金赫在整顿和提高哈尔滨的工作方面，立下了很大功劳。他作为担当一个区域革命工作的负责人，走遍了整个城市，蓬勃地开展工作。不料在哈尔滨道里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他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他和敌人开枪拼杀，最后他下定决心自杀，从三层楼上跳了下去。但是，他那铁铸般的肉体没有听从意志的指挥，反倒使他被敌人捉去。敌人把他押到旅顺监狱，施以种种迫害和非刑拷问，在敌人残酷折磨下，他终于牺牲在监狱里。

金赫和白信汉一样，是在我们革命队伍中，为祖国和民族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的第一代的代表性人物。

在一个革命同志贵于千金的那个时代，我们失去了像金赫那样出色的革命才子，是对革命的令人心痛的损失。我听到他被捕的消息时，几天没能入睡。后来，我到哈尔滨时，曾在他留下脚印的街巷和码头踱着步，低吟他生前创作的歌子。

金赫和车光秀、朴勋一样，为摸索朝鲜的前进道路，遍历他乡，终于和我们携起了手。当他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亭子间，寄人篱下，长吁短叹度日的时候，是车光秀写信给他，介绍了我们的情况。车光

秀在信中写道，不要在上海虚度年华，到吉林来吧。只要你到吉林来，就有你所寻找的领导人，既有理论也有运动。吉林是你的理想所在之地。……车光秀给他去了三四次这样的信。金赫就这样来到了我们这里。他和我们见过面后，在吉林转了几天，然后找到我，有力地握住我的手说："成柱，我要在这里抛锚。我的人生要从现在开始。"

据说，车光秀和金赫是在日本东京留学时成为莫逆之交的。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建立共青同盟那天，他流着泪领唱《国际歌》的情景。

那天，金赫握着我的手说：

……我在上海时，曾同中国学生们一起参加示威游行。我见他们呼着反日口号行进，牵动了我的心，便投入了游行队伍。示威遭到挫折，我回到住所，翻来覆去地想，现在该怎么办？明天该做什么？因为我不属于哪个党派或组织，是个无党派青年，所以没有人告诉我要在哪里集合，也没人指示或跟我说，明天要在哪里，怎样进行斗争。……

我参加示威时，心里想，当我泄气时如有人喊着叫我前进，该多好！示威游行结束，要回家时，如有组织和领导人指示明天要怎样行动，那有多带劲！当我中弹倒下时，如有同志抱着我，挥泪叫喊"金赫""金赫！"我该多么幸福！我参加的示威队伍如果都是朝鲜人，是朝鲜的组织，又该多么好！当我朝向敌人的枪口前进时，这种想法始终都凝结在胸间。来到吉林，我找到了好同志，这就够幸运了。今天又加入了共青组织，真不知怎样表现我内心这种骄傲和自豪。

金赫的这一席话是毫无修饰的真情。

他常说，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就是找到了好的同志。正因为他有这样一种人生体验，所以他才创作了《朝鲜的启明星》那样的歌，并把它普及到革命组织中去。

起初，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支歌。我到新安屯去，才听到那里的青年唱这支歌。

金赫背着我，和车光秀、崔昌杰等同志商量后，便在吉林一带普及了这支歌。当时，我对他们把我比做启明星，甚至编歌来唱这件事，曾严加责备。

在《朝鲜的启明星》这支歌得到普及的那个时期，我们的同志连我的名字也改称一星了。他们自己给我起了这样的名字，根本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就“一星”、“一星”地叫起来了。

和同志们一道提议把我的名字改为金日成的是边大愚等五家子的志士和崔一泉等青年共产主义者。

这样，人们以“成柱”、“一星”、“日成”这三种名字来叫我了。

金成柱，是我父亲给起的本名。

幼年时节，叫曾孙。那是因为，那时曾祖母在世，她叫我曾孙，于是一家人都跟着叫起“曾孙”、“曾孙”了。

我认为父亲给我起的本名是很宝贵的，所以不喜欢人家给我起别的名字来叫我。尤其是，把我比做星辰或太阳，对我这样的年轻人弄些不相称的名堂来拥戴，我是绝不允许的。

然而，我们的同志不管我怎么责备、怎么说服，也不管我高兴不高兴，就是喜欢用金日成这个名字。

1931年春，我在孤榆树被军阀逮捕，在牢里呆了20天左右，那时金日成这个名字第一次登在公开的出版物上了。

可是，直到那时，认识我的大部分人都按过去的习惯仍叫我成柱。

后来到东满开始武装斗争以后，同志们开始只用金日成这一个名字来叫我。

同志们就这样又给我起新的名字，又作歌来歌唱我，把我拥戴为他们的领导者。他们是那样尽心尽意地拥戴我。

我年轻，斗争经历也短，可是他们全心全意地推举我，那是因为他们从过去由于没有统一团结的中心，各党各派各自以英雄豪杰自居，专事派系斗争以致葬送革命运动的前一代的运动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是因为他们痛切地省悟到，要光复祖国，两千万民众必须同心同德抱成一团，要使两千万民众团结成一体，就必须有领导的中心、统一团结的中心这一真理。

我热爱和永不忘记金赫、车光秀、崔昌杰等同志，并不是因为他们作歌来歌颂我，拥戴我当他们的领导人，而是因为正是他们开辟了我们民族热切盼望却未曾实现的统一团结，即我国人民的骄傲、光荣、无穷无尽的力量的源泉——真正的统一团结的先河；因为他们是用鲜血开辟了在我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实现领导者和大众的一心同体的统一团结的新历史的先驱。

和我一道进行了革命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们，从未因争权夺位而在队伍中造成不和，也从未因意见分歧而破坏我们当做生命的统一团结。统一团结，曾是在我们队伍中识别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正

因为如此，他们即使被拉到监狱和绞刑架上，还是用生命捍卫统一团结，而且把它作为瑰宝传给下一代共产主义者。

这就是他们的最大的历史功绩。拥戴领导者，以领导者为核心实现了统一团结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崇高、优美的灵魂，是产生今天我们党称为一心团结的统一团结的伟大的传统。

自从青年共产主义者拥戴领导者，同心同德地团结在领导者周围开展革命斗争以来，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开始谱写新的篇章，给过去由于派系斗争弄得混乱不堪的历史打上了终止符。

金赫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那为了革命，熬夜、挨冻、挨饿，奔波于风雪大作的满洲旷野的情景，仍然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如果他现在仍活在我们身边，他会做很多的工作。当革命面临严重考验的关头，我就怀念那时全身燃烧着爱国热情，在斗争中使自己的青春发光的亲密的同志金赫，为他过早地去世而感到痛惜。

我们为了把金赫的形象永远传给后代，在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的最前排立了他的半身像。

金赫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除了我，当时和他一起斗争过的同志们全不在世了，所以没人知道他的相貌。因此，在雕他的半身像时，我们的雕刻家付出了很大的辛劳，金赫的相貌是根据我所说的雕成的。

七　1930年夏

ＭＬ派系统的宗派分子不仅不从五·三〇暴动的失败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反而在1930年8月1日这个国际反战日前后，以吉敦铁路沿线地区为中心，又发动了一次冒险的暴动。

这场暴动给我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五·三〇暴动后，转入地下的那些为数不多的组织也都暴露了。我出狱后奔走各地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组织，也再次受到打击，遭到破坏。在满洲各地，许多优秀的领导骨干成批地被捕、判刑。敌人有了诋毁共产主义、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的借口了。

这次暴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离间活动,起了多大的帮助作用，就更无须赘言了。由于两次暴动，朝鲜人在中国人面前完全丧失了信用。后来，我们通过游击斗争，费了很大的劲才恢复了信用。

居住在东满的朝鲜人，经历了八·一暴动，才开始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有多大的危害，才以不信任和戒备的目光对待驱使群众举行冒险暴动的宗派事大主义者。

我们立即派遣工作员到暴动席卷过的地方，使革命群众不再受宗派分子煽动的骗。

我也准备经由吉林市到敦化方面去做恢复组织的工作。

我到了吉林市一看，像五·三〇暴动后一样，空气十分紧张，杀气腾腾。

我每天化装几次，到处去找那些与组织有过关系的人。

吉林市的火车站、城门和各岔路口，都设了检查站。日本领事馆的密探也在街上到处乱窜，搜索朝鲜革命者。当时民族主义运动已经趋于衰亡,所以敌人也不像在安昌浩事件时那样追寻独立军老头儿们，而到处设网，企图捉拿搞共产主义运动的青年。

曾以反对铺设吉会铁路的斗争而沸腾的吉林市，如今也很难见到熟悉的面孔，想到这里，我心情无比悲愤。

同志们跟我分手的时候，劝我说，到了吉林市决不要久留，要马上到海龙或清原去。但也不能因此就轻易离开吉林市。想到整整三年为开拓新的革命道路日夜奔波付出的心血，我不忍那么轻易地移步到别的地方去。如果我在吉林市没有为革命受苦，甚至坐过牢，那么，对这个城市也许不这样留恋。越是倾注了自己心血的地方，就越热爱，这是人之常情。

幸亏我遇到一个做过共青同盟工作的同志，得知了几个组织成员的下落。我把他们叫到一块，指示他们不要再在敌人面前暴露组织成员，吉林少年会、留吉学友会等合法组织，也要暂时转入地下。

我们还讨论了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的措施。然后对一些可靠的同志交代了恢复革命组织的任务，把他们派到各自的活动地区去。

我也决心离开吉林市了。我要做的事太多。吉林市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我就更急切地想到东满方面去恢复被破坏的组织。

我打算先到清原或海龙方面去，在中国朋友家暂时躲一躲，然后到一些遭敌人破坏严重的地方去，消除暴动的后果。我估计，到了海龙和清原，可以同卡伦会议后一直没有见过面的崔昌杰取得联系，和他一起开辟去南满的通路。这一地带和柳河是崔昌杰的活动地区。

崔昌杰来往于柳河、海龙和清原一带，正在建立基层党组织，扩大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等各种群众组织。当时这一地区的革命运动，由于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的对立，正经受着巨大的阵痛。加上八·一暴动余波的冲击，革命组织成批地遭到了破坏。

海龙和清原之间，有一个我很熟悉的吉林时期的中国同学。初建游击队时，他曾在我们部队，南满远征后回家了。我想到他家去住些时候，等白色恐怖稍稍平息，就可以顺利地闯过这个危险关头。

我离开吉林那天，有几个女同志到车站为我送行。因为她们都像富家小姐似地穿着漂亮的衣服，所以我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安全地上了车。当时，军阀以为绅士家的人是不会搞共产主义运动的。

那时，我没有在吉林本站上车，而到警戒不严的市郊车站上车。不料在车上我遇见了张蔚华。

张蔚华说，他是到沈阳去念书的。他说，在去沈阳之前，为了找我商量干革命的办法问题，先到过吉林市，可是那里却杀气腾腾。他说：“我认识的朝鲜人都已隐藏起来，所能见到的不是军警，就是日本走狗。我找不到你，又没有熟人，只好去沈阳了。”他说着，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到他乘的一等车厢里。看来，他也猜到我是为躲避敌人的恐怖行为而潜行的。

这天，警察对乘客的检查特别严。他们把所有的车门都封锁起来，一一检查上车人的身分，对有些乘客，还毫不留情地翻他们的行李。这天，检票员检票也比往常严得多。八·一暴动的后遗症，不仅影响到城市和村庄，甚至影响到列车上。

在张蔚华的帮助下，我安然抵达了海龙站。警察对乘客的检查那么严，可是对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张蔚华，却连问都不敢问一声。我跟他坐在一起，也没有受到警察的盘查。检票员也没有查我们的车票就过去了。这可能是因为张蔚华的背景吧。

那时，我怀里藏着文件和秘密材料。如果警察搜身，我是不会没事的。

到海龙站一看，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早已在月台和剪票口严阵以待。我凭直感意识到某种危险要临头了。

我想到海龙站的敌人是日本警察，心里就非常紧张。中国警察和日本警察同样都是警察，可是如果落到日本警察手里，那就更没办法了。他们在满洲抓到朝鲜革命者，就不由分说地押送到国内去，或者在关东都督府法院审判后，关进旅顺、大连、吉林等地的监狱。

当我拿不定主意，呆望着车窗外时，张蔚华说，没有特急的事，就跟他一块走，要我到他家去见见他父亲，也商量商量他的前途问题。

我本来是打算在草市站下车到目的地去的。要到草市站，还要走五六站。张蔚华在海龙站下了车，就没有人保护我了，那就可能出现意外的危险。

于是我决定应他的邀请，跟他一起下车。

张蔚华的父亲正好在车站等着。他父亲是到营口去卖人参，在归途中听说儿子要来海龙，才前来接儿子的。他带着几十名腰挎盒子枪的家丁，把一辆高级马车赶到了我们面前，真够气派。领事馆的警察们，愣愣地站在那里，不敢触犯我们。

我们坐上高级马车，在家丁们的护卫下，大摇大摆地向站前大街驶去。那天，我同张蔚华他们一起，住进了高级旅馆，休息得很好。

张蔚华他们让家丁们站岗，家丁们把旅馆围了两重三重，戒备非常森严。

张蔚华的父亲说，隔了好久才见到我，很高兴，便把我领到特等房间，连连替我点好菜。他在抚松的时候就很体贴我。客人问他我是谁，他就开玩笑地介绍说，是他的干儿子。起初是开玩笑的，后来就真的叫我干儿子了。

我知道张蔚华是大富户的儿子，可是，从我在抚松的时候起，就跟他亲密相处。我从小就有地主是剥削者这种一般的观点，可是在同张蔚华的关系上，就没有受这种观点的支配。他心地善良，有良心，为人纯真，又有强烈的反日情绪，所以我们能跟他亲密相处，毫无隔阂。这次在危急关头得到了他的帮助，我心里真是感慨万端。如果平时我因为张蔚华是地主的儿子就排挤他，那么在那危急的关头，他们就不会诚心诚意地保护我。

像张蔚华这样的富家子弟，他不参加革命，不支持革命，也能平生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他在我处在危急关头时，和他父亲一起帮助了我，这是因为他珍视同我的情义。

从我在抚松念小学的时候起，张蔚华就不分富者与贫者、中国人与朝鲜人的差别，跟我亲密相处。他比谁都深切地理解和同情我们亡国的悲痛，真心实意地支持我们光复祖国的决心和理想。张蔚华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热爱自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爱国者。他从朝鲜民族的悲惨命运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不幸。

张蔚华的父亲虽然是个富翁，但他是反对外来势力，主张民族主权的坚贞的爱国者。他的爱国热情如实地反映在他给儿子起的名字上。大儿子生下来，他就给儿子起名叫蔚中。蔚中的“中”字，是取了“中华民国”这个中国国号的第一个字的。他给老二起名叫蔚华，给老三起名叫蔚民，如果生了老四，就准备给他起名叫蔚国。把四个名字的第二个字接起来，就成为“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了，可是老四没有出生。

那时，张蔚华问我，看来明春或明秋，日本帝国主义就会打进来了，他们打进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对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来侵犯，就要迎头痛击。要开展武装斗争。”

张蔚华担心地说，他也要参加斗争，不知家里会不会允许。

我说：

“国家要沦亡了，还顾得上家吗？你既然决心为反对旧社会而斗争，就要参加革命。现在已没有别的出路了。不然，就只能作一个口头上谈论共产主义，坐在家里看看书的忧国志士了。路只有这两条。因此，你也不要只看父母的眼色，而要参加革命。这才是拯救中国的道路，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你不会有别的问题，应该和中国人一起进行革命。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那时不仅是朝鲜人，而且中国

人也都会奋起战斗的。”

我在旅馆住了两三天，就这样给张蔚华灌输了反日思想。他听了我的劝告，说他上完学以后也要参加革命。

我对他说：“要是我实在没办法了，也许还会需要你的帮助，请你给我留下你在沈阳的地址吧。”他给我写下了他在沈阳的地址。我又问他能不能帮我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张蔚华说，只要是帮助你、保护你的事，什么事还做不到！便用他家的马车把我一直送到海龙县和清原县交界处的一个中国朋友家里。

这位朋友家也和张蔚华家一样，是个富户。在中国革命的先觉中，有不少这样的人。所以，我经常想，中国革命是有特色的革命。同工人和农民一起，许多知识分子和有钱人也参加了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

即使是富裕家庭出身的人，如果他发现了抑制人的自主性和阻碍社会发展的矛盾，就有可能产生要参加排除这种矛盾的革命运动的觉悟。我认为，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当中，涌现出为维护劳动群众利益而斗争的革命战士和先觉，其原因就在于此。

问题不在于家庭出身，而在于他的世界观。

如果把人生只是看做一种享乐，那就干不了革命，就只能是为享受而终其一生；如果过的是不愧为人的生活，那就比单纯追求享受要高尚得多，有了这种想法，富翁也能参加革命。

如果因为是阶级革命，就把这样的先觉都加以排斥的话，那么，革命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我在中国朋友家住了几天，他也和张蔚华一样待我很好。他姓王

还是姓魏，现在已记不清了。我托他找了几天崔昌杰，没有找到。据说，八·一暴动后，崔昌杰便深深地转入了地下。

我遇到草市附近的一个共青盟员，托他给崔昌杰转达一封信。我在信里，要他在海龙和清原一带迅速恢复被破坏的组织，积极推进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我在中国朋友家做了几天客，觉得闷得慌，恨不得马上不顾危险地在大地上驰骋，热情奔放地进行活动。可是又想，为了工作，还是得化装进行活动；要是草率从事，有可能坏事，重返吉林就更困难了。再说，南满铁路又因日本鬼子控制，坐火车也不是容易的。我又很想到间岛去，可是那里正进行着对共产党的大逮捕，看来也呆不住。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想尽办法到东满去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

我同中国朋友一起在海龙站坐火车先到吉林市，在那里换车去蛟河。蛟河有很多在我们影响下的组织。在吉林市的时候就和我建立了亲密关系的韩英爱和她的叔父韩光也在那里。

我打算在他们的帮助下，找个能暂时躲避军阀追踪的隐身处，同时推进恢复和整顿组织的工作。我还想，见到了韩英爱，通过她同在哈尔滨的共青国际属下的上级组织取得联系。

韩英爱1929年初因家庭情况从吉林市辍学回到蛟河后，一直没有同我们断绝联系。

先去找谁呢？我犹豫了一阵后，决定先去找在独立军当过中队长的张哲镐。

国民府成立后，张哲镐就同独立军上层诀别，解甲回到蛟河，办

了个碾米厂，埋头营业。我去找他，是因为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又很疼爱我，还曾经是可靠的爱国志士。我在同组织成员取得联系之前需要有一个暂时住宿的地方。

张哲镐见到我，非常高兴，可他没说让我躲在他家里。我看出他有些害怕，便没有说出找他的原因。我又去找一个名叫李载纯的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经营旅馆，积极支援过独立运动者。他虽然也高兴地接待了我，可是只领我到中国饭馆吃了一碟饺子，就要跟我分手了。其实，当时对我来说，比一两顿饭更需要的是能够隐身的住处。他见我来找他，也不会看不出这一点，却没说一句要我到他家去住一宿的话，就跟我道别。他怕连累自己，把过去的情义和亲密关系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从这里吸取了一个深刻而沉痛的教训，人如果不从思想上结合，即使是父亲的朋友也没有用。单凭过去的交情和人情，是不能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

思想变了，信念变了，那么情义和人情也必然随着改变。情同手足的好友之间，产生隔阂以至决裂，都是因为其中某一方的思想变了。即使是赌咒永远不变的友情或同志关系，如果某一方在思想上变了质，也必然要出现裂缝。不坚持思想上的一致，也就不能恪守情义和交情，这是后来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吸取的一则教训。

我同李载纯分手以后，去找韩光的家。我抱着一种期待，心想：韩光也许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韩英爱是女人，也许在家里；只要她知道了我的处境，就会豁出命来帮助我。

谁料到韩光和韩英爱都不在家。我问邻居的大嫂，她也说不知道。在朝鲜青年中，参与过运动的全都隐蔽起来了，再也无处去找人。

不知是谁告的密，警察追上来了。我绝望地想，这下可逃不脱了。在这危急的时刻，韩光家的邻居大嫂把我从危险中救了出来。她急切地对我说："我不知你是谁，看来有危险，快进厨房来吧！"说着她迅速地把自己背上的孩子让我背上。她还说："由我来对付他们，先生就坐在灶前烧火就是了。"看来，那时我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要大得多，扮成孩子他爹也看不出破绽来。

我背着孩子，手拿拨火棍坐在灶门前，开始扮演她叫我演的角色。在革命道路上，我曾经闯过无数难关，也碰到过不少令人惊悸的危急关头，可是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

警察们拉开门，问那家大嫂："刚才来的那个青年哪儿去了？"

那位大嫂泰然自若地回答说："青年？哪来的青年呀？我家谁也没来过。"然后她小声地用中国话说，"家里没有外人，快进屋来，想吃饭就吃点吧。"

我背上的孩子认生，哭个不停。我想哄哄孩子，可是弄不好，又会露出马脚。我左右为难，只是用拨火棍拨弄灶里的柴火。

"跑哪儿去了？是不是看错了？"警察们互相叽咕了一阵，到别家去了。

警察走后，大嫂泰然地笑着说：

"警察走出村子前，请你再当一会儿'主人'。我丈夫下地干活去了，我这就去叫他快回来。你就放心在这儿等一会儿吧。等他回来，

咱们慢慢商量下一步对策。”她给我摆上一桌饭菜，然后就到地里去了。

她刚回来，警察又折回来了。他们喊我出来，说有事要我跑跑腿。这位大嫂不慌不忙地说：“一个病人，怎么去跑腿儿呀？要是你们实在急，那我替他去一趟吧。”于是她替我跑了一趟。

就这样，这位大嫂帮我闯过了危急关头。她虽然是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却很勇敢机智，革命觉悟也相当高。

这位不知姓名的农村妇女，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我凭着过去的交情去找过我父亲的朋友，他们没有理我，可是这位陌生的妇女却不顾生死帮我脱了险。她抱着一心想帮助革命者的纯洁的感情，不顾自己的安危，把我从危急中救了出来。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

干革命的人甚至把自己的生命都能毫无顾虑地寄托给它的那种纯洁而坚实的情义，还是存在于劳动群众中。所以，我经常对战友们说，在革命中遇到了困难，要去找人民群众，肚子饿了要去找人民，想喝口水要去找人民，碰到什么悲伤的事，也要去找人民。

那位大嫂真是个好大嫂。如果她还在世，我真想给她鞠躬道谢。

那年冬天，在满洲地区进行活动的朝鲜革命军指挥员和地下组织负责人在五家子开会时，我就向大家讲了这位妇女的事。

同志们听后都说：“成柱同志可真走运啊！运气好嘛，老天才保佑。”

我对他们说，我并不是运气好才脱了险，而是因为人民好，才没有被军阀逮捕。依我看，人民就是老天，民心就是天心。从此“蛟河大嫂”这话，便成了象征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的我国人民的代词，成

了象征在危急关头不惜牺牲帮助革命者的那种妇女的有意义的代词。

直到现在，每当回想起赤日炎炎、血迹斑斑的1930年夏的时候，我就想到蛟河，想起那位难忘的蛟河大嫂。我一想到苦心找了几十年也找不到踪迹的那位大嫂时，就为我在60年前的那一天，没有问一声大嫂的姓名就匆匆离开蛟河而后悔，感到沉痛的自疚。

如果那时问了她的姓名，今天不是可以向全世界发出寻人启事吗？

解放到现在，有许多恩人通过各种渠道找我来了。有些恩人一直生活在异邦，离别后半个世纪变成了白发老人出现在我面前。在那苦难的年月，曾帮助过我的不少恩人，都来见了我。他们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大地，接受了我的感谢。可是，唯独那位蛟河大嫂总没有出现。她自己也许把1930年夏天的那个时刻发生的戏剧性的事情，只当做平凡的事，全都忘却了。

60年前的恩人杳无音信、杳无踪迹地悄悄隐没于大地。真是越是好玉，埋得就越深。

那天，蛟河大嫂的丈夫从地里回来，她才把孩子从我背上接过去。那时的每一件事，都像是一部惊险小说里的情节。

我跟主人互道寒暄，可我不能说出我的本名，便说了个假名，只说我是个干革命的。

主人说，自己也是干过革命的，同组织的联系断了，只好束手无策地呆在家里，并告诉我说，前面那家有个大狗（密探），要注意。据他说，韩光已逃到北满去了，韩英爱也因白色恐怖到处躲藏，现在要找她是很难的。

我听了，有些茫然。前家既然有密探，那么这家我也不能久留。最好是在哪家隐蔽一段时间后，看形势重返敦化。可是，日本鬼子在敦化设了据点，敦化又曾是共产党火曜派总部的所在地，所以搜查很严，一般的朝鲜人几乎在五·三〇暴动后都被逮捕了，只剩下了妇女。到这样的地方去能不能站住脚，也是个问题。

天黑后，我由这家主人领路，到了离蛟河城内约有15里路的孤零零的一座草棚。这家的老夫妻待人和蔼亲切。

这夜，我再一次深切地感到，我们革命者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只有人民群众。

夜里我躺在炕上，总是睡不着，脑子里浮现出各种念头。该找的人，一个也没找到，一连几天老是扑空，这算什么呢？越是这样的时候，就越不要陷于被动，而要冲破逆境前进；要是陷于守势，那就完了；无论如何要进行活动，老是藏在这样的地方，还能干出什么事呢？我决心，想尽一切办法过好这个关，到东满去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天亮后，没想到韩英爱来了。她说，她接到我去东满的通报后，就嘱托母亲，如果右颊上有酒窝的人来找，就到她隐藏处告诉她。我们是隔一年后才见面的。

我受了那么多周折才见到她，高兴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我们只是呆呆地互相对望着。过去，她笑起来，笑得是那么痛快，几乎把腰都要笑折了。可是只一年工夫她的脸就消瘦得简直认不出来了。

据韩英爱说，间岛的形势也非常险恶。

我对韩英爱说：“老是隐藏着，不就成无骨虫了。无论如何也得开

展活动啊！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不能坐以待毙，要奋发起来，作好迎头打击敌人的准备。要尽快恢复组织，提高人民的觉悟。不能只顾隐藏起来，怕得发抖啊！”

韩英爱说，她也有同样的想法；还说在这样艰难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话，使她产生了新的勇气。

“坐在这没有我们的人的地方，是没有办法的。我帮你同组织接上联系，跟我到哈尔滨去吧。”

韩英爱高兴地说，这太好了，她正因为同组织失去了联系，不知所措呢。

为了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已经派金赫到哈尔滨去了。可是，这时我却想在他回来汇报活动情况之前，我自己尽快到哈尔滨去见见共产国际的人。由于暴动，组织惨遭破坏，城市和农村都笼罩着可怖的紧张气氛，使我再一次痛切地感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给革命带来的危害是多么严重！它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如不克服左倾冒险主义，那从30年代起步的我国革命，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受到莫大的牺牲。

单靠理论斗争，是不可能制止宗派事大主义者和左倾冒险主义者的轻举妄动的。我们说了合乎道理的话和有益于革命的话，他们也不肯接受。他们根本不想理解我们的意见。在五·三〇暴动的影响下，终于又爆发了我们甚为忧虑的八·一暴动。这意味着他们根本没有理睬我们在吉东地区党的会上提出的意见。

要刹住在满洲大地上滚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车轮，就需要有共产国际的帮助。

我很想知道共产国际对暴动的看法，也很想弄清这次暴动究竟是共产国际的指令呢，还是某些人的轻举妄动？如果是共产国际下的指示，那么，宁可展开一场论战，也要刹住这个车轮。

在敌人警戒森严的情况下，我和韩英爱决定化装成中国人上车。

那天，韩英爱在蛟河一带忙了一整天，准备了我们要穿的绅士衣服和鞋子，筹措了旅费。为了减少军警的怀疑，她在皮箱里还装了些化妆品。我在她的帮助下，安全地到达了哈尔滨。

我们找到位于哈尔滨码头商埠街入口处的共产国际联络站，我向那里的人介绍了韩英爱，又通报了五·三〇暴动和八·一暴动后东满的形势，还介绍了卡伦会议的情况。

共产国际联络站也说这两次暴动是冒险主义。在联络站跟我见面的人说，依他的见解，我们在卡伦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是符合朝鲜的实际和革命原则的，是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在卡伦会议上提出新的建党方针，成立了作为其母体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同志社，对此，他也明确地说这同一国一党原则不相矛盾。

我就这样从共产国际得到了对我国革命的生命即自主性原则、创造性原则以及我们提出的一切路线的完全支持。

那时，共产国际联络站的同志问我，想不想到他们在莫斯科办的共产主义者大学去留学。

我也知道莫斯科有这样一个大学，我国也有些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由朝鲜共产党保荐到这所大学去学习。曹奉岩、朴宪永、金溶范

等人也曾在这个大学学习过。当时，满洲地区的青年广泛传唱《莫斯科留学歌》，可见对留学莫斯科的憧憬是多么强烈。

我无心脱离革命实践，回答说："我也想去，可是现在形势不允许我去。"

1989年，我曾和文益焕牧师见过一面，作为闲话提到过哈尔滨的事。他说，那时候，他的父亲也在哈尔滨，负责把共产国际选拔的留学生送到苏联去的工作。

共产国际委任我做吉东地区共青同盟第一书记。

金赫从三层楼房上跳下来，被关进监狱的消息，我们也是通过共产国际联络站听到的。

由于金赫被捕，我和韩英爱在哈尔滨逗留期间，心情一直很沉痛。金赫被囚在铁牢，使我悲痛难忍，有一次甚至到他掉下来的道里那座三层楼房前去看过。

道里的商店和饭馆里，有很多珍馐美味，可是对我们来说，这些都不过是画中之饼。

那时，共产国际一天发1角5分零用钱，靠这一点钱在哈尔滨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住普通旅馆，户口查得严，革命者不能住。没有警察出入，无需报临时户口的，只有白俄人经营的旅馆。不过，这是座豪华旅馆，伙食费和住宿费都很昂贵，只有那些有钱的资本家才能住，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我从多方面考虑，最后还是决定宁可一天吃一顿饭，也要住安全的高级旅馆。韩英爱住了对妇女盘查不严的普通旅馆。

我住进旅馆一看，内部确实富丽堂皇。馆内有商店、餐厅、娱乐室、舞厅，还有放映室。

我没有钱却住进了这家旅馆，曾多次遇到使我难堪的事。头一天，就有个俄籍女客室服务员跟了进来，要给我剪手指甲。剪了指甲，是要付钱的，所以我说已剪过了。她走出去，又有餐厅服务员接踵而来，问我要订什么饭菜。我只好又说是已在朋友家里吃过了。

我每天都要受这种缠磨。因为没有钱，我在旅馆里没吃过一顿饭，只是过夜。办完一天的事，晚上再和韩英爱一起上街去，买一两张最便宜的玉米煎饼来充饥。

有一次，我同前来我国访问的刘少奇见面时，谈到过这件事。他说，那年他也在哈尔滨耽过一段时间，那时党员中没有中国人，领导过几个朝鲜共产党员；还问我那时是不是跟共产国际有联系。推算一下时间，我好像是在刘少奇刚离开哈尔滨后去见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

我交给了韩英爱寻找分散的组织成员的任务。

韩英爱同在吉林时就有联系的哈尔滨共青同盟支部的韩某取得了联系，通过他把转入地下的组织成员，一个个地找了出来，给他们解释了卡伦会议方针。

我也到金赫曾工作过的铁路和港口，会见了受革命组织影响的工人们。这样，我在哈尔滨恢复了地下组织，建立了同志间的联系，然后，把韩英爱留在那里，独自来到了敦化。当时，时间很紧迫，没来得及跟韩英爱说句道谢的话就分手了。临走时，韩英爱要跟我一起去。可是，哈尔滨的同志们坚持要把她留下，所以没能让她如愿以偿。到

了东满后，这事老挂在我心上，可是地下工作纪律又不允许书信联系，所以自那以后，韩英爱就杳无音信了。

韩英爱后来的遭遇，我是很久以后看到党史研究所的同志们所搜集的资料才知道的。

我离哈尔滨去敦化时，给哈尔滨的革命组织留下了一封信。韩英爱为了执行我在这封信里交给哈尔滨的同志们的任务，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于1930年秋被警察逮捕。要是一般的妇女，就会想念家，回蛟河去的，可是韩英爱却继续留在哈尔滨，废寝忘食地执行了我交给的任务。她是个沉默寡言、温柔善良的姑娘，但在革命工作中却坚韧不拔，勇敢果断。

韩英爱被捕后马上被押到了新义州监狱。那正是李钟洛、朴且石等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有牵连的人大批被捕入狱的时候，所以，她也和李钟洛被囚禁在同一个监狱里。

后来，李钟洛同韩英爱见面时说：“我和金成柱很熟，你也受过金成柱的领导，我们是不是应该齐心协力，想法让他归顺呢？你要是有这个意思，就来参加我们的‘归顺工作队’吧。”

韩英爱当场就驳斥他说，你干这种勾当是可耻的，我们应该帮助金成柱干革命，怎么能做这种卑鄙的背信弃义的事呢？出狱后干不了革命也就算了，可不能干那种勾当。

1938年冬，我们在南牌子开会时，为了让我“归顺”而来到会场的李钟洛，把这些事全都坦白了。

我这才听到了韩英爱的消息，知道她在监狱里虽然受到严刑拷打，

但是没有屈服，坚持了革命者的节操。像李钟洛、朴且石那样的男子，刚尝到监狱的滋味，就在转向书上盖了章，而韩英爱身为女子，却勇敢地战胜了那种苦楚。

“惠山事件”[8]后，各地革命者大批被捕，走革命道路的人当中出现了变节分子，给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这样的时候，听到韩英爱的消息，我深受感动，也得到了鼓舞。

韩英爱在中国丹东的橡胶厂做过制鞋工。她在劳动当中还给同胞们传布了她在吉林时期唱过的革命歌曲，为维护工人的权益，提出各种要求，并有力地唤起人们展开实现这些要求的斗争。

后来，韩英爱到汉城去了，在洪命熹先生的儿子家里度过了几年。

她为了重新到满洲去找组织线，苦心奋斗了几年，很晚才结婚。她虽然盘髻埋没在家庭里，但是丝毫也没有抛弃和我们一起为革命奔走时的良心和节操。听说，当我们手持武器，转战于白头山一带，打击敌人的时候，韩英爱在汉城听到这个消息，还一一点出吉林时期的同志们的名字，衷心祈祷我们胜利。

她的丈夫在解放后加入了南朝鲜劳动党，进行地下活动，后来在祖国解放战争的暂时撤退时期，被敌人杀害了。

战争时期，韩英爱在汉城附近负责一个妇女同盟组织，积极进行支前工作。丈夫被杀害后，她带着孩子为了找我来到平壤。但是，她还没有见到我，就在1951年8月14日夜遭到敌机的轰炸，不幸和两个孩子一起牺牲了。

我认为韩英爱的一生是清白无瑕的。她以吉林时期的那种精神走

过了自己的一生。她唱歌，唱的也是吉林时期的歌。

干革命的人应当像韩英爱那样，即使身处远海孤岛，也不失去信念，不抛弃良心。

在我的生活中，韩英爱也是我难忘的恩人。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她来找我，冒着危险帮助了我，是个值得感谢的妇女。

解放后，我回到祖国向各地探询韩英爱的去向，但她不在共和国境内。

解放前，我忙于抗日战争，没能重新见到她。可是，她为了弄到我化装所需的中国衣装，在盛夏酷暑中汗流满面地到处奔走；在火车上，每当受军阀检查时，她随机应变，保护我脱险；她吃一张煎饼时，也总是掰成两半儿，把其中一半默默地推到我面前。这种种往事，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韩英爱为我做的一切，大大超越了恋情之类的感情，是纯洁的无私的同志的爱。

我想到她为找我来到平壤，还没有见到我，就牺牲于敌机的轰炸下，心里禁不住悲痛万分。

幸亏她年轻时的照片奇迹般地留存了下来，传到了我的手里。每当我心中充塞对已故恩人的缅怀时，我就从照片中去找给我的青春时代留下了巨大足迹的韩英爱的美好的灵魂，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八　渡过豆满江

我父亲曾多次说过，间岛人的斗争性是很强的。经历了五·三〇暴动和八·一暴动后，我也清楚地认识到了间岛地区的朝鲜人具有出众的革命性。

间岛和朝鲜北部地区很早就成了义兵和独立军的活动舞台，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也首先传播到这个地区。间岛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由于领导人中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急躁情绪，经历了很多迂回曲折，但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却一直在持续进行。

因此，我在狱中就决定，一旦开始展开武装斗争，就以白头山为中心，把朝鲜的北部国境地区和间岛地区作为重要的战略据点。

日本帝国主义也很早就对这个地区非常重视。我们是想把以白头山为中心的朝鲜北部国境地区和间岛地区作为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据点，而日本帝国主义是企图把这个地区变成他们侵略满蒙的战略要冲。从20世纪初起，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满制造各种事件的目的，就是要为实现这一野心搭起桥梁。

1907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派军队侵入延吉县龙井，并设了“朝鲜统监府派出所”；1909年又诱骗中国反

动政府缔结了间岛条约，进而夺取了吉会铁路敷设权。后来，龙井的“朝鲜统监府派出所”升格为日本总领事馆。日本帝国主义在龙井设总领事馆，其下设五个领事分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在间岛的朝鲜人过上好日子。除这类领事机构外，他们在各地设置警察署，还制造出朝鲜人居留民会等许多走狗团体，严密地监视居住间岛的朝鲜人的一举一动。东洋拓殖会社办事处和日本金融界也向这个地区伸出了魔爪。东满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完全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

东满地区就这样正在变成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场。

这就更使要把白头山大森林地带和东满建成武装斗争的据点的想法片刻不离我的脑海。八·一暴动后，我从各方面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已迫近的征候，便更加坚定了把革命性强的东满人民组织起来，尽快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心。因此，我决定到东满地区去。

我一说要到东满去，我们的同志们都恳切地挽留我，说，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机构和情报网密如蛛网的地方去，是冒险，等于负薪投火。但是，我还是下定决心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进行革命，大胆地奔赴东满。

可以说，直到那时我的活动主要是以城市的青年和学生为中心进行的。要根据卡伦会议通过的革命路线的要求，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阶段，我们就有必要更深入到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中去，引导他们尽快作好投入反日战争的准备。

共产国际也支持我到东满去。

我首先到了敦化。因为这一带受八·一暴动的害最严重。敦化是这一暴动的发源地和中心舞台。

这里有日本军的一个守备队本部和吉林总领事馆所属的领事分馆，还有旧东北军677团团部。在敌人的镇压力量如此稠密的地方发动像八·一暴动这样冒险的暴动，是同这一带有许多左倾冒险主义分子进行活动有关系的。敦化同磐石一样，是ＭＬ派的根据地，也是朝鲜共产党重建运动的一个中心。朴允世、马建等八·一暴动的主谋也都把自己的活动基地设在这个地方。

敦化有党、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等我们组建的各种革命组织，陈翰章、高在凤，高一凤等一些可靠的同志也在那里。

我一到敦化就住在陈翰章家，穿上中国山东衣裳，开展清除暴动后果的活动。我在吉林到处建立共青小组时，正在念中学的陈翰章也在敦化加入了我们的组织，进行活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了满洲后，他在吴义成部队总司令部做过秘书长，后来在东北抗日联军历任师参谋长、师长、方面军军长，还任过南满党委书记等。可是在敦化时他还是个淳朴、寡言的共青同盟盟员。

陈翰章同张蔚华一样，也是大富户的儿子。但他对革命的热情特别高，共青同盟生活过得非常认真。陈翰章的父亲是个大富农，有几百匹马，还有好几支枪。家宅周围筑了土墙，好威风。他开玩笑地对我说，他家本来是打倒对象，周围都是自己的地，所以从来不踩人家的地。他家究竟有多少地，我不大清楚，不过他家是个大富户，确是事实。

陈翰章说我是教给了他共产主义的前辈，盛情款待我。因为生活富裕，我白吃饭，他家也不在乎。

我让陈翰章和高在凤去找打散了的组织。白天穿中国衣服，说中国话，到处去找同志；夜晚就穿上朝鲜衣服，说朝鲜话，恢复组织。这样基本上清除了暴动后果，然后我按共产国际的委托，在敦化组织了吉东地区共青委员会。

之后，高在凤等几个共青盟员接受了我交给他们的到豆满江沿岸的城市和农村去，实现群众的革命化，建立党组织的任务，奔向了各自的活动地区。

我交给陈翰章进敦化中学去搞共青活动的任务后，也离开了敦化。

我到东满后第一个落脚的地方是和龙。

和龙有个名叫曹亚范的中国同志，他在吉林师范学校念书的时候，加入我们的共青组织进行活动。那里还有蔡洙恒等朝鲜同志。我估计，靠这些同志进去，就能清除暴动的后果，扩大组织。

我首先到大立子去见了曹亚范。

曹亚范说，八·一暴动的后果非常严重，暴动后，朝鲜同志不知都藏到哪里去了，根本见不到。他还说，被捕入狱的几个同志很快会获释，要我见见他们。

几天后，蔡洙恒接到通知找我来了。他在龙井的东兴中学念过书。我在毓文中学念书的时候，他在吉林师范学校念书，从那时起，就在我们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工作。蔡洙恒在吉林的青年学生中以足球选手享有声誉。当时，有好几个和龙的青年到吉林市来念书。金俊在龙

井和稳城一带宣传我们的思想，而蔡洙恒则来往于和龙与钟城地区宣传我们的革命思想。他同后来任县党委书记时被打成“民生团”嫌疑而被杀害的金日焕同志一起，建立了共青组织、反帝青年同盟、农民协会、反日妇女会等革命组织，把广大群众团结在他们周围。以制造延吉炸弹的能手出名的朴永纯同志，也在延吉县八道沟矿山反帝青年同盟，进行活动。

这样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组织，因两次暴动而分崩离析了。许多骨干分子被逮捕或转入地下，所剩无几的组织成员也因缺乏锻炼，惶惶不安，不知所措。

这种情况，使我就革命者的信念问题想了很多。我在离开卡伦，经吉林、海龙、清原、蛟河、哈尔滨、敦化来到和龙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在反革命恐怖面前，吓得发抖或失去了革命必胜的信心，发生动摇的人。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只有在从理论上领会能引起万众共鸣的正确革命路线和战略策略，并拥有自己的革命力量的时候，才会产生，并通过斗争更加坚定起来。

但是，鼓吹暴动的人却没能提出群众可以作为旗帜的纲领和战略策略。我们在卡伦通过的革命路线还没有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我同蔡洙恒等几个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干部开了协议会，详细地给他们解释了卡伦会议通过的革命路线。

我还强调，要以经过了斗争考验的有威望的同志配备好领导骨干，迅速恢复被破坏的群众组织，不断扩大其队伍。在豆满江沿岸各县设立革命组织区的任务，也是这时提出的。

我又强调说，暴动组织者们害怕监狱和绞刑架，把群众丢在敌人的刀枪面前，都逃跑了，但是，我们必须尽快清除暴动的后果。那时，我经常穿山东衣服，所以和龙的同志们都称我“山东青年”。

我第二个去的地方是汪清。我去汪清的目的是要见吴仲和。

给我介绍吴仲和的，是金俊同志和蔡洙恒同志。他们从来往吉林市的时候起，见到我就向我介绍许多人，说，哪儿有谁，到某个地方去就有干什么的人，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聪明，等等。所以，我身在吉林市却比较熟悉间岛地区的情况。

那时，我注意听他们的话，把那些他们认为聪明的人都记在脑子里了。

我父亲一听到有好人，就不管他在哪里，一定去找他，跟他携起手来，争取他成为自己的同志。这使我领会到人材决定一切，革命事业的成败，取决于能争取到多少真正的同志这一真理。

只要能争取到一个同志，就是饿三天饿十天都没关系，这就是当时我的心情。我抱着这种心情来到了汪清。蔡洙恒从和龙一直陪我到汪清县石岘。

我在石岘见了吴仲和、吴仲洽，还见了吴泰熙老人。

吴泰熙老人的家是个少有的大家庭。老人的四兄弟原来住在咸镜北道稳城郡古作洞，1914年前后迁移到汪清县。这四兄弟的子孙合起来就有几十人之多，他们分居在豆满江两岸的汪清和稳城各地，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吴仲和是汪清五区党委书记，吴仲洽在汪清县春华乡元家店做共青工作。吴仲和的弟弟吴仲成曾在汪清县石岘进行共青

活动，于1929年初迁居稳城郡丰利洞，以普文学堂教师身分进行革命工作。

吴仲和在中学毕业后，曾在和龙私立化成学校当过教员。

那时，我到石岘去一再提醒吴仲和同志说，为了实现群众的革命化，首先就要使自己成为革命者，然后实现家属和村民的革命化。

后来，吴仲和出色地实现了家庭革命化，在他的弟兄亲属中，有十多人成长为忠实的革命者，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其中涌现了吴仲和、吴仲成、吴仲洽等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并不是偶然的。

在石岘办完事后，我决心径直到稳城地区去。我生在朝鲜西部地区，从小就在异国土地上生活，所以对豆满江以南的六邑[9]地区不大熟悉。

六邑一带是李王朝时期被罢职的两班过流配生活的地方。这地方本来口粮紧缺，气候恶劣，加上头头们的欺压和残酷虐待，所以边防军的士兵来到这里不久就逃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些做官的，叫他到这一带去做官，也都感到失望。他们接到任命状后，也不愿到这里来，制造种种借口，在汉城街上转来转去。据说，李王朝500年期间，封建统治者一直为此事伤脑筋。

每当金俊谈到六邑时，我就说，我们的祖先把这块地当做不毛之地，弃之不顾，可是我们要付出血汗把这一带转变成革命的堡垒。我抱着这种远大的计划开始向这里派人。

稳城是在我们的影响下，从20年代末起，由金俊、蔡洙恒、吴仲和等人开始正式开拓的地方。早在那时，我们就已经看出白头山地区

和稳城等豆满江沿岸六邑地区在发展我国革命中所占的地位和重要性，拟订了把这一带建设成为抗日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的计划。还打算在这一地区，为掀起国内革命的新高潮打开突破口。当时，稳城地区有100～150名青年到龙井去学习，他们放假回来，就在同我们有密切联系的金俊、吴仲成等先觉的领导下，把“吉林风”吹进这一地区。稳城成立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支部。这是我们可以向国内扩大我们势力的好渠道。我们的思想沿着这一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向稳城地区。

我来稳城地区的目的是要在国内建立党组织，采取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的措施，以扩大和发展整个朝鲜革命。

从石岘陪我同行的吴仲和的堂弟，为了通知我们即将抵达的消息，先渡江到吴仲成所在的丰利洞去了。

我们在稳城郡南阳对岸的灰幕洞一个山沟入口会见了接到通知赶来的吴仲成和其他组织成员。这是我同吴仲成第一次见面。他身材比他哥哥吴仲和魁伟，性格豪放。吴仲和说，他弟弟能歌善舞，诗也吟得很好。

入夜我们坐船悄悄地渡过了豆满江。吴仲成摇橹摇得也挺起劲儿。我望着黑暗中的山野，想到这是时隔五年重踏祖国大地，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端。

我在南阳上滩下了船，对吴仲和说，如果是实现了祖国独立后渡这条江，该多好呀。

吴仲和表示同感，说他每次渡豆满江时也都有这种心情。

我们经过南阳上滩村，到了爬南阳山的山路。我们走进吴仲成预先搭好的草棚里，了解了稳城地区革命组织的活动情况和群众的动向。

稳城人们在建立群众组织中取得了不少成果。

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指导了国内地下革命组织的工作。在这过程中，我了解到稳城地区的革命者们虽然在国内许多地方建立了组织，但在扩大和发展这些组织方面却非常消极。

只由几个可靠的骨干成立组织之后就关起大门，不扩大队伍，是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这种原因，各组织未能深深地扎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

1929年春作为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下属组织成立的稳城共青同盟，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成员。他们高筑围墙，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当时，地方会、振兴会、新干会、党的重建派等各种团体和派别竞相把青年拉向自己的一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是战战兢兢地维持现状，以防歪风吹进组织里来。

我在丰利见到的一个共青干部说，敌人的活动一猖狂起来，群众就根本不肯接近他们；还有的共青干部诉苦说，不知应该怎样对待那些参加过青年同盟和新干会的青年。曾任丰仁洞农民协会负责人的全长元，因为亲属中有不少当区长、面长和警察的人，生怕敌人的魔爪通过这些人伸进革命队伍里来，所以只要是在敌统治机构里效劳的，不管是他的多么近的亲属，一律不接近。

这都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

不克服这种弊端，稳城地区就不能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使革命深入

发展。

革命者的一生，可以说从深入群众开始；革命的失败，则可以说从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深入群众开始。

我向吴仲成恳切地说,单靠几个家庭出身好的人是干不了革命的。要大胆地相信群众，向他们敞开组织的大门。越是打着形形色色的幌子的青年团体竞相把青年拉向自己一边,共青组织就越不能陷于被动，而要发动积极的攻势，争取更多的青年群众。不论是参加过青年同盟和新干会组织的青年，还是追随过党的重建派分子，或者是无意中被他们利用的青年，都要给予教育和引导，把他们一个一个地争取到我们一边来。

我对全长元同志也讲了做敌机关人员工作时应遵守的策略原则。

我说，干革命的人不仅不要因为亲属中有区长、面长和警察而惊惶或畏缩，反而要有这样的打算：利用这种亲属关系，打进敌人统治机关去，使日寇的基层统治机构陷于瘫痪，在敌人内部大干一场。要把稳城等六邑一带建设成武装斗争的战略据点，就要实现群众的革命化，同时还要大胆地争取在敌统治机构里服务的人。你要在争取敌机关人员的工作中积累一些经验。

在那次稳城之行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同金俊、吴仲和、吴仲成等同志一起，到美浦面月坡洞铁路敷设工地去和工人们见面的事。

日本帝国主义从1929年初起就在豆满江沿岸加快了铁路敷设工程。从三南地区等国内各地和间岛地区强征1 000多名劳工，在月坡村形成了叫开风街的繁杂居民区。原在吉会铁路敷设工地的劳工也拥到

这里来，为挣钱从事苦役。

我在吉林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找金俊说，如果在月坡洞里开始了铁路敷设工程，就要到工人中去建立组织。

金俊显出了好奇心，也说这是值得干的事情。后来，他按照对我作的许诺，到稳城去在月坡洞组织了劳动青年会和反帝青年同盟。

我一说要到铁路敷设工地去，稳城的同志们就劝我打消这个念头，说那儿敌人的警戒非常森严。

那时，他们说是“来了共产国际特派员”，为我的安全费了很多心。他们之所以给我加上“共产国际特派员”的头衔，周密地组织了警卫工作，是因为在国内日本警察对革命者的监视和戒备特别森严。

我当然也知道，到了朝鲜事事要小心，提高警惕。但我的心情是到工人中去，即使不能马上干出什么大事，也很想握握工人的手，说一句能鼓励他们的话。我直到那时一直做青年学生的工作的目的，是为深入工人阶级架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工人阶级带头，开拓和完成朝鲜革命。自从我们提出解放工人阶级的纲领，并决心为其实现而献身的那天起，就一直想念着朝鲜的工人阶级。

我到工地一天半时间，同工人一起卸碎石、运沙子，吃“工棚”的饭。

金俊向工人们介绍我是在延吉念书，为补贴学费而来的。

我现在也在想，那时我到工人中去是非常有益的。我在“工棚”和工地上看到的，不只是工人们为挣几个工钱拼死拼活地干活的悲惨群像。我在那里看到了渴望斗争的工人，为寻找能够保护和开拓自己

命运的正确道路的工人的面貌。

他们的面貌给了我强烈的冲击。要为工人阶级的幸福奋斗终生的热望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

那时，我在铁路敷设工地上认识了来自稳城的崔春国和崔凤松，后来他们都成了抗日革命战士。

崔春国在陪我到宿舍的路上说,他当爆破工时秘密地藏起了炸药，等工程竣工那天，准备把隧道炸毁。

我对他说，在目前情况下，不要干炸毁隧道之类的冒险活动，更迫切的是加强组织，促使工人的意识化和组织化。炸药先留下来，等我们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用在节骨眼上。

那时，我同工人们谈了很多话。

武装斗争问题、建党问题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也跟他们谈了。到国内来，单是向工人正确灌输卡伦会议精神，也就是很大的收获了。我们对一个人说了，就能马上传给十个人，再经过百人、千人的嘴，传到万人的耳朵里，最后我们的思想就将成为国内人民的信念和旗帜，这是毋庸置疑的。

铁路工地的工人们知道了我们的路线后，都表示积极支持。

工人们从我们的路线中得到了信心，而我从他们接受这条路线后欢欣鼓舞的面貌中得到了信心。

1930年10月1日，在头娄峰建立了党组织，这是我们在稳城取得的最大成果。

我在指导稳城的革命组织过程中，了解到这一地区的革命者们虽

然在对战略问题的理解上犯了几点错误，在群众工作中表现了消极性，可是他们的斗争觉悟和思想水平比预想的高得多，而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稳城地区已经有了可以建立党组织的基础。

参加会议的稳城地区革命者们都打扮成樵夫到头娄峰来了，全长元还托月坡洞组织负责人把牛爬犁拉到会场附近。

在傍着月坡川的头娄峰顶幽静的空地上，我们举行了成立国内党组织的会议。

我首先向与会者传达了卡伦会议通过的路线，阐明了贯彻这条路线首先要执行的任务是建立革命政党，然后说明了在稳城地区建立新型的党组织的宗旨。同时还提出了稳城地区党组织面临的任务：吸收经过组织生活和实践活动检验的优秀的先进分子，不断地扩大和加强党的队伍，组织和发动群众投入反日斗争。

根据我的提议，吴仲成、全长元、全昌龙、崔春国、崔凤松和崔根柱等同志加入了稳城地区党组织。吴仲成被选为党组织的负责人。

光荣地入了党的同志依次站起来介绍自己的历史，还简短地表明了决心。

当时，他们表明的决心，我大都忘却了，只有全长元表的决心，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党组织吸收像他这样家庭关系复杂的人入党，这使他血肉化为尘土，也不会忘记。然后他发誓说，只要革命需要，削骨剜肉在所不惜，甘愿献出肝胆。他说，要是他变成违背誓言的卑劣小人，那么把他的肉体剁成肉酱抛进水沟里也心甘情愿。言辞虽然有些过激，却是真情的流露。

后来，全长元按照自己的誓言，在把稳城建设成半游击区、支援朝鲜人民革命军方面，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为保密，会议讨论的问题一律不许记录。这次会议上没有通过创立宣言和宗旨书等。

与会的稳城同志们说，这是成立党组织的历史性会议，开得这样简朴，没有仪式，未免感到有些空落；像衡平社那样的屠夫组织也搞出个发起宗旨书来公之于世，可我们的会议只说几句誓言就结束了，总觉得不够意思。

我勉励他们说，刚才同志们发的誓言比几百页的宣言书和宗旨书还要实际得多;光是搞文件有什么用呢？不要以为党组织是制造声势、传扬名声的地方，默默地多做工作的人才是好党员，你们要通过实践斗争显示出自己的党性和爱国精神。

稳城地区成立了党组织，这就为在国内奠定建党基础打开了突破口，成了推动国内人民反日斗争的重要转折点。由于稳城地区党组织的积极活动，六邑地区群众的意识化、组织化过程，迅速得到促进，反日斗争也高涨起来了。

群众支持我们，革命以新的形式高涨起来，这样一来，为扩大本派势力而回来活动的崔昌益，也不得不离开家乡，跑到汉城去了。解放后，他向我们坦率地讲了当时的情况。他说：“稳城是我的故乡，所以我以为ＭＬ派已经打进这里，可是到那里一看，没有我们的势力，却吹进了‘吉林风’。这股风刮得那么厉害，全是金日成同志的势力。我原以为金日成同志年岁一定不小，可是人们说，是20几岁的青年，

很精悍。本想去见见，可是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

崔昌益离开稳城跑回汉城，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不喜欢宗派，不同像他们那样搞宗派的人妥协。

在建立了党组织之后，我在那里指导了六邑一带和其他许多地区的工作员和地下革命组织负责人会议，然后踏上了归途。我坐渡船由于汀渡口渡江，心情比来时轻松多了。一切事办得都很如意，高兴得好像要飞起来似的。不顾生死，冒险来到祖国，并没有白跑。

我在祖国度过的一个星期，成为证实我们在卡伦提出的革命路线是万众都能接受的正确路线的重要契机。我们等于得到了祖国人民对我们路线的肯定。

从那时起，稳城人民一直和我们共命运。

我安全渡过豆满江，由吴仲和同志带路，经过凉水泉子和长洞到了延吉县朝阳川。和龙井一样，朝阳川是在延吉地方受我们影响最大的地方。

朝阳川有间岛地区党及共青同盟书记处成员马得汉和罗一同志在进行活动。后来做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会委员的林春秋也在朝阳川挂出“逢春堂药铺医生林春逢”的牌子进行革命工作。他来延吉前，因学生事件被捕坐过牢。他一面行高丽医，一面保证间岛地区党及共青同盟书记处同各县之间的联系。

那时我在朝阳川和林春秋同志是第一次见面。他年纪轻轻，却掌握了高丽医技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于他有高丽医技术，我们的游击队员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整个期间，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帮

助。

五·三〇暴动和八·一暴动给延吉的革命组织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里敌人的恐怖活动比敦化还要严重。干过革命的人畏缩和动摇，缺乏觉悟的群众则埋怨说：“全是共产党惹的祸。”

我同马得汉、罗一、林春秋等党和共青同盟的领导干部讨论了尽快清除左倾冒险主义的后果，进一步加强和扩大革命斗争的问题。

我离开稳城没有径直去五家子，特地经过凉水泉子来到朝阳川，是因为预料到这一地区将成为我们要开展的武装斗争的战场。我是考虑到将要开展的武装斗争，为在稳城、汪清和延吉奠定群众基础去做工作的。

不出我们所料，后来这一地区成了抗日战争最可靠的根据地。

九　变“理想村”为革命村

有一个时期，我国的独立运动者们抱着要建设一个“理想村”的构想，为实现这个构想从各方面做过努力。提起“理想村”，人们都会联想到：没有压迫、剥削和不平等，人人过自由、幸福生活的世界（村）。自古以来，我们民族一直梦想着这种乌托邦式的世界。

民族主义者们提倡的关于建设“理想村”的设想，可以说反映了我们的祖先渴望人人都过富裕、和睦、安宁的生活的志向和愿望。

提倡建设“理想村”，并且为其实现做出了很大努力的代表人物是安昌浩。“韩日合并”条约公布后，安昌浩、李东辉、申采浩、柳东悦等人在中国青岛举行会谈，安昌浩在会上就提出了建设“理想村”的方案。经过认真商讨，独立运动领导者们决定，买下美国人经营的大同实业会社（在密山县境内）的土地，加以开垦，建立士官学校，以培养独立军。他们原打算，建设好这种“理想村”，在那里筹措资金，培养人材，为独立运动奠定物力、人力、财力基础。

这个计划落空后，安昌浩还是为筹措建设“理想村”所需的资金和物色适宜的地区，做了多年艰苦的努力。他之所以为建设“理想村”费这么多心血，是因为他认为需要有一个独立运动的基地，从物质上给“培养实力论”以支持。

要建设“理想村”的想法，当时在独立运动中已成为一种潮流，有不少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开荒办农场、开设军官学校，实现培养实力的朴素梦想。

辽河农村，也是随着这种潮流诞生的。

首次开拓辽河农村的，是曾在南满地区活动的民族主义者。南满的民族主义势力中的部分人员，即，宋硕潭、边大愚（边昌根）、金海山、郭尚夏、文尚穆等人向西行进，到辽河边安家落户。他们宣扬说要在这里建设一个朝鲜的“理想村”，让300多户朝鲜同胞迁移到这里来，同外界断绝关系，开始建设起另一个世界。因为上述五户人家最先到此地落户，所以把这个地方叫做五家子。

当时在吉林文光中学念书的朝鲜学生当中，有几个来自孤榆树和五家子的青年，他们常夸五家子是个好地方。

因此，我就开始注意五家子，并决心把这个村改造成革命村。

1930年10月，我从东满来到五家子。我原计划在东满召开与武装斗争的准备有关的大型会议，可是鉴于当时的局势，东满不宜做会议场所，所以把会议地点改为五家子。

我决心在五家子住几个月，计划一面为召开会议作准备，一面促进这个村的革命化。我到那里一看，果然名不虚传，风俗习惯良好，人情厚道。

这个地方风大，屋顶不能盖瓦，只好抹上粘土做屋顶。抹上有盐分的粘土就不漏雨。五家子的人还用粘土砌了墙，砌得很规整。先用木杵锤打挖出来的粘土，打得像石头一样硬以后，就按一定规格切开

拿来砌墙。这里的人夸口说，这种土坯枪弹也打不穿。

开拓五家子的“志士”们，严禁同他们的思想、主义、主张不同的异己的思想潮流传进村子里来。

他们和农民同心协力，把沼泽地开成水田，办了学校。他们建立了农友会、青年会、少年学友会等群众组织，还建立了叫做村公会的自治机构。每年在日本宣布“韩日合并”的8月29日，他们就召集村民唱《国耻日歌》。五家子的人们把日本军警和中国反动军阀的魔爪还伸不到的此地，看做是“天国”，这也并不奇怪。

五家子的居民中，平安道人和庆尚道人占绝大多数。庆尚道人受南满青年总同盟系统的ＭＬ派影响,而平安道人主要受正义府的影响。

我考虑到我是平安道人，像在卡伦所做的那样，到了五家子也常常住在庆尚道人的家里。否则，会使庆尚道人神经过敏。

我们在卡伦时，曾派几名朝鲜革命军队员到五家子工作，可是他们到这里来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因为他们未能说服这村的顽固而又有坚实基础的“志士”。

靠同志们的介绍，那年我在这里过了冬。我们所以在这一个地方住了几个月之久，是因为我们非常重视这个村。

我们认为五家子是民族主义势力在满洲中部一带的最后一个堡垒。只要我们在这里搞好工作，就能把五家子建设成农村革命化的样板，并且可以根据这一经验，把满洲全境和朝鲜北部国境一带的农村置于我们的影响之下。

我们把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规定为革命的基本动力，并且

特别致力于农民的革命化，是同在我国阶级构成中农民所占的地位有关系的。在我国人口中，农民占80%以上。这种情况，在间岛也不例外。间岛人口的80%以上是朝鲜人，而其中90%左右是农民。由于军阀的迫害和地主、高利贷者的苛刻剥削，农民生活在极度贫穷和无权的状态中，他们不仅受交纳地租的剥削，还受类似强加于奴婢或奴隶身上的那种经济以外的种种剥削和虐待。

国内农民的处境，也和这里差不多。这就说明，农民群众是同工人阶级一样对革命有最迫切的利害关系的阶级；在我国革命中，农民应当同工人阶级一道成为主力军。

实现农村革命化，乃是在奠定抗日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的工作中应首先解决的最重要的环节。

由于工作员们的活动，青年们要追随我们志向的热情急剧高涨。这样一来，五家子的“志士”们就气得挥动着烟袋威胁说，近来邪风冲了年轻小伙子的头脑，哪个二流子想把社会主义传进辽河平原，就把他的骨头打碎。有的“志士”甚至说，听说共产党把间岛弄得一塌糊涂，那股狂风要是吹到这儿来，我们辽河的农村也不会安宁。

看来，贸然行动是不行的，有可能挨他们一顿烟袋锅砸。

青年中发生了动摇。他们很想随着共产主义进行曲前进，可又怕老头子们看不顺眼，因而犹豫不决。有点主心骨的，就跟那些“志士”顶撞起来。

我听了工作员的报告后，认为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先决条件，首先是做好“志士”的工作。如果不把五家子“志士”们的思想方法改

过来，就不能使五家子从建设“理想村”的幻想中摆脱出来，也不能实现我们要把辽河农村建设成满洲中部的样板村的构想。只要让那些“志士”转变过来，其余的人就看我们的了。

然而，我们的工作员已有三个月没能接近他们，只在他们的周围转。五家子的“志士”们确实是难对付的。这些老头儿有当过独立军的资历，又兼有学识和理论，用一般的手段是跟他们搭不上腔的。村子就是由这个“志士”集团摆布的。

在幕后操纵村公会、总管村里大小事务的，是一个叫边大愚的老人。他掌握着村里的实权，操纵着“志士”。村里的人们管他叫“边托洛茨基”老头。人们给他起这个绰号，是因为他不时谈托洛茨基。

边老人很早就为搞独立运动辗转于国内和满洲各地。起初，他在家乡汉川（平安南道）和慈城、道清沟（临江县）等地办校，从事教育活动。1918年他参加了以临江县帽儿山为根据地的独立军部队，从此投笔从戎。那时，他为了同我的父亲取得联系，时常到在临江的我们家来。有时他不能来，就由康晋锡舅舅替他跟我的父亲取得联系。

他历任大韩独立团宣传部长、民族独立军副总裁、光复军军法部长兼第一营营长，后又任统义府实业部长等职，为重振独立军运动而东奔西走。1926年，他辞掉军职，开始埋头建设“理想村”。

有一个时期，他还说要搞共产主义运动，便来往于苏联滨海省地区。他还有一个绿皮党证，是他参加高丽共产党时领到的。

如果不把边老人引上正道，就无法使顽固的“志士”集团转变过来，更无法实现五家子村的革命化。

负责农友会工作的、边老人的儿子边达焕，听到我到五家子的消息，跑来看我。他对我说，在五家子，应把那些民族主义者拉下台，把五家子从“理想村”变为革命村，可是，因为我父亲和村里的“志士”们阻挠，什么也干不了。这回金先生来了，应该把那些顽固不化的、不中用的老头儿们打倒。

我啼笑皆非，便问他：

“打倒？你是想怎么办呢？”

边达焕的回答可够绝的。

“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们另起灶，建立组织，把五家子建设成社会主义的村庄。”

“那样是不行的。那样的话会把五家子分裂成两个。这是不符合我们的路线的。”

“那你说怎么办好啊？总不能把五家子让那些落后的老头儿任意摆布呀！”

“问题是让那些‘志士’支持我们。我想做做会长先生你父亲的工作，你看呢？”

边达焕说，任谁来接近他，都无济于事；国民府啦、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啦、ＭＬ系的共产党重建委员会的人物啦等等，都来过，各自都想在这里站住脚，虽然费尽了心机，可是都遭到我父亲的冷遇，空手回去了；一般的人，他连见都不见，即使来了不简单的民族主义巨头，他也把他训诫一通，打发回去。

“会长先生的父亲跟我的父亲有交情，我又跟会长先生熟，是不

是总比生人强啊？”边达焕说，他那顽固的父亲，拿交情也说不通。说着他显出了为难的表情。十年前，边达焕带着边老人给我父亲的信，来过一次临江。

在村里的“志士”们经常来串门聚在一起的边达焕家，我跟“边托洛茨基”老头谈了好几天。

第一天，主要听边大愚老人谈。他盘腿稳坐，连连磕着烟锅，神情傲慢，嘴上虽说得好，金先生的儿子来了，很高兴，实际上却把我当小孩子对待。一开口就是“你们”、“你们”，一直训人。他仪表堂堂，气度不凡，又有相当的理论水平，一开始就让人感到一种压力。

于是，当边老人问我的岁数时，我就给实岁多加5岁，说是23岁。否则的话，他就更会把我当成毛孩子了。因为我早熟一点，说我23岁，也没人怀疑。当时，不论到哪里去，有人问我岁数，我就回答说23岁或24岁。这样，无论做“志士”的工作，还是做青年的工作，都有利。

边老人说出不合道理的话，我也没有反驳或打断，耐着性有礼貌地听下去。

边老人说，近来的年轻人啊，人家说十句，他连一句都听不懂，却说什么封建啦什么的，光挑刺儿。可是，跟成柱说话，还说得来。

有一天，边老人请我在他家吃晚饭。他说，金亨稷先生在世时，在临江，曾多次受到金先生的款待，今晚请你吃一顿家常便饭。

他跟我谈了一阵，突然问我说：

“听说，你们来是要搞垮我们的‘理想村’，是真的吗？”

边达焕曾说，他父亲最忌讳共产主义者，他这话没错。

“搞垮‘理想村’？我们不能帮你们忙倒也罢了，怎么会搞垮老人们辛辛苦苦办起来的‘理想村’呢？再说，我们又没有这种力量。”

“噢！是嘛。可是，五家子的年轻小伙子们，我家那达焕打头，净说‘理想村’的坏话，一心想打倒我们这些老头子，在我们村打起红旗呢。听说，指挥我们五家子青年的领导人是成柱，吉林的青年们也跟我们那些青年一样对‘理想村’不满意吗？坦率地说说你对我们‘理想村’的看法吧！”

“我不认为‘理想村’是不好的。你们为了把那些被赶到外国流浪的朝鲜同胞集结在一处，让他们过上殷实生活，建设了‘理想村’，我怎么会认为不好呢。在这荒无人烟的辽河沼泽地上建成了这样的朝鲜人村庄，确实了不起啊！老一辈为建设村庄，可真辛苦了。”

边老人听了，非常满意，得意地捋着胡须。他说话的口气也变了，对我的称呼也提高了一格。

“我说嘛。待会儿你也会知道，我们村里，既没有警察和监狱，也没有官衙，通过叫村公会的自治机构由我们朝鲜人民主地解决一切问题。世界上哪里还有这样理想的村子呀！”

我心想，这正是明白说明我们对“理想村”的看法和立场的好机会，便说：

“老大爷，我认为建设一个设有自治机关，用民主方式，为朝鲜人的生活谋福利的村庄，是爱国的行动。可是用建设这种村庄的方法，能取得国家的独立吗？”

边老人刚才还盘腿稳坐，连连磕着烟锅，神气十足，此刻却紧闭

着嘴，只是眉毛一耸一耸的。过一会儿，他长叹一声说：

“那是办不到的。你正好击中了我的痛处。虽然搞了个‘理想村’，可是，对独立运动尚无贡献。我也正为此苦恼。如果建设了‘理想村’，就能取得国家的独立，那该多好啊！”

我不失时机，论证了建设“理想村”的想法是荒诞的。我对他说，一个被霸占了祖国的民族，在异国土地上建设“理想村”，是不可能的；靠老人们的努力，五家子比其他地方的朝鲜人村庄生活过得好些，这是事实，但是，不能说朝鲜人的理想已经得到了实现。我们民族的理想，是在没有日本鬼子、地主和资本家的独立了的祖国，过上不受剥削和压迫的生活；可是，欠了地主的债，还能说过着理想的生活吗？再说，日本鬼子打进满洲来，五家子也不会平安无事；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满洲，只是个时间问题；日本鬼子是不希望朝鲜民族过上理想的生活的。

“那么，你是说‘理想村’啦，什么啦，都不要搞啦，是不是？”

老人在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们是要把这个村庄改造成为光复祖国而斗争的村庄、革命的村庄，不要它成为一个甘于现状、安常处顺的村庄。”

“这么说，你是想把社会主义传播到五家子啦。那可不行，我就是讨厌那个社会主义。己未年夏天在宽甸，你父亲说应该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我们都支持了他的想法。可是，后来我跟着高丽共产党跑，才知道，共产主义者全是疯子。他们干的全是宗派勾当。从那以后，我一听共产主义这句话，就一身冷汗。”

边大愚老人把高丽共产党发的绿皮党证拿出来给我看。他说：

“成柱，你为了革命，拼命奔走，可是，你可没有这种党证吧？”

他说完，瞥了我一眼。

我打开党证看了一会儿，赶紧把它揣进西服口袋里了。

老人遇到这出乎意料的事，说不出话来，只是愣愣地望着我。

“这是因搞宗派垮台的高丽共产党的党证，我想留着看一看。”

我以为老人会把党证要回去的，可是他没有要。

“你们说，要把五家子改造成革命村，那你们有什么特殊的方略吗？说说看。”

于是，我长时间地给他谈了江东、新安屯、奶头山、卡伦、孤榆树等村庄是怎样革命化的。

老人非常注意地听了我的话。

他默默地听完我的话，说：“听了你的话，知道你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不反对。可是，光推崇斯大林是不行的；托洛茨基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接着讲开了托洛茨基的理论。

可是，不像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可以看出来，他对托洛茨基的印象很深。我见过很多说自己是精通了共产主义理论的人，像他这样袒护托洛茨基的人，还是头一次见到。

我觉得很奇怪，便问边老人：

“老人家，您为什么那样崇拜托洛茨基呢？”

“说实话，我不崇拜托洛茨基。只是因为我看不惯如今的青年人盲目地崇拜大国的人，才那么说的。托洛茨基是托洛茨基，斯大林是斯大林，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就搬出大国人的论点来说三道四，那有

什么了不起的呢？斯大林的论点如何，托洛茨基的话又如何，这是俄国人才该说的，朝鲜人嘛，应该有朝鲜的精神，应该说为搞好本国革命所需要的话。”

边老人说的话，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我通过跟“边托洛茨基”老头的几天交谈，认识到他不是一般的老人。

起初我还怀疑，这位老人是不是托洛茨基派。随后，我判断他不是托洛茨基派，只是因为他厌恶宗派争斗，给青年们敲一次警钟罢了。你们不要既崇拜这个，又崇拜那个。什么老是说俄国如何、斯大林如何地光谈别国的事。哪有事事都要学俄国的道理呢？老人想对我们说的思想分明是这些。总之，他是要我们按着自己的信念去生活。

“我不想干预年轻人做的事。对我儿子做的事，我也不想干预。不管我家达焕做什么，都由他本人决定。可是，有一件事我决不允许，那就是不许年轻人丢了自己的灵魂，盲目地把人家的论点背下来，自鸣得意。”

听了老人的话，我确信：我们一贯反对宗派主义、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是正确的；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我们的这种见解也是正确的。

第二天，我谈的比他谈的更多。就我们在卡伦会议上通过的路线，做了具体的说明。我说，我们要建立新型的党和军队；超越思想、宗教信仰、财产程度和男女的差别；形成吸收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两千万人民的抗战，以光复祖国。老人似乎从这些话中受到了很强的冲击。他对我们要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向，

举起双手表示特别欢迎。

他们父子俩，都没有妻室。虽有边老人的女儿在料理家务，但只凭这一点，是无法排除这个家庭的冷清贫寒的气氛。

为了给边达焕物色适宜的配偶，我跟同志们商量了多次，终于在五家子附近的农村找到一位姓沈的女人，做边达焕的妻子，还动员我们的人，给他们办了婚礼。我身为未婚男子，要给年长者作媒，觉得既有点妄自尊大，又有些不好意思。可是，办完了婚礼，村里人都把它当做自己的事一样高兴，并绝口赞扬我们办了一件大事。

由于这件事，村里的“志士”都加倍地信任我们了。

有一天，边达焕来找我，谈了他父亲的动向。他说，他的父亲对村里的“志士”说：“现在出现了可以代替我们掌管‘理想村’的主人了，成柱他们就是那个主人。要是他们的做法就是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放心地接受。不要把成柱只当做一个年幼的青年看待。我们已经老了，是落后于时代的古董了。我们应把五家子全盘交给年轻人，尽力帮助成柱他们。”他还说，别的“志士”们也都佩服地说，我们的主张，都是对的。

我了解这些情况后，再次去见边老人。

我说：“我是来还给你高丽共产党党证的。”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党证，说他不需要这种东西。

他说不需要嘛，不能还给他，又不好扔掉，着实为难。后来，那个党证，在我们同志们手里转了好几天。

1946 年，也就是祖国获得解放后的第二年，边大愚老人曾来过一

次平壤，当时我跟他谈了在五家子时的往事，他听着不禁感怀万千，歉然地笑了。他回顾了我们在五家子见面时的情景，又说，看到了整个北朝鲜变成了一个理想村、理想天国，现在死无遗恨了。这时，老人已有 67 岁了。就在这一年，他在吉林省伊通县去世。很久后，我才听到这一悲痛的消息。

边老人的儿子边达焕，在五家子任过农民同盟负责人。他因在我们领导下进行了反日斗争，从 1931 年起在新义州监狱被敌人关押了多年。

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突破口，就这样打开了。

从那以后，这里的“志士”们就开始另眼看待到此地工作的朝鲜革命军工作员了。他们争着做些别样的饭菜请工作员到他们家去做客。

我在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时候，为争取中国人也做了很大努力。不争取中国乡绅，我们就不能在满洲中部地区站稳脚跟。因此，即使是地主，只要有可能争取他，我们就毫不犹豫地争取他、利用他。

当时，五家子附近有个名叫赵家凤的中国人地主。有一次，因土地问题，他跟外地的地主发生了纠纷，决意跟他打一场官司。

可是，他不会写诉状，很焦急。他虽然有个在城市中学毕业的儿子，可是，儿子也不会写诉状。看来，他虽说念过中学，可是光贪玩，没有好好用功读书。

赵家凤托在五家子行医的金海山，帮他找一个会写诉状的人。

有一天，金海山来找我，问我会不会写诉状。

我们搞地下革命活动的时期，中国为方便普通居民和学生，曾出

版过如何写信、悼文、诉状的参考书。

我随金海山去了赵家凤家。他摆了一桌中国饭菜款待我。他长时间地说明了这次要告状的缘由。

我用中文给他写好诉状，还跟他到县城去，在背后给他出主意。赵家凤拿我给他写的诉状，打赢了官司。如果他在这场官司中打输了，就会丢掉几十垧地的。

从那以后，赵家凤就绝对拥护我了。他说，有人说金先生是共产党，这可是弥天大谎。金先生不是共产党，是好人，要不是金先生，这场官司定会打输的。逢年过节，他都请我，以别有风味的中国菜招待我。

我每次到他家，就跟到他家串门的许多中国乡绅结识，对他们进行反帝教育。

从此，我在五家子的革命活动合法化，可以合法地办朝鲜人学校，我们在这一带的革命斗争基础，也开始巩固起来。

我们把“志士”们转变过来之后，便开始革命地改组群众团体。

首先，把青年会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这个青年会，本来也是受民族主义影响的。朝鲜革命军小组来到五家子后，青年会的骨干分子虽然开明了些，可是在各方面仍没有完全消除民族主义的残余。首先，斗争目的和任务就不明确。不仅会员人数少，也没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是个只有招牌、不进行活动的有名无实的组织，几乎没有做团结青年群众的工作。五家子地区的村庄很分散，间隔 10 里、20 里甚至 60 里，可是青年会在任何一个村子里都没有设支部。由于这种情况，青年组

织无法在群众中站住脚，也无法组织青年群众开展活动。

有些人主张，立即把青年会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我认为，有很多青年仍受着民族主义者的影响，而且他们对青年会也抱着一定的期待，在这种情况下，不考虑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程度，硬把现有组织改组为新的组织，那是行不通的。

朝鲜革命军队员同青年会的干部们一起到许多村庄去，为成立反帝青年同盟组织，进行了思想动员工作。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的革命路线自然就贯彻到青年群众中去了。我也每天跟青年们进行谈话。

经过这一准备阶段，我们在三星学校教室宣布了五家子反帝青年同盟的成立。同盟在各村子设立支部。崔一泉被选为该同盟委员长，文朝阳被选为组织部长。

而后，又把农友会改组成农民同盟，少年学友会改组为少年探险队，南满女子教育联合会五家子支部改组为妇女会，从此，五家子各群众团体的工作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

改组后，各群众团体吸收了很多新成员。五家子的居民，几乎都在各该群众组织过上了政治生活。

我们把地方自治行政机构村公会也改组成革命的自治委员会。五家子的先觉们建立村公会，是在20年代前半期。村公会是以领导经济、教育工作为主，并经常同中国官衙取得联系，还设有公主岭稻米销售站等机构，为农民谋福利。

五家子的人们公开责难村公会的干部缺乏群众观点，经济上不够清白。

我在同农民谈话的时候，了解到村公会的干部们谋求私利，没有把由公主岭稻米销售站购进来的部分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公平地分配给农民，而搞走私倒卖。为了弄清是否属实，派人到公主岭去了解，他回来说，村公会已腐化堕落，滥用从农民那里筹集的钱财，中饱私囊。

村公会的工作，几乎由村长独揽，任意处理，自然难免独断专行，忽视群众的意见。因为群众无法干预，即使村公会有缺点，有问题，别人也无从知道。在人、生活、工作作风都正在发生革命的变化的情况下，村公会仍旧保持从前的组织机构和陈旧的工作方法，那是不可能满足群众的要求的。

我们召开了村公会干部、各村的屯长和农民同盟委员长参加的协议会，总结村公会的工作，把村公会改组为自治委员会。

自治委员会按照我们的意图，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和独断专行，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工作做得很好。

我们对自治委员会所属公主岭稻米销售站的工作，也予以极大的关心。过去，五家子的农民要粜米，就得用大车或牛车拉到 100 里外的公主岭去。米价下降，就把米保管在适当的地方，等涨价再卖，这样才有利。可是，公主岭没有五家子农民可以保管稻米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只好不管粮价高低胡乱卖出去。为了消除这种弊端，五家子的农民于 1927 年秋天，在公主岭设了稻米销售站。

我们从五家子群众组织的成员中选出最受群众好评的同志，派到公主岭稻米销售站去。为了帮助稻米销售站的工作，又派去了朝鲜革命军的桂永春、朴根源、金园宇等队员。我们掌握稻米销售站之后，

这个销售站一方面执行为农民谋生活福利的合法商业机构的职能，另一方面还执行保证同各革命组织的联系、给朝鲜革命军提供情报等不公开的任务。

我们把村公会改组为自治委员会，并在其属下设立了公主岭稻米销售站这样的协助革命的合法商业机构，可以说是我们在30年代初的革命斗争中取得的一条经验。

我们在五家子的时候，派工作员到满洲各地，扩大组织和活动范围。当时，我们向开鲁地区也派去了许多工作员。“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华成义塾毕业生朴根源，也在那一带活动过一个时期。

开鲁地区，有不少蒙古族居民。

远离文明世界的开鲁人，生了病，无法治疗，只是祷告神灵。所以，我们的同志们每到那里去，都带些药给患病的人，疗效很好。从那以后，朝鲜人一到开鲁地区，他们就热情款待。

为了提高各组织负责人的政治、业务水平，我们为各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分子举办了讲习班。

每夜，我和车光秀、桂永春等同志，轮流给他们讲两三小时的课，主要讲的是：在卡伦会议上提出的主体的革命路线和战略策略方针、群众政治工作方法、扩大组织和从质量上加强组织的方法、教育组织成员的方法、指导他们的组织生活的方法，等等。

讲习班结束后，我们也带领着他们，教给了各种工作方法，诸如：建立组织的方法、培养骨干分子的方法、分配任务并总结其执行情况的方法、开会的方法和谈话的方法，等等。

五家子的各组织领导人员、满怀信心地深入到群众中去了。

我们对五家子人民做启蒙和教育工作，也倾注了很大的力量。

我们首先把力量集中于教育工作。

我们从朝鲜革命军队员和地下组织成员中选出得力的青年，分配到三星学校去当教员，由他们主导，革命地改革学校的教育内容。我们直接办校以后，废除了讲授民族主义思想和封建儒教思想的陈旧科目，新设了政治课。在三星学校取消学费，也是在这个时候。学校的经费，由自治委员会提供。从这年冬天起，五家子的所有学龄儿童，上学不交学费了。

后来，我们在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中规定了免费的义务教育这一条，但朝鲜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实行免费教育，是在孤榆树、卡伦和五家子。五家子的三星学校、卡伦的进明学校和孤榆树的三光学校等，都是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实行免费教育的意义深远的教育机构。

我还致力于为那些不能受学校教育的青壮年男子和妇女办夜校。

我不仅在中心村，而且在周围各村也都办了夜校，让所有的青年都参加夜校学习。

我们根据在卡伦发行过《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在五家子也发行了《农友》杂志。《农友》起到农民同盟机关刊物的作用。《布尔什维克》登的文章较难理解，《农友》刊登的文章写得简洁、平易，农民容易理解。《农友》也和《布尔什维克》一样，发行范围达到间岛地区。

当时，我们通过学生，给村里的人教唱了很多革命的歌曲。《赤旗歌》、《革命歌》等革命歌曲，只要到学校去教唱一次，当天就传遍全

村。

五家子村有个由我们组织起来的演艺队。在桂永春的领导下，这个演艺队以三星学校为据点，积极开展了活动。

我也着手完成《卖花姑娘》的剧本。这个剧本，我在吉林市就已开始写，并已试演过几次。剧本一完成，桂永春就带领三星学校的戏剧小组成员开始排练。

在十月革命 13 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在三星学校礼堂演出了这出歌剧。

这出歌剧解放后长期被埋没，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才在金正日同志的指导下，由我们的作家、艺术工作者改编成电影、歌剧和小说公诸于世。金正日同志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力量。

我们在五家子人民的绝对支持和声援下，在短时间内，把辽河地区的农村建设成了朝鲜革命军可靠的活动基地。我们曾在吉林周围做过农民的工作，在长春周围也做过农民的工作，可是从没有像在五家子那样彻底实现过农村的革命化。

对于我们在五家子做的一切事情，共产国际的联络员金光烈大为惊叹。

我们提出独创性的革命路线，以自主的方法开拓革命道路前进，因而共产国际也开始注视我们了。当时共产国际的东方局也好像进行了很多有关我们的议论。听说朝鲜出现了与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完全不同的新一代革命者；是股不属于任何派别，又不声张，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的势力；他们的群众基础也好，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大概

他们是出于这种好奇心，派遣了联络员的。

金光烈经过哈尔滨联络站，来到五家子，见了我们的同志和各革命组织负责人，同“志士”们也见了面。他和很多人说过话后跟我见了面，对我们做的工作说了很多鼓舞性的话。他说，朝鲜的青年共产主义者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中正在开拓独创性的道路，在这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对我们提出的革命路线和方针表示了积极的支持和赞同。

对于我们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他感到非常惊异。他问我，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规定革命的支持者和同情者的问题，不断地进行着深刻的讨论，而你们却同顽固的民族主义势力、宗教徒，甚至同有产阶层也携起手来，这该作何理解呢？

我对联络员说，单靠少数共产主义者和工人、贫雇农是干不了革命的；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连中间势力也都动员起来；不知别的国家如何，可是在朝鲜，大多数民族资本家和宗教徒也都反对外来势力；不喜欢革命的势力只有那些地主、买办资本家、亲日派、民族叛徒等一小撮人。我们是要把其余的人全部动员起来组织举族的抗战；用朝鲜人自己的力量，争取朝鲜独立的秘诀在于争取一切反日势力。

联络员听完我的说明，说：“你不拘泥于经典著作，万事都独创性地加以处理。这最合我的意。”他还劝我到莫斯科去留学。

“你前程万里，实践固然重要，但还是要学习呀！”

金光烈还把装有西服、衬衫、领带、皮鞋等的提包打开给我看，说，共产国际是对你寄予很大的期望，才一再劝你去留学，最好还是

接受这一劝告。看来他是到共产国际去接受了说服我、把我送到莫斯科去的指示。

我对金光烈说："你们对我表示关切，我很感谢，可是，我要去东满，深入到群众中去。要是我到苏联去吃面包，也许变成俄国派，这是我所不愿的；朝鲜有ＭＬ派、火曜派、汉城派等很多派系，这就够叫人痛心了，怎么能连我也重蹈他们的覆辙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我准备从书本上学习！"

车光秀和朴素心等我的同志也曾准备好了留学所需要的种种生活必需品，劝我上莫斯科去。

同年 12 月下旬,我在五家子召开了朝鲜革命军指挥员和各革命组织负责人的会议。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在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的斗争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根据目前局势的要求，进一步扩大和发展革命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确保新的殖民地，扩张领土，挥动军国主义铁锤，把国力全部动员起来，加紧推进侵略战争准备。凡是他们认为有碍于推行这个计划的，就毫不留情地加以消灭。

我们准备在日本进攻满洲之前，到东满去占据阵地，作好对付侵略的准备。要到东满去，就需要总结我们在满洲中部地区的活动，采取武装斗争准备所需要的措施。于是召开了五家子会议。

朝鲜革命军的骨干分子和各革命组织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蔡洙恒等许多革命组织负责人,冒着零下 30 度的严寒,从间岛和稳城、钟城等地区，来到了五家子。许多互不相识的青年革命者，在这次会

议上才互相认识，建立了友情，为朝鲜革命的未来，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在会上讨论的焦点，是在东满大大加强活动的问题。把斗争的基本舞台转移到东满去，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意向。这从革命面临的形势来看，也是不可推迟的。我虽然身在五家子，却一直不忘东满，迫不及待地等待去东满的那一天，也就是为了这一点。

在会上，我还提出了加紧推进抗日武装斗争准备的任务，和加强同国际革命力量联系的任务。

这次会议的全部过程，明确地表明了我们要从青年学生运动和农村地下工作过渡到武装斗争，对敌人发动决定性攻势的决心。卡伦会议集中了朝鲜民族要以武装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意愿，而五家子会议则再一次确认这一意愿,指明了走向抗日大战战场的捷径。

五家子会议为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者由卡伦会议经过 1931 年春季明月沟会议、松江会议、冬季明月沟会议，走向抗日决战的战场架了桥。

到了 30 年代，我们的青年学生运动终于发展到了武装斗争阶段。可以说，在这里五家子起到了跳板一样的作用。

在我离开五家子的时候，文朝阳陪我直到 10 里外，流着泪为我送行。

十　难忘的人们

有一年，我在平壤同卡斯特罗同志见面，就抗日革命时期的斗争经验谈了很长时间。那时，卡斯特罗同志问了我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武装斗争时期怎样解决粮食问题。

我对他说，有时也用过夺取敌人粮食的方法，但主要是人民始终如一地给我们提供粮食。

我搞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斗争的时候，也是人民提供了饭食和住处。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和正义府、新民府、参议府等独立军团体都各自制订出什么法来，向同胞募集捐款、征收军费，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搞革命活动有时需要钱，可是，我们不能为征收税金制订出法来。用某种法律和规定把人民束缚起来，掖着个帐本转，谁家要出多少，某家要出几圆的方法收钱，本来就不符合我们的思想。人民给我们就吃，不给也没关系，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可是，人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顾生命危险帮助了我们。人民提高了觉悟，动员起来了，就会像对待亲生子女一样照顾革命者。所以我们一向信赖人民。在有人民的地方，我们从没有饿过一顿饭。

我们之所以能够赤手空拳起来斗争并取得胜利，完全是因为有人民支持和声援。孤榆树的玄河竹、金保安、承春学，卡伦的刘永宣、

刘春景、黄顺信、郑行正，五家子的边大愚、郭尚夏、边达焕、文时骏、文朝阳、金海山、李蒙麟、崔一泉等，都是在南满和满洲中部地区，衷心帮助过我们的难忘的人们。

人民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在他们自己喝稀粥的时候，也给我们做干饭吃。

我不好意思给人民添麻烦，有时就借口工作忙，要熬夜，在学校值班室里睡。在卡伦，进明学校的教室是我的住处；而在孤榆树和五家子，三光学校和三星学校的教室便是我的住处。

我在三光学校教室里枕着木枕睡时，玄均就赶来，生气地拉我的胳膊。

玄均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盟员和朝鲜革命军队员，是个聪明、耿直，懂人情的人。

玄均的哥哥玄华均，在孤榆树做农民同盟工作，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他们兄弟俩都参加了我们的组织，他的父亲也搞独立运动，所以他家待我格外亲切、热情。

玄均的父亲玄河竹是在独立运动者当中享有相当地位和权威的人物。河竹是他的号，本名叫玄正卿。孤榆树的人们都不叫他的本名，而称他河竹先生。当时，一提起玄河竹先生，居住在满洲的朝鲜同胞无人不知。

我的父亲生前多次提到玄河竹先生，和他有深厚的交情。不是作为单纯的朋友，而是作为在独立运动中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经常接

触，交换意见，以炽热的同志友爱，互相尊敬，互相扶助，投身于独立运动。

统义府[10]时期，玄河竹先生任过中央法务委员长，正义府时期任过中央委员，国民府时期又任过民族主义者曾称之为民族唯一党的朝鲜革命党政治部负责人。他对共产主义有较深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同情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跟他们很合得来。

金赫、车光秀、朴素心等同志在柳河地区开办社会科学研究会，在各地组建反帝青年同盟组织的时候，玄河竹先生为对青年进行启蒙，常常作为讲师去讲课。在旺清门学院时期和化兴中学时期，听过玄河竹先生讲课的人，时常缅怀他。

我每次去孤榆树，玄河竹先生都让我住在他家，说：

“你就当做到了伯父家，放心住下吧。”

这是玄先生常对我说的一句话。他的年纪，比我父亲大十来岁。

我做群众工作时，在玄先生家住过 10 天，20 天，甚至一个多月。

有一年，还在孤榆树跟玄先生的家眷一道过了端阳节。

老实说，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让客人住上几个星期供饭吃，可不是容易的事。种了庄稼，缴了地租，再用所剩无几的粮食给革命者做饭吃，家里人就连稀粥都不够喝了。

玄先生家为了给我做合我口味的饭菜，竭尽了诚意。有时杀鸡，有时做豆腐和豆粘儿，熬莙荙菜汤，给我吃。

他家妇女做豆腐磨豆子，我就挽起袖子帮她们磨。每当我坐在磨盘边磨磨的时候，二十二三岁的玄华均的妻子金顺玉就羞答答地抬不

起脸来，这情景我总也忘不了。

玄河竹先生属于民族主义团体国民府，但他从不隐瞒自己是国民府内的革新派，甚至公开表明他将来要参加共产主义运动。

我离开孤榆树后，听说玄河竹先生为避开国民府内部的争斗去了西安。我想，大概是因为张学良的军队到西安去，玄先生也对他寄予希望跟着去的。因为张学良排日思想强烈，所以有不少人就想在他的保护下进行反日运动。曾在东三省一带进行过活动的许多朝鲜独立运动者，在满洲事变前后，把活动舞台迁移到上海、西安、长沙等地去了。

祖国获得解放后，每当我出国访问坐火车或飞机路过东北地区时，总要望着眼熟的山河，想起孤榆树，想起玄河竹先生和他的子孙。河竹先生虽然与世长辞，可是他的子孙总会至少还有一两个活着的吧，怎么杳无音信了呢？我想，我是不知道他们的住址，束手无策，可是他们不是可以给我写信吗。我想：一个人受人恩惠容易，要报恩可真难啊！

1990 年春，我出乎意料地同玄河竹先生的子孙进行了激动人心的会晤。

玄河竹先生的大儿媳妇金顺玉，把保存了 60 年之久的、我到她家吃饭时用过的铜碗和给我做豆腐时用过的磨，献给了朝鲜革命博物馆。在中国吉林发行的朝文杂志《道拉吉》（桔梗）刊登了这件事。我国《劳动新闻》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我听到 60 年来一直音信杳然的恩人还在世的消息，感怀万千，心

情无比激动。当年我就想等祖国获得了独立，一定要好好地还我在孤榆树欠下的“债”。听到她的消息，我多么想亲手给她摆一桌朴素的饭菜，畅叙旧怀呀。

金顺玉也说，生前能见我一面，死无遗恨。

1990 年 3 月，我以我的名义邀请了金顺玉。见面时她已 80 高龄，老年病严重，步履维艰。

金顺玉来我国时，有六名她的子孙陪同前来，他们都是我从未见过的。

我见他们时，玄均的儿子也在座。他的嘴，长得跟他父亲一模一样。因为嘴那么像，我也就觉得是他父亲再生来见我了。

我们安排金顺玉一行住在供外国贵宾住的招待所，让他们逗留了一个月左右，参观了故国各地。

令人焦急难过的是，金顺玉耳朵背，听不清楚人家说的话。口音也不清楚，记忆力又相当衰退。因不知生死而让我那么焦心的恩人之一，现在时过 60 个春秋，好不容易见了面，却不能畅叙情怀。我本想见了她，可以畅谈往事，我记不清的，由她补充，她记不清的就由我补充，这样慢慢地畅谈孤榆树时期的往事的，可是这个希望落了空，我心里禁不住感到惋惜。

她的子孙也不大清楚玄河竹先生的命运和活动情况，所以我就详细地给他们谈了玄河竹先生怎么为争取朝鲜独立进行了斗争，又怎样帮助了我们的革命事业。这样做，也是熟悉玄先生经历的我应尽的义务。

并不是因为继承了同一血统，先烈的事业就能自然而然地被后代继承的。只有熟悉先烈的斗争业绩，真心实意地珍视这一业绩的后代，才能把父亲和祖父一代开拓的革命事业可靠地继承下去。

我同金顺玉见面时，同孔国玉和在五家子给了我的革命活动很大帮助的文朝阳、文淑坤也同时见了面。

孔国玉是在我父亲去世时替我守孝三年的孔荣的女儿。不记得是哪一年，我在吉林毓文中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年我放假回抚松，见到因脸上有疤痕被丈夫疏远的孔荣的妻子，背着孩子来到我家，那个孩子，就是孔国玉。

解放初，我在平壤指导农民同盟会议时，见到参加会议的碧潼郡代表，问他知不知道孔荣的遗属在哪里。孔荣是碧潼人，所以我就估计他的未亡人和女儿可能住在家乡。

那位代表回答说，碧潼性孔的人倒不少，可是没听说过孔荣的家属还活着。

我听了他的回答，非常失望。别的遗属都找到了。唯独孔荣的遗属却杳无踪迹，我心里很不好过。

当时，我们正准备在万景台建立革命烈士子女学院。

我在平壤公共体育场向平壤市民致凯旋问候后，回到了祖父母等待着我的阔别20年的万景台。我的小学同学们来看我，建议在我的父亲任过教的顺和学校校址上建立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中学。他们为了说服我，还说万景台是金将军诞生的著名的地方，盖一所规模大的学校，以将军的名字命名为“金日成中学”，那该多好。

直到那时，我的家乡还没有一所中学。

我就对他们说，过去有许多爱国者跟我一起手持武器，在山上战斗时牺牲了。他们临终托我在朝鲜独立后，让他们的子女念书，把他们培养成优秀的革命者；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想，一定要按照他们的遗嘱，在朝鲜独立后，让同志们留下来的子女念书，让他们继承父母的遗志。光复了祖国后，这个决心更加坚定了。万景台应该建立供革命烈士子女念书的学院，而不是中学。

我这么一说，村里的人们就说，革命烈属到底有多少？哪有那么多烈士子女,还需要建立学院呢？在党和行政机关任要职的干部当中，间或也有说这种话的人。他们想象不到有多少烈士为国牺牲了。

在异国的山野和溪谷掩埋了无数战友尸首的我，每当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就不禁愕然。

农民把土改后第一年收获的粮谷，作为爱国米捐给了国家，我们拿它作为资金，在万景台建立了革命烈士子女学院。

为了寻找该在学院学习的烈士子女，有许多干部被派到国内各地和中国东北地区。那时，有几百名烈士子女，从中国回到了祖国。现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部分委员，也是当时随林春秋同志回国的。

有些烈士子女，以卖染料卖烟为生，听到在万景台要建立革命烈士子女学院的消息，自动找我们来了。他们当中，有独立军的子孙，也有参加劳动组合、农民组合等组织进行反日斗争时牺牲的爱国者的子女。

可是，唯独孔国玉没有来。

我每当到平安北道，就探寻孔荣遗属的去向，并托当地干部们替我寻找。

每当我同学院的孩子一起欢度节日，见到他们明朗的笑脸，看到他们快活地唱歌跳舞，我眼前便不由得浮现出头顶山菜包袱，拖着草鞋，来小南门街的我家的孔荣妻子和在她的背上吮着小手的孔国玉的面孔，我的心就酸酸的不好过。

1967 年我才找到了孔国玉。这时，孔国玉的母亲已经去世。她的母亲要是知道了金日成就是金成柱，她是会马上来找我的。可是，她不知道金日成是谁，再说，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她的丈夫又是独立军，所以她可能怕被另眼看待，对女儿也没说她丈夫进行过什么活动。

我们找到了孔国玉后，保送她到高级党校学习。毕业后她在平壤市党委会和铁道部事迹馆工作，现在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

孤榆树的金保安也和玄河竹先生一样，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在独立军当过中队长。

金保安因为我光去玄河竹先生家，却一次也没去他们家而感到遗憾。每当我们的朋友到他家去，他就对他们说，他跟金亨稷的交情不同一般，而且对成柱也没有慢待，可真不知道为什么成柱连一次也不到他家来。

我听了这话后，每次去孤榆树，都一定到他家去。

金保安开药铺，从收入中拨出一些钱捐给我们办的三光学校做经费。他对教育的热情很高，对青少年的启蒙事业非常关心。我每次邀请他到三光学校演讲，他都欣然答应。

金保安曾慨叹说，孤榆树的人连钱都不会算，靠这些睁眼瞎，怎么能争取朝鲜独立呀！

如今的人们听说一个大人还不会算钱，当然不会相信，可是当时中国人和居住在吉林省的朝鲜移民当中，有很多不会算钱的人。省里印发的钞票和县里流通的钞票互不相同，加上吉林官帖啦、奉天大洋啦、吉林小大洋啦、银大洋啦等币种繁多，币值又各不相同，因此，没念过书的人到集市买卖东西也不会算钱。

我们把农民叫到夜校，在上算术课时教给他们算钱的方法。

金保安看到那些他看不起的连钱都不会算的睁眼瞎，加减乘除都能应用自如了，便满意地说："我们朝鲜人的头脑，本来就聪明嘛！"他说："看到人们由无知识变为有知识，真有意思。"他到夜校去参观，也到三光学校参观讲课。

三光学校高等科的学生，都很聪明。那些学生当中，至今印象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刘春景和黄顺信。

她们两个都是卡伦的革命组织保送的。刘春景的父亲刘永宣在进明学校任教，给了我们的革命事业很多帮助。当时，刘春景和黄顺信的年纪只有十四五岁光景。

我们从孤榆树回卡伦或吉林的时候，常托她们替我们运武器。因为军阀对女人检查得不那么严。

刘春景和黄顺信，每次都认真地执行我们的嘱托。她们把武器藏在裙子下，在离我们 50 来米处跟着。路上，军阀军警检查了我们好几次，而对她们却不大注意，让她们安全通过。

解放后，黄顺信回到祖国，在家乡务农。她不愧为三光学校时期的探险队队员，农活儿做的很出色，以高产农民扬名于世，在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中度过了有价值的一生。战后，她曾当选为最高人民会议议员。

刘春景辗转满洲各地，后来，和李宽麟一样，想在祖国度晚年，便在 1979 年回国了。

她如果也像黄顺信那样在年轻时回国，也会成为著名的女活动家，后半生为社会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三光学校时期的刘春景是在女生当中文章写得最好，话讲得最好，头脑最聪明的很有前途的少女。

我在安图为建立游击队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她给我来信说，愿意到我这里来继续进行斗争。但是，那时正是我们急于开始武装斗争的时候，而且我想武装斗争一旦开始，女同志很难跟男同志一道活动，所以我没给她捎信让她到安图来。

直到那时，我们虽然主张妇女应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却认为女同志是不宜搞武装斗争的。

如果刘春景在 50 岁左右时回国，我们就会送她到学校深造，让她参加社会活动。

我们定了这样一条原则：只要找到过去参加过或帮助过革命斗争的人，即使上了点岁数，也要让他学习，分配他到适当的工作岗位去进行政治活动。再聪明，再有用的人，如果长期不参加社会活动，埋没在家庭里，也必然会思考能力减退，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人生观生锈。

解放后，有不少革命老战士和帮助过革命斗争的人，没有被提拔到适当的岗位，长期被埋没。宗派分子们说，抗日老战士经历虽好，

但缺乏知识，没有用，便长期不把他们提拔为干部。如果他们缺乏知识，就应该下狠心送他们去学习，培养他们，让他们起到应起的作用，可是宗派分子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排斥他们，不理睬他们。

因此，我们采取措施，找到了革命烈士子女和帮助过革命斗争的人，就把他们送到高级党校或人民经济大学学习，然后根据他们的水平，把他们提拔为干部。

如果不学习、不过组织生活，那么，即使是老革命战士，也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许许多多革命老战士和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帮助过抗日革命斗争的人经过这样的过程，成长为党和国家得力的领导干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五家子的文朝阳就是其中的一个。文朝阳在五家子任反帝青年同盟组织部长的时候，同边达焕、崔一泉、李蒙麟、金海山等一道，曾大力帮助我们工作。他和我们一起写过很多文章，做过很多演说，也积极地参加了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的工作。开会，在他家开的恐怕最多。

我在五家子的时候，给文朝阳的哥哥文时骏和崔一泉两家添了很多麻烦。

文时骏是个厚道的人。他一连几个月给我们供饭吃，也不收钱。我们在五家子进行活动的时候，文时骏给我们杀猪吃，嘱托我们一定要争取祖国独立。这好像还是昨天的事一样。我在他家也住了很长时间。

在文时骏家，每顿饭都给我摆上别有风味的酱蒜。

他家的酱蒜的味道是那么独特，以至解放后我见到文时骏的女儿

文淑坤，首先就想起了那酱蒜。因此我把她请到家，请她把腌酱蒜的方法教给我家的人。

我每次到地方去，我们的人都要在我的饭桌上摆酱蒜，可是总觉得比不上我在艰难时期在五家子用水泡小米饭吃的酱蒜的味道。

前不久，文朝阳过 80 寿辰。我回顾着我在五家子活动的年代，给他祝寿，送花束，摆寿筵。

崔一泉曾任五家子反帝青年同盟委员长兼《农友》杂志的主编。我在他家也住过几个星期。当时，他叫崔泉或崔灿善，印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上的名字崔衡宇，是解放后他在汉城从事写作时用的笔名。

在五家子，他是最开明的人，他没有像金赫那样写过诗，可是他具有卓越散文家的写作能力。因此，我们劝他到长春去做秘密工作员。他到长春一面任《东亚日报》支局局长，一面任秘密工作员，进行了多年的活动。在这过程中，他搜集了很多有关我们的资料，并常常写出很好的文章发表。

崔一泉是日本情报机关列在黑名单上的人。他任支局长的《东亚日报》支局大门外，经常有日本宪兵和密探轮流监视。敌人所以开始注意崔一泉，是因为他到长春后仍没有停止做青年工作，也是因为他同国内的爱国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进行了很多有关我们的宣传。我们在东满开始武装斗争后，他曾把通过反帝青年同盟直接培养的多名骨干青年输送到抗日游击队。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中那出色地反映了旅居满洲的朝鲜人的民族解放斗争实况的气势雄伟、充满激

情的笔触，应该说是在上述革命实践中练就的。

崔一泉住在沈阳和北京的时候，曾多次到汉城去，向国内的著名人士和各阶层人民介绍抗日武装斗争的战果。祖国光复会成立后，他还给他们解说了该会的十大纲领。在他的宣传下，由李克鲁先生领导的朝鲜语学会和民俗运动对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表示完全支持和赞同，并按照十大纲领的精神开展了捍卫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斗争。

日本官署迫害和监视加强后，他就把他在《东亚日报》支局任职时到满洲各地亲手搜集到的我们的斗争资料和独立运动资料带到汉城去，全部交给了当时负责领导朝鲜语学会的李克鲁先生。这些资料中还有一捆我们在五家子发行的《农友》杂志。他对李克鲁先生说：

“这都是有国宝价值的资料。一直受敌人监视和追踪的我，没有力量保存这些资料。等国家独立后，我想用这些资料写历史著作，请李先生无论如何也要把它保管好。”

崔一泉这样托付了李先生后，又回到了满洲。

解放初，他把李克鲁先生珍藏的那些资料要回来，一口气写完了《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这部书虽然印在用废纸造的掺杂砂粒的再生纸上，可是一问世就大受读者欢迎，供不应求。专修历史和文学的年轻知识分子甚至全文抄下来阅读。

解放初，美军政当局宣布反共反北方为南朝鲜的“国策”，用刀枪加以推行。崔一泉在这种杀气腾腾的环境中，还印出反日斗争漫画来向青少年宣传反帝反日精神。

解放后，崔一泉在政治混乱、毫无秩序的汉城，集中全部精力写

出了《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这样有分量的书，实在令人惊叹。

解放后，崔一泉进入了南朝鲜政界，历任朝鲜革命党政治部长、新进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欢迎金日成将军委员会委员、民族自主联盟执行委员等要职，同吕运亨、洪命熹、金奎植等人携手，为团结民主力量、争取南北统一，忘我奋斗。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汉城被反动派杀害。

《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是崔一泉的未完成之作。他原计划印出第二集后继续写下一集，可是他走上复杂的南朝鲜政治舞台后，无法抽出时间，所以没能实现计划。据说，他在下一集里计划全面叙述我们的革命活动情况。

如果崔一泉还在世，那下一集一定会问世，如那样的话，一定会有更多有关我们的革命活动的令人感兴趣的史料公诸于世的。

漫长的岁月流逝了，可以回忆抗日革命斗争时期的人物中，还在世的人不多了。能回忆我们的早期革命活动的人就更少了。我的记忆力也是有限的。有不少事已忘记，有些事已记忆模糊，有的时间和人名已无法准确地回想起来。

在南满和满洲中部一带帮助过我们的活动的人当中，金利甲的爱人全京淑给我留下了特别强烈的印象。金利甲是“金刚馆”（大成馆）事件的主人公，《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也介绍了他。

1930 年春，化装成中国人的日本领事馆警察在吉林市复兴街的吴尚宪（吴春野）家，逮捕金利甲，给他的嘴塞上毛巾，捆绑起来押到长春去。

后来，他被判处九年徒刑，关进大连监狱。

全京淑的父母反对女儿同金利甲这样的革命家结婚，可是她断然拒绝父母的要求，离家随爱人去了大连。当时，她不是 18 岁就是 19 岁。离家后她进了纺织厂，一面做工，一面做共青同盟工作，全心全意照顾狱中的金利甲。

跟我谈了这件事的，是任过东满特委书记的童长荣。他说，他在大连搞地下党工作时，见过全京淑。他深为全京淑热烈纯真的爱情所感动，说："我见过她后，才知道朝鲜妇女的节操和意志是如此的坚贞。"

我听了他的话，也对全京淑的崇高品质深感佩服。那时，我听着他的话，感怀深切地回想了她在旺清门时的面貌，我为参加南满青年总同盟大会到旺清门的时候，她一面给我做晚饭，一面把国民府的恐怖活动计划悄悄地告诉了我。我心想，金利甲可真是幸福的人啊！

为了拯救民族，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奔走在满洲大地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给我们做饭吃，拿出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钱给我们做学费和盘费，那么多恩人的事迹，是谈也谈不完的。

在这些恩人当中，到现在还不知生死和去向的人，仍然数不胜数。如果他们现在能出现在我面前，我心里的遗憾就会消失。如果我能招待他们一顿饭，和他们坐在一起共叙积蓄几十年的情怀，那该多好啊！

但是，这就能全部酬谢他们过去为我付出的辛劳和赤诚吗？

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给我国人民提供更大的福利，完成在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下开拓的革命，这才是献给他们的最大的酬谢和礼物。在这之前，谁也不能说已完成了自己作为共产主义者的义务。

第五章

武 装 的 人 民

时期：1931.1~1932.4

一　受难的大地

以五·三〇暴动和八·一暴动为契机开始的白色恐怖的旋风，进入1931年更加疯狂地席卷了满洲大地。敌人到处肆行血腥镇压，企图连根拔掉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花几年功夫培养起来的革命力量。

我到东满一看，空气比南满和满洲中部更加紧张。暴动的后果也更加惨重，更具有破坏性。我在敦化南门看到挂在杆子上的暴动者的头颅，猜测到敌人对革命力量的攻势达到了何种程度。

为教条主义、小资产阶级英雄主义所迷惑的宗派事大主义者们，在五·三〇暴动和八·一暴动后，仍在国耻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广州暴动纪念日等许多纪念日，以纪念暴动、收获暴动、恐怖暴动等名目连续发动暴动，其次数实达几百次。敌人的恐怖活动跨年持续进行的原因就在这里。

在这过程中，间岛的革命组织几乎都遭到了破坏。不消说站在前列进行斗争的骨干分子，就是跟着暴动队伍给他们端过饭的人也都被抓去或被处决了。一年前我们到豆满江沿岸时恢复起来的组织，也受到了不少损失。

在参加过暴动的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向敌人自首或脱离了革命组

织。

我们为了寻找转入地下的组织到村子里去，有些人就畏畏缩缩地只是看眼色，不敢接近我们。有些人还说，“间岛叫共产党给糟踏了。”“共产党的妄动，使整个间岛变成了一片血海、火海。”“合着共产党的拍子跳舞，就要全家毁灭。”当时，只要是有共产主义者这个“招牌”的人，人们就不管他的所属和系统，一概不理，敬而远之。

我到明月沟的时候，瓮区党委委员李青山，诉说暴动后他所经历的苦处，向我倾吐衷肠说：

“上级一个劲儿地催我到群众中去恢复和扩大组织，可是老实说，已经没意思，也没勇气找人谈话了。过去把我当做革命家表示尊敬的人，甚至由我介绍加入组织的人，已有几个月，一看见我，就悄悄溜开。你看，多么叫人伤心，哪有心思干革命啊。暴动风刮过几次，间岛的民心变坏了。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遭冷遇，倒不如放弃革命，到什么地方去挣碗饭吃，反倒会心安。话倒是这么说，可是一个誓死干革命的人，怎么能那么轻易放弃初衷呢。反正得有个什么办法才行。可我想不出什么来，只是在抱怨这个骚乱的时局哪。”

这是李青山的苦衷，同时也是我的苦衷。1930 年和 1931 年，间岛的所有革命者都经受了这种苦衷。形势是那么险恶暗淡，以至像李青山那样诚实寡言的老革命家也作这样的表白。

当然，李青山并没有中途退出革命。

后来我到安图又见到了李青山。在我辗转豆满江沿岸各县的时候，他被调到安图区党委去了。和他在瓮声砬子时相比，我觉得他格外精

神饱满。

李青山十分满意地说，他在新上任的地方工作较顺利。

“恶梦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用这么一句话简短地表达了在他的生活中发生的变化。他的脸上根本看不出他倾吐苦衷说人们不肯接近他时的那种悲伤、忧郁的表情。

但是，直到我在瓮声砬子见到李青山的时候，满洲地区的革命者们还在尝着白色恐怖的苦头，因人们不肯接近而苦闷。

我也曾在这种苦闷中度过。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喝着玉米稀粥，吃腌芥菜，夜里枕着木枕躺在透进寒风的人家下屋，与饥饿搏斗。当时最使我们难受的痛苦之一就是饥饿。那时，我们到了间岛确实吃了很多寒冷和饥饿的苦头。

我没有棉衣，穿着西服过冬，所以总是比人家感到更冷。到了没有铺盖的人家去过夜，就和衣躺下来睡。我到过李青山的家，他家也没有被子和枕头。我和衣躺下去过了一夜，冷得怎么也睡不着。

这一夜过得真够苦的，后来我到了安图也谈过这一夜的遭遇。母亲听了这话，在几天内就给我做了一件像车夫穿的那种大棉袄。我穿着这件棉袄，在没有被子的人家过夜时，就用毛巾把木枕卷起来枕，脱下棉袄盖在身上蜷曲着睡。

可是，这种苦楚还算不得什么。那年春，我去间岛，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夜晚躺在炕上，又冷又饿，难以入睡，加上对牺牲的同志的怀念和对遭到破坏的组织的担忧，使我心情无法平静。

人民的冷遇所带来的绝望和孤独感折磨着我。看到不愿接近我们的群众，回来枕着胳膊躺在冰凉的炕上，眼前就浮现出遭人们冷遇时的情景，无法入睡。

其实，我们很早就对间岛地区寄予很大的期望。延吉是受宗派影响很大的地方，但间岛其他地方受宗派影响并不太严重。这就提供了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在这一地区迅速成长，并以新的方式开展革命的有利条件。几年来，我们的同志顽强努力，煞费苦心，为了在这一带把抗日革命推向更高的阶段，扎扎实实地作了准备。

可是，两次暴动，使来之不易的这一成果大受损失。左倾分子用极左的言词和口号暂时迷惑群众,但其危害却如此严重和具有破坏性。我认为，把左倾说成是翻过来的右倾，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把一切事情都放到一边匆匆地去间岛，也正是为了弥补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加紧进行准备，尽快开展武装斗争。

抱着很大的期望来到间岛，可是破坏程度比预料的更为惨重，加上又看到人民不相信和疏远革命者，我心里十分难过。

为人民而战的斗士们，如果被生育了自己的人民遗弃，那么，哪里还能有比这更可悲的事呢。只要有一天失去人民的信任，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那么，那个革命者的生命就完结了。

当群众不分系统一概冷淡对待所有革命者时，我们所以感到那么痛心，是由于暴动导致共产主义者的威望受到损伤，群众不相信自己的领导者而退出组织，朝中人民之间产生了隔阂，互不信任和误解。

当时，这些是最大的苦恼。

但是，我们并没有只是苦恼、悲伤和挣扎。假如革命者前进的道路上没有难关，实际上也就不能说是革命了。一个革命者，越是处于这种情况，就越要坚定，越要满怀信心顽强地克服困难前进。

我们在 1931 年仍在间岛一带坚持不懈地进行了清除五·三〇暴动后果的工作。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第一个障碍就是暴动的后遗症。如果不尽快消除这个障碍，重新整顿革命队伍，就不能挽救处于危机的革命；革命也不能深入地发展。

五家子会议后前往东满的时候，我向我自己和同志们提出了两项任务。

一项任务是总结五·三〇暴动。我们虽然不是计划和指挥这次暴动的当事人，但我们感到有必要从各个角度科学地正确地分析和总结这次暴动。

尽管暴动连连失败，但在东满仍有狂热的恐怖主义者和李立三路线的信奉者煽动群众进行冒险的暴力斗争。

李立三机械地搬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的论断，提出了“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路线，这条路线起到了推动群众举行暴动的强大刺激剂的作用。

这是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实权的人提出的路线，而且是通过组织下达的，因此，直到李立三退出党的领导职务，他的主张被定为左倾冒险主义时为止的很长时期，人们追随了这条路线。他们饱尝了失败和挫折的苦头，却仍然不能轻易从李立三编织的甜美的梦想中清醒过来。

对五·三〇暴动进行总结，人们就能从这种梦想中清醒过来。

我们决心通过对五·三〇暴动的总结，给宗派事大主义者向上爬的思想、名利主义和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敲起警钟。

我认为，对暴动的总结会成为使满洲地区的革命者掌握科学的战略策略和领导群众的方法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另一项任务是，提出能把群众组织成一支政治力量的正确组织路线，用这条路线武装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

当时间岛地区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一条在恢复和整顿被破坏的组织，并将它加以扩大和加强方面可作为指针的明确的组织路线。

在东满地区进行活动的宗派事大主义者，在使群众组织化方面，也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他们大喊“阶级革命论”，只吸收贫雇农和工人加入组织。他们把其他的阶层都看做与革命无关的对象。因此，没能加入组织的人们就说，原来共产主义就是这么个货色，把其他人都撇开，只由那些屈指可数的穷汉子聚在一起叽叽咕咕，就是共产主义啊！对此，他们甚至还表示愤慨。

要打破这种关门倾向，把各阶层爱国力量紧密地团结起来，就必须克服死抱住经典著作的命题和外国经验不放的事大主义、教条主义倾向，找出能够把一切爱国力量一个不漏地容纳进来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并尽快加以贯彻。

我把这些任务定为这次间岛行的第一阶段的工作目标，加快了前往东满的步伐。在孤榆树指导群众组织的工作后，和柳凤和、崔得永一起前往长春方面。不料，在路上因密探告发被反动军阀当局逮捕了。当时，军阀当局严密地注视着我们的活动。他们嗅觉的灵敏也是不亚

于日本警察的。连我们为了作武装斗争的准备前往东满，他们都知道。

军阀当局已探知孤榆树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满洲中部地区的主要活动基础，便发动伊通县公署，把督察员派到这个村子严密地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孤榆树有个叫李出流的中国地主，他同县公署派来的督察员取得联系，秘密地打探我们的活动。

向督察员告发我们离开孤榆树前往长春的，正是这个姓李的。我们在大南屯，被接到督察员的通知紧急出动的保卫团逮捕，在县公署的牢里受了几天审讯，然后被押送到长春，在那里坐了20来天的牢。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三次坐牢。

那时，吉林毓文中学的李光汉校长和何先生正在长春。他们听到我被捕的消息后，去找军阀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说："金成柱是在吉林被判无罪释放的，为什么又抓起来？金成柱由我们作保。"幸亏有他们的帮助，我被释放了。

我想，两位恩师都是理解共产主义的联共人士，所以在困难关头毫不踌躇地救了我。

他们和过去一样真心同情我，保护我，对我们的事业表示理解，我从中受到终生难忘的深深的感动。

我们到东满做的第一项工作是在敦化为朝鲜革命军队员和革命组织骨干分子举办讲习。

这次讲习讲的是：大力促进准备武装斗争的任务及其途径，对基层党组织保证统一领导方面的原则性问题，和把分散的革命群众组织

起来的问题。可以说是为这年 12 月召开的冬季明月沟会议作准备的讲习。

在这次讲习后，我就到安图、延吉、和龙、汪清、钟城、稳城一带做革命组织的工作。

在充分掌握了间岛和豆满江沿岸六邑一带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1931 年 5 月中旬，我们在瓮声砬子的李青山家召开了党和共青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历史上也称为“春季明月沟会议”。

瓮声砬子，意思是发出瓮声的岩石。在日本霸占满洲以前，明月沟曾叫瓮声砬子。日本人霸占满洲后在这里设火车站，把瓮声砬子改称明月沟，这名称便固定了下来，于是后人也就把瓮声砬子称作明月沟了。

现在明月沟是安图县县城了，可是我们开会的时候它还属于延吉县。

参加“春季明月沟会议”的有：党及共青干部、朝鲜革命军成员、地下工作员等数十人。记得在间岛地区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中白昌宪等出名的革命者几乎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贯彻执行革命的组织路线》这篇著作，就是根据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整理出来的。我来东满时提出的两项任务都包括在这篇讲话中。

我们按既定计划，在这次会议上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五·三〇暴动的本质，提出了革命的组织路线：把基本群众紧紧地组织起来，并把各阶层反日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其周围，使全民族团结成一支统一的

政治力量。

会上，作为贯彻这一组织路线的任务，讨论了建设坚强的领导核心，加强他们的独立作用的问题；恢复和整顿被破坏的群众团体，吸收各阶层群众加入群众团体的问题；通过实际斗争锻炼群众的问题；加强朝中人民的共同斗争和友好团结的问题；还制定了从小规模斗争发展到大规模斗争，由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密切相结合等策略原则，并且特别强调了彻底克服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问题。

1931 年 5 月的“春季明月沟会议”，用一句话来说，它是为争取群众的会议。争取群众，最大的障碍就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因此，我们果断地批判了这条路线。

当我们批判左倾，提出了宽泛的组织路线时，与会者们表示完全支持。

会上，有很多人发了言，每个人的发言都富有革命性。他们都说，日本侵略满洲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要作好准备，时机一到，就要决一死战。有很多老练的革命者参加了会议，所以，有很多值得一听的，也有很多可资参考的意见。

通过这次会议，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会后，工作员陆续奔向了间岛各地和国内地方。

我在明月沟住了一些时候，对这一带的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工作进行了指导，然后前往安图。目的是暂时以安图为活动据点，把间岛和国内的革命工作搞上去。

安图是个远离铁路、公路和城市的山区，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还没有伸进来，而且四周全是险峻的山岳和密林，便于同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地区和抚松、敦化、桦甸地区以及六邑一带等国内地区的组织取得联系，也非常有利于组织和训练游击队，推进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居民成分也非常好。

尤其是这里跟祖宗之山白头山邻近，所以，时刻不忘祖国的我们不能不从它那崇高、庄严的威仪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万里无云的晴天，远远的西南方天际白头灵峰的银灰色波涛，那隐约的远景映入眼帘时，我不由得心潮澎湃，恨不得马上拿起武器光复祖国。虽然离开祖国在异国土地上开始武装斗争，但希望在望得见白头山的地方打响抗日的枪声，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情。

在敦化的讲习结束后，4 月，我到安图去领导群众团体的工作。

那时，母亲缠绵病榻。当时医术还落后，诊断不出是什么病。母亲只是说好像是“瘕”在发作，煎些汤药用。

母亲对自己的病并不在意，反而担心我这个手无分文、经常在外乡奔走的儿子，同时还为妇女会的工作费尽心血。

时隔两个月重访安图，我心中排解不开对母亲的担心。

可是，我到了安图，看到母亲脸色非常好，便放心了。母亲经常告诫我，不要想家，要专心于光复祖国的事业，可是我一出现在她面前，她就高兴得不得了，竭力掩盖脸上的病容。

跟母亲住在一起的祖母，听说我来了，顾不得穿鞋就跑出来拥抱我。祖母在父亲去世那年来满洲后就没有回乡，一直和母亲一起维持

着朝饭夕粥的贫苦家计。我们一家从抚松搬到安图的时候，祖母也跟着母亲来到安图。祖母来到安图后，住在兴隆村的英实外婆家，不过也常常到我们家来住。

英实是亨权叔的独生女儿。

亨权叔入狱后，叔母（蔡燕玉）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她刚出嫁，生了第一个孩子，这时候，不幸丈夫被抓去坐了牢。她神经受到刺激，患了忧郁症，也是难怪的。

在亨权叔被判处 15 年徒刑，被关进监狱后，我写信劝叔母，把孩子送人后改嫁。但叔母没有改嫁。她说，嫂子没有了丈夫，也没有改嫁，千辛万苦抚养着三个孩子。我丈夫还活着，怎么能改嫁呢？要是我改嫁了，英实她爹在牢里听到这消息该多么伤心呀！要是我把英实送给人家，嫁给别人开始过新的日子，那我能睡好觉，吃得下饭吗？再也别说那种话了。这位叔母是位又贤惠，又有主心骨的人。

母亲搬到安图后，让叔母回兴隆村的娘家去了，好让她转换转换情绪。

祖母住在英实的外婆家，照料照料儿媳妇，陪她说话做伴儿。祖母想起病中的大儿媳妇，就又跑到我母亲那里，替她煎药、做饭。那时，祖母为照料两个病弱的儿媳妇，费了很多心。

我想，祖母没有回家乡，在异国他乡待了几年，是因为善良的婆婆怜爱两个孤苦的儿媳妇。

我到安图那天晚上，祖母睡在我旁边。

深夜，我醒来一看，我的头竟枕着祖母的胳臂。看来，在我睡着

后，祖母悄悄地把我的枕头抽去，抱着我的头。我体味到祖母的心情，不忍把头挪到枕头上去。

祖母还没有睡着，轻轻地对我说：

“你是不是把家乡都忘了？”

“奶奶，哪能忘呢！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万景台。我多么想念在家乡的亲人们呀！”

“我来满洲，是想把在这儿的家属都带回去。你是带不去了，不过你妈和你弟弟，我是想都带回去的。可是你妈怎么也不听。她说，我们是立下祖国不光复就不再渡过鸭绿江去的誓言走上这条路的，怎么能因为成柱爹去世，就打退堂鼓呢。她是狠了心的，离开抚松的时候连一次也没有回头看。我也不好再提回家乡的事了。要是住在这里，对朝鲜独立更有利，那我也不再拉你们，我就一个人回万景台去。你要是想念家乡，想念你爷爷和奶奶，就写封信寄回去。那我就当做见到你们了。我不是不能常来这里吗？”

在那以后，祖母的嘱托我一次也没能做到。

我想在祖国的报纸上常见的我的名字和抗日游击队的战果报道，会代替我的信，便没有特地写信。

祖母轻轻地叹口气说，你要想做更多的事，你妈就得不闹病，可是你妈病势却越来越重，加上你妈做事又那么不惜力，真没办法。

听了这话，我为母亲担忧，怎么也不能入睡。我身为应当担起一家生活的长子，万景台家门的长孙，想了很多事情。

当时和我们一起干革命的青年当中，相当广泛地流行着一个男子

汉走上了斗争的道路，就应该忘掉家庭的想法。恋家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这是青年革命者普遍的看法。

我很早就批评了这种倾向，说不爱家庭的人，就不能真正地爱祖国、爱革命。

可我本人是怎样爱护和照料自己家庭的呢？积极投身于革命，才是对家庭的最高的爱，这是我当时的孝道观。我未曾想过脱离了革命的纯粹的孝道。因为家庭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国家安定，家庭也才能安宁，这是个常识。国家的命运悲惨，就必定影响到组成国家的千百万家庭。因此，要保卫家庭的安宁和幸福，就要保卫国家；要想保卫国家，各自都应该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公民义务。

但是，不能因为要干革命，就忘掉家庭。对家庭的爱，是推动革命者投入斗争的一个原动力。对家庭的爱淡薄了，革命者的斗争热度也就同时下降。

我从原理上是理解家庭和革命的这种相互关系的，但是对一个把自身献给了革命的革命者，爱家庭到底应该怎样爱，还没有自己的明确见解。

早晨醒来，看了看屋内屋外，有好多处需要由男人动手拾掇的活，烧柴也没有多少储备了。

我决心这次要抽时间帮助母亲料理一些家务。这天，把一切事情都撇开，和哲柱一起上山去打柴。

到井边去打水的母亲，不知怎么知道的，拿起垫圈儿和镰刀跟上

来了。无论我们怎样哀求她回家去，也无济于事。

“我跟你们去，不是为了帮你们的忙，是要上山去跟你好好儿谈谈。昨天不是奶奶独个儿通夜跟你说话了吗？”母亲说着开朗地笑了。

我这才理解了母亲的心情。在家里，总是祖母把我的时间独占了。祖母放了我，弟弟又缠住我不放。

打柴的时候，母亲一直在我旁边跟我说话。

“成柱，你认识崔东和吗？”

“认识他，崔东和不就是那个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吗？”

“几天前，那个人来过我们家。他问我，你什么时候能来安图，还说你来了，叫我告诉他一声。他很想跟你打一场嘴架呢。”

“是吗？为什么？”

“他说，你到处说五·三〇暴动是错误的，这不合他的意。他还摇着头说，暴动是上级支持和鼓励的，不知像成柱这样有水平的人为什么要非难它。你是不是遭人白眼了？”

“也许是吧。看来也有些人对我的主张感到不满意。妈妈，您是怎么想的？”

“我懂啥世情呀，我只是想人们一群一群地被杀、被抓，这怎么行啊。核心都没了，那由谁来干革命呢？”

母亲这一朴素而又单纯明了的主张，十分合我的意。人民的眼睛任何时候都是看得正确的。人民作不出判断的社会现象是不存在的。

“妈妈想得对。看问题，妈妈比崔东和看得准。革命不是现在也在继续受暴动的危害吗！我这次来安图，就是为了消除暴动的后果。”

“那么说，你又该像今春那样到处奔走啦？你再也不要像今天这样为家事操心，要专心做你该做的事。”

母亲想跟我说的话的要点就在这里。我想，母亲正是为了说这话，那天才提到崔东和的。

从那以后，我就按照母亲的意愿，专心做建设组织的工作。

安图也是受五·三〇暴动严重损害的地方。加上，这个地区组织群众的工作没有很好地进行。要使安图革命化，首先就要在这一带扩大党组织，加强党的队伍，健全党的组织领导体系。

1931 年 6 月中旬，我们以金正龙、金日龙和其他骨干分子组成了小沙河区党委会，并向区委提出了向二道白河、三道白河、四道白河、大甸子、富尔河、车厂子方面派工作员去建立基层党组织的任务。

成立了区党委后，在柳树河、小沙河、大沙河、安图等地扩大共青组织，组织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革命互济会、少年探险队等反日团体。

那年夏天，安图地区已经完成了组织群众的基础工作。没有一个村庄没有建立组织。

使安图革命化，最大的障碍是革命队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安图中间隔一道河，分河南、河北。这些村子里建立了不同的青年会组织。河北的青年组织是正义府的残余势力主管的，而河南的青年会是参议府的沈龙俊等人管辖的。这两个组织白眼相向，互相争斗，加上，由崔东和领导的ＭＬ系的青年组织也伸进手去，因此，青年运动内部非常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停留在使青年组织恢复原状上，而是按照把青年组织合并成一个组织的方向去教育和引导青年。对于企图分裂青年运动的活动，哪怕是细小的，我们也没有姑息，而是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所以，像崔东和那样搞宗派斗争成性的人，也不能不慎重对待我们提出的安图地区应建立一个统一的青年组织的主张了。

在实现安图的革命化方面，敌对分子的阻挠活动也曾极为猖狂。

在卡伦和五家子，村长都是受我们影响的人，可是在兴隆村，村长则是恶霸地主穆汉章的密探。他打探到村民和群众团体的动向，就径直往城里跑。因此，我们召开兴隆村男女老少都参加的声讨大会，把村长从村里赶走了。

几天后，穆汉章来找我，讨价还价说：

“我早就看出了金先生是共产主义者。

“我常住在旧安图，这里只有我的保卫团，我很不放心。要是那些不知分寸的人看出金先生的真面目，害你的话，我不就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了吗？可也不能老是像现在这样。要是日本人知道了，首先就会砍我的头。咱们来个两全其美吧。金先生你就离开这儿。需要旅费，要多少就给多少。”

我听完他的话，对他说：

“你一点也用不着操心。我相信，你虽然是地主，但具有中国人的良心，会憎恨企图鲸吞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

“我认为，你没有理由反对或加害于我们。对你，对作为中国青年的保卫团员，我们都没有另外的想法。

“如果我认为你是个卑劣的人，就不这样开诚相见了。在为我担心前，请先注意你自己，免得人们叫你是日本鬼子的‘狗’。”

穆汉章听我这么说，就没有多说什么，随即离开了兴隆村。

从那以后，穆汉章和他的保卫团一般都采取中立态度，慎重地对待我们，新上任的村长也看我们的眼色小心地只执行必需的一些行政任务。

如果我们在安图没有及时贯彻组织群众的方针，就不可能在白色恐怖席卷过的荒凉的间岛土地上，制服像穆汉章那样的大地主，使他中立，对我们无害。

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力量，的确是无穷无尽的，在这个力量面前是不会有“不可能”这句话的。

兴隆村和那一带的革命组织生气勃勃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二　九·一八事变

安图的革命组织走上正轨开始进行活动后，为了扩大成果，1931年夏和初秋，我到和龙、延吉、汪清一带去把五·三〇暴动后分散了的群众组织起来。

当我以敦化为活动据点，同安图、龙井、和龙、柳树河、大甸子、明月沟等地取得联系，正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那时我正在敦化附近的一个村庄做共青积极分子的工作。

9月19日清晨，陈翰章跑到我所在的村子来，告诉我关东军进攻奉天的消息。

“打仗了！东洋鬼子终于挑起战火了!”

他好像背了什么重东西，发出急促的呻吟声，有气无力地在廊台上坐下来。战争这个字眼从他的口里吐出来，显得那么凄切、悲壮。

虽然是很早就预料到的事变,爆发的时间也大致和预想的差不多，但是，由于朝鲜民族和几万万中华民族将要遭受的灾难以及我的命运也会有巨大转变这一预感，我的心受到猛烈的冲击。

后来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弄清了事态发展的真相。

1931年9月18日夜，在沈阳北大营以西柳条沟日本满铁公司占有的铁路被炸。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出张学良军爆破铁路、攻击日本守

备队的荒唐借口，突然开始进攻，一举占领了北大营，19日晨又攻占了奉天飞机场。

继沈阳之后，安东、营口、长春、凤城、吉林、敦化等东北地区大城市，相继被关东军和渡过鸭绿江的日本驻朝鲜军占领了。不到五天工夫，日本侵略军把辽宁、吉林两个省的广大地区，几乎全部占领了，并继续扩大战区，向锦州方向逼近。

真是风驰电掣般的速度。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真相，把事件的责任转嫁给了中国方面，可是没有人相信他们制造的谎言。因为人们对日本帝国主义阴险狡诈的本性知道得太清楚了。日后，制造了这次事变的当事人也承认，炸毁满铁公司所属铁路，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点了火的肇事者，就是关东军特务机关。当时我们在出版物上发表文章，揭露柳条沟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鲸吞满洲而制造的阴谋活动和奸计。

满洲事变前夕，关东军正处于待命状态的1931年9月18日晨，这一事件的制造者之一土肥原贤二大校（沈阳特务机关长）突然出现在汉城。他去找日本驻朝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神田正种，宛转地说明他访问朝鲜的目的说，来找他是怕被新闻记者纠缠住，意思是说，一旦满洲事变爆发了，就会有许多记者纠缠他，所以事先到朝鲜躲避。

同一时刻，日本航空本部长渡边锭太郎大将也访问汉城，同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大将一起，在白云庄大酒店宴饮休息。作为设计了满洲事变这样惊人战火的人的行次来说，应该说太安稳、太从容了。

读这一历史记录时，就不由得想起朝鲜战争爆发时杜鲁门到别墅去休息的事。从九·一八事变和朝鲜战争这两场互不相同的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脉相通的地方，这并不只是因为这两场战争都是不宣而战，突然开始的，而是因为从挑起这两次事变的人的面貌中，都可以看到帝国主义所固有的狡猾性、无耻性、侵略性和支配主义本性。

有人说，历史是不重复的事件的累积，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无视各个事件之间存在的类似性和共同的倾向性。

日本会制造像九·一八事变那样的事变来侵吞满洲，对我们来说，这已成为确定的既成事实了。当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张作霖被炸死事件时，我们就预感到这一点；当由于万宝山事件，朝中人民之间出现了险恶的对立状态时，我们也预感到这一点；当他们制造了以“农学学士”身分从事间谍活动的关东军参谋本部所属中村大尉“失踪”事件时，我们又预感到这一点。

我特别是从万宝山事件中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万宝山是个小村庄，座落在长春西北约有 30 公里的地方。所谓万宝山事件就是指在这个村里朝鲜移民和中国居民之间围绕着水渠问题发生的纠纷而说的。朝鲜移民为了开水田，挖了引伊通河水的水渠，而这条水渠侵占了中国居民的旱田。而且，拦住了伊通河，在雨季河水有可能泛滥。因此，中国居民便反对这项工程建设。

这时，日本人却又唆使朝鲜农民强行推进工程建设，于是纠纷就扩大起来，波及朝鲜国内，造成了人命和财产受损害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巧妙地利用农村里常有的地方性民事纠纷，进行了民族

离间活动。

如果那时日本人没有搞离间活动，或者朝中农民中有位先觉，作了稍为理智的思考，那么纠纷就会以简单的争吵结束，而不会扩大起来，发展成互相破坏、互相厮打的局面。由于这起事件，朝中人民之间出现了更大的误解和不信任，造成了反感。

那时，我通夜不眠地想了又想。因日本帝国主义而遭受着类似的灾难的两国人民，为什么要互相挥动拳头，进行血腥争斗呢？正当应该在抗日这一大前提下两国民族紧密地携起手来进行共同斗争的时候，却只为一条水渠，竟然闹出“骨肉相争”，这还像样子吗？为什么，因为谁，造成了这种惨剧呢？这到底对谁有利，对谁有害呢？我想了又想。

我忽然感到这次事件是日本人预先安排好的鬼把戏，是即将发生的惊人事变的前奏。首先，日本驻长春领事馆的官员干预农民之间偶发的冲突，“维护”朝鲜人的利权，就很可疑。日本帝国主义者炮制出“土地调查令”这种掠夺性法令来夺取朝鲜的农田，实行了杀人的农业政策，而现在摇身一变却成了“保护者”，“维护”朝鲜农民，实际上这是可以成为世人笑料的一幅政治讽刺画。在长春的《京城日报》支局，急忙向本社通知了万宝山的纠纷，在国内又急忙印出号外来发行，这些我都觉得可疑。

是不是奸诈的日本帝国主义为离间朝中人民，迅速抓住地方的小小纠纷制造的可怕的阴谋得逞了呢？如果是这样，那他们为什么需要搞这种阴谋呢？

我们在间岛腹地重整革命组织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分明在急急地准备着什么。

万宝山事件余波尚未消失的那年夏天发生的中村大尉“失踪”事件，把中日关系推向了战争边缘。与此同时，在日本本土接连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东京的青年军官聚在靖国神社，举行了中村大尉的慰灵祭，抽出自己的血来画了个膏药旗，把它挂在神社头上，煽起国民的战争狂热。形形色色的有关满洲的团体，召开满蒙问题各派联合大会，大肆叫嚷什么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解决满蒙问题。

那时我已判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只是个时间问题。可以这样断定的根据，不止一两项。

鲸吞朝鲜后，侵吞满蒙；侵吞满蒙后，侵吞全中国；侵吞了全中国后，则称霸亚洲，正如《田中奏折》中规定的，这是日本的基本国策。满脑子要做东亚盟主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轮，正在沿着这个国策毫无阻挡地滚动着。

日本帝国主义以中村大尉“失踪”事件为借口，把关东军兵力集结在沈阳，采取了进攻态势。

那时陈翰章非常不安和焦急地说,日本军队马上就要侵吞满洲了，可我们都等于赤手空拳，怎么办才好呢？他对国民党的张学良军阀寄予一定的希望。他认为，他们至今是优柔寡断的，可是一旦国权被侵犯，他们就会为了在中华民族面前保持体面，并在几万万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起来抵抗。

我对陈翰章说，指望国民党军阀会抵抗，是个妄想。

想一想张作霖被炸死事件时的情况吧。那是关东军的谋略，这已经很清楚了，而且有确凿的证据，但那时东北军军阀既没有查明真相，又没有对关东军追究责任。竟然还接待日本吊客到死者灵前吊丧。难道这能只看做是某种慎重性、脆弱性和优柔寡断吗？国民党为了扑灭共产党、“讨伐”工农红军，向江西中央苏区投入了几十万大军。宁可把国土的一部分让给日本帝国主义,也一定要扑灭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这就是国民党的打算。攘外之前，先肃清共产主义势力，安定国内政局，这就是国民党的路线。张学良在其父被炸死后完全倒向国民党，盲目追随这一可恨的路线。因此，他不会有什么抵抗，对他寄予期望是荒唐的。

陈翰章慎重地听了我的话，可是没有表示同感。他说，张学良军阀虽然追随国民党的路线，但是到了自己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盘——东北土地完全沦陷的地步，仍会不抵抗侵略者吗？陈翰章仍然没有抛弃对军阀的期望。

正在这样的时候，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数十万军队竟毫无抵抗地退出了沈阳。陈翰章也不能不握紧拳头，面如土色地跑到我这里来了。

“成柱同志，我是个愚蠢的梦想家，幼稚!”

陈翰章说着，气得全身发抖。他抑制不住激愤，不断地唾骂自己。

“我曾相信张学良这种人会保卫东北，看我多么愚蠢啊！张学良是个违背中华民族的信义，放弃了抗日的懦夫，不抵抗将军！我曾到沈阳去看过，满城军阀军队，大街小巷全是扛着新式步枪的军队。可

是，那么多的军队一枪不放就退却了。哪里还有这样气人的事啊。这该作何理解呢？”

事事沉着、温和的陈翰章，这天早晨却抑制不住感情激动，提高嗓音，连连喊叫。

张学良后来主张抗日，对国共合作也做出了贡献，可是在满洲事变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不好的。

我把陈翰章带到屋里去，轻轻地慰勉他说：

“陈同志，镇静一下吧。日本军会进犯满洲，这不是我们早已料到的吗？事到如今还喊什么呀！从现在起，我们应该冷静地观察事态的发展，作好准备应付它。”

“那当然啦，不过，太气人，太冤枉啦。我对张学良这种人寄予的期望太大了。我通夜没有睡着。我是苦闷了一夜径直跑到你这里来的。

“成柱同志，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你知道有多少人吗？30万啊，30万！30万这个数字还小吗？这30万人一枪不放，一夜之间就退出了沈阳……啊，难道我们中华民族就这么软弱无力吗？孔子、诸葛亮、杜甫和孙中山的祖国，难道就这样沦亡了吗？”

陈翰章捶胸痛哭，泪如雨下。

他想到本民族面临的悲惨命运，那样地气愤和悲伤，是理所当然的。那是只有热爱祖国的人才能有的纯洁的感情，是对任何人都不能让步的神圣权利。

有个时候，我也曾在家乡的蟠松下，想着被日寇践踏的祖国，暗自流过眼泪。那是一个星期天傍晚的事，那天我到城里去，看到一位

老人被日本警察踢打得血肉模糊地倒在街上蠕动的情景，回来后整天抑制不住气愤，在万景峰上度过一天。

那天，我也像陈翰章这样，以悲愤的心情想，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值得自豪的我们国家，为什么这样一朝就遭受了亡国的耻辱了呢？如何洗刷这一耻辱呢？

这么说，我和陈翰章体验了同样的耻辱。过去是思想的共同性使我们接近，而从那时起，处境的共同性，使我们的友情倍加深厚了。俗语说，同病相怜，可以说，人们越是不幸的时候，就越加亲密，友谊和爱也就越加深厚。过去，朝中人民和共产主义者所以能够那样容易地像亲兄弟一样亲密起来，正是有着处境的共同性，目的的共同性和事业的共同性。帝国主义者是为了利润暂时互相勾结，而共产主义者则是为了共同的斗争目标——人类的解放和福利，实现巩固的国际主义团结的。我把陈翰章的悲伤当做自己的悲伤，把中华民族的苦难当做朝鲜民族的苦难。

能够调动几十、几百万大军的蒋介石、张学良等政界和军部的头头们，如果有像敦化青年陈翰章那样的爱国心和洞察力，那么事态就会不同了。如果他们把民族的命运放在个人和自己党派的利益之上，不反共，而联共，唤起全体民众和武装力量投入抗战，那么一开始就能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光荣地保卫领土和人民。

但是，他们把祖国和民族都没有放在眼里。

在日本进攻满洲之前，蒋介石就向张学良的东北军下达如下内容的命令书："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

避冲突。”事先抑制了军队的抵抗。这一事实，后来激起了数万万中国人民的愤怒。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仍发表投降主义的声明，让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不要抵抗日军，保持平静和忍耐，从而涣散了军队和国民的士气。满洲的命运等于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就决定了。他们甚至派代表到东京去同日本政府进行秘密交涉。在这次交涉中，蒋介石毫无顾忌地干出了卖国勾当，以日本不占领中国其他地区为条件，同意将与苏接壤的中国领土让与日本帝国主义者。

蒋介石是拥有几亿人口和数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国家的主席，而他连这种国家元首的自尊心都丢弃，竟然毫无顾忌地把国土的很大一部分割让给日本，这是因为他害怕反对地主、买办资本家和国民党官僚的国内人民的枪口，更甚于害怕日本的大炮。

因此，东北军的30万大军，抵不过不到自己武装力量1/25的关东军，整个丢弃拥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的广阔的满洲土地，不战而退。

我向为亡国而悲愤痛哭的陈翰章说：

“现在，任何党派、军阀或政治势力，都不可信赖了。应该只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力量。形势要求我们自己把群众武装起来投入抗日战争。出路就在于拿起武器。”

陈翰章没有说什么，只是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那天，我为了转换陈翰章的情绪，和他一起度过了一整天。说起亡国的悲伤，说实在的，我比陈翰章更重。陈翰章是失去了祖国的一部分的人，而我是失去了整个祖国的亡国民的儿子。

陈翰章恳切地请我到他家去，所以第二天我就跟着他前往敦化。

九·一八事变不仅震撼了朝鲜和中国，也震撼了全世界。在日本鲸吞朝鲜时大为惊愕的世界，为九·一八的炮声又一次发出了悲鸣。人类把它看做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开始。

日本把这次事变描写成可以通过中日间的交涉解决的地方性的突发事件，但是世界人民没有相信它。公正的世界舆论谴责日本对满洲的进攻是对主权国家的粗暴侵略，要求日本从霸占地区撤兵。

但是，以美帝国主义为头子的帝国主义暗中希望日本的矛头指向苏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采取了同情的态度。国际联盟向满洲派遣了李顿调查团，但这个调查团也没有站在正义一边，分清黑白，而是采取了模糊的立场，没有把日本规定为侵略者。

战争的炮声震撼大陆，张学良军阀的强大军队在日军的猛攻下全面退却，这一事实挫伤了亿万人的志气。由于在中日战争和俄日战争中的胜利而产生的“无敌皇军”的神话，已不只是神话，而成为眼前的现实了。极大的愤怒和恐怖的波涛席卷了朝鲜和满洲以及整个亚洲大陆。在这恐怖的波涛中，一切武装力量、政治势力、革命团体、形形色色的忧国志士和著名人士，都赤裸裸地露出了自己的原形。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把处于崩溃状态的独立军残余势力的大部分赶进了深山老林，把曾经高喊培养实力的人们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当独立军把多年用过的枪埋在地里、缩着肩膀回家乡的时候，那些民族改良主义者就高喊起亲日来了。那些发表独立宣言、高喊救国抗战的忧国志士们，则唱着《望乡歌》慌忙流亡国外。也有些独立

运动者抛弃过去的活动据点，跟随着撤退的张学良军队逃往锦州、长沙和西安。

区分爱国和卖国、反日和亲日、自我牺牲和明哲保身的错综复杂的分解过程，随着九·一八的炮声，在民族内部急速地进行。各自根据自己的人生观，有的附着于阳极，有的附着于阴极。满洲事变起到了甄别民族的每个成员的动向和本性的试金石的作用。

当时，我们在敦化和陈翰章就九·一八事变一连谈论了几天。起初，我们也曾非常惊慌。拿起武器的时机到了，这个判断是较容易下的，可是，在日军潮水般冲进来的情况下，该从何做起？则摸不着头绪。不过，我们很快就恢复了冷静，严密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当时，我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满洲对朝鲜革命的影响问题想了很多。

日军出兵满洲已成现实，占领满洲已是既成事实，因此，我们的身边就有敌人了。几年来，日本官署凭着“三矢协定”，在中国反动军阀的帮助下，对朝鲜独立运动者和共产主义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是，在朝鲜的日本军警越过国境进入满洲的事例是少见的。因为根据日本国和中国的协定，日本军警越境是原则上禁止的。

在满洲地区搜捕朝鲜革命家，大都是在该地区的日本领事馆警察干的。

满洲事变爆发以前，日本驻朝鲜军没能进入这一带。俄国国内战争时攻入西伯利亚的日本军，在撤退时得到中国方面的谅解，在珲春留下了两个中队的兵力，这就是当时驻扎东北地区的日本驻朝鲜军的

全部。

但是，随着九·一八事变，满洲就变成了日本军队飞扬跋扈的地方。从朝鲜，从上海，从日本，几万日军像潮水般拥进满洲。满洲大陆变成了敌我搅在一起的最前线。朝鲜和满洲间的国境，随着日军的进攻，实际上等于撤消了。

日军霸占满洲，无疑会给以这一带为活动据点的我们的斗争造成严重的困难局面。日本进攻满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绞杀在这一带高涨着的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便于维持朝鲜国内的治安。因此，我们要作好思想准备，今后在自己的活动中会从各方面受到日本军警的威胁。

我曾想，在朝鲜国内施行的“新治安维持法”的铁锤，也将会落在满洲地区朝鲜人的头上。

如果日本在满洲制造了傀儡国家，这也将会成为我们活动的很大障碍。实际上，后来日本制造出来的“满洲国”，成了我们活动的巨大障碍。

日本霸占满洲，将使在这一带安家落户的几十万朝鲜人的生活陷于涂炭。朝鲜移民希望在没有日本鬼子的地方，不受总督统治折磨，这种自由将成为一场春梦；流浪的人民背井离乡来到人情风土生疏的异国，就将成为毫无意义的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光想九·一八事变造成的不利条件。如果我们光想不利条件，只是悲观和叹息，就会陷于绝望，瘫坐在那里站不起来了。

那时，我不知怎么想起了一则朝鲜俗语：“入了虎穴，才能捉虎”。我们的祖先经过几千年的岁月体会并归纳的人生哲学，告诉了我这一条深奥的真理。

“满洲已变成了虎穴。就应该在这个虎穴打日本帝国主义这只老虎。现在，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的时机已经到了。如果这样的时候不去决一死战，战胜敌人，我们就永远做不了人。”我这么想着，坚定地决心不失时机地站起来。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战争的胜利，将会在我国强化殖民统治，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以保证战争所需的物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将达到极限，朝鲜民族的反日气势将会高涨。如果我们建立起武装队伍，开始抗日战争，人民群众就会从物质和精神上积极支持和声援我们。

中国的数亿人民群众也将奋起展开全民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今天侵略了满洲，明天将会侵略中国关内，中国大陆将会燃起全面战争的烈火。自主精神强的中国人民对祖国面临的危险，不会袖手旁观，这是无须赘言的。我们的身边有着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一心要保卫民族主权的中国众多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有着热爱自由与独立的数亿中国兄弟。他们过去把朝鲜人当做亡国民表示同情，而明天就会从单纯的同情者变成可靠的同盟者，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瞄准同一个靶子。

我们的侧翼任何时候都将有中国人民这一伟大的同盟者、同盟军。如果日本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关内，就会同欧美列强发生正面冲突，这将会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如果中日战争长期化，日本被卷入

世界大战，日本就会因人力、物力资源的缺乏和枯竭而发生困难。

日本侵吞满洲，意味着他们的统治区域的扩大。统治区域的扩大，不可避免地将会带来统治力的削弱，在统治殖民地方面，将会无法保证从前的强度。

全世界将会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者，日本将在国际上难免孤立。

我估计所有这些将为我国革命打开战略上有利的局面。

张学良军开始总退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大举攻进来，我们的面前就展现了惊人的事态。官署的官吏和公安局的警察停止了业务，四下逃散了。几天工夫，军阀统治的地方机关全都关了门。随着张学良军的败走，军阀统治体系陷于瘫痪。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急于扩大战果，顾不到维持治安。因此，在满洲地区出现了无政府状态。我们估计这种状态将持续一段时间，直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大陆建立自己的统治体系时为止。这种空白状态，是我们放心地建立武装队伍的绝好机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革命正在迎来新的转折点。

为了执行朝鲜革命所赋予的任务，应该决定各自的任务，并为其实现而誓死奋斗的时机到了。

九·一八事变，是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同时也是对生活在这一带的朝鲜人民和朝鲜共产主义者的进攻。我们作为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应当对此作出应有的回答。

我决心加紧进行组织武装队伍的工作。

三　以武装对抗武装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我们面临了必须尽早开始抗日战争的迫切任务。这是以正义的炮声反击预告新的世界大战的不正义的炮声的好机会。

获悉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洲，革命者都从地下走出来，占据自己的阵地。这年秋天，震撼大陆的炮声使满洲的人们振奋起来了。那炮声并没有使人们畏缩，反而使他们觉醒和奋发起来。由于敌人的暴行，变成了一片焦土的满洲地区，新的斗争气势重新萌动。

我们认定，这是在斗争中锻炼群众的好机会。

说句老实话，那时满洲地方的人们由于暴动失败带来的懊丧，都陷于苦闷之中。要使革命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给他们以信心。可是，撒檄文，说空话，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要给接连遭到失败的群众以力量和信心，就要发动他们投入新的斗争，并且一定要以胜利结束斗争。只有取得胜利的斗争才能把群众从恶梦般的停滞状态中解脱出来。如不使群众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即使由几个先觉开始武装斗争，也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提供了东满地区人民可以再次起来斗争的机会。国内人民的暴动也给了他们很大的推动。

国内接连发生了佃户斗争和反日暴动，高原的东拓农场、龙川的不二农场、金堤的多木农场等的佃户斗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

龙川地区农民的斗争，1929年以后仍继续进行。当时，当地组织在同我们的联系下很有效地开展了斗争。龙川地区有我们派去的许多工作员。

永兴的3000多名农民和三陟的2000多名农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以后借口“非常时局”强化法西斯镇压和掠夺，举行了大规模的暴动。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在间岛地区组织了秋收斗争。各地的斗争委员会在自己的属下，组织宣传队和纠察队，印出传单和檄文，制定斗争口号等，周密细致地做了准备工作。然后，按革命组织区，分别投入秋收斗争。开始时，进行的是争取减租的合法的经济斗争。

有的历史家曾把这次斗争称为“秋收暴动”，我不认为这个命名是合适的。秋收斗争既不是五·三〇暴动的模仿，也不是它的再版。这一斗争是在完全清除了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思想流毒的基础上，根据新的策略原则开展的、取得了胜利的群众斗争。五·三〇暴动，宗派分子是主角，而秋收斗争则是由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掌舵和领导的。

秋收斗争没有把暴力作为基本斗争手段。五·三〇暴动时，放火烧了变电所和教育机构，地主和资本家一律打倒，甚至毫无顾忌地杀人放火，但秋收斗争参加者提出三七制和四六制佃租等正当要求，在斗争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同相邻地区相协调，采取了秩序井然的行动。要求减租，对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来讲，决不是无理的。因为

这个要求是正当的，吉林省政府也不得不宣布施行三七或四六制（地主分30或40%，佃农分70或60%）佃租。

对那些老老实实接受农民要求的地主，决没有施加暴力；只对那些对斗争委员会的要求顽固抗拒的恶霸地主和用刀枪镇压农民斗争的军警，动用了暴力；对那些不接受农民要求的顽固的地主，采取了在田地里按三七制或四六制，把佃户的分额拿走，或打开仓库把粮分走的办法。掠夺性的东拓金融部、高利贷者、协助日寇统治的朝鲜人居留民会等反动团体也被定为斗争对象。

我到延吉地区领导秋收斗争回到安图后，有一天，五·三〇暴动后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搜捕隐蔽起来的崔东和来找我。他对秋收斗争逐渐带上暴动性质，表示了忧虑。

他本来是在安图鼓动五·三〇暴动的带头人，后来他还对我们把那次暴动认定为左倾盲动行为表示异议，要跟我们进行争论，这样一个人突然搬出了暴动有害说，不能不使我感到惊异。

“成柱同志！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曾经责难五·三〇暴动是左倾盲动，现在你们却在纯粹的经济斗争中引进了暴力，这叫人作何理解呢？”

崔东和这样质问后，抱着双臂绕着我踱来踱去。他可能以为击中了要害，显得挺得意。

“先生好像有些误会。你是不是以为你们在五·三〇时提倡的‘红色暴力’和我们在秋收斗争中使用的暴力是一回事？”

以质问来回答质问本不合乎礼节，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可是

我却脱口这样反问他。

“当然会有些微的差别。但是，不管怎么样，暴力还是暴力吧。”

“我们是只在有正当理由，合乎情理时，才使用暴力的。比如说，在地主不答应农民的要求时，用暴力打开了地主的粮库。在军警抓人时，我们用武力斗争抢回了同志。当敌人用暴力镇压斗争的时候，难道我们就应该对他们行善吗？”

“我并不是因为不懂应以暴力对抗暴力这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才对你们论是论非。目前不是一对一地行使暴力的时候。五·三〇暴动已成遥远的往事了。不幸的是，我们的革命进入了低潮期。”

“低潮期？”

“对，是低潮期。现在是退两步的时期。就是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也不会比现在更黑暗的了。你没看到关东军一举强占了整个满洲吗？连张学良的30万大军也退却了。在这样的时候，要保存革命力量，不要暴露出来。如果轻率地惹翻了敌人，就有可能在东满重演庚申年受讨伐那样的惨剧。”

崔东和主张，要防止秋收斗争发展为暴力斗争，群众应当停止拿起武器。他反对我们的武装斗争构想，说什么时机尚早，是沙上楼阁。

和崔东和争论是很费神的。这个人头脑聪颖，又是个共产主义意识较高的知识分子，说些一般的话，是说不服他的。他开口就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主张的正确，而且说的头头是道，一环扣一环。说服崔东和可不简单。

总之，他的主张是从革命进入低潮期这个基本观点出发的。他看

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武装进攻、张学良军队的败逃以及独立军的瓦解等不利的因素，全然看不到国内和东满人民趋向暴动的活动，显然是一个睁着两眼却看不见现实的青光眼。

反革命的猖狂和卑怯分子的败逃，决不意味着革命的低潮期。决定形势的是革命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动向。

正如所有的前一代共产主义者那样，崔东和也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他不把人民群众看做革命的主体，不相信并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我通过谈论革命低潮期的崔东和的表现，看到了前一代共产主义者和我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可以说，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是从如何看待人民群众这一点产生的。我们和他们虽然追求的是同一个理想、同一个目的，却没能通力合作，而形同路人，就是因为有这个差别。

我对崔东和说：

“也许你会认为这是谬说，我认为人民群众不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趋向暴力斗争的今天，正是革命的高潮期。我们决定不放过这个高潮期，秋收斗争结束后，就马上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使其组织化，把抗日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不管形势如何变化，这个决心不会变，也不会动摇。”

崔东和再没有说什么，不高兴地回去了。

崔东和之流以谈论暴力不利于革命之说来阻挠我们，但我们决不

脱离自己选择的前进道路，满怀信心地领导了秋收斗争。

十多万名间岛农民从1931年9月到年底，冒着日本军警和反动军阀的野蛮镇压，进行了不屈的浴血斗争。

在这斗争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表现朝鲜民族英雄气概的传奇性故事。开区地区的人民在示威途中，在封冻的豆满江上，同日满军警进行肉搏战的故事，一度成为满洲地方人民惊心动魄的话题。

女战士金顺姬牺牲的悲壮故事，也是在秋收、春荒斗争的烈火中产生的。金顺姬是药水洞赤卫队队员，又是秋收斗争委员会的委员。窜到药水洞的“讨伐队”用枪口戳着她快足月的肚子，问她肚子里是什么东西。

金顺姬怒视着围住她的日本守备队士兵和领事馆的警察回答说：“生个好样的是皇上，生个赖的就是沿街瞎闯的你们一样的东西。”她这一句有名的回答，使敌人顿时愕然。她为了严守组织的秘密，最后自己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可惜她22岁的芳年就被烧死在敌人的火堆里。

秋收斗争以农民的胜利结束。

通过这次斗争，东满地方的人民有了信心。他们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斗争的胜败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领导方法，以惊异的目光看待把秋收斗争引向胜利的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并紧密地团结在他们的周围。

人民群众通过秋收斗争的胜利，自己找到了五·三〇暴动失败的原因，发现并深信：投入暴力的多少，决不是决定斗争成败的基本因素这样一个真理。正像五·三〇暴动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投入的暴力

少，秋收斗争胜利的原因并不在于投入的暴力多。大家认识到：暴力只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而不是万能的东西。

只有为正义使用的、正当的、有分寸的、适时的暴力，才能给人民带来胜利。只有这样的暴力才能对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发展做出真正的贡献。我们只支持这样的暴力。

问题在于怎样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可以说，在这方面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创造了一个典范。秋收斗争是独特的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把和平的方法和暴力的方法适当配合，始终牢牢地掌握主动权，使敌人陷于被动。第二年春天开展的春荒斗争，也是这样的斗争。

通过秋收斗争，朝中人民的团结得到了加强，朝中共产主义者之间的革命纽带得到了巩固。

秋收斗争曾是提高人民群众觉悟和锻炼他们的好机会。在这个斗争队伍里，朴实的普通人成长为战士和革命者。东满的各革命组织能够以在秋收斗争中得到训练的许多骨干分子，更牢固地建设了自己的队伍。培育出这样的骨干分子，对不久将进行的武装斗争来说，也是值得庆幸的事。

在秋收斗争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许多青年革命者，后来成了在东满各县组织的游击队的骨干。

我一面领导秋收斗争，一面继续深入酝酿对武装斗争的构想。东满人民在斗争中发挥集体英雄主义和不屈的斗争精神，大大鼓舞了正在摸索新阶段革命路线的我。它使我确信，我们一旦手持武器同日本

帝国主义展开血战，群众一定会支持和声援我们。

1931年10月，当秋收斗争的烈火燃遍整个东满时，我到咸镜北道钟城地区去了一趟,为的是同国内的同志们讨论有关武装斗争的问题，召回派往六邑一带进行活动的工作员，给他们分配与武装斗争有关的重要任务。蔡洙恒和吴彬给我带了路。

钟城是蔡洙恒的家乡，他的岳家也在那里。他家祖辈直到旧韩国末期，一直住在那里。他的曾祖父做过坐守钟城的官。蔡洙恒他们一家人是在“韩日合并”后不久离开祖国搬到和龙县金谷的。

蔡洙恒是在间岛长大的，可是他总不能忘怀渗有他儿时梦想的故乡。每当他同我一道渡江到钟城去时，都显得非常高兴。不知为什么，这回他的情绪显得深沉忧郁。

我心想，或许是秋收斗争的波涛连蔡洙恒家的粮垛也给卷走了吧？于是我问他：

“你家是不是也成了清算对象？”

他家是地主。他的父亲是遭穷人白眼的德新社社长。他回答说：

“没有，我们没等农民提出要求，就在地里按三七制把粮食分给了他们。”

“县委书记的家庭到底不同啊！我说，你脸色怎么这么阴暗啊？”

“有些人叫我说服父亲不要当那个社长，可是父亲不听。”

蔡洙恒不知道他父亲是受革命组织的委任当德新社社长的。为了严守纪律，他父亲不能向儿子透露真情。蔡洙恒对不肯接受儿子要求的父亲感到不满，也是很自然的事，难怪他伤脑筋。

当时，占据上级党委要职的人当中，有些左倾分子提出违背革命利益的极左要求硬往下压，使下级人员很为难。他们甚至说蔡洙恒犯了“没有和父亲划清阶级界限”的“错误”，解除了他县委书记职务，后来又给他恢复了。

我为了转变蔡洙恒郁闷的情绪，改换了话题，谈起了武装斗争的事。

于是，蔡洙恒开玩笑说，等咱们的军队组织起来，他要第一个报名参加当机枪手。

“我看哪，武官对你不相称，你是天生的文官。”我也开玩笑地说。

可是这玩笑话里含着真意。我认为他是天生的政工人员。如果蔡洙恒活下来加入了革命军，一定会成为团或师一级的政工干部。

当我们建立了游击队，大力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他在大立子附近不幸被日本“讨伐”队杀害了。

吴彬是从上龙井东兴中学时就出了名的体育选手。他在珲春的运动大会上，参加摔跤比赛得了冠军，得了一头黄牛作为奖品。他为人洒脱、快活，而且动作敏捷。

我认为，吴彬是一定能成为革命军队的一员猛将的武官型人物。我从这个时期起，产生了一种习惯，凡结识一个人，就在心里掂量他在革命军队里能担当什么职务。可能是抗日战争迫在眉睫的紧迫形势把我逼成了那样的“精于筹算的人”。

我们在石建坪渡口坐船渡过豆满江，到潼关镇豆粮组合大豆精选场去了一下。这个组合干的活是把日本帝国主义从满洲掠夺来的大豆，

分成等级，过磅打包，准备运送到日本。

我们装成从间岛过江来打零工的，边帮工人干活，边同他们搭话。工人们听说我们是从间岛来的，便提起秋收斗争的事。他们对秋收斗争的看法大体上是悲观的。他们的看法是：鬼子还没强占满洲时，在间岛就举行了多次暴动，都失败了；现在鬼子侵占了满洲，搞秋收斗争之类的东西，能有什么胜算！这种斗争，无疑地也免不了五·三〇暴动那样的下场。目前，不管搞什么斗争都没有用。瞧吧，日本军正在乘胜长驱直入，加上强大国家凑成的国际机构也都袒护他们，弱小民族还有什么可指望的。这就是工人们共同的看法。

那时，我听了工人们讲的话，从三个方面受到了冲击。其一是，革命者要熟悉民心，就要经常深入群众；其二是，要想开始武装斗争，首先就必须加紧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其三是，无论什么形式的斗争，如果不使群众充分认识到它的意义，积极地动员起来，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我听到工人们那些虚无主义的、自暴自弃的看法，痛切地感到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尽早开始武装斗争，给我们的民族带来再生的希望，独立的希望。

那天，我们在光明村青年会会长崔成勋的家，召开国内政工人员和地下组织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国内革命组织在武装斗争方面的任务。

我在会上强调说，九·一八事变后，剧变的形势和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教训，迫切要求我们开展有组织的武装斗争，这是我国革命的合乎规律的要求，是飞跃的质变。然后提出了两大任务，即

作好军事准备的任务和牢固地奠定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的任务。

与会者面对开始有组织的武装斗争这一激动人心的大事，大为兴奋，热烈发言，提出了许多有助于组织武装队伍的创造性意见。

关于为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准备革命力量的问题，1931年5月，在共树德会议上已经讨论决定。在这个基础上，光明村会议，讨论了在面临武装斗争这样一个新的事件的时候，国内革命组织应执行的实际任务。这次会议是对国内人民和革命者发出的有关武装斗争的预告，是事先的信号。在会议过程中，国内革命者对武装斗争的积极响应，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在钟城住了一宿，很快回到间岛，同蔡洙恒、吴彬分手了。我们预定12月中旬在明月沟再聚首，总结武装斗争准备工作，讨论武装斗争的具体途径和战略策略问题。

在那以后，我的工作日程全被明月沟会议的准备工作占去了。

一说会议准备，人们首先会想到报告、决议等文件，但那时的会议准备，实际上是构想路线，确定战略策略的摸索过程，把思想写成文件则是会议次要的程序。

我对选择武装斗争的形式问题花了特别多的时间。

马列主义理论强调了武装斗争的意义，但没有规定应该用什么形式去进行武装斗争。因为不可能有适合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武装斗争的药方。我在摸索武装斗争的形式方面，也力求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为了进一步深入讨论武装斗争问题和新形势下的任务，我决定到

东满特委去见童长荣。因为我们既然要在满洲土地上建立武装力量，开始抗日战争，就不能无视同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合作。

在满洲地区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把武装斗争问题提到了日程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发出了号召：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直接用武装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者。

在要把枪口对准同一个目标的朝中共产主义者面前，提出了要结成用任何铁锤也不能破坏的牢固的联合战线，互相紧密合作和支持的迫切任务。

被任命为特委书记的童长荣，遇到日本军的“讨伐”，险些送了命，脱险后来到龙井市街，想在那里见我。可是龙井市内到处有密探活动，到那里去是很危险的，因此我请他到明月沟来。

后来，东满特委通知说，童长荣不知道特委已经转移，对间岛情况又不熟，在寻找特委时被密探发觉，关进了牢房。这意外的消息，不禁使我失望。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和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杨林，在九·一八事变后离开沈阳隐蔽起来，杨靖宇又在狱中，结果是没人可以商量。

我决定，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救出童长荣，并和同志们商量了营救办法。

这时，有一个叫高宝贝（宝贝是绰号）的人自告奋勇，要去营救童长荣。那人手特别灵活，像个魔术师，很会“扒窃”。他能在一眨眼的工夫，把对面说话人衣兜里的自来水笔扒过来。高宝贝常搞这种鬼，

所以他所到之处，每每有人因“丢”东西闹腾一番。

他故意去龙井市内扒窃，叫警察抓了去，到牢里找到了童长荣。高宝贝在监狱里不知使了什么招，特委书记不久就出狱了。这样，童长荣参加了明月沟会议。

我们于1931年12月中旬,在明月沟召开了党和共青同盟干部会议。我们为方便起见，把它称做“冬季明月沟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车光秀、李光、蔡洙恒、金日焕、梁成龙、吴彬、吴仲和、吴仲成、具逢云、金哲、金重权、李青山、金日龙、金正龙、韩一光、金海山等通过忘我的斗争得到群众爱戴和有声望的四十多名青年战士。

那时，我在明月沟第一次吃到了雪里红泡菜。我到达明月沟后山沟那天晚上，李青山他们家给我端来了云豆玉米粥和雪里红泡菜，我吃得不知道有多么香。雪里红泡菜，咸镜北道吉州、明川地方的人做得好吃。现在，这种泡菜甚至上了国家宴席。

明月沟会议时，李光不知从哪里捉来了五只山鸡。他可能是看到会议期间代表们只能吃到玉米粥和小米饭，心里难过，才同共青组织的积极分子们一道去捉的。

那天晚上，李青山说，有了好的浇头，压了冷面。明月沟里，大米珍贵，可是，淀粉还是有的。

一见冷面就乐得忘乎所以的车光秀，愣头愣脑地去挑逗李光说：“我说，汪清大叔，只那么五只山鸡，还不够往鼻子上抹哩。”其实，他因有胃病，每顿都吃得很少，可是在有很多青年人聚集的地方，他

总是装成忍着饥饿的大肚汉。

“这位吉林老爷连一碗玉米粥都吃不下，说大话倒挺能耐。我说，愣头儿车，那五只山鸡还是搭在粮袋上背来的呢！可把我累坏了。”

李光笑着也用玩笑来回答他。

车光秀还指手画脚地说，五只山鸡扒不下多少肉，要让代表们分坐在两个屋，一个屋里的吃放了山鸡肉的面，另一个屋里的吃放了家鸡肉的面。

可是，代表们都反对他的意见。那天晚饭，我们大家都坐在一个屋里，亲亲热热地吃了掺和着放上山鸡肉和家鸡肉的冷面。大胃口的朴勋吃了三碗，得了“冷面大王”的绰号。

为了把会开好，我们事先在李青山家开了预备会议。预备会讨论了议案、确定会议参加者名单和议程等问题。

开过预备会议后，开了十天正式会议。会上，集中地讨论了武装斗争要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因为把这个问题决定了，才能决定武装组织的形式和根据地的形式等其他问题。

没有国家，也就不能指望以正规军来进行抗战，要发动全民掀起武装起义，条件又没有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想法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游击战。

列宁对游击战做出的规定是，它是在群众运动已实际上达到暴动的地步的时候，或者在国内战争中两个大战斗之间多少有了间隙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的辅助性斗争形式。列宁没有把游击战看做基本战斗形式，而看做是临时的、辅助性的斗争形式，对这一点我深感惋

惜。因为我当时感到兴趣，而且苦苦探索的不是正规战而是游击战。

如果我们把以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打游击战作为我们要进行的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那么这种形式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在这过程中，我看了《孙子兵法》，重读了《三国志》。我国的兵书中，我看的有《东国兵鉴》[11]和《兵学指南》[12]等。

有些人说，游击战的始源是在公元5世纪，但是，至于那个游击战具体地在哪个国家，怎样进行的，我们是无从知晓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抱着最大的兴趣进行过研究的是，1812年俄法战争时期俄国农民武装部队的活动。俄法战争时期出现的游击队英雄达维多夫及干练地指挥了正规部队和游击队联合作战的库图佐夫将军的故事，鼓起了我的好奇心，使我更倾向于游击战。

在把游击战规定为基本形式方面，壬辰卫国战争[13]给了我很多启示。我认为，使壬辰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义兵斗争，是在游击战的历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一个典范。郭再祐、申乭石、金应瑞、郑文孚、西山大师、以及后来的崔益铉、柳麟锡等义兵出身的名将所发扬的勇敢精神和多样战法，完全把我迷住了。面临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交战的我，心完全被游击战这个词占据了。

然而，他们却说只有有了国家的后方和正规军的支援，才能打游击战，这就成问题了。马列主义经典作者们指出的这个附带条件，使我在选择武装斗争的形式方面，不得不经历复杂的探索过程。在既没有可作后方的国家，也没有正规军的朝鲜的实际情况之下，打游击战是否可能，这个问题是谁也不能下结论的未知数。这一点成了在我们

当中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

在我们的周围，接连发生了推动革命的激动人心的事件。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投降主义心怀不满的原东北军的爱国官兵，接二连三地举行了兵变。王德林、唐聚伍、李杜他们都没有跟张学良跑，都叛离了原东北军。连马占山那样的将军也举行兵变，疾呼抗日了。以这些人物为主轴，在满洲各地出现了反日部队，开始展开了救国军运动。

这种形势给有志于武装斗争的我们造成了非常有利的环境。

我强调说，武装斗争形式中，历来有正规战和游击战，正规战为主导，游击战则是辅助性的，我们必须在这两者当中选择一种。依我个人的看法，游击战更适合于我国现实情况。在不可能打正规战的我国的情况下，可以不拘于既成的惯例，应把游击战作为主导的斗争形式。

“变化无穷的游击战，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基本武装斗争形式。我们在没有了国家的情况下，以正规战与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以在军事技术上和数量上都处于劣势的武装力量，去同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交战，因此必须采用变化无穷的游击战。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那些只见过张学良的军阀军队、独立军或日本军的青年们，根本想象不出游击队是什么样的。

我给他们说明了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差别。还说明，要想战胜强大的日本侵略军，就要进行小部队和大部队灵活的配合作战、奇袭战、埋伏战、政治活动、政治工作、生产活动等，军事、政治、经济活动

都要搞。为此，就要组织一支在作战中能够自如地分散和集中的游击队。

有几个同志听了我的说明后，表示疑问说，用那种形式的武装斗争能战胜敌人吗？没有国家的后方和正规军的支援，又是在别国领土上作战，用游击队那样的非正规武装力量能够战胜用坦克、大炮、飞机等现代精锐武器装备起来的几百万大军吗？

他们表示这样的疑问，也是难怪的。我自己也曾反复斟酌过这些问题。

我们用那么几支枪，竟敢同日本那样的军事强国对抗，会不会成为世人的笑柄？义兵、独立军、张学良的30万大军在日军的威力面前，都未能免于风烛的命运，而我们靠什么打赢敌人呢？我们有国家政权吗，有领土吗，有财富吗？

我对他们说：

“我们是国家政权、领土、资源全被夺去的亡国奴的儿子。现在我们是在人家的国土上，过着寄居生活的赤手空拳的青年。但是，我们要毫不踌躇地向日本帝国主义者挑战了。靠什么？我们下了靠人民抗战的决心。人民就是国家，人民就是后方，人民就是正规军。一旦开始打起来，全体人民会变成士兵站起来的。因此，我们将开展的游击战，可以说是人民战争。”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就以游击战为主，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游击战，是一种既能保存自己的力量，又能从政治和军事上沉重

打击敌人，并能用较少的力量去消灭占有数量和技术优势的敌人的武装斗争方式。我们确信，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援助以及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用游击战的方式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就能打败敌人。

当别人都把游击战当做正规战的辅助手段的时候，我们则把它确定为基本斗争形式，并把它作为方针通过，这是符合我们实际的科学的、创造性的决定。

关于以游击战为主开展有组织的武装斗争问题的讨论结束后，又讨论了贯彻这一决定的途径。

首先提出了建设革命武装力量的问题。当时我们讨论决定：开始时，各地方组织小规模的游击队，在武装它的同时，逐步把它发展成为大规模的革命武装力量，在第一阶段，建立游击大队，逐渐把它扩大，最后发展成为人民革命军。紧接着讨论了解决武器装备的途径问题。

讨论从组织游击队问题转到建立根据地问题。组织反日游击队后，它的活动基地应该设在哪里？设在山里，设在城市里，还是设在农村？再说，在朝鲜和满洲都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的情况下，游击战的基地设在国内，还是设在满洲？就这些问题，大家认真地交换了意见。

无论什么军队都必须有支撑点，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简单常识。

因为我们的武装力量在没有国家的后方和正规军支援的情况下进行战斗，所以，要有一个可以在战斗后安全地进行休整，补充武器弹药，进行军事训练，治疗伤员的根据地，这样才能长期地坚持游击战争。因此，我们在组织游击队的同时，还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根据

地。

经过热烈的讨论，决定在群众基础好，物质保障条件也好，地形又有利的间岛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满洲大陆幅员广大，敌人的统治机构密度比朝鲜稀疏，眼下先在间岛设基地，等到时机成熟，再到国内去占据白头山大森林地带和狼林山脉。

根据地应以敌人的统治达不到的解放区形式为主，而且必须设在便于进行国内作战，又便于得到祖国人民支援的豆满江沿岸的山区。豆满江沿岸，有不少物质保障条件好，地形易守难攻的山村。

开始选定建设根据地的具体地点时，李光、吴彬、金日焕等许多同志争先恐后地提出了很多好意见。根据他们的建议，决定在渔郎村、牛腹洞、王隅沟、海兰沟、石人沟、三道湾、小汪清、嘎呀河、腰营沟、大荒沟、烟筒砬子等天险要塞建立根据地。这些地区集结了秋收斗争后为躲避日寇的“讨伐”而逃来的革命群众，而且已经有赤卫队在保卫革命组织和人民。

讨论越深入、越具体，提出的问题也就越多。为了长期经营和维持根据地，对于怎样进行农业生产，怎样经营经济，怎样建设修械所和医院，以及由谁来怎样做居民行政工作等复杂的事务问题接连提了出来。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还就奠定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问题、结成朝中人民反日共同战线问题和加强党组织工作和共青同盟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一切都是在以游击战为主开展武装斗争方面必须解决的重要问

题。对这些问题，在会议上都制定出了方针。

这的确是巨大的、意义深远的、创造性的工作。我们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游击战战史里也找不到能够照样应用到我国革命实践中的典范，因此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一切问题，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根据地。这对不得不在没有国家后方和正规军支援的史无前例的艰苦条件下，开展游击战的我们朝鲜共产主义者来说，是无法避免的，是历史赋予我们必须解决的课题。

在解决这个课题方面，如果我们教条主义地仿效以正规军的支援为前提，配合正规军开展游击战的别国的经验，就必然会遭到不可挽回的严重失败。

有一年，拉丁美洲的一位抵抗运动者来见我，求我给他谈谈游击战争的经验。

我给他讲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经验，然后对他说，游击战，不可能有万能的公式。那是需要最高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智慧的波澜壮阔的创造性斗争。我们的经验可能对你们有所帮助，但切不可把它绝对化，机械地采纳。各国的情况互不相同，因此，你们也要创造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斗争方法和形式来灵活运用，这就是胜利的秘诀所在。

他听了我的话，想了许久，对我说，他们的国家山区很多，可是至今没有考虑到这个特点，而去偏重于搞城市游击战。或许是由于这个缘故，致使成果少，损失大，今后要根据实际情况，依靠山峦，以农村游击战为主，进行抵抗运动。

我们决定，会议结束后回到各自的活动地区，立即着手组织游击

队，就这样结束了会议。每当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血腥镇压和“讨伐”而失去亲人和同志的时候，人们是多么痛心地捶胸顿足，多么渴望能有自己的军队呀！我们终于盼来了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武装力量即将诞生的时刻。青年们一齐站起来唱了《革命歌》和《国际歌》，以那庄重的旋律向亲爱的祖国和革命宣誓。

童长荣等几名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参加了明月沟会议。他们是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他们从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居民占绝大多数的东满的特点出发，一开始就很重视这一带的朝中人民的友好和朝中共产主义者的合作。

童长荣一再请求在东满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积累了很多经验的朝鲜同志作重要发言。

我以在会上讨论的重要问题为中心，用中国话和朝鲜话相交替作了鼓动性演说。演说中谈到了我们关于武装队伍的组织和武装斗争的构想。

中国同志对我们的构想表示完全支持。游击战争的形式问题、组织游击队问题、游击根据地问题等，无论对哪个问题，他们和我们的意见都完全一致。

从那时开始，朝中人民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震撼了大陆，伟大的朝中友谊的传统在血战中开始扎下了根。

1931年召开的冬季明月沟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揭开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开端，给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变化。在卡伦会议上提出的武装斗争路线，通过这次会议得到了

深入的发展。如果说在卡伦会议上，朝鲜民族要把反日民族解放运动推向最高阶段——武装斗争阶段的意志得到了确认，那么在明月沟会议上，这个意志再一次地得到了确认，并在“以武装对抗武装，用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的口号下，正式宣布了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了规定游击战方向的战略及策略原则的骨架，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非常丰富的、变化无穷的武装斗争的作战方法。

明月沟会议结束后，我和童长荣在白岩下面交谈，谈到了各方面的问题。记得大概就在那时，我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被监禁在大连监狱的金利甲的情况，听到了在纺织厂做工、同时做共青同盟工作的全京淑，是如何照顾在狱中的金利甲的事。

童长荣说，东满不只是居民构成，而且党组织的党员构成中，大多数都是朝鲜同志。他还托付我代表朝鲜同志多帮助他工作：

“在东满，革命的主力军是朝鲜人。只有依靠朝鲜族居民，游击战争才能取得胜利。不管日本怎样挑拨离间，两国共产主义者一定能克服民族偏见。特委今后将特别关注做朝鲜同志的工作，希望你多加帮助。我相信您金日成同志。”

我热情地接受了他的托付。

“对两国人民的团结问题，我们也特别关心，这一点请放心。朝中人民之间产生的一时的猜忌，将被游击战争的枪声清除干净。”

我们笑着互相紧紧地握住了手。

后来，我和童长荣多次回顾了这一天的感受。

每当我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的讲话或会谈中，总要谈到30年代初，通过抗日游击队的建立和朝中武装力量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共同斗争，使朝中友谊发展到更高阶段的话。他还就根基深远的朝中友谊传统，谈了很多感人肺腑的话。

每当这时，我就想起充满朝中友谊的热烈气氛的明月沟会议的会场，怀着无限的感慨回忆和我们一道闯过枪林弹雨的魏拯民、童长荣、陈翰章、王德泰、张蔚华、杨靖宇、周保中、胡泽民等亲密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友好情谊也是人的感情，所以，只有通过具体的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友情，才会是巩固的；而且这样建立起来的友情，经过多长的岁月也不会淡漠。

四　准备血战

明月沟会议，对开展有组织的武装斗争问题作了结论，并要求我在这一工作中，发挥先锋和骨干的作用。

“金日成你来打头阵。不管什么事都该有个样板，有个示范嘛!”

同志们用这种话来和我作别。

我在明月沟等到与会者都离去后，便和童长荣分手，去了安图。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安图是最适于搞游击战的地方。

正如在12月的明月沟会议上提到的，我们在组织武装队方面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是，着手对九·一八事变后在满洲各地组织起来的中国反日武装力量救国军进行工作，因此，决定把组织的基本力量部署在安图和汪清。安图和汪清是救国军集结的中心。

我回到兴隆村，同家属一道在马春旭的家住了一些时候，然后搬到小沙河土器店沟芦苇村去，全面着手进行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准备工作。小沙河是实现了组织化的村子，周围环境比兴隆村好得多。这里的地下组织很坚强，密探不敢随便进出。因为没有走狗作祟，军警也很少到这里来“讨伐”。

我们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斗争，一开始就碰上了种种军事政治方面的难题。人的问题、武器问题、教练问题、粮食问题、群众基础

问题、与救国军的关系问题等都等待我们去解决。

我们认为，组织武装队伍方面，人和武器是最重要的两种必不可少的因素。而这两样我们都缺乏。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人，是指军事上、政治上都具有一定水平的人。我们所需要的，是懂政治、懂军事的人，具有为祖国和人民，手持武器进行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的青年人。

我们在一年半时间里，失去了朝鲜革命军的几乎全部骨干分子。金赫、金亨权、崔孝一、孔荣、李济宇、朴且石等革命军的主力，他们有的牺牲了，有的被关进了监狱。1931年1月，作为中队长进行活动的李钟洛，在带着有关朝鲜革命军的小册子去筹办武器的途中，同金光烈、张小峰、朴炳华一道被日本领事馆的警察逮捕了。对军事较内行的金利甲也被抓去坐了牢，白信汉牺牲了。崔昌杰和金园宇下落不明，连消息都无从知道。

革命军其余的成员中，有军事经验的人屈指可数，连为数不多的这些人都被派去做群众政治工作，不能叫他们参加武装队伍。当我在安图为建立游击队奔忙的时候，在我身边的朝鲜革命军出身的青年，只有车光秀一个人。

如果是掌握了国家权力的人，就可以下动员令或实施义务兵役制那样的法律，轻易地征集到足够的军事人员；可是，我们就不能用那种方法征集人员。因为法律机器或物质力量，是不能动员群众进行革命的。有一个时期，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曾把全体国民都负有纳税、服兵役的义务这样的条文列入宪法，可是群众连有无这种法律都不知

道。在失去了国权的情况下，蹲在别国租界的一个角落里，行使国权的流亡政府的法律或指令，是不可能生效的，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在殖民地民族解放革命中，不可能用动员令或义务兵役制之类的法律手段，让人们扛起枪来。在这个革命中，领导革命的领袖和先觉们的号召代替了法律，群众的政治道德觉悟和战斗热情，决定了兵源问题。即使没有人提出要求或下指令，群众也会为自身的解放自觉地扛起枪来。这是把自主性当做生命，决心为之献出生命的人民群众出于本性的行动。

我们根据这样的原理，在安图及其附近，开始物色吸收到游击队里来的对象。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工人纠察队、地方突击队等半军事组织里，有很多要求参军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在秋收、春荒斗争的风暴中，半军事组织急剧扩大，经过这些风暴，青年们成长了，面貌一新。

然而，不能因为群众要求参军，就不考虑他们的水平如何，随便接收他们为游击队员。东满的青壮年在军事上还没有作好准备，为了保障游击队的人员来源，必须在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半军事组织中，加强对青年的政治军事训练。

可是，我的身边没有一名可以担任教练的人才。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使安图地区的青年全部实现军事化的。拿我自己来说，也只不过是在华成义塾学了点军事，在指挥新型的军队——游击队的军事实践方面，几乎是一张白纸。学生出身的车光秀的军事知识还不如我。如果有像李钟洛那样的人，就可以把军事完全交给他，我就可以

把全部时间花在政治工作上，可是李钟洛又被关进了监狱，再没有可以指望的人了。这实在叫我焦急。

每当面临难关时，我总是感到缺少同志。

我们正承受这种苦恼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朴勋的黄埔军校出身的很有前途的人来找我们。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是蒋介石，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那个学校里有许多朝鲜青年。中国人把广州暴动又叫做“三日苏维埃”，在这次暴动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就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朴勋和安鹏参加了广州暴动，暴动失败后，从关内逃来满洲。朴勋身材魁梧，言行风度很豪爽，不愧是个武人。他常说中国话，说朝鲜话的时候少；常穿中国衣服，很少穿朝鲜衣服。他就成了我的“军事顾问”。

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破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曾在黄埔军校、广东军校、云南讲武堂等武官学校毕业后参加中国革命的杨林、崔庸健、吴成仑（全光）、张志乐、朴勋等许多人，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也都来到满洲地区。

坦率地说，当时我一听到黄埔军官学校这个校名，就对朴勋抱有很大期望。

朴勋有在战场上两手各握一支手枪，打双枪的本事。他的枪法真了不起，堪称神枪手。

他的又一个本领是口令喊得好。他有一副罕见的嗓子，他作为教官可以不用扩音器，指挥一两万人的队伍。他在土器店沟大喊一声，全村人都能听到。

他那口令声使安图的青年都为之倾倒，都以钦佩的目光望他。

车光秀看到朴勋指导赤卫队进行训练的情景，佩服地说：

“他那副嗓音，怕坐在东京的日本天皇也能听到哩。真不知是从哪里来了这么个宝贝蛋!”

对朴勋最为倾倒的就是车光秀，他俩常搞理论辩论，可是相处得非常亲密。

因为朴勋在安图训练搞得很好，所以我们组织的部队后来到汪清时，被评为“大学生部队”。我们部队的游击队员们在抗日战争的整个期间，都因为有秩序，纪律严明，言行文雅，衣着整齐，而受人尊敬。杨靖宇也一直赞赏我们革命军有纪律、生气蓬勃和文明的面貌。每当听到这种赞扬时，我就想起朴勋，想起他那响彻土器店沟的口令声。

朴勋作为教官的又一个特色是对受训者要求严格。由于他那非常严格的要求，受训者很快便掌握了军事知识。

然而，朴勋有时对队员实行体罚。他对做不好制式动作的或违反纪律的受训者，吹胡子瞪眼地骂他们，有时还用脚踢他们，有时罚站。我怎么对他讲革命军队内禁止体罚，也没有用。

有一天，训练结束后，我同嗓子都喊哑了的朴勋一同回家时，问他：

“朴勋，你身上总有点军阀的气味，你是在哪儿学来的那种习气？”

他一听军阀气味，便对我笑笑说：

“教我们的教官曾是个又严又厉害的人。说不定就是那个德国人

给我留下了那种‘遗产’。要成为像样的军人，不管怎么说，要多挨几下鞭子。”

德国式军事教育的痕迹在朴勋身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他上军事理论课，讲得最多的就是普鲁士军队。他对英国士兵的勇敢性、法国士兵的敏捷性、德国士兵的准确性和俄罗斯士兵的顽强性讲得很多，他讲这些的时候，总要号召受训者说，我们要成为具备所有这些品质的万能的军队。

他进行的比较多的训练，和我们作为训练目标的游击战的特点也是不相符合的。他为了让人们领会拿破仑式纵队队形和英国式线形序列是什么样的，用20名左右的受训者排成那种队形，为此下了很大功夫。

我参观教练后，在休息时间，低声对他说：

“朴勋同志，你刚才执行的那个英国式线形序列训练，就用简单的说明省略掉怎么样？我们又不是要在这里干一场和滑铁卢激战一样的战争，而是马上要在山地作战，同用大炮和机关枪武装起来的敌人打游击战，学那些旧时代的兵法能有什么用？”

“要打仗，是不是应该掌握那些军事知识。”

“别国制定的一般性的军事知识固然也是重要的，可是应该先选择那些马上能用得上的东西来教给他们。你最好别想让他们把你在军官学校学到的东西都囫囵吞下去。”

这天，我对朴勋说的是，叫他在训练中不要犯教条主义。

我把十来名赤卫队员交给朴勋，让他对他们进行射击训练。结果，

他把一个桩子立在平地上，一整天反复地说，敌人出现了，就要瞄准中心下部打枪。

于是，我对朴勋说，照这种方式搞训练是不行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训练先撇在一边，要先教打游击战所必要的东西。特别是，要先进行山地战所需要的训练。不符合我们情况的，要大胆地删改，操典里没有的兵法，要由我们集思广益，一样一样给制定出来。

朴勋诚恳地接受了我的意见。

从那以后，以打游击战所需的东西为主进行了训练。起码的制式动作和武器操作法自不必说，把伪装法、信号法、刺刀使用法、敌情侦察法、走山路法、棍棒使用法以及夺取武器的方法、打夜战时识别敌我的方法等马上能用得上的军事知识，先教给了受训者。

朴勋开始时，无计划地教这教那，后来就制定出教学计划，按计划进行训练了。

朴勋后来在回顾当年的事时，坦率地说，他在黄埔军官学校所学的军事，都是属于世界五大军事强国的东西。那是把古今内外的兵法集大成的、总括的、综合性的军事知识。他为在可以算是中国军事教育的最高学府的有名的黄埔军官学校学到这种知识引以自豪，心想，到东满来普及这样的知识，会博得人们的掌声和喝彩。不想，他的估计错了，他得到的不是掌声和喝彩，而是冷淡的反应。青年们对他讲的课，当做知也可、不知也可的常识，并没有把它当做必需的、不可缺少的东西来接受。他痛切地感到，他在过去的几年里学到的军事知识虽说是世界性的东西，但对游击战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半拉子知识，

对曾把它当做绝对的万能法典的他自己感到幻灭，切身地悟到必须创造新的、游击战所需要的军事理论。从那时起，他才摆脱了教条，才具备了适应朝鲜革命战争需要的、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

在安图地区的“训练都监”中，仅次于朴勋的出色人物是金日龙。他虽然没有现代战争的知识，但他用在独立军打仗时掌握的实战经验，对队员进行了不懈的训练。

我们加强了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少年探险队等半军事组织的军事训练，并扩大了队伍。通过这个过程，在我们周围集结了数十名在政治、军事上具备了一定水平的坚强的青年。我们选拔那些在豆满江沿岸各县工作的同志和在秋收、春荒斗争中经过锻炼和考验的青年，让他们都到安图集合。有很多青年从安图、敦化等东满各地来找我们。

我们从这些同志中选拔车光秀、金日龙、朴勋、金哲（金哲熙）、李英培等18名骨干分子，先以他们组织了游击队小组。同时，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地区也组织了同样形式的武装队伍。这样，各县陆续出现了一二十名左右的人组织的武装队。先以少数人组织武装队，悄悄地进行活动，借以筹办武器，积累经验，扩大队伍，一旦条件成熟，各县分别建立大规模的武装队伍，这就是明月沟会议讨论决定的方针。

组织游击队小组的过程，也就是为解决武器进行浴血斗争的过程。这困难，那困难，也不会有比解决武器的工作更大的困难。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用在他们本土军事工业系列生产的现代化武器和装备不断地加强陆海空军的战斗力，可是我们没有国家后方供应

武器，连买一支枪的钱都没有。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大炮，也不是坦克。眼前，只要有步枪、手枪、手榴弹之类轻武器就行。如果国内有生产武器的工厂，可以借助于工人的力量去解决，可是我国没有那种工厂。遗憾的是，我们在武装自己的过程中，丝毫没有得到本国工业的好处。

正因为如此，必然地出现了“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这样悲壮的口号。

我回到安图，把父亲托母亲保管的两支手枪从地下起出来。我举起那两支手枪，对同志们说：

“看，这就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遗产。我父亲不是义兵，也不是独立军，可是直到他去世那天，一直带着这些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只有武装斗争才是能够实现国家独立的最高的斗争形式。我父亲总的志愿，就是要进行武装斗争。我在承受这两支手枪的时候，下了坚定的决心，要代替我父亲去实现他未遂的志愿。现在到时候了。要把这两支手枪当做本钱，开始我们争取独立的进军。目前，虽然全部财产只有这两支，但使它一次又一次地翻本生利，就会变成二百支、两千支、两万支，你们想象那一天吧。有了两千支枪，我们就能解放祖国。要拿这两支枪作本钱，不断地叫它翻本生利，叫它变成两千支、两万支!”

我想着壮志未遂过早去世的父亲，哽咽得再也说不下去了。

筹办武器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时，朴勋问我，听说，在抚松曾有一个财主的儿子向你们献出了几十支枪，那些枪都弄到哪儿去了？他所说的财主的儿子就是张蔚华。我们在五家子进行活动时，有

一次张蔚华带着他们家丁的40支枪来找我。那时，我们把那些枪全给了朝鲜革命军队员。

朴勋听到了这件事，深表惋惜。他说，有钱，就有出路。他提议，巡访我们建立的革命村，向农民发出号召，捐一些钱。

我没有接受他的提议。若是向富者发出号召，从他们那里弄些资金倒有商量的余地，但要叫贫穷的工人、农民掏钱来买武器，这不是好办法。捐钱的事，当然比豁出命去夺敌人的枪容易得多。可是，我们还是放弃容易的办法，选择了困难的路。我也承认拿钱买枪是一种办法，但没有提倡这种办法。向人民群众伸手要钱是独立军的方法，而不是我们的方法。况且，即使捐到一些钱，也不会有多少。

有一次，崔贤同志到山林队那里，花1 500圆买来了一挺机关枪。那时，一头黄牛的市价大约是50圆，这么算起来，要买一挺机关枪，就要卖掉30头黄牛才行。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个数字。

我们商量多次，找出一个办法，到奶头山方面去，挖来了几支独立军埋在地下的枪支。

别的县里，也争相回收了独立军用过的武器。洪范图麾下的独立军在青山里战斗后，把大量的枪支和子弹埋在大坎子附近，退到苏满国境一带去了。

日本守备队通过密探得知此事后，便用几十辆卡车运走了那里的枪支和子弹。明月沟会议后，汪清的同志们派几个人到大坎子，从日本守备队员挖开的地方又找到了约5万发子弹。

我们手里弄到了一些枪支，便开始用它做本钱，投入了直接夺取

敌人武器的战斗。

第一个攻击对象选的是地主双秉俊的家。他手下有一个约有40人的保卫团。团长李道善后来成了恶名昭著的“新选队”队长，这个“新选队”后被崔贤同志的部队打垮。

保卫团的兵营设在地主家土城里头和外头。我们把游击小组成员和赤卫队员编成一个袭击小组，根据事先侦察的情况，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位于小沙河村的双秉俊的家，夺来了十多支枪。

夺取武装的斗争，在豆满江沿岸的所有地方，都群众性地蓬勃开展起来。革命群众提出“武装是我们的生命！以武装对抗武装!”的口号，由游击队小组成员、赤卫队员、少年先锋队员、地方突击队员们带头，无论男女老少，都奋起展开了夺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日满警察、亲日地主和反动官僚的武器的殊死斗争。

“要枪不要命!”就是那时用的话。到海关、保卫团、公安局或地主家，端着枪喊一声：“要枪不要命!”，那些胆怯的官吏、反动地主和警察官，就哆哆嗦嗦地把枪统统交出来。

“要枪不要命”这句话，在东满的所有革命组织区成了流行语，广为流传。

吴仲和的父亲（吴泰熙）和他叔父也手持用饭桌腿做的假手枪，口喊“要枪不要命”，威胁警察和自卫团，夺取他们的武器，送给了赤卫队。这个消息甚至传到了安图。我们听了，对那些老人的机智、大胆，深为叹服。

后来，我在汪清见到吴泰熙老大爷时问过他：“您是怎么想出那么

绝妙的法子来的呢？”老大爷笑着说:“晚上看起来放在炕上的饭桌腿也挺像手枪哩。我们哪里有枪或炸弹那种东西呀。所以，就拿出了饭桌腿。急中生智嘛。常言说，‘口渴者挖井’不是吗？”

老人说的确实很对。那时，我们真是抱着口渴者挖井的心情，勇敢地投入了夺取武器的斗争。那时需要最大的创造精神和智慧的苦斗。

东满的革命者和革命人民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地伪装自己，或是装成宪兵、救国军军人、日本领事馆官吏、大富豪或贸易商等来夺取武器。有的地方，妇女们用捣衣棒或棍子打倒军警，夺取武器。

夺取武器的斗争，是全民抗战开始的序幕，是预备战斗。所有革命组织都为这一斗争发动起来，全民动员起来了。革命需要武器的时机一到，群众就不顾一切地投入了这一斗争。在这过程中，他们进一步觉醒了。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大。

“自己的武器自己解决”,我们提出的这一口号发挥了巨大的生命力。

然而，我们在这一斗争中也失去了很多革命同志。那时，我们获取的每一支枪里都渗透了革命同志的热血和他们火热的爱国精神。

我们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同时展开了自力制造武器的斗争。

起初，在铁匠炉制造大刀、长枪之类刀枪武器。接着，还制造了手枪和炸弹。

在自力制造的手枪中，做得最精巧好使的，是汪清县南区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们制造的“比及盖手枪”。咸镜北道地方的人按俄语把火柴叫做“比及盖”。之所以把这种手枪叫做“比及盖手枪”，是因为要用

红头火柴制造子弹火药装在枪膛里。

他们用洋铁制造枪管。

东满的兵器厂当中，最有名的是和龙县金谷的神仙德鹰岩窟兵器厂、汪清县南区兵器厂和延吉县依兰沟南阳村朱家洞兵器厂。

鹰岩窟兵器厂用通过延吉县八道沟矿的革命组织弄到的炸药制造了炸弹。

起初，制造的是轰响炸弹，这种炸弹声响挺大，可是杀伤力几乎等于零。为了除掉这种弱点制造出了辣椒炸弹。这种炸弹比轰响炸弹效果大些，可是，只是气味呛人，杀伤力几乎没有。后来，和龙的同志们用碎铁片代替辣椒，制造了杀伤力挺大的炸弹。这种炸弹就是有名的延吉炸弹。延吉炸弹问世后，我们把和龙的朴永纯叫到小汪清大房子，举办了历时两天的炸弹讲习会。这是为了把制造炸弹的技术普及到东满各地。来自间岛各县的兵器厂成员和游击队指挥员参加了这次讲习会。

讲习第一天，我给大家讲了火药制造法。当时，游击队兵器厂制造炸弹所用的火药，是通过秘密渠道从矿山购进的。因为敌人对火药的管制很严，这种方法总是伴随着危险。我们较容易地自行从民房获取了火药原料，并用它成功地制造了炸药。在讲习会上，讲授了制造炸药的秘诀，并把它推广到各地方去。朴永纯讲了炸弹制造法及其使用法、保管管理法。关于他们在和龙自力更生地研究炸弹的过程的故事，引起了听讲者们一致的赞叹。主管鹰岩窟兵器厂的朴永纯、孙元金两同志的技艺都很高明。后来，这个兵器厂成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可

靠的武器制造基地和修理基地，对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

如果能有一位作家把反映我国人民在夺取武器的斗争中发扬的无比的自我牺牲精神、大胆性、随机应变的机智和非凡的创造精神的故事综合起来，用形象的画幅再现出来，那会成为一篇庄严的叙事诗。千万年来，被置于历史之外、只被当做廉价劳动力、在无知和蒙昧中挣扎的人民群众，他们作为亡国之民而悲酸地流尽血泪、尽管咬牙切齿，但只能将它当做命运逆来顺受的淳朴的人民群众，终于走上了用自己的力量开拓自己命运的神圣的解放斗争道路。

我每当看到地方组织缴获的或自力制造的武器，就再一次自豪地确认，我们相信自己人民的力量，要依靠这一力量开拓朝鲜革命的决心，是多么正确。

我们在加紧进行建设常备革命武装力量的准备工作的同时，特别关注奠定抗日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的工作。在实践斗争中，使人民群众不断地提高觉悟，得到锻炼，使他们做好抗日战争的准备，这是我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全民族一致地动员起来，这就是我们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

1930年，农业空前歉收，随之而来的严重的饥饿，为我们继秋收斗争之后，再次开展新的群众斗争提供了条件。我们为不让通过秋收斗争高昂起来的群众斗争气势减弱，又展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地主的新的春荒斗争。春荒斗争，从向地主借粮的借粮斗争开始，急速地发展为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地主的粮食的夺粮斗争，清算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暴力斗争。

春荒斗争的烈火，把东满地区的人民革命化的工作推到了新的高度。在反革命对革命的攻势越发猖狂的情况下，朝鲜的共产主义者依然深入群众，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对群众的启蒙和教育工作。各群众团体砸毁关门主义的框框，打开了大门，在实践斗争中，不断地锻炼了群众。

但是这个工作并不是在哪里都进行得一帆风顺。为一个村庄的革命化，有时甚至会牺牲好几名革命同志，有时，还要受到人们的难以忍受的鄙视和怀疑，却因不能说明自己是革命者，只好乖乖地忍受这一切。

我在富尔河村的经历，可以说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的。

富尔河村是位于从安图到敦化的重要通道上的村庄。不经过这个村庄，就不能自由地来往于敦化地区和南满一带，如不使这个村庄革命化，小沙河、大沙河、柳树河等临近村庄的安全就很难保证。

组织曾派去几名有能力的工作员，可是都失败了。需要赶快在那里扎下组织的根子，可是无论谁到那里，就被抓去遭到杀害，简直想不出一个妙计来。金正龙愤恨地说，富尔河村是个反动村，那个村里准有间谍或白色组织暗藏着，要设法把他揪出来。听到这个村的事，我也觉得很奇怪。

富尔河村有一个姓宋的组织成员，但是单靠他一个人，不可能探出反动分子，也不能实现村子的革命化。总得有一个人豁出命打进去，该揪出来的揪出来，该组织的就组织起来，把这个村从反动村改造成革命村，非这样不行。

于是，我自愿要求到富尔河村去。

我把宋同志叫到小沙河，事先商量好该怎么做。

“等你回到村子，就说你家缺人手，要雇一个小伙子做长工，把这话传扬出去。那么着，我就到你家去当‘长工’。”

宋同志一听这话，圆睁起眼睛说，那个村反动分子蠢动得厉害，怎么能冒那种险呢。还说，要你当“长工”，这成什么话，他说着直摇头。组织上也反对我到富尔河村去。

我不顾人们的反对，和宋同志一道坐着牛扒犁到富尔河村去了。我没洗脸，也没理发，故意弄得像个傻子似的打进了“反动巢穴”。

几个小时后，当我和宋同志吃晚饭的时候，突然骑警队扬起灰尘驰进村来。不知是用什么方法，怎样联系的，这么快就从安图派来了警察。

在外边玩耍的孩子大叫大嚷说，骑马队来了。我就走到院子里，抡起斧头劈劈柴。情况就和在蛟河不知名的一个女人家经历的差不多。

骑警指着我，问他是谁。宋同志就回答，是他家的长工。

有一个骑警晃着头说：“据说，有一个共产党干部到这个村来指导……”看样子，他们想象着一个西服革履的绅士打扮的干部，急忙奔来，可是看到的却是一个穿着破旧的褂子，蓬头垢面的我，觉得白跑了一趟，显出挺失望的样子。

那时，我疑惑地想到，是不是我们的队伍里有通敌的不纯分子。因为我要打进富尔河村的事只有几个负责干部知道。

骑警回去后，我一看宋同志，他面无人色，额头上浸出了冷汗。

我从第二天起，大清早起来，给房东家打水、劈柴、扫院子、煮牛食。然后，跟宋同志一道每天坐扒犁上山去。到了山上，我就看文件，讨论工作，砍柴，并一样一样地向宋同志交代任务。

村里人都说我是个老实的“长工”。富尔河村的人们只拿我当一个憨厚的“长工”。井边结了冰，村里的妇女就招招手叫我快给她们把冰砸掉。这种事我都乐意地给她们做了。因为我想，村里的人越多使唤我，我就会越像“长工”，我越老实地为他们干活儿，敌人就越不易发现我是个革命者。

有一天，宋同志他们对门的人家办喜事。村里的人拥来叫我去给他们家打糕。他们可能以为我是扛“长工”的，干这种活一定是干得很漂亮的。

我的种了一辈子庄稼的祖父常说，扶犁、弄铡刀、打糕这三样活儿都会才算是真正的庄稼汉。可是，我从来没有打过糕。我家的生活情况，哪里富裕到能去做打糕吃。我若听从村里人的话去，怕露了我的身份；要推辞，又不像个“长工”。因此心里犹豫不决。起始，就推说，房东家活儿忙，不能去。

可是，人们再三地来催，不好再推辞了。

我一来到办喜事那家的院子，这家主人为有人来帮忙挺高兴。他从前院的瘦瘦的半老人那里把木棰夺过来交给了我，说“小伙子，今天的糕好不好吃，全在你这一手啦。使出你的本领吧。”他们哪里知道我心里的苦楚呢！女主人忙把刚蒸出来的糕米盛在大木盆里端出来，我看着又好笑，又为难。村里的人们围着我，要欣赏我这个“长工”

的手艺。在农村，看打糕，也是个乐趣。

我往拿着木棰的手上唾了一下唾沫，心里想，嗐，豁出去了，使出全副力气抡起木棰干吧，这反正是人干的活儿，“长工”也不能是万能的嘛。顶多骂我手艺不高罢了。这时，宋同志察觉了我的心事，使我摆脱了窘境。他说：“看你这人，你那胳膊怎么打糕？我不是告诉你，要留神你那胳膊吗？”他故意摆出主人的威严责怪我。然后对办喜事那家人笑呵呵地说：“他昨天上山砍柴，伤了胳膊，不能打糕。邻居办喜事嘛，我来替他打吧。”

村里的妇女们在给客人分糕时，也把我当“长工”对待。别人的糕都放在碗里，可我的就递在手里。我对村里人这样慢待我，并不觉得不好，反而对我的工作有好处。

使富尔河村革命化的工作，就是这么不简单。在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过程中，曾遇到很多困难，但要和这里比起来，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的了。我在这个村，大约呆了一个半月，建立了组织，发动青年骨干清算了密探。

我回到小沙河，对同志们讲了在那里发生的事，同志们捧腹大笑。我对同志们说：“革命者没有打不进去的地方。过去一直没能打进去是因为像浮在水面的油滴，没能深入群众，绅士式地搞革命的缘故。”

建立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后，我曾率领部队去过富尔河村。我成为游击队长骑马路过这里，开群众大会讲了话。村里的人们一见我都惊呆了。

那些招手叫我给她们砸掉井边的冰的年轻妇女，看到讲完话坐在

马鞍上的我，说道：

“哎呀，那不是在咱村扛过‘长工’的小伙子吗？他成了革命军队长哩。”她们不知如何是好。

横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就这样克服掉了。

可是，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就是对给朝鲜共产主义者带来了很多流血损失的救国军部队的工作。

五　新的武装力量的诞生

由于一连串轰动世界的事件，1932年春显得非常动荡。霸占了满洲大陆的日本帝国主义搬出被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推翻的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制造出了傀儡国——满洲国。日本的御用宣传机器和中国的关内和满洲的亲日出版物，不失时机地大肆宣扬“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建设，赞美满洲国，而亚洲和世界的进步舆论则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刚刚抵达日本的国际联盟调查团的活动，这个调查团的使命，是查明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责任。

以英国枢密院顾问李顿为团长，由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列强的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同日本国的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外务大臣会见后，又到中国，同蒋介石、张学良会晤，又到满洲同关东军司令本庄中将见了面，还视察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现场。日方和中方为了把李顿调查团拉向自己一边，大搞欢迎和招待竞赛。有人猜想，如果调查团查明事变的真相，国际联盟行使影响力，那么，日本也许会从满洲撤军，这种臆测不仅在政界、社会界和舆论界流行，连那些对政治开始敏感的小学生和农村的老年人也都这样说。

当时，我们正在安图地区加紧武装斗争的准备，对那种臆测和风闻并没有怎么注意，而专心进行军事训练。小沙河妇女会会员们天天把午饭装在木盆里，用头顶着送到土器店沟的台地上。

3月中旬，我们为东满许多县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小组的指挥员，在安图举行了短期训练（短期讲习）。有将近20名指挥员从其他地方聚集到小沙河土器店沟。

短期训练进行了两天，头一天上理论课，第二天进行动作训练。我在政治课上讲了朝鲜革命的路线和方针问题，还讲了游击队的生活规范和行动准则。军事训练主要由朴勋负责辅导。那时我们的训练逐步从制式动作、武器装卸等基础训练深化到袭击、埋伏等战术训练。

安图成了朝鲜共产主义者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活动总部和中心，常有工作员和通信员从豆满江沿岸各县来到小沙河同我们联系。我们在安图组织游击队的消息，一直传到国内各地。20岁上下的热血青年们听到这个消息，冒着生命危险，从朝鲜和满洲各地拥到安图来，要求参军。

边达焕在带领八名志愿入伍的五家子青年来安图的路上，被日本军警逮捕关进监狱，也是在这个时期。解放初，边大愚老人来找我，讲到他儿子未能实现入伍的理想，在狱中虚度了几年岁月时，表示十分惋惜。

在间岛的各县中，特别是延吉地区，来找我们的人最多。延吉地区密布敌统治机构和镇压工具，密探网也很多。1932年4月初，池田大佐指挥的以罗南19师所属38旅75团为基干，由炮兵、工兵和通信兵加

强的间岛临时派遣队，为了对东满地区进行“讨伐”，渡过豆满江闯进了延吉等间岛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地区的地下组织把很多要求参军的青年送到安图来了。

也有不少青年未经组织的推荐，只听到有关我们的消息，便自动来找我们要求参军。

敦化的陈翰章也领着名叫胡泽民的中国青年来找我。胡泽民曾在和龙当过师范学校的教师。

有时候一天就有十多名青年结伙来找我们。

可是，救国军却在路上拦截他们，常常把他们抓去杀害。

当时，中国东北地区有东北自卫军、反吉林军、抗日救国军、抗日义勇军、山林队、大刀会、红枪会等形形色色的反日部队。所谓反日部队，是指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满洲后，由那些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帜，从旧东北军脱离出来的爱国军人和官吏以及农民组成的民族主义军队。把这些部队统称为救国军。

在满洲地区的反日部队中，较为有名的有王德林、唐聚伍、王凤阁、苏炳文、马占山、丁超、李杜等的部队。

东满最大的反日部队是王德林部队。王德林在青年时代，在穆棱和绥芬河一带密林中，毫无政治主张，过着“绿林豪杰”的土匪生活。后来他率部队编入张作相麾下的吉林部队，才成为具备了正规军外貌的军官。九·一八事变以前，他在旧吉林军当了第3旅7团3营营长。民间称他的营为“旧3营”。

日本进攻满洲后，他的上司旅长吉兴向日军投降，拜见了关东军司令。他宣誓要效忠日本帝国，被日军任命为吉林警备司令。

王德林为上司的背叛行为所激怒，立即举行哗变，宣布抗日救国。他率领500多名队员进入山林，组织了中国国民救国军，并任命吴义成为前方司令，开始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

吴义成、史忠恒、柴世荣、孔宪永等都是王德林的忠实部下。他们以罗子沟一带为活动据点，牵制间岛地区的敌人，后来跟我们游击队建立了血肉联系。

南满的山区有唐聚伍的自卫军进行活动。黑龙江省一带则有马占山部队抵抗北上的日军。聚集到安图的偏僻山区的是吴义成属下的于司令部队。这支部队非常强横凶暴。

他们都一致把朝鲜共产主义者看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认为朝鲜人是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引进满洲大陆的肇事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朝中两国人民之间不断进行挑拨离间活动，加上在五·三〇暴动和万宝山事件中所产生的对朝鲜人的坏印象，直到那时还留在中国人的脑海里。

朝鲜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是同样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的灾难和不幸的被压迫民族，正如中国人不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一样，朝鲜人也不会成为他们的走狗；正如中国人不会成为朝鲜人民的敌人一样，朝鲜人也不会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然而救国军的上层顽固分子没有具备能够理解这些道理的政治判断力和洞察力。他们也盲目地敌视共产主义。当然，这是同救国军的上层大部分是资产阶级

出身这一点有关系的。救国军的上层造出朝鲜人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宗派分子，宗派分子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样一条公式，并以此为准，毫不留情地迫害和杀害青壮年朝鲜人。

在城市和平原地区，有日本侵略军在猖狂肆虐；在日军还没有占领的农村和山区，又有成千上万的救国军把守在路口，使我们动弹不得。救国军的敌对行为，是对我们年轻的游击队生存的严重威胁。

不消说日本帝国主义，就连山林队和独立军也都反对朝鲜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名副其实地陷入了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地步。

不改善同反日部队的关系，就不能使我们游击队的存在和活动合法化；不使游击队的存在合法化，就不能扩大队伍，公开地进行军事活动。

虽然组织了部队，却不能合法化，因此，我们处在躲在人家后屋的境地。只有公开露面才能发挥作用，我们却不能公开露面。我们没有军装，都穿着便衣，躲在人家后屋，只是摸弄着驳壳枪，慨叹说，这样下去怎么能抗日呀！躲也只能躲在朝鲜人村子里，别的地方就根本不能露面，到了夜晚才能几个人出来走动。

这就是我们起初把游击队称为秘密游击队的原因。

那时，我们不仅要躲避日本军队，而且要躲避救国军和伪满军的兵，还要警戒敌视共产主义者的部分朝鲜民族主义者和反动派。只要我们公开露面，他们就说是共产党，向我们开枪、横施暴行，实在叫人伤脑筋。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的情况也一样。

但又不能专找共产主义者的家去住。他们本来就穷，再有几十个

人去吃，他们的生活就会更苦。

只有争取游击队合法化，白天能在街上排队唱着歌行进和进行宣传，受到群众欢迎，工作才会顺利，打起仗来也才会有劲头。可是现在办不到，真叫人焦急。

我们只要坐到一起，就反复讨论如何实现游击队的合法化，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同反日部队的关系等问题。

讨论得最深入的是共产主义者同中国民族主义者携手对不对的问题。救国军上层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官僚利益的军队，我们共产主义者同他们携手，是不是抛弃了阶级原则，妥协了呢？抱这种怀疑的同志并不止一两个。他们说，暂时改善同救国军的关系是可以的，但不能结成同盟关系，并主张对他们的敌对行为，只能用武力去压下去。

这是极其危险的主张。

救国军虽有各种局限性，但他们的斗争目的和处境跟我们相同，所以在抗日战争中能够成为我们战略上的同盟者。我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坚决主张不仅要改善同救国军的关系，而且要同他们形成联合战线。至于思想和信念互不相同的两支武装力量的联合战线问题，当时还是第一次提出来，所以引起了复杂的争论。

实现同反日部队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内也作为重大的问题提了出来。东满特委很早就对王德林部队予以关注，派七八名优秀共产党员去做救国军的工作。我们也派李光等朝鲜共产主义者到救国军里去。

我通过通信员多次收到关于派到同山好部队的李光，苦心做救国军工作的情况汇报。

当救国军对我们施加的暴行更加严重时，我们的同志们就说，要形成联合战线是一种空想，现在我们也应该迎头还击，为牺牲的同志报仇雪恨。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了他们。把救国军当做敌人，一对一地进行报复，这是不仅不符合反日的大义和道理，还可能把我们年轻的游击队引向自灭的盲目行为。

间岛以及满洲全境的共产主义者和游击队员都为救国军煞费苦心。

当时，各县的游击队人数不多，一个县才有几十名。这些人只要被救国军抓住，就被杀害，无一幸免。所以，想扩大部队，也根本没法扩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便想，我们游击队暂时加入于司令的部队，作为别动队进行活动，会不会有利呢。于是我作了这样的假设：编入了于司令的部队，就有了救国军的招牌，是不是可以不受他们的害，还可以得到一些武器；只要给他们以好的影响，是不是可以使他们共产主义化，把他们变成安全的同盟者呢？我提出这一设想请大家讨论。

我们在党组织所在的小沙河金正龙家开了一整天的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现在把这次会议称为小沙河会议了。这次会议上的讨论非常热烈。在救国军部队里作为别动队进行活动，是否可能，是否有益，就这个问题，从早到晚进行争论，嗓门都喊哑了。不仅是吸烟者，连那些不会吸烟的人也卷起烟吸，不住地喷出烟来，弄得整个屋子乌烟

瘴气，简直叫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这事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那时我还不会吸烟。

最后我的想法得到了同志们的支持。

会上决定派代表到于司令的部队去同救国军进行谈判，我被选为代表。不是同志们选了我，而是我自告奋勇要去的。

当时，我们没有一个做过军事外交的人。所以慎重地讨论了派谁去的问题。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的忧虑：我们选派了代表，对方会不会接待他呢；进行谈判时，他们会不会提出无理要求把我们推入窘境呢；如果他们不如意会不会枪杀我们的代表呢。大家还异口同声地强调说，必须选派能够老练地对付这一切情况的人作代表。

那时，在我们当中没有合乎这个标准的人。要与于司令谈判，就得选出岁数较大的人，可是在我们当中岁数大的只有朴勋、金日龙和胡泽民三个人。金日龙虽比我大十多岁，可是他不会说中国话。其他的人都是和曹亚范一样刚从学校毕业的18～20岁的青年小伙子。

我向大家提议派我去。

同志们都表示反对，说成柱同志是队长，于司令说你是共产党，杀害了你，怎么办。所以，最好在陈翰章、曹亚范、胡泽民等中国同志当中，选派一个善于外交的人去。

我问大家，我去了，于司令为什么要杀害我呢？同志们说，那谁知道呀？见了你，说声“高丽棒子”，就杀了你，那不就完了。别人都被杀了，难道就不能杀你吗？尤其是在汪清的关部队事件后，救国军一看到朝鲜青年，就更眼红，你还是不去的好。

所谓关部队事件，是指汪清的李光同志领导的秘密游击队解除了名叫关部队的反日部队武装的事件。由于这一事件，游击队和救国军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游击队的活动面临更大的困难。汪清来的通信员说，关部队事件后，他们那里的救国军为了报复，把好几个游击队员抓去枪毙了。金策同志在北满被山林队逮捕，差点送命，也是这个时期。

我还是坚持要去。我所以这样坚持，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出众的外交艺术，或者有什么能折服于司令的特殊处方，而是因为游击队的存亡取决于同于司令的谈判，我们的成败也取决于如何协调同他们的关系，不把救国军变成同盟者，我们就不仅无法在东满开展游击战，而且连家门都不能自由出入，这已成为无可争辩的现实。还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过好这个关，开展武装斗争，那么作为一个朝鲜男儿活着就没有意义，也没有理由活着。

我说服他们说，怕死是干不了革命的，我会中国话，在搞青年运动时又经历过多次风浪，我去了，就能见到于司令。所以，应该由我去。然后，我就带领朴勋、陈翰章、胡泽民和另外一个中国青年去找于司令。这是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冒险之行。

对方的司令部驻扎在两江口。

我们约好如果救国军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不要说是从安图来，而要说从吉林来。向救国军说出游击队驻扎区东满的地名，是不适宜的。

我们在通向大沙河的路上遇到了于司令的部队。几百名的队伍像

在《三国志》里看到的那样，打着写有“于司令”字样的旗，威风凛凛地走过来。这是在于司令的部队在南湖头消灭日军，缴获了机枪之后，正是他们的名声大振的时候。

“要不要躲一下？”胡泽民不安地回头望着我说。

“不，要迎面前进!”我说着继续朝前走去。他们四人也采取共同步调，并肩走在我的两旁。

救国军看到我们，就大声喝道:“高丽棒子，过来!”接着他们不由分说地要逮捕我们。

我用中国话抗议说，我们也和你们一样是抗日的，为什么要逮捕我们。他们反问我，你是不是朝鲜人？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是朝鲜人，然后指着陈翰章、胡泽民他们说，他们是中国人。

“我们有急事要商量，找你们的司令。快把我们领到你们的司令那里去。”

我正颜厉色地提出了要求，他们的态度稍缓和了些，要我们跟他们走。

我们跟着他们走了一段。这时，有个原东北军军官装束的指挥官下了吃午饭的指令，然后把我们拘禁在一个农民家里。

出乎意料，我念毓文中学时的导师刘本草先生走进屋来了。刘本草先生曾在毓文中学教过汉语，后来又在文光中学和敦化中学任过教。他跟尚钺先生有深厚的交情，同陈翰章也很熟。先生为人忠厚，知识渊博，给学生介绍了很多好书，写出好诗来也乐于给学生们朗诵，所以我们都爱戴他，尊敬他。

我和陈翰章认出是刘本草先生，欢呼着跑了过去。正处于逆境的时候见到了刘先生，倍加高兴。

刘本草先生也又惊又喜，一连串地问我说，你怎么在这里？怎么来到这里？往何处去时被捕的？

我简单地说明了一下。先生听完就大声指示部下说："要好好招待他们。我也要在这儿跟他们一起吃午饭，备些好菜。"原来，他在日军侵入满洲后就离开讲台，投到于司令的部队里当参谋长了。

刘本草先生同我们一起吃饭时说，他眼看着国家沦亡，忍无可忍，穿上了军装，可是要带着愚昧无知的部下打仗，令人焦心的事不止一两桩，并问我们愿不愿意跟他们携手共事。我们表示同意后，要他帮我们去见于司令。他说，原在两江口的于司令，现在要到安图县城去，跟他一块去，就能见到司令。

于是，我对他说：

"老师，我们也想组织一个朝鲜人的部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怨恨，朝鲜人要比中国人更深。反日部队为什么不让朝鲜人抗日，老是对他们施加暴行，加以杀害呢？"

"可不是嘛，我老劝他们不要这样，可是这些无知之徒连共产党是什么都不知道，却总是这样。共产党抗日，有什么不好？"

刘本草先生也表示愤慨。

我听了他的话暗自高兴，心想这下好了，有活路了。我当场派朴勋回小沙河告诉那里的同志们，我们都平安无事，于司令部队的参谋长真心帮助我们，游击队合法化有希望了。

午饭后，我们跟着刘本草先生前往安图城。

刘本草有一匹专用军马。我们劝他骑。可是他说：“你们都步行，我一个人骑马，那还像话吗。咱们一面走一面谈吧。”他就这样一直同我们一起步行到了城里。

反日部队的士兵们胳臂上几乎都戴着臂章，上面写着“不怕死，不扰民”。

与士兵们给人的凶恶印象相反，他们的座右铭却非常健康而又富有战斗精神。这使我又添了一缕希望，同于司令的会晤也许能有好的结果。

那天，我们在刘本草先生陪同下，毫无阻碍地见了于司令。他也许是看在参谋长的面上，对我们以礼相待，并给了很高的待遇。他们这样做，也许还因为他们探听到我们都是中学毕业，是会讲、会写、又会使用武器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便想把我们留下来使用。

不出所料，于司令真地要我们加入他们的部队。他要我担任司令部宣传队队长。

我的本意是要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使其合法化，可是于司令却要我当宣传队队长，这可真叫我为难。我要是拒绝，那就一定会惹怒于司令，也会使刘本草先生难堪。

我想，虽然事与愿违，可是只要能得到于司令的信任，或许能交上好运，便答应了下来。

于司令非常满意，当即叫部下写了任命状。

我就这样当上了司令部宣传队队长。他还任命胡泽民任副参谋，

陈翰章任秘书。这虽然是出乎意外的荒唐的结果，但对我们来说，又是不能不经由的梯子。实际上，这一“飞黄腾达”，对游击队的合法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把我们躲在人家后屋时的处境和经刘本草先生介绍深深地打进于司令部队心脏的今天相对比，心里暗自高兴，心想，这下可好了。

那天晚上，我们碰上了一件意外的事。救国军抓了七八十名从延吉去富尔河的朝鲜青年，押到城里来了。

我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愕然地在远处望了一会儿那些被抓的青年，然后跑到了刘本草先生那里，说：

“刘先生！出事了。刘先生的士兵又抓来了一大批朝鲜人。那些人当中有亲日派吗？我看，他们当中没有亲日派。是不是应该调查一下有没有日本鬼子的走狗，然后再处理？”

刘本草先生听完后说：“成柱！你去看看吧。我们是相信你的。”

“刘先生，我一个人去怎么行呢？还是先生跟我一起去吧。刘先生不是讲话讲得好吗，只要您出去讲一席话，就是日本鬼子的走狗也都会受感化的。应该想办法把他们感化过来，让他们去打日本鬼子才对。老是杀那些并不是亲日派的人，有什么好处呢？”

“成柱，你不是也讲得很好嘛，我还讲什么呀？你一个人去吧。”

刘本草先生摆摆手，硬是推让。

正如先生所说，我在学生时代，讲话讲得多，倒是事实。我在吉林、敦化、安图、抚松、长春等地，作了很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野心，呼吁朝中人民团结的讲话。刘本草先生是知道的。

“刘先生，我用朝语讲话，先生部队的老爷们怎么知道我在讲什么呀！他们会不会怀疑我搞什么坏宣传呢？”

刘本草先生听了，还是摆摆手，催我快去。他说：

“成柱你顶多是宣传共产党呗，没关系，由我作保，你只管放心讲吧。”

这位老师已经知道我与共产党有关系，在搞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党的宣传，如有必要，也要搞嘛。那有什么不好呢？”我说。

那时，若不是互相信任，我就不敢在刘本草先生面前说这种话。如果他们说我也是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便干掉我，那我也就完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先生和我有着格外亲密的关系，所以没有发生这类事情。

早在毓文中学时期，我和刘本草先生就亲密相处，毫无隔阂。我在吉林念书的时候，刘先生体贴我，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我和刘本草先生正在说话的时候，于司令走进了参谋部。他望着那些被抓来的青年说，又抓来了共产党，共产党不知什么时候在满洲养出了那么多崽子。说着他摇了摇头。

这时，刘本草先生赶紧给我递了个眼色，说，宣传队长快出去跟他们谈谈吧。朝鲜人不可能全是共产党，共产党员也不会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嘛。

于司令听了参谋长的话，大发雷霆，说：

“你说什么？他们搞暴动，抢土地，甚至把日本鬼子引进来。你

还敢说共产党不是日本鬼子的走狗？”

看来于司令对朝鲜人的偏见是盲目的，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他对共产主义者的误解也十分严重。

我决心无论如何要说服于司令，就不揣冒昧地冲他说：

“司令，你说共产党不好，是从书本上看到的，还是听人家说的？不然，你为什么说共产党员不好呢？”

“看什么书呀，我是听人家说的。有嘴的人都说共产党员不好，我也就认为他们不好。”

听了他的话，我不禁愕然，却又放心了。他不是通过亲身体验而得到的见解，而是听风闻产生的误解，我也就有信心把他改变过来。

“司令，您心无主见，盲目地听信人家的话，怎么能成大事呢？”

在我旁边的陈翰章和胡泽民都是共产主义者，参谋长也支持我们，于司令就等于被我们包围了。

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机会，便继续说服他：

“司令，干吗老杀那些青年呢？虽然不能马上给他们发枪，可是不妨给他们每人发一支长矛，让他们去当突击队，看看他们同日本鬼子打仗打得怎么样。如果他们打得好，那就再好不过了。何必白白杀死他们呢？”

于司令听了我的话，说：“嗯，这话也有道理。宣传队长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我走到那些被抓来的青年中间，写了张条子让他们偷偷传看。条子上写的大意是，除非被查出证据，你们决不要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搜身时被查出来的传单《告反日士兵书》，就说是在哪儿捡来的。当然，他们是无从知道这张条子是从哪儿来的。

我一出现在这些青年面前，他们都以愤怒的目光盯着我。看来，他们似乎在怀疑我是在于司令手下当帮凶的坏蛋。

我承受着他们充满敌意的目光，问他们说：

“你们当中有没有听说过金成柱这个名字的？”

我这一问，冰冷的紧张气氛被打破，场内响起了嗡嗡的议论声。有的回答说听说过，也有的青年说没听说过。

“我就是金成柱。现在我在于司令部队当宣传队长。

“于司令刚才要我了解一下你们愿不愿意同救国军联合起来共同战斗。愿意跟我们一起战斗的，请回答说‘愿意’。”

大家异口同声地大声说：“愿意！”

我去找于司令，照实汇报了青年们的表现，并提议说，我们是不是把他们收进来，让他们同日军打一仗。

于司令当即表示同意。于是那些青年的命运就按我们的要求决定了。

我们面前展现出了实现反日联合战线的更宽广的道路。

正当我们快到游击队合法化的门口的时候，在幕后操纵于司令的朝鲜人顾问却出来找麻烦了。他是属于金佐镇[14]派的老民族主义者，在南湖头种地，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他就参加了救国军。他有知识，头脑聪慧，深受于司令的信任。

这个人便是唆使于司令迫害共产主义者的谋士。他说，七八十个

人，连调查都不调查一下，就收进来，这可是轻率的举动，说不定他们当中还有亲日派呢。

不把这个人压下去，我们的活动就有可能又遇到严重的困难。

有一天，我向于司令低声问道：

“听说部队里有个朝鲜人，为什么藏起来，不让他出来呢？”

于司令说，怎么？你们还没见过面？于是指示一个部下把那个人喊了来。

这个人身材高大魁梧。

我先打招呼说：“认识认识吧，先生年纪大，经验丰富，我们年轻人不懂事，请您多多指教。”

他也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听说司令部新来了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朝鲜青年，当宣传队长，辅佐于司令，他作为一个朝鲜人感到非常高兴。

他竟然以朝鲜人的名义谈论民族，我便抓住这个机会，冲他说：

“既然这样，就应当多募集愿意反日的人才对，为什么老杀害他们呢？因为思想不同，就杀害，那还行吗？朝鲜人不能在祖国生活，这已是很不幸的事了；被赶到满洲，又被救国军抓去丧命。这岂不太冤枉了吗？不管是搞共产主义的，还是搞民族主义的，不要分什么主义，而要让他们都团结起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老是排斥和杀害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那个人留心地望着我，说宣传队长说得对。第二个障碍便这样被排除了。

于司令看到我们的谈话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满意地微笑了。

我向于司令说，您要是信得过我，宣传队长就让胡泽民兼任，让我用朝鲜人组织一支部队，当队长去打仗，不知可否？

刘本草先生支持我说，这话有理。

于司令问我说，如果用朝鲜人另组织一支部队的话，枪支怎么解决呀？

我回答说："枪支嘛，您就不必操心，我不会向司令伸手要。我们准备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部队。"

于司令听了我的回答，表示十分满意。

"那你就组织一支部队吧。不过，给了你们武器，将来你们把枪口掉转过来怎么办？"

"这一点，请您不要多心，决不会有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再说，即使掉过枪口，司令的强大部队还怕抵挡不了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兵吗？"

于司令挥挥手，哈哈大笑说，队长是不是把开玩笑当真了。

我怕一开始就说要从救国军分离出去，会惹怒于司令，便请他以司令的名义给部队起个名称。

在旁的刘本草先生说："那就叫别动队吧。我看叫朝鲜人别动队好些。"

于司令和我都赞同了刘本草先生的意见。

随着别动队的诞生，秘密游击队合法化的基础工作，就胜利结束了。我把安图的秘密游击队成员和被拘留在于司令部队的七八十个青年，都收进这支别动队里，实现了游击队的合法化。

我分别拉着陈翰章和胡泽民的手，走出了于司令的房间。我们连声说“胜利了!”、“特大成功!”，整夜漫步在城市周围。

胡泽民递给我一支香烟，叫我吸一口试试。他说，今天这样的喜庆日子，最好喝酒喝个醉，没有酒，就吸烟吸个醉也好。

我第一次把香烟叼在嘴上吸了一口，呛得我直打喷嚏，惹得胡泽民和陈翰章哈哈大笑，我也笑了。

“看你，连烟都不会吸，游击队长怎么当呀。”胡泽民开玩笑地说。

我回到小沙河一报告谈判成功的喜讯，那些蹲在人家后屋的同志一哄而起，把我抬在肩头上拥出了门，三呼万岁，让全村人都能听到。

被誉为名歌手的金日龙竟然唱起《阿里郎》来。在这样喜庆的日子，本应该唱轻快活泼的圆舞曲或雄浑有力的进行曲，一个钢铁般的男子汉金日龙却唱出了《阿里郎》这样的悲歌，只能说是反常的了。

金哲（金哲熙）摇着金日龙的胳膊问：

“日龙哥！这样喜庆的日子，你何必唱这种歌呀？”

“不知道，我也说不上怎么冲口唱出了《阿里郎》来。我们不是闯过了那么多的险关吗？”金日龙停止唱歌，泪汪汪地望着金哲说。

我听着他的话，肃穆之情油然而生。正如他说的，我们迎来这一天，经受了多少严峻的考验啊！可以说金日龙的一生就是这些考验的缩影。他曾辗转于朝鲜、满洲和滨海省，作为独立军搞过民族主义运动，也搞过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说是个风云人物。他在这一过程中，叹息过，也流过很多泪，经历了种种人间苦难。

《阿里郎》可以说是对他的一生的概括。在应该把叹息换成欢笑，

从挫折转入进攻的这一历史的岔路口，金日龙以《阿里郎》最终地回顾一下多难的过去，在青天下尽情唱出了新起点的喜悦。

那时，要是我们没有遇到刘本草先生，我们的命运、游击队的命运将会如何呢？我现在也常想起这事，默默地向已故的刘先生致谢。

在于司令部队里，对我们的谈判成功最感到高兴的，正是刘本草先生。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一直把我们送到军营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满怀激情地说，我们不再是敌人了，我们成了兄弟，成了友军，让我们狠狠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吧。

后来，当我听到先生去世的噩耗时，回忆起在安图城进行的难忘的谈判情景和毓文中学时期，我悲伤地流了泪。

由于同于司令的谈判取得了成功，我们实现了游击队的存在和活动的合法化，有了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同盟军。谈判的成功，还使我们有了这样一种信心，只要主张爱国家爱民族这个大义，就是同思想与信念互不相同的他国民族主义者也能形成统一战线，进行共同斗争。

我想，这一信心对我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很大影响。当出现需要团结那些思想和信念不同的民族主义者或生活经历复杂的资产阶级出身的各阶层人士的问题时，遇到犹豫不决或怀有偏见的干部，我就想起同于司令谈判的经验，开导他们度量要大。

我回到小沙河，向在汪清地区苦心做救国军工作的李光，详细地通报了同于司令进行的谈判内容和组织朝鲜人别动队的经过，并交给他要以安图的经验作参考，在汪清立即组织一支别动队的任务。

直到那时，李光仍在进行着地下活动。我向李光派去一个中队人

员，让他在那里组织别动队，从地下活动转为合法活动。

所谓别动队，就是指由朝鲜人组成的特殊部队。在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当中，在同救国军的关系上能够合法活动的，只有我们和李光他们。

那时，我们用别动队的名称，可以说是为保障我们游击队的合法活动，加强同救国军的联系，同他们形成反日联合战线而采取的一个策略措施。

组织了别动队之后，我们积极推进了扩大和改组这支部队，以便在短时间内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筹备工作。

确定队伍编制的工作，引起了许多争论。

那时，有些同志为游击队队伍里工人成分不多而非常担心。调查了一百多名入伍对象，大部分是学生出身和农民出身。有几个人为之一惊，表示忧虑说，工人成分少，这在组织革命军队方面，是不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会不会成为将来革命军变质的因素。

我真诚地开导了这些同志：工人阶级应该成为革命军队的主要组成成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的普遍原理，但是没有必要机械地运用这条原理。在我国居民中，农民占绝大多数，比起农民，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极少。但也不能因此就把建立游击队的工作推迟到工人阶级数量大大增加以后。在我国，农民和学生出身的人的革命觉悟和民族精神并不次于工人阶级。即便出身不同，只要是以工人阶级的思想去进行斗争就行。农民和学生出身的人多，并不成为革命军变质的因素。

在建立指挥体系方面，我们也没有把既成公式绝对化，而是根据

游击战争的特点和要求，本着执行口令的战斗人员多于喊口令的人的原则，组织队伍，确定编制。也就是说，使指挥体系高度简化。所以，部队里没有另设后勤部门和主管这项工作的指挥员，把所有的队员都培养得既会做饭洗衣，又会打仗，如有需要还能做政治工作。

那时，我们要是有了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这样的书，那该能得到多么好的启示啊。当时我们的水平很差，停留在只知道部队编制中的三三制是拿破仑创立的这种常识上。至于克劳塞维茨，只听说过他的名字。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我才第一次弄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必须简化指挥体系，多配备些战斗人员。他的这一主张，很容易地引起了我的共鸣。

反日人民游击队是以连为基本战斗单位组成的。我被选为队长兼政治委员。

游击队的军装是用栎树皮做的染料染成的绿色布缝制的。左胸前缝上五角形红布，上面写上连队番号。帽徽是红星，腿打白色绑腿。确定服装制度，可以说是游击队筹建工作的最后一道细节作业，我们以愉快的心情一个个解决了这些问题。

妇女会会员们根据我们认真讨论决定的服装制度,开始缝制军服。

那时，我母亲虽然缠绵病榻，却也同其他妇女会会员们一起，尽一切诚意裁衣，操作缝纫机。

1932年4月下旬,我们在安图召开了组织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最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最终审查了志愿入伍者，讨论了举行游击队成立

典礼的时间和场所，确定了当前的活动区域，采取了有关游击队活动的各项措施。

这次会议后，志愿入伍者先集合到三道白河入口处的刘家粉房(发财屯)，然后集结到小沙河。志愿入伍者有一百多名，至今我还记得名字的有：车光秀、朴勋、金日龙（小沙河）、赵德化（小沙河）、麻子（别名，小沙河）、赵明化（小沙河）、李明洙（小沙河）、金哲（金哲熙，兴隆村）、金凤九（兴隆村）、李英培（兴隆村）、郭〇〇（兴隆村）、李凤九（三人坊）、方仁铉（三人坊）、金钟焕、李学用（国内）、金东振（国内）、朴明孙（延吉）、安泰范（延吉）、韩昌勋（南满）等人。

1932年4月25日早晨，我们在土器店沟的台地上举行了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典礼。

在四周长着落叶松林的空地上，游击队员们个个穿上新制的军装，携带着武器，在空地的一边按分队整齐地列好队。从小沙河和兴隆村一带拥来的许多群众兴高采烈，谈笑风生。

我深情地望着他们生气勃勃、威风凛凛的面貌，眼前浮现出了种种往事。为建立这支武装队伍，我们的同志们走了多少路，开了多少次会议，作了多少次演说，爬过了多少高山峻岭。在这过程中，曾有过多少令人痛心的牺牲！反日人民游击队，是以许许多多同志可歌可泣的辛劳、浴血斗争和牺牲为代价换来的革命的宝贵产儿。

我恨不得把那些没有看到这一天便牺牲了的同志和已故的人都叫到这土器店沟台地来，我抱着这种心情，慷慨激昂地开始了讲话。

我一宣布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队员们就高呼万岁，人民群众也

都热烈鼓掌喝彩。

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战斗节日5月1日那天，我们反日人民游击队打着红旗进入安图县城，吹号敲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举行了阅兵式。

这天，被任命为反日人民游击队指挥员的金日龙，在部队行进中担任了领唱。

这天，不仅是市民，就连反日部队官兵也纷纷拥到街上来，竖起大拇指表示热烈欢迎，鼓掌祝贺。

武装示威结束，部队回到了土器店沟。这时，车光秀和金日龙跑到我家去，扶着我病中的母亲来了。

我看到的是母亲那被病魔折磨的面容、眉间的皱纹、头上的白发，然而母亲的眼睛却是笑眯眯的。她走近李英培，久久地抚摩着枪、子弹带和五角星，接着走到金哲、赵德化、金日龙、方仁铉、车光秀跟前，摸摸这支枪，又摸摸那支枪，拍拍这人的肩膀，又拍拍那人的肩膀，眼睛终于湿润了。

“真是好样的。有了我们的军队，这回可好啦。一定要打倒日本鬼子，光复祖国呀！”

母亲的声音哽咽了。母亲一定是把献给我们的一切至诚全置诸脑后，在缅怀着祈愿祖国光复而先走的我的父亲和那些爱国志士的辛劳吧。

后来，延吉、汪清、珲春、和龙等东满的其他地方，也陆续建立了游击队。金策、崔庸健、李红光、李东光等朝鲜坚贞的共产主义者在北满和南满也先后组织了游击部队，向敌人开了火。

1932年的春色，在抗日大战的枪声中越来越浓了。

第六章

考 验 的 年 代

时期：1932.5~1933.2

一　挺进南满

游击队活动合法化和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后，我们的同志深入讨论了如何迈出第一步的问题。

我们在县城举行了阅兵式后回到小沙河，安排队员分散住宿，每个农户住三四名，让他们休息几天，同时讨论了游击队的活动方向。这次的讨论，也和在卡伦和明月沟一样，争论得非常激烈。

看他们聚在一起争论的情景，真可以说个个都是雄辩家。

大家对游击战的看法各异，关于游击战术的主张和解释也各不相同。

这是个文化水平和生活经历各不相同、原属团体也不同的一百多青年组成的集体，他们的主张自然也难免各色各样。

他们的主张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小组论”。所谓小组论，是主张不要采用连、营、团、师这种老一套的部队编制，而要组成机动灵活的许多武装小组，不断地开展消耗战，来打败敌人。他们说，把游击队细分成三五人一组的几十、几百个小组，按照参谋部的统一作战计划，在各地开展活动，就能使日本帝国主义屈服。

这一主张的提倡者们说，以武装小组为基本战斗单位的游击战，

还可能创造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种新形式。

来自敦化和延吉的青年中，主张小组论的人特别多。这两个地方的青年，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最深。他们的思想方法里，还残存着这一路线的流毒。

车光秀对这种武装小组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它是布朗基主义的现代版。对车光秀的看法，我也有同感。

他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所以要回避大部队的全面武装对抗，组成几个人一伙的小组开展活动，像罗锡畴和姜宇奎那样，向敌人的头子投掷炸弹，火烧敌统治机构，处决亲日派、民族叛徒。这就是武装小组论的实质。

武装小组论，是披上了游击战外衣的恐怖主义的变种。

如果按着这一主张行事，实际上我们就等于放弃大部队游击战。这意味着在斗争方法上的后退。我们是不能容许这种后退的。

在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前后，由于我国爱国者的活动，在日本和中国发生了两起轰动一时的事件。一个是，李奉昌烈士在东京日本宫城樱田门前向日本天皇乘坐的双头马车投掷炸弹的义举；另一个是，同年4月29日，尹奉吉烈士在上海虹口公园投掷炸弹的事件。由于投掷的炸弹没有命中，李奉昌没有达到炸死日本天皇的目的；而尹奉吉则取得了成功，当场炸死了前来虹口公园参加庆祝日本天皇诞辰典礼的驻沪日军司令官白川大将、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和日本在沪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还使日本驻中国公使、第9师师长、海军大将等军政要员多人受重伤，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震动。

李奉昌向日本天皇的行列投掷炸弹被捕后的第二天，即1932年1月9日，中国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以特大字号报道说，“韩人李奉昌狙击日本天皇不幸不中”，其他许多报纸也都以头条新闻，广泛介绍了李奉昌的义举。这条报道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以致当地的日军和警察，袭击、破坏了《民国日报》社。用过“不幸”这个字眼的各报社，也都被勒令停刊封闭。

对尹奉吉的义举，朝中两国人民一致给以极大的赞许。上海虹口公园事件发生后，中国的社会名流接连请求与这一事件的组织者和幕后操纵者金九会面。连那些对日本的侵略采取投降主义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头头们，也为朝鲜民族坚强的抵抗精神和英勇精神所感动，答应从经济上资助旅中朝鲜人了。

李奉昌和尹奉吉都是金九的部下，是金九主持的韩人爱国团的成员。韩人爱国团的抗日斗争方法，是恐怖活动。

继李奉昌和尹奉吉的义举后，接着在大连发生了金九派去的爱国团团员以暗杀关东军司令官未遂的嫌疑被捕的事件。他们是计划利用日本军政要员到大连站迎接从奉天来大连的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机会，暗杀关东军司令官、满铁总裁和新任外事部长等人的。金九甚至还计划派人处决朝鲜总督。

击毙伊藤博文的安重根，被推崇为民族英雄；李奉昌、尹奉吉的义举，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在国内，而且在美洲、滨海省、满洲等地的侨胞社会也为之沸腾。适应这种时代空气，恐怖主义迷住了充满敌忾的许多朝鲜青年。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了武装小组论这类主

张，甚至把它提到确定反日人民游击队活动方向的会上来宣扬，是不足为奇的。武装小组论的提倡者们极力主张，只要在朝鲜、日本、中国各地，连续发生像尹奉吉那样的义举，那么，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堡垒就会发生动摇。

第二类，是“立即转入全面武装进攻”的主张。金日龙等人对武装小组论感兴趣，而朴勋、金哲（金哲熙）等人则迷恋于立即转入全面武装对抗的论调。朴勋只见过在大城市几千几万正规军和暴动群众喊声连天的混战场面，所以他看不起武装小组论，固执地主张必须立即转入全面的武装进攻，这倒还有情可原；但是入赘做婿的、性情温顺的金哲，却与自己的性情不协调地大发议论，力主一开始就应该大张旗鼓地干。这就叫人感到稀罕了。

主张立即转入全面武装进攻的人们，也都有一定的论据。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霸占满洲的目的，还占领了上海等中国关内的许多要冲。在东北三省出现了名为“满洲国”的傀儡国家。下一个目标是哪里？那当然是中国关内和苏联。目前，日本军队虽然在观望局势的发展，减慢了进攻速度，但他们一定会制造借口来进攻中国关内、进攻苏联，这是洞若观火的。因此，现在用已建立的武装部队开展全面的军事作战，就等于给深陷战争泥坑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后脑勺以重重的一棒。我们游击队采取积极的进攻态势，是时代的命令……这便是他们的论据。

金日龙只用“要看被子长短伸腿”的俗语简单地驳斥了这种急进的主张。实际上，那是根本没有考虑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准备程度的盲

目的只凭主观想象的主张。

当然，我们在卡伦提出的武装斗争路线，是预计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全面武装对抗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将是有组织的、全面的武装对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刚迈出第一步的游击队，毫无自身准备地一开头就走这条路，那就无异于自杀了。

除此而外，还有一种论调。那就是以“知敌知己，百战百胜；不知敌我，百战百败”这一道理为幌子的“慎重论”。

慎重论的提倡者们说，我们的对手是强敌，而我们自己呢？不论在数量上或在质量上，都不过是刚刚出土的幼芽；当然我们将强大起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还是应该隐秘地进行活动，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坚持不懈地培养实力。我们的斗争是长期性的，所以要耐心地积蓄力量，看准敌人削弱的机会，一举打垮敌人。

这一见解遭到了人们的非难，说这种“慎重论”是不冷不热的、无法估量时间的、渺茫的东西。

这种论争并不是在小沙河才头一次出现的。在孤榆树组织革命军的时候，在卡伦确定武装斗争路线的时候，在明月沟会议上通过关于有组织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的时候，都曾进行过类似的论争。因此，除了很早就和我们一起过组织生活的以外，其他同志就很难充分领会我们的意图。

在队伍内就重要的路线问题出现如此互不相同的意见，可以说是一个如实地说明反日人民游击队还处在幼年期的很好的事例。我们的部队，是由来自不同地点和组织，职业、文化水平各不相同的青年组

成的。他们有些是定期阅读《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报刊和中学讲义等教材提高了水平的；有些是读了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和崔曙海的《出走记》等小说，抱着改造社会的理想参加游击队的；还有些是从没有迈过学校门坎，在赤卫队或少年先锋队等革命组织经过几年的政治锻炼后，得到一支枪参加了武装队伍的。因此，他们对事物的理解水平，自然就有差别了。

这种情况，要求我们为了在部队内保证思想上的唯一性、行动上的一致性和习惯上的统一性，必须特别注意做好组织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为此首先就要采取措施，统一对游击队的战术原则和重要路线的认识，不经过这道程序，刚诞生的反日人民游击队，有迈出第一步就搁浅的危险。

我和车光秀一起到每个村去，向不大理解我们的战术意图的同志们说：

“武装小组论，是想重蹈安重根的老路的思想。想用恐怖活动使日本帝国主义屈服，是一种妄想。伊藤博文死了，可是日本的统治仍然存在，而且还制造了个‘满洲国’，甚至把魔爪伸到中国关内。根据情况，反日人民游击队有时可能开展小组活动，但小组不应该是基本战斗单位。

“主张立即转入全面武装进攻的论调，也是不现实的。一百多人的部队同日本的几十、几百万大军正面交锋，这简直是荒谬绝伦。如果以为能用一百人的冲锋战压服几十万大军，那该是多么轻率的判断啊。同志们，你们千万不要低估敌人。

“那么，该怎么办呢？暂时要以连队为基本单位展开游击战。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活动，是成不了气候的。将来部队扩大了，也可以以更大的单位开展活动，可是目前，还是以连队为单位开展活动最为理想。不可能一开始就组成大部队，这一点你们不是也清楚吗。抗日战争，不可能是以几场战斗结束的短期战。因此，首先要从小股力量开始，然后在战斗过程中不断积蓄和扩大武装力量，到时候，就同全民武装起义配合起来进行决战，争取最后胜利。我们要以轻便的武装，机动灵活地运动，使集中的敌人分散，再各个击破，避大吞小，要用这种方法，始终掌握战略战术上的优势，以不断的消耗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游击战，游击战的妙处就在这里。主张不打仗而悄悄地积蓄力量，到时候一举消灭敌人的慎重论者同志们，你们以为没有斗争和牺牲，不流血，时机也会自行到来吗？你们要记住，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取得独立的机会。这种机会，要由我们自己用斗争来争取。”

我就这样使队员们领会了我们的意图。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队员都能立刻理解我的话。也有些青年不收回自己的主张，固执己见。

我认为，只有斗争实践，才能给这个各持己见的论争作出结论，判明真理在哪一边。我为确定游击队的活动方向，不惜花费时间进行研究。

当时，我们踏上了抗日战争征途的部队，面临着下列几项任务：

第一，要在实践斗争中锻炼反日人民游击队；第二，要从质量和

数量上迅速扩大和加强部队；第三，要牢固地奠定革命军队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把各阶层广大群众团结在游击队的周围。

我们认为，远征南满，是完成上述任务的突破口，便把它规定为1932年的主要战略任务。

我们在安图建立的武装部队，有着不同于在其他县和区建立的武装部队的特点。其他县的游击队，是由该县的青年组成的，而安图游击队是由东满和南满各县选拔的先进分子和来自国内的先觉组成的。其他地方的游击队以在本地进行活动为原则，我们的部队则不把活动范围局限于一两个地方，而以在白头山地区和鸭绿江、豆满江沿岸整片地区进行活动为原则。

从地域上看，安图是非常有利于打游击战的地方，可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里。我们的刚刚破土而出的游击队，需要到广阔的大地，在风雨中培养茎干枝叶，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对那些急躁冒进行为，需要警惕，而对那些只顾保存自己，原地踏步，虚度岁月的思想和行为，也是不能容许的。

这就是我们把远征南满定为反日人民游击队活动开端的重要理由之一。

当前远征南满的主要目的，是同在鸭绿江沿岸进行活动的独立军部队取得联系。南满的通化地区驻扎着梁世凤司令指挥的独立军部队，我们要同他们结成联合战线。

梁世凤管辖的独立军，有几百人之多。这支部队也叫朝鲜革命军。

我们在安图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时候，正是梁世凤同唐聚伍的

自卫军合作，胜利地打击日军和伪满军的时期。这个捷报传到小沙河山沟，使我们感到高兴。

朴勋摇着头说，梁世凤是反共思想渗入骨髓的国民府系统的民族主义者，怎么会甘心同共产主义者合作。可是我对他说，我们同中国救国军也结成了联合战线，有着抗日这个共同方针的同一血统的人，有什么理由不能携起手来呢！应当千方百计实现同独立军部队的联合战线。

我之所以认为同梁世凤的合作有成功的可能，是因为梁世凤和我父亲有着深厚的交情，过去又很爱护我，我很重视这种过去的情谊和人际关系。我小时候就听说过，金时雨和梁世凤同我父亲在桦甸结拜为义兄弟，还照了相。梁世凤和我父亲的交情是不同一般的。如果没有这种关系，他是不会替我给华成义塾写介绍信的，也不会每到吉林都去毓文中学看我，给我些钱的。当时，我为了凑学费，分文必省，连人家常吃的烧饼都没买过一个，他给的钱帮了我很大的忙。

旺清门事件后，由于我对国民府感到幻灭，同梁世凤的关系自然也就疏远了，可是我对他的感激之情丝毫没有变。

建立了游击队，苦于找出路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梁世凤去，这并不是偶然的。结成统一战线当然是主要的，可是我还有一个殷切的愿望,那就是很想得到有多年实战经验的梁世凤的指教和鼓励。

比起还没有尝过炮火滋味，只沉浸于出征喜悦的我们来，梁世凤司令堪称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了。我们曾在民族运动者们面前，多次表明决心说，我们决不按照独立军的方法去打仗，这是说我们决不重蹈

他们不依靠人民力量的覆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视他们的军事经验和技术。

在旺清门体验国民府的白色恐怖时，我曾噙着血泪决心再也不跟那些独立军老头儿们来往了。但是我们为了解放民族的共同大业，决定不咎既往。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合作。

在南满，除了梁世凤的部队外，还有由李红光、李东光等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李红光在1932年5月组织的游击队，亦称磐石工农义勇军。这支部队后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

李红光之所以成为著名人物，当然同他非凡的智谋和军事艺术、老练地指挥部队有关，可是关东军和伪满的一些报刊，把他误说成是“女将军”，也是一个原因。

李红光被成为“女将军”，是个令人发笑的喜剧性故事。李红光在结束东兴袭击战回驻地后，选一个女游击队员审问俘虏。这位女队员在审问前，自我介绍说：“我是李红光。”然后要俘虏招供警察兵力的部署情况和“讨伐”计划等等。

这些俘虏被释放回去后就说“李红光是个20岁左右的美人”。于是，李红光是女将军这个传闻就在日军部队里传开了。

李红光通过武装斗争充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机智和胆量，而李东光则在党的建设和实现群众的意识化和组织化方面，显示了突出的本领，他是一位优秀的政工干部。他的名字，早在20年代后半期起，就在东满地区广为传扬。

跟我谈过李东光的是金俊、徐哲和宋茂璇。李东光在龙井东兴中学读书时，就作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崭露头角。李东光在龙井与第一次间岛共产党事件牵连被捕后越狱的消息，我是在吉林听到的。

1930年夏，我在哈尔滨同徐哲同志见过面。他在谈话中顺带着说李东光认识我。他说，李东光曾对他说，安昌浩到吉林发表演讲时见过我，后来在五里河子举行磐石地区农民代表会议时又见过我。我对徐哲同志说，见到李东光，要把我们的斗争战略告诉他，还要转告我的话：我们总有一天会见面互相认识，在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

后来李东光历任南满特委书记、东南满省委组织部长，我们在准备远征南满的时候，他在磐石县任区委书记。

在南满地区也和东满一样，朝鲜共产主义者是抗日武装力量的骨干。

我们打算到了南满就同李东光他们取得联系。我认为，还处在幼年期的部队，互相交流经验，共同摸索斗争对策，是有利于发展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实际上，我们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是在同南满地区的游击部队的紧密联系下展开活动的。在这一过程中，我同李红光、李东光、杨靖宇等同志建立了割不断的密切关系。

柳河、兴京、磐石等南满地区，有很多我们的组织。我们在满洲中部一带进行活动的时候，曾派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许多优秀干部到这些地区去进行组织工作。崔昌杰和金园宇也派到那里去了。可是，他们努力建立起来的许多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我们挺进到南满，就会为恢复这些组织、给士气消沉的革命者灌注活力，打开有利的局面。

有些历史学家写得好像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后，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一帆风顺的，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也没有经过任何挫折似的。革命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从把刚建立的游击队的首次活动定为远征南满，直到付诸实践，我心理上确实有过许多苦楚和曲折。

1932年5月，我们在区党委所在的金正龙家，召开在东满各县进行活动的党及共青领导骨干参加的会议，讨论了远征南满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我提出的远征南满的方案，得到了全体与会者一致的支持。在部队内，分成两三派进行过激烈争论的青年们，也都欣然接受了这个远征方针。

有一天，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远征，被任命为部队参谋长的车光秀忽然来找我，表情严肃地说：

“队长同志，既然我们决定远征，那就在几天内早早离开这个小沙河好不好？离这儿不远有公路，敌人的运输队不时来往，我看有点不妙；再说，口粮也很困难，小沙河只有四十来家农户，我们一百多人聚在这里吃，尽管这里的人心地宽厚，还是承受不了这个重担的。”

这里开春以来闹饥荒，甚至举行过春荒暴动，口粮情况，他不说，我也很清楚。

但是，因为敌人运输队来往频繁，所以应该早点离开小沙河，这种想法，我不能同意。

我听了车光秀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安图的建议后，对他说：

“参谋长同志，既然我们拿起了枪杆子，是不是先打一仗？”

“你是说要打仗？”

“对，既然组织了部队，就应该开始打仗嘛。敌人在我们鼻子跟前来来去去，我们却坐在一边袖手旁观，这有什么意思？到时候走还是要走的，先在安图放一枪看看，不打仗，说不上锻炼队员。打得好，说不定还能解决远征需要的物资哪!”

车光秀爽快地表示同意。当天，他就带着朴勋到公路上侦察了地形，为的是确定宜于打埋伏的地点。他们提出了一个战斗方案，埋伏在小营子岭路口处，突袭路过的运输队。他们的建议，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我认为，在游击队的战斗形式中，埋伏战是最适宜、最普遍的形式。

小营子岭位于由安图到明月沟的中间地点，是由大甸子去大沙河的近路，离小沙河的直线距离大约有40多里。山势并不险峻，可是沿着山沟有条曲曲弯弯的大车路，很适于打埋伏。敌人就是利用这条路给安图地区的兵力补给军用物资的。

恰巧，这时地方组织送来一份情报，说伪满军大车运输队载着武器和后勤物资，离明月沟向安图方向出发了。我带领预定远征南满的队员，以神速的夜行军到达小营子岭，部署他们埋伏在路口两旁。

夜间打埋伏战，本来不能说是合理的战法。夜里分不清敌我，打埋伏战，不如打突袭战有效。在抗日战争整个期间，我们在夜间打埋伏战的事例并不多。

当时我们刚刚踏上陌生的征途，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幸亏，那天明月当空，照得通亮，避免了自相混战。

夜已很深，敌人的运输队才来到小营子岭。埋伏在100米前方的第一梯队队员们，打来了敌人出现的信号。敌运输队是以12辆大车组成的。

我非常紧张和兴奋，以至能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那时，我切实地体验到，不论是什么事，首次碰到，就会产生很大的冲动，感到不安和畏惧。我回头看了一眼趴在身旁的朴勋，他好像也相当紧张。他是黄埔军校毕业，又闻过硝烟味，尚且如此，其他队员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第一个埋伏组把敌人放过去，当敌人车队的约一半走进第二埋伏组火力圈的时候，我跳上岩石，举起手枪打响了第一枪。霎时，枪声、喊声震撼山谷。我们的部队胳臂上都缠了一条白毛巾，所以容易识别敌我；可是遭到突袭的敌人却分不清敌我，盲目地乱放枪。十多个敌人依托大车顽抗。我想，再拖时间，情况会对我们不利。

我们继续射击了十来分钟，随即转入冲锋，一口气结束了战斗。敌人死伤十多人，其余十多人弃械投降，做了俘虏。俘虏都是伪满军，只有一个日本鬼子下士。

我对投降的敌人作了简短的反日演说。

那天晚上，我们用10辆大车载着战利品回到了木条屯。我们缴获了步枪17支、手枪1支和100多人够吃一个来月的面粉，还有许多布匹、军鞋。作为首战的战利品，这是很可观的。

深夜12点多，我们在院子里燃起篝火，围坐在篝火旁，喝了用缴

获的面粉做的片儿汤。可以说是庆祝首战报捷的朴素庆宴。

我喝片儿汤的时候，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息下来。我们不仅吃得香，心情也非常愉快。这天晚上感受的首捷的喜悦和极大的兴奋，60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忆犹新。

车光秀从近视眼镜下流着眼泪望着篝火。他忽然握住我的手，声音嘶哑地说：

“我说，成柱！经过这一战，我觉得打仗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就是参谋长对首战的感想。

我的感想归纳起来，也和他一样。打仗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要有枪，有胆量，谁都能打。敌人决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强大的。看吧，他们不是举手向我们投降了吗！我们要满怀信心，准备打大仗。我们有把握打赢，我们能够胜利。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这样的时候，如果金赫在场，该多好啊！要是他在，一定会写出很多好诗来。你这人呐，怎么这么早就去了呢！金赫、信汉、利甲、济宇、孔荣……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车光秀自言自语地诉说着，用手揩了揩流在脸颊上的泪水。他在怀念没有看到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诞生就离开了我们队伍的同志们。

我也缅怀为奠定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基石献出了生命的同志们。没有看到这一天就牺牲了的战友们的面容，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要是他们都活着，我们的队伍该多么强大啊！

车光秀摘下眼镜，站在篝火旁，打着手势开始演说：

“同志们，我们迈出了第一步。我们争取到了首次胜利。是谁干的呢？正是我们大家！”

他张开双臂，作了个把队员都拥抱在怀里的姿势。

“拿起了枪，就要打，打了，就要胜利。不是吗？今晚，我们消灭了一个大车运输队，不过这是一件小事，但它却是我们伟大事业的开端。就是说，一条小溪离开深山幽谷，开始流向茫茫大海了。”

我头一次看到车光秀如此兴奋。

那天晚上，他作了很好的演说。他的演说，比我现在凭记忆写的要生动得多，更富有号召力。很遗憾，我不能把他的演说如实地复述出来。

“同志们，打起来有多么好啊。我们有了枪，有了粮食，又有了被服和鞋……今天晚上，我学到了伟大而深奥的辩证法。我们要把缴获的枪支分发给大家。让我们用这些枪再去消灭敌人吧。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枪、更多的口粮，还可以有机枪和大炮。用缴获的粮食装满米袋吧！吃着这些粮食，大踏步地行进吧。直到完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那天为止，我们要像今天这样向敌人要武器，要粮食。这不就是我们的生存方式，斗争方式吗。”

他的演说一结束，我最先鼓掌。全场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回答了他的演说。

接着不知是谁站起来，唱起了歌。记不得是赵德化还是朴勋了，唱得那么动听。

我们就这样满怀信心地迈出了第一步。

二　最后的容貌

我们部队加紧做远征的准备。有一天，哲柱弟为见我，来到小沙河。当时，反日人民游击队在小营子岭袭击了日本指导官率领的伪满军运输队的消息，越过安图境界传到敦化、延吉地区。这一场胜仗成了到处谈论的话题。松江、大甸子、柳树河子的革命组织，为了解小营子岭战斗的实况，派人来到小沙河。

起初我以为弟弟也是为那事来的，没有怎么介意。

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他对小营子岭埋伏战连一句也没有打听，只是默默地看队员们的制式训练，又到指挥部隔壁的房间，帮着准备远征的队员打草鞋，直到晚上。草鞋是指挥部指定的远征备用品之一。

这时，我猜想，哲柱来小沙河，可能是为了帮助远征队做准备工作。我去村里见农民组织负责人回来时，已经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哲柱正等着我。他对我说，他要回家去了。

我对他说，既然来了，就一起吃顿晚饭再走吧，可是他执意要走。弟弟好像有话要说，可又不说出来，只是以异常的表情，不安地观察我的颜色。

于是，我直感到，他来小沙河不是为帮助远征的队员做准备的，而是另有缘由。如果是必须告诉我的事，那就是，不是关于母亲的，

就是他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有到指挥部去，陪着哲柱走到村口，直截了当地问他：

“是不是土器店沟发生了什么事？”

我说的土器店沟，就是指的家。不知为何，我有点怕说出家这个词。

“没有，什么也没有。”

哲柱回答着，勉强装出了笑容。他很会演戏，而且很幽默，所以他满可以做出笑容骗过我的。可是，我看出他的笑里藏着悲哀，而且面容很快变了形。他尽量不正面看我的脸，视线越过我的肩头，凝视着遥远的天空。

“发生了什么事，就痛快地说吧。你不说，就那么走掉，难道我不会担心吗？别吞吞吐吐的，快说吧。”

哲柱长叹了一口气，勉强开了口：

“妈妈的病势好像又重了些。两天了，一点米粒都没沾口。”

弟弟这句话像一声霹雳冲击了我的耳鼓。我一听母亲不进饮食，顿时头一阵昏晕。母亲近来常闹病，我是知道的。

我们住在八道沟的时候，母亲很少闹病。可是，到了抚松，父亲去世，我到吉林市上中学以后，母亲时常受疾病折磨。哲柱有时来信告诉我这些事。

起初，我接到那些信，猜想母亲会不会是得了地方病。抚松地方的人有很多患地方病的。据说得了这种病，手会钩曲，手指骨节变粗，还生喉病，丧失劳动能力不说，生命也过不了30年。父亲去世后，吴

东振曾到抚松劝我母亲搬到吉林市去，他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不叫母亲受这地方病的害。

那时，我放假后回家，看见母亲不是得了地方病，而是因过度劳累而病倒的。我想到母亲一辈子都过着无休止的劳苦生活，过度的劳累终于损害了她的健康，心中禁不住难过。但因为不是可怕的地方病，多少放了点心。

母亲到安图后，因为心口疼，受尽折磨。那时候，把心口疼叫做“瘕”。母亲自诉，心口好像有一大块东西直往上顶。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胃癌。

医生们下诊断是“瘕”，但没法子治。母亲的病百药无效。一犯病，就躺下，禁食或喝几口稀米汤，这就是唯一的治病方法。

为了给我母亲治病，我的朋友们从各方面做了努力。凡是搞共青工作的我的朋友，都给我母亲送来了药。看到报上登的广告，凡估计对治母亲的病有益的，就不管它价钱多少，买了打邮包寄来。吉林、沈阳、哈尔滨、龙井等地都有这种邮包寄来。

安图地区的中医师也为给我母亲治病，不辞辛苦。大沙河的中医给我母亲治病还不收费。

我看着哲柱充血的眼睛和忧郁的表情，意识到母亲的病情十分严重。我问弟弟，家里有没有粮，他说米缸已经见底了。

第二天，我拿同志们给我的钱在小沙河买了一斗小米朝土器店沟出发了。我估计一斗米，三口人（母亲、哲柱、英柱）能吃一个月，再说，有一个月时间，我们也可以从南满回来。

一斗粮约有15公斤，拿那时我家的情况来说，连粥都饥一顿饱一顿的，有了这些粮食算是了不起了，简直够办一桩喜事了。

可是，我觉得这点粮食太少了。挎在肩上的带子虽然把肩膀勒得挺疼，我却不觉得它重，要和母亲给予我的爱相比，它实在是轻如鸿毛。

过去，我从父亲那里听到了十三道倡义队长李麟永的故事。这个人被推举为十三道倡义队长的过程，确实是戏剧性的，而且值得后人从中吸取教训。当关东（朝鲜东部）义兵长们为推举他做义兵部队的领导人而去找他时，他正在护理弥留的老父亲。那时，李麟永说，义兵可以由别人来指挥，可是父母一去就不能再见，我怎能丢下不知何时瞑目的老父，离家而去？我不想成为不孝之子。于是他推辞了他们的请求。直到第四天，才不得已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全国的义兵都争先恐后地投到李麟永的麾下，人数达到8 000之多。不久，许　，李康年的部队也来汇合，倡义军由8 000增至1万名。用小铳武装起来的3 000名旧韩国军也投来了。

全国义兵长们把李麟永推戴为十三道倡义队长，在他的指挥下向汉城挺进。义兵的最终目的，就是打进汉城一举推翻统监府，废除保护条约。

按照这个作战计划，义兵部队正一步步逼近汉城时，李麟永因老父去世，把指挥一事交给了别人，自己赶回老家奔丧去了。他的回乡和先遣队许　吃败仗的消息，使义兵士气大伤，进而招致了部队瓦解的悲惨局面。

我在搞学生运动的时候，在吉林，同留吉学友会的成员就李麟永因父丧回乡的问题进行过争论。

那时，有很多同学非难李麟永，说他是没有灵魂的义兵长。他们气愤地说，身为统率一万大军的义兵队长，面临进攻汉城这样的大事，竟为父丧回乡，那叫什么男子汉，算什么爱国者。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非难李麟永。也有几个人袒护他。他们说，因父丧回家治丧，是应该的、很自然的，还把他捧为孝子。

现在，我们把忠于国家，孝敬父母的人称为孝子，可是，那时，只要为父母尽孝，就称为孝子。

我反驳说，李麟永的行动不能成为真正的孝子的典范。

“要同样地爱国爱家，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孝子。只重视家庭，忽视国难的人，怎么能称为孝子呢！现在，应该改变对孝道的儒教式的价值观了。如果李麟永尽到自己的责任，达到目的后，再到父亲的墓前祭奠叩拜，那么，他的名字就会在后代面前大放光彩的。”

这是向那些封建道德和儒教式孝道观渗入骨髓的人们掷去的炮弹一般的宣言。

留吉学友会成员分成两拨，有的说，成柱的话有参考价值；有的说，没有参考价值，争论很尖锐。

对现在我们的社劳青盟员和少年团员来说，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可争论的简单而又明白的问题。但是，在那时，却是一个很难断定哪个对、哪个不对的相当困难的问题。全国人民都一致地认识到又爱祖国，又爱家庭，才算是真正的孝道，并把它当做一种信念，这是经过几十

年的历史和血泪斑斑的体验才形成的。

我在背着粮袋回家的路上，重新想起了李麟永的这个故事。不知怎么，我又觉得那个倡义队长的做法好像是对的。从过去众人异口同声地责难为没有灵魂的义兵长的行为里，我多少发现了一点点情理，在心里有一点点同情他，对他有了一点点理解，这不能不说是奇怪的事。

一个人因为要干革命，就忘掉家庭，那是很难的，也是不可能的。革命也是为了人，革命者怎么能无视家庭，对父母妻子的命运漠不关心呢。我们一向认为家庭的幸福和国家的命运是系在同一个脉络上的。国家处于逆境，家庭也不得安宁；家庭蒙上阴影，国家的景况也会晦暗。这就是我们一贯的主张。正因为我们持有这样的信念，才为了救出一个战士的家属，毫不踌躇地向敌后派去一个团的兵力，这是战争史上没有前例的。这是只有朝鲜的共产主义者才能信守的情义和道德。

初期，我为忠于这种道德尽了努力。出狱后，把活动舞台转移到东满，以敦化和安图为中心来往于各地，这时我时常回家看望，常给母亲带些药去。

不料，我这样做，倒惹母亲生气了。她见我频繁回家，有一次把我叫到跟前告诫说：

“你要干革命，就要专心致志地干革命；你要在家过日子，就要专心过日子。必须选择一样。依我看，家里有哲柱，我们能靠自己过日子。你不用为家操心，最好一心扑在革命上。”

我听了母亲这一席话，以后就减少了回家的次数。自从组织了反

日人民游击队后，我几乎没有回过家。

对此，我很后悔。即使母亲是那样告诫我，我仍然应该尽到做儿子的道义。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心痛。对家庭、对国家都至精至诚，这决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离土器店沟越近，我的步子就越快。可是，心却越来越沉重。想到要去见病危的母亲，不禁有些心慌。

泥塘里，芦苇已经长得挺高，随风摇曳。本来这里因为芦苇多，叫芦苇村，几年前住在下村的金秉一开始烧土器卖，使这个偏僻的深山沟大有改变，因此便改叫土器店沟了。

我走过独木桥，向上村走去。眼熟的茅草屋映入眼帘。胡枝子篱笆歪歪斜斜，屋顶的苫草多年失修，很像久不住人的破屋，那就是几年未经男子汉的手修缮的我的家。

我刚打开栅门，还没进院子，房门突然打开了。

“妈妈!”

我大声叫着，向倚着门框坐着、现出笑容的母亲急步走过去。

“我说呢，脚步声好耳熟嘛。”

母亲手摸着卸在廊台上的粮袋子的背带，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心里怕她责怪我老回家，幸好母亲没说什么。

母亲和我互相问着别后的情况。我和母亲说着话，时时留神她的音容和神态，想估摸出她的病情。从外表上看，她和去冬差不多，但可以看出气力已经大减。胸脯也塌了，脖子也细了，鬓角也出现了丝丝白发。我禁不住悲伤地想，那无情的岁月竟这样过早地在母亲脸上

留下了令人不禁泪下的痕迹。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漫无边际地谈着：日本军队打到哪里了，游击队今后要怎样行动，和梁世凤先生将怎样携手，在根据地应该做些什么……母子俩一直谈到了午夜。

母亲老是把话题转到政治问题上去。一提到家里的生活和她的病，母亲就敷衍一两句，把话题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使我不得不随着她的意思说话。

我断定，母亲在对我隐瞒自己的病情，这意味着她的病已经很重。我的第六感官告诉我，母亲将不久于人世了。这使我心里一阵颤栗，脊梁骨像泼了冷水一样，眼泪直往肚里流。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做早饭吃，饭后和哲柱弟一道上山去打柴。家里的柴禾也只有一两捆。我心想，借回家的机会，多打些柴禾，也许心情会轻松一些。

心里倒是很想多砍些柴，使它能烧几个月，可是山不高，沟不深，枯木也没有，只能砍些灌木。

“哲柱，除了这些，没有更禁烧的吗？”

弟弟见我问他，往上提着土布短裤，回答说：

“不管是什么柴禾，砍上一背架就回去吧。妈知道了又该说你了。”

看他外表像不懂事，可心里挺明白。他一面砍柴，一面老是不放心地往村子那边望。

看他那样子，是在担心妈知道了我们背着她出来打柴。他也知道，妈知道了我为家里的事操心，就不高兴。我一手抓住树枝迅速地挥着

镰刀砍起来。

日暮时分，我们才背着柴禾下山。刚走到可以望见芦苇塘的拐角，只见母亲站在院子的一角在等候我们。

我拄着支棍下山，老是沉浸在冥想之中。想到要留下病重的母亲去远征，就感到心如刀绞，眼前漆黑。我们虽然把远征的期限定为一两个月，可是，在这一两个月里，我的命运会怎么样，部队的前程会怎么样，这是谁也不能预测的。

我又想，像从前那样，再搞几年地下斗争怎么样呢？如果这样做，我就可以每几个月回家一次，商量家里的事，安慰母亲。是不是这样做才是我做儿子的对一辈子受苦受难的母亲，对内心经受了非同一般的痛苦的母亲应尽的道义呢？祖母刚回家乡没多久，我又离开安图，母亲该多么孤单，她病弱的身体怎么能挺得住！可是，又不能为我个人的家庭问题，取消已经定在游击队一年活动方针里的远征南满的计划。

“嗨，住在这山里还怕没柴烧吗？”

站在栅门边等我们的母亲不高兴地说。

我以笑来代替了回答，擦着汗望着母亲。

“我看你有点变了。在抚松的时候还没那样，在兴隆村倒也没感觉到，你近来怎么越来越为家里操心了呢。”

母亲的声音有些嘶哑。

“隔了好久又闻到野草味，心里怪爽快的。”

我装着没听见母亲的话，若无其事地走进了院子。

那天晚上，我家四口人围坐在饭桌边，这是难得的事。碟子里还放着烤　鱼，那烤　鱼是别有风味的。我问这是哪里来的，母亲告诉我，是小弟弟怕我来了没菜给我吃，钓了一些　鱼挂在房檐下风干的。那烤　鱼有手指头一般大，放了一碟，我吃着虽然好吃，却难咽下去，剩了几条。

小弟弟睡熟后，母亲欠起斜靠在墙上的上半身，严肃地对我说：

“我看，你不像从前了，有些变了。我可没想到你会背着粮袋来奉养妈。当然你是为我这个生病的妈担心，倒是应该感谢你至诚的孝心。可是，妈不是以此感到安慰的人。在抚松的时候，为了扩大妇女会组织，拉着你的手爬越险山峻岭，难道是为了得到今天这样的安慰吗？还有更大的事等你去做。你应该遵循你父亲的遗嘱。处境还不如我的朝鲜人多得很。不要惦着我，快走你该走的路吧。”

母亲的话充满激情，声音微微发颤。

当我抬起头时，看到母亲咬着嘴唇，说不下去了。母亲的那几句凝聚着她的人生观的话语，像暴风一样震动了我的灵魂，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这是贵如千金的瞬间。

母亲缓了缓气，接着说：

“拿打柴的事来说吧。你若是个没事干的人，那倒也可以……你就当这世上没有妈，没有弟弟，不要再惦记家。你离开家，把革命工作搞好，那我的病也许会好起来的。所以，你要带领部队快些出发。这就是我的心愿。”

我马上回答：

“我一定铭记母亲的话。今晚在家过，明天就到小沙河去，带领部队立刻向南满梁世凤先生那里出发。”

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只好把头转向墙角。母亲心里也难过，把放在角落里的针线篓拿了过去，开始给我的军服上衣缀扣子。

不知为什么，这时候我的眼前突然浮现了我父亲葬礼上的各种情景。

那时，母亲没有穿丧服，也没有到坟墓上去。只给我们三兄弟穿上丧服，去行葬礼。吴东振、张哲镐、梁世凤等人为首的独立军，还有我叔叔，数十人跟到墓地去，但我母亲没有去。

父亲去世不久，到了端午节，那时我们缠着母亲要她一起到父亲的坟地去。

母亲却说，我去做什么？你们自己去吧。她为我们准备了祭品，并一一告诉我们，香火要怎么点，酒要怎样敬，要怎样叩拜。我想，她不同孩子们去坟地，是为了不让我们看到她的眼泪。

母亲总是一个人到父亲的坟前去。只有一次破例，因为李宽麟未能参加葬礼，事后到抚松来，去父亲的墓地时，母亲陪她一起去的。因为李宽麟吊丧时过于悲痛，几乎哭昏了，我母亲还在一旁劝她不要哭。

我母亲是个重感情的人，可是从不流泪。她的性格刚强，作为一个女人是罕见的。我在少年时看到的母亲令人惊异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

正因为是这样的母亲，才能这样不顾自身卧在凄凉、寂寞的病榻

上，还果断地催促儿子上路，以鞭策儿子的心情说出使我身心震颤的、当做毕生的座右铭的训诫的话语。

我的母亲不是平凡的母亲。我总是说，马东熙的母亲张吉富女士不是平凡的母亲，也是因为她很刚强。张吉富老大娘在解放后见了我，非常激动，可是她没有哭。别的妇女见我时都哭了，唯有她没哭。我让她住在儿子的战友很多的平壤，可是她说，要把出卖她儿子的仇敌找出来，谁也没告诉就悄悄地自己回故乡去了。

我怎么也睡不着，便到屋外去了。我在歪斜的篱笆前面，来回踱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哲柱轻轻地打开门，也走了出来。

我俩坐在柴禾捆上谈起来。哲柱说，他一直只顾做共青组织的工作，没有照顾好母亲，以后为了不让哥哥惦记家，要把家照顾好。这正是我想托付他的，由他先说出来了，真让我高兴。

早晨，我们做豆粘儿，吃得挺香。我吃完早饭，去找住在我家后头的金正龙。我想和他商量如何安排弟弟们的事。

我坦率地对他说我马上要到南满去了，可是家里的事放不下心，很难就这么走出这个土器店沟。金正龙说："家就托给我好了，我负责。你只管走吧。我替你照顾弟弟们，你母亲的病也由我好好护理，你就放心吧。"

我回到家，准备上路。

我系鞋带的时候，母亲从柳条包的最底下拿出四张5圆的纸币递给我。

"你到外地去，该花钱的事就多了，你收下吧。男子汉的兜里应

该有一点备急用的钱。你父亲不是说过，清朝末期，孙中山先生被关在外国大使馆监狱时，用钱买通清扫夫逃脱的事吗。”

我接了钱，可是手发颤，没法马上把它放进衣袋里，不知如何是好。那20圆钱里渗着母亲多么大的辛苦，我是很清楚的。她给人家洗衣服，做针线，手指尖都磨坏了，她省吃俭用，一文一文地才攒下了这20圆钱。那时，一头牛约50圆钱，用这些钱可以买一头中等大小的牛，也可以买三口人够吃一年的口粮。

我好像被那钱的份量压得身子失去了平衡，踉跄地走下廊台。“妈妈，我走了。请您保重。”我低头行了礼。这时，我心里想着，千万不能做出不同于往常的行动，致使母亲流泪。因此，我有意使自己的行动无异于平时，跟往常一样地说了道别的话。

“你快走吧。反正是要走的嘛。”

母亲的脸上病色很重，可是她努力微笑着点点头。

我转身迈步时，身后响起关门的响声。我迈出了步子，可是没有走向村口，却绕着房子转起来，那20圆钱仍攥在我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又转第三圈……在这并不长的时间里，缠了我一整夜的复杂多端的思绪，像一片片云朵浮现脑海：我何时才能再回到这个院落？我走的路是有胜算的吗？在我前进的道路上，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在这期间，母亲的病有可能好转吗？我正想着心事绕圈子，母亲打开房门严厉地责备我道：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心，磨磨蹭蹭地不肯离开？决心要光复祖国的人，心那么软，老想家里的事，怎能做得了大事。你在惦记家之前，

要想到在监狱里的叔叔和舅舅，要想到沦亡的祖国，要想到百姓。倭寇强占国土快22年了，你若是个朝鲜的男儿，就应该心怀大志，迈出大步才行啊。你若是今后也为惦着这个妈回家来，那你就别想再登这个门。我不想见那种儿子。”

母亲的话像轰雷一样猛烈地撞击着我的胸膛。

母亲说这一席话好像耗去了全部气力，把头无力地靠在门框上，用深情的、火热的、愠怒的眼光望着我。我好像重又看到了，当我走千里路回到八道沟的时候，连一夜都没叫我睡，立刻催我去临江的母亲的容貌。

我作为儿子第一次看到了充满正义和热情的，刚强而崇高的母亲光辉的容貌。母亲的全身燃烧着正义和热情，我感到母亲一瞬间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

我一直以为，我熟悉生育和抚养了我的母亲，然而，母亲的气概和灵魂却在我未曾想象的高度上俯瞰着我。

当时母亲的形象更近于导师的形象。我为有这样出色的母亲、应受世人谢忱的母亲，感到无限的自豪和莫大的幸福。

“妈妈，请您保重!”

我摘下帽子，深深地鞠了躬。然后，大步流星地走向村口。我走过独木桥，回头看时，穿着一身白衣服的母亲依然在扶着门框注视着我。这就是我看到的母亲最后的容貌。我心里想，她那纤弱的身体怎么就会保存着那么有力地震撼儿子心胸的高洁、刚毅的灵魂。那么不平凡的母亲，如果没有病魔缠在她身上，我现在上路的心情该多么轻

松啊。我为了忍住眼泪，轻轻地咬住了嘴唇。

这是我一生中最痛心的、不会再有的永诀，而不是在人的生活中会体验千百遍的平常的离别。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母亲。

几个月后，当我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时，我在脑子里最先想到的是，我在最后作别时没有对她说些更温暖的话，这使我十分悔恨。说来，母亲并不希望那种温情的离别，这是我无可奈何的。

我已是年迈的人，但总不能忘记那时的情景。人活在世上，至少有几次面临那种时刻。在那种时刻，由于行动上只有一张纸那么薄的些微差别，在人们的命运中会产生极大的偏差，乃至各自走向不同的两个极端。如果那时母亲在我面前为家里的事发愁，或是说一句使我松懈的话，那么，正要展翅飞向高空的儿子的心里会引起什么样的波动呢。

自从我率领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队伍，离开小沙河的台地，同战友们一道走了几十年超越人的想象的血战之路、严寒之路、饥饿之路。以后，又高举社会主义旗帜闯过了创造和建设的半个世纪。在为祖国和民族走的充满考验的严峻道路上，每当处于考验一个革命者的信念的逆境的时刻，我最先想到的不是某种理念或哲学命题，而是回顾催促我走向南满的母亲的教诲，和穿着白衣服目送我的母亲的最后的容貌，它激励着我，使我的意志更加坚强。

三　喜与悲

在反日人民游击队向南满进军的时候，于司令也把一支由200人组成的部队派往通化地方。这支部队的领队是刘本草先生。于司令把当做自己右臂的刘本草参谋长派往南满，目的是实现同唐聚伍自卫军的合作，通过自卫军解决武器问题。当时，于司令正为缺少武器而苦恼。以辽宁省为根据地的南满地方自卫军的武器，比于司令部队的武器多，而且精良。

听到我们要远征的消息，刘本草先生来小沙河对我们说，他们也受命去南满，目的地相同，一同去好不好。如果同去，他就介绍我们去见唐聚伍。跟唐聚伍建立了联系，就有可能解决武器问题。

我们欣然接受了刘本草先生的建议。因为我们也很需要武器。而且和救国军一同去南满，路上遇到中国反日部队也可以避免冲突，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全。

唐聚伍本来是东边道省防军第一团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以抗日救国为旗帜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他的麾下有一万多人。唐聚伍部队的活动据点是通化地方。他们以南满一带为中心，同驻沈阳的日本关东军艰难地作战。在这过程中，他们还曾同国民府所属的朝鲜革命军部队组织过联合作战。

辽宁民众自卫军刚组织起来时，士气很高，战果也不小。可是，形势变得对日本有利以后，困难越来越多，唐聚伍就开始动摇了。

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到满洲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可是，日本军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大约束，仍然继续扩大侵略战争。1932年1月初，日军占领锦州。同年1月28日，又用阴险的强盗手法挑起了上海事变。他们以五名日本僧侣在上海虹口被殴打为借口，破坏了中国的工厂、商店，杀害了警察，接着调动海军陆战队，以武力大举进攻上海市。日本挑起上海事变的目的，是要把上海变成他们侵略中国大陆内地的桥头堡。日本军部的头头们，妄想以闪击战的方法占领上海，并以此为跳板，一举吞掉整个中国。

上海的军人和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击，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但是，由于以蒋介石、汪精卫等为头目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上海抗战失败，上海事变以缔结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而告终。

上海抗战失败，使救国军、自卫军等所有有志于抗日的爱国军人和人民士气低落。

上海事变和《淞沪停战协定》的缔结，说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是阻挡抗日救国力量的最大障碍。国民党反动集团不仅没有支援上海抗战，反而视抗战为犯罪行为，横加阻拦。蒋介石和汪精卫一方面故意停止对十九路军的军需物资供应，没收了全国各地支援上海抗战的捐款；另一方面却密令海军向日本方面供应粮食和蔬菜，肆无忌惮地进行可耻的叛卖活动。

国民党反动派不仅自己不抗日，还阻止人民抗日。他们的枪口无

论何时何地都对准了抗日人们的心脏。讨论抗日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成了他们残杀和拉上绞架的对象。

蒋介石很早以前就发出无耻的谰言说，中国亡给帝国主义，我们即使做亡国奴，也还可以活命；要是败在共产党手下，就连当奴隶的命也保不住。这证明，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反动集团害怕和戒备人民革命，甚于害怕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和走狗。

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对那些与国民党有关系，并且代表旧军阀、官僚、政客利益的救国军和自卫军上层分子，产生了很坏的思想影响；当时日本长驱直入的军事优势也是使救国军士气低落的因素之一。以李顿为首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在他们的报告中提出建议说，满洲不要由日本独占，而要归国际共同管辖。日本根本无视这个建议，继续武装进攻。他们的武力逐渐向山海关和北满推进。他们一步一步地占领北满的广阔地区，同时往热河方面集中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在进攻北满之前，发动关东军的特务机关从政治上瓦解东北军，派特务通过收买、离间等阴谋活动，使北满的东北军各旅四分五裂，互相猜忌，热中于争权夺利。敌人在打马占山时，就拉拢苏炳文；等打败了马占山，又一举把苏炳文消灭。他们用这种手法，轻而易举地各个击破了北满的反日部队。

北满一带反日部队的瓦解，对东满的王德林、南满的唐聚伍不能不发生影响。

唐聚伍虽然乘人民的革命气势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但没有积

极大胆地展开活动，而是小心翼翼地看风使舵。

当时，丁超、李杜、邢占清等不少反日部队的头领都抱有一种幻想，主张不要积极抗日，只要依靠国际联盟，就能万事如意。他们甚至提出荒诞的主张说：“张学良没有抵抗日军，是为了肃清共匪。先肃清共匪，才能赶走日军。是共产党引进了日本鬼子。”

我们去南满那年春天，周保中曾被自卫军逮捕。当时，周保中问逮捕他的指挥官，你们的部队为什么称做自卫军。

自卫军的头头们回答说，所谓自卫就是保卫自己的力量。现在自己的力量都难保，还有什么力量去打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们。这就是“自卫”。

这就是自卫军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观点。失去了信心，陷于动摇的唐聚伍，不去统辖自己的部队，几乎任其自流。在这种时候，于司令派刘本草去自卫军本部，可以说是适时的措施。

远征队在6月3日下午离开小沙河，第一天行军路程定得短一些，由沙河（下小沙河）农民协会会长带路，渡过二道江，向刘家粉房行军。我们决定在这里住一宿，做政治工作。

据说，这个村是自从有一个姓刘的人在这里开了个粉房，才开始叫做刘家粉房的。

我们吃过晚饭，在宽敞的粉房前院燃起了篝火。

听到游击队来到的消息，连邻近村落的人都到刘家粉房来了。村里各组织的负责人从各家拿来了席子，还为邻村的客人拖来原木、椽木，叫他们当椅子坐。粉房院子里聚集了好几百名群众。我们和他们

紧靠着坐在一起，一直谈到深夜。

那天晚上，他们向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一辈子深入人民群众，做过无数次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可是像那天那样被问到那么多的问题，还几乎没有过。

那天，我和群众几乎谈了个通宵，嗓子都哑得说不出话来了。

最初他们问我，游击队是什么样的军队，它和独立军有什么区别。他们也知道，一个月前在小沙河组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他们提的问题，虽然显得很简单而平常，但包含着他们对新生武装力量的期待和疑虑。独立军是为朝鲜解放而战的军队，反日人民游击队也是为朝鲜解放而战的军队，那么，何必另组织游击队？独立军没能把日本军怎么样，新组织的游击队有把握打倒它吗？如果有把握，拿什么作担保呢？这就是刘家粉房的群众想知道的主要问题。他们受了独立军的不少折腾，而且由于独立军的失败尝到了无数次绝望的痛苦。

我努力给他们讲得通俗易懂，简单明了。

反日人民游击队不是什么特别的军队，和字面一样，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的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正是由像大家一样的工人、农民的子弟、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组成的。反日人民游击队的使命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朝鲜民族的独立和社会解放。

反日人民游击队既不同于义兵，又不同于独立军，是新型的军队。独立军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所有的人都能过自由、平等生活的社会的思想。

如果说建立富人当家作主的社会是独立军的理想，那么，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就是反日人民游击队的理想。独立军把你们这样的普通百姓看做光复运动的协助者、同情者，而我们把你们看做抗日革命的担当者，即主人。独立军对外部势力寄予很大期望，想借他们的力量实现国家的解放；我们却更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要靠这个力量光复祖国。

独立军继义兵之后，在满洲山野和祖国的北部地区，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战斗十多年，受了很多苦，这是事实。可是，独立军的军力渐趋衰弱，现在处于自身难保的危急关头。因此，我们组织了新的军队。我们怀着要由我们来完成独立军未能实现的光复祖国的大业这样的决心，组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

我这么一说，村里的一个青年又问我，反日人民游击队有几千人？

我对他说，现在还是初建，没有几千人，只有几百人。现在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不久将增长到几千、几万人。

那个青年听我说了之后，又问要参加反日人民游击队，须办理什么样的手续。

我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手续或规矩，只要是有决心战斗的青年，谁都可以参加，不过体力要够格。可以通过革命组织的推荐来参加，也可以直接到部队申请参加。

一听这话，村里的几个青年就把我围住，问我，如果他们提出申请，能不能即刻接收他们为队员。

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笔横财。

“当然接收，不过入了队，暂时还没有武器。武器要在战场上自己解决。如果这样也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马上接收你们为队员。”

青年们说，没有武器也好，只求允许他们跟着游击队走。

就这样，我们把好几名青年吸收为队员了。这是刘家粉房送给我们年轻的游击队的意外的礼物。我们大家为此感到莫大的喜悦。那时为得到一个革命同志，有时甚至要牺牲两三名同志，在这里，一下子接收将近十名青年为新队员，我们的激动心情是不难想象的。

在艰苦道路上啃着雪团，风餐露宿的革命者，具有资本家、市侩之流绝对享受不到的乐趣。那就是获得新的战友时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精神上的充实感。昨天还是陌生人，今天他们甘冒风险志愿入队，我们给他们穿上军服，荷上枪，这时候，所感受到的崇高而庄严的喜悦，是平时绝对尝不到的。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独有的喜悦和享受。

那天晚上，我们开了欢迎新队员的娱乐会，我和车光秀也都唱了歌。

我们所以能够没下多大功夫就获得了这么大的成果，原因是九·一八以后民心大大地倾向于抗日游击队。日本连满洲都鲸吞了，朝鲜人在这里也无法过太平日子。既然在满洲也不能扬眉吐气，干脆去决一死战，这就是当时朝鲜青年的共同心理。

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快到凌晨时，才在篝火旁铺上席子睡下，这是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次露宿。

游击队来到朝鲜人住的村庄却要露宿，刘家粉房老百姓的面子往哪儿搁？村民们这样说着。村组织的负责人要把我们安排到各农户去

住。可是我们没去，就在外边过了一夜。我们以不侵犯人民的利益为理由谢绝了村民们的好意，这固然是事实；但我想，一个革命者应该心甘情愿地选择粗陋的卧处，而不选择温暖的热炕头，这样一种浪漫情绪，也使我们谢绝了村民的诚意。

我们在结束南满远征回来时，又在这个村里住了一宿。那时，我们是在名叫吕修文的中国老大爷家前边宿营的。他家前边有一个挺大的做过土豆窖的窝子。我们把谷草编好围起来，在里面生了火，这样过了一夜。

吕修文老大爷看到我们不进他家，在外头做饭吃，又在外头露宿，便来找我说，如果部队全都移驻不方便的话，队长一人也该到他家里去住。他这样劝我：

“成柱先生又不是和我素不相识的人，我们不是早在旧安图的时候，就认识了吗？”

老人说，没想到我会这样一丝不苟，还说了好多遗憾的话。

我和那位老人是早就认识的。我们家借住在马春旭客店的下屋时，我在那里见过两三次吕修文老人。老人豁达、热情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老人说，为了抗日，从千里远征回来的军队在露天地里吃、睡，我怎么能舒舒服服地钻进被窝！于是他陪着我们说话，直到深夜。

他和刘家粉房的大多数人一样，对时局很敏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炮制了一个叫满洲国的傀儡国家，把长春改称新京，定为首都，把溥仪安置在那里，这些事他都知道。

我在同老人的谈话中，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关于安重根的事。

老人说，在朝鲜的烈士当中，他最尊敬的伟人是安重根。他说：

“安重根先生的确是东洋的巨人。难怪连袁世凯总统都做诗，称颂过安义士的义举。”

老人这些话，深深地感动了我。

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后，在满洲地方的中国人当中，他就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广为人知。有的中国朋友，还把安重根的画像挂在家里，很是尊敬。

“老大爷，你又不是朝鲜人，怎么对安重根那么熟悉呀？”

因为吕修文对安重根表示深厚的爱戴，我这样问他。

“住在满洲的人哪有不知道安重根的人啊！还有人提议，要在哈尔滨车站立一尊安重根的铜像哩。我现在也常对孩子们说，要想成为革命家，就要成为像孙中山先生那样的革命家；要想成为大丈夫，就要成为像安重根那样的大丈夫。金队长，你既然组织了部队，不想把关东军司令官那个大头头干掉吗？”

我听了老人这样淳朴的问话，不禁笑了。

“干掉那么一个关东军司令官，管什么用啊。正像杀了伊藤博文，又出现了新的伊藤博文那样，杀了本庄，还会有新的本庄出现。靠恐怖行动是不能扭转大局的。”

“那么，队长你将用什么方法跟他们斗呢？”

“据说，关东军有十万人，那就要以他们十万人为对象进行战斗。”

吕修文老人一听这话，非常激动，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金队长，你真了不起。你真是和安重根一样的伟人啊!”

我笑着说：

“过奖啦。我虽不能像安重根那样了不起，但决心不做亡国奴。”

第二天，游击队离开村庄时，吕修文老人舍不得离开我们，一直送了很远很远的路。当我想起刘家粉房的时候，总是亲切地重温与吕修文老人相逢的往事。

我们部队离开刘家粉房，来到二道白河附近，又宿营一夜。然后沿着大路继续行军，不料途中与从抚松朝安图方向转移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斥候队遭遇。我们在每次行军时，也派三四名人员组成的斥候队，走在队伍前面。我们的斥候队和日军斥候队接上了火。

坦率地说，那时，我们心里慌得厉害。因为这是游击队建立后第一次与敌人的遭遇战，而且是和自诩无敌的日军的第一次战斗。小营子岭那次战斗，是我们经过周密计划进行的埋伏战，对敌人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可是这一次的情况就不同了，对方不是浑浑噩噩的伪满军，而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凶恶、机敏的日本军。相比起来，我们是只有一次战斗经验的初学者。当时，我们还不懂遭遇战应该怎么打。

无论从远征目的来看，还是从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来看，在长途行军过程中，最好避免对我军行动会发生不利影响的冲突。古时的兵书上也说要“避实击虚”。

那么，该怎么办呢？

全队都以紧张的表情注视着我，显然是在等待我的决策。我认定，在敌人的基本力量赶来之前，先占据有利的地形，是掌握战斗主动权

的最好办法，于是把部队迅速移到斥候队正在接火的高地北边的山坡上。然后，把部分力量派到公路南边。部队在公路南侧和北侧同时开火，猛打敌人的斥候队。

敌人的行军纵队不久就出现了。他们全副武装沿路跑来。看来足有一个连的兵力。

敌人知道他们的斥候队被消灭，就企图包围我们。

我下令，信号枪不响，不准射击。并监视前方，单等敌人进入火力圈。我们没有多少子弹。

我打响了信号枪，全队一齐开始射击。

我倾听着从四面八方响起的枪声，力求从中了解队员的精神状态。我从一发发枪声中，听出了反映着战士们兴奋、高昂情绪的心声，但也感到他们有些慌张，失去自制。

敌人不顾大批的伤亡，仗着他们力量上的优势，迅速重整战斗序列，向我军占据的阵地两侧猛烈攻击。

我从部署在公路北侧和南侧的主力中抽调了部分力量，迅速地拉到我军的两翼。队员们一到阵地，就以神速的狙击战歼灭了翼侧的敌人。

可是，敌人主力寸步不退，凶猛地朝我军占据的地方扑过来。我们从上往下滚大石头，坚守阵地，而敌人还是拼着命往上冲。

我乘敌人的攻势稍有松弛之机，下令全队冲锋。冲锋号声响彻山林，队员们一个个像猛虎似地从山坡上冲下来，扑向逃跑的敌人，狠狠地追击。敌人的一个连在我军冲锋面前被打得一败涂地，除了几个

逃掉了性命外，全部被歼。金日龙在进行肉搏战时，每见敌人倒下去就喊“又一个鬼子完蛋了!”

我们游击队也有好几名队员阵亡。

我们把牺牲的战友们安葬在不知名的山岗上，在他们的坟墓前举行了永诀仪式。望着手握军帽饮泣的队员，我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些永别的话。当时我说的话，现在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我说完抬起头时，看到队员们的肩膀都在抖动，再就是我们的队列比从刘家粉房出发时显得短多了，致使我全身战栗。

过了一会，我又向队伍下了出发的口令。大家都到公路边整队，唯有车光秀还趴在坟墓上。他不忍心就这么离开无主的坟墓，连一块七星板都没能给铺上的战友的墓地。

我跑上山岗，使劲抓住车光秀的肩，摇晃着吼道：

“光秀！你怎么这个样子！还不快起来!”

因为我的声音又大又严峻，车光秀才拄着膝头蓦地站起来。我放低声音在他耳边劝导：

“队员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脸色……你那百折不屈的气质到哪儿去了？”

车光秀擦去眼泪，站到队伍前面默默地迈开了步。

后来，我对那天的事后悔不迭。安图——抚松县境战斗后，过了四个月，我接到了车光秀阵亡的噩耗。那时我最先想起的就是那天的情形。

“那时，我怎么对车光秀说了那样的话，难道就不能用别的话劝

他站起来吗？”

说起来，在失去了战友以后，我也是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那时阵亡的队员都是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就和我同甘共苦的骨干分子。

诚然，不会有没有牺牲的斗争。革命总是伴随着牺牲的。在改造自然的和平的劳动中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损失，何况是动用一切兵器和工具决一胜负的武装斗争呢！但是，我们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中付出的牺牲太残酷、太不应该了。当时我想，就算革命是要伴随着牺牲的，可是怎么可以给我们刚迈出第一步的队伍带来这么惨重的损失啊！

若以算数来计算，我们只不过失去了不到十名的有生力量，损失可以说不算太大。在一次战斗中，会有成千上万人伤亡的现代战争中，损失十个人算不了什么。可是，我们失去战友时，从不是以算数来计算损失的大小。算数不能成为我们换算人的价值的手段。

同我们一道走过革命道路的每个战士，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宝贵的人。一百个敌人也不能与一名游击队员相抵，这是我们的信条。敌人可以发布他们的国法和动员令，在一天之内征集几千，几万兵力，大批地投入战场，但我们没有那种物质手段或实权。即使我们有那种力量，一个个革命同志仍是价值千金的。得到志同道合的同志、生死与共的战友，再由那样的人组成一个队伍，这要付出莫大的努力，经历无数的艰辛困苦。

正因为如此，在整个抗日革命斗争期间，即使是一场消灭了一百

名敌人的战斗，如果我军有一名牺牲，我就没把它当做值得夸耀的战果。

历史学家们把安图——抚松县界的战斗评为灵活地指挥遭遇战，使之转为反击战，从而歼灭了敌人一个连的成功的战斗。那是一场取得胜利的战斗，这是毋容置疑的。这次战斗的意义，不仅在于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完全消灭了一个连的日本正规军，还在于在游击斗争史上第一次打破了日军天下无敌的神话。我们通过这场战斗，认识到日军虽然强大，但它决不是无敌的，也不是战无不胜的，更不是打不垮的。这使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只要我们用符合游击战特点的战法，干练地进行战斗，完全可以用较小的力量打赢强大的日军。

可是，我们失去了将近十名“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第一批产儿，我们在这场战斗中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试想，为消灭一个连的敌人，失去了将近十名战友，那么为打赢朝鲜和满洲的十多万日本侵略军，该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啊！

这是我在离开硝烟还未消散的安图——抚松县境战场时，回头望着埋葬了战友们遗体的岗子所想的。

我们经历了那场遭遇战后，大家都领悟到，在打游击战的过程中，今后要吃很多苦，要作出很多牺牲。

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后，我们在十多年的抗日战争中，实际上经受了以人们对战争的原有概念根本无法想象的苦痛、难关和牺牲。

四　合作是不可能的吗？

从安图到通化这条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行军路上，有很多只有在我国北部边境一带才能看到的险山峻岭和溪谷。由安图到抚松，有长白山脉绵延不断；由抚松到通化，有龙岗山脉的三岔子岭、三道老爷岭等山岭重重叠叠。

部队沿着这些山脉艰难行军将近一个月。白天，避开可能有敌人警戒的公路，抄山路行军；夜晚，找朝鲜人居住的村庄住下，忙着进行政治工作和战斗训练。

为了做革命组织的工作，我们在抚松也住了几天。在这里我见到了张蔚华。

张蔚华为我们的逗留时间太短，表示非常惋惜。他挽留我说，看在学生时代的友情，在抚松多住两天或三天。我心里也很想答应。抚松和我在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有意义的地方。可是我还是按原计划住了三天还是五天就带部队出发了。不管对往日的回忆多么宝贵，挽留我的情谊多么深挚，为了同梁世凤司令会晤，不得不忍心同张蔚华分手。

据说，从抚松到通化约有 500 里路。有话称“山外山”，越走山势越险峻，行军越艰难。翻越怪异的山峰，跨过深沟，进行几百里的强

行军，队员们都筋疲力竭，开始出现病号了。我也相当疲劳。

远征队行军到达通化附近时，车光秀忽然跑来建议说，要在二道江休息一两天，喘口气，再进通化。

我模糊地猜到了车光秀说这话的意图，可是我不能赞同他的意见，便故意问道：

“我们在抚松很想多住几天，可是忍心离开了，一直跑了 500 里路，通化就在眼前了，要休息，这是什么话？你说这话，还像个车光秀吗？”

车光秀在回答之前，摘下眼镜用手绢擦起来。这是他认为需要固执己见时特有的习惯动作。

“大家都筋疲力尽了。队长你也疲劳到了极点。你可能不承认，可是，你瞒不过我的眼睛。病号不少，扶着病号行军，怎么能和梁世凤司令会晤呢？”

“梁世凤先生不是那么计较的人，连这点情由都不能谅解。”

“就算梁司令眼光远大吧，可是他几百个部下的眼睛会怎么看呢？让他们说我们是乌合之众，那不就糟了吗。我怕把这次长途行军弄得前功尽弃啊！”

这么一来，谁也拗不过车光秀的固执劲。

我认为车光秀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们以这样邋邋遢遢，疲惫不堪的样子出现在通化，独立军就会瞧不起我们。如果他们小看我们，我们就无法按我们的意图实现合作。按照车光秀的建议在二道江休整一两天，恢复元气，然后秩序井然地、生气勃勃地进入通化，

也没有什么坏处。

我命令全队停止行军，在二道江宿营。然后派联络员通知梁司令，反日人民游击队为了同独立军合作，离开安图行军到通化近处，正在休息。

我们一面等着联络员回来，一面休息解乏。

我们指挥部住在有水碓房的一家农户。这家老人们竭诚照顾我。

我把十多名队员叫到指挥部，给他们上政治课，解释做独立军的工作应遵守的行动条例。这家老大爷看到这个情景，责备我说：

“古圣贤说，言杂伤气，喜过伤情，气激伤志。

“少思，少忧，少事，少言，戒笑，便是自古传来的摄生之本，摄生之理。像队长这样话说得多，心操得多，多思多虑，怎能养气、去病？况且，你们是要争取朝鲜独立的军队啊！”

老人真诚地介绍了连记都不好记的几十种养生法，然后再三强调说，大事是不可能一两天成就的，为大事着想，要好好照顾身体。我只好停止上政治课，让车光秀替我上了。我听老人的话，才知道他是许浚[15]的崇拜者，他长时间给我讲的正是《东医宝鉴》里的养生法。不知他在哪里得到的知识，他对养生法造诣很深。

我们离开二道江的时候，老人拿出用高丽纸包着的莲子和几包合蜜的枸杞子丸交给车光秀说，药不多，请你收下，用来保养队长身体。

我不好意思收下老人为保养自身精心配制的补剂，婉言推辞说：

“老大爷，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药我不能收。我们年轻人，还会因气虚、血亏活不成吗？您老一生饱经人间苦难，没有享过福，

请您用这补剂长寿，看到朝鲜独立。”

老人听了，面带愠色地责备我不领百姓的情，说：

“我嘛，已经是半截入土的人了，用不用补剂都无所谓，你们可是争取朝鲜独立的先锋队呀！我已是烂树墩子，你们可是青松绿竹啊。”说着，把药包推到我的面前。

去通化的联络员回来报告说，梁司令接到我的信，表示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进入通化城，并命令部队作好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准备。我们即刻离二道江向通化进发。队员们都在二道江理了发，还把裤线弄得笔挺，按着指挥员的口令有时正步走，有时唱革命歌曲，威风凛凛地向通化市行进。

走上大路，把队伍交给金日龙带领，我就同车光秀仔细地重新讨论了同梁世凤的谈判计划。我的一切思索和思念全集中于如何做独立军的工作上。水碓房的老人三番五次地强调说，少思，少忧，少事，少言，甚至戒笑，是摄生之本，可是我根本无法遵守那么多的养生法。我们做的事情全都是从无中创造有的过程，是开拓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的独特的创造过程，所以不能不比谁都多思，多忧，多商量。

我最关心的是，梁世凤在这次交涉中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这次交涉的结果，车光秀一开始就采取了怀疑的态度，可是我始终作乐观的预测。

不久，通化市街全景映入了眼帘，这一刹那我忽然想起了一则关于梁世凤的令人愉快的轶闻。这是我父亲卧病时回忆起每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志，跟我和母亲闲谈时说的。

三·一人民起义前夕，在梁司令的乡里，由贫农组成的契合打头，开展了旱改水的工作。梁司令家也参加了这个契合。他知道水田比旱田产量高，所以积极欢迎搞这项工程。可是，契合中占据上层地位的长老派却借口种水田没有把握，坚决反对开水田，因此，春播前夕长老派和少壮派吵起架来，这是有了这个契合以来的头一次。

少壮派的青年怎么也拗不过那些长老派的老顽固们。那年在少壮派想开成水田的旱地也种上了谷子和大麦。老人们为契合的农事没有受年轻人的干扰，照常进行，而感到庆幸，放下了心。

可是，少壮派的首领梁世凤却一直在窥伺贯彻自己主张的机会。到了插秧季节，青蛙在四处聒噪的一天晚上，他牵着牛到了地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几块已长出了嫩芽的麦地和谷子地翻了一遍，放进水造了水田。

老人们看到昨天还是好好的麦田和谷子地，一夜之间竟变成了水田，感到惊愕，威胁地说："你这该死的东西，契合的农事都叫你给糟蹋了。今年要是歉收，你也免不了讨饭。"

梁世凤开成水田的那几块地，通常种谷子或大麦只能收 9 石，可是这年竟收了 24 石稻子。

契合的老人们不禁惊叹，砸着舌头说："这个世凤倒是个人材。"从那以后，梁司令所在的村子和邻近村庄里，种水田的人家开始大大增加了。曾经任意摆布契合的老头子们，也都服服帖帖地听梁司令的话了。

离通化近在咫尺的路上，我为什么忽然想起了这件事呢？也许是

因为我一心想使同梁司令的谈判会成功这一预想合乎情理的缘故吧！

三·一人民起义前夕，梁司令离开家乡（铁山）到了南满的兴京县。我的父亲就是在兴京认识了梁世凤的。

当时，他在统义府任检务官。正义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队长，一跃成了受吴东振司令器重的骨干。他的中队驻地就是抚松，所以，我也见到梁世凤了。

我家由八道沟搬到抚松后不久，梁世凤被调回兴京，由张哲镐接任他的职务来到抚松。三府合并成立了国民府的时候，独立军的领导信任生性刚直、实践能力强、受群众属望的梁世凤，把军队的统帅权移交给了他。梁世凤不仅在军内，而且在由三府的元老组成的朝鲜革命党内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梁司令常说，他和金亨稷是义兄弟，非常体贴我。在吉林，梁世凤和吴东振、孙贞道、张哲镐、李雄、金史宪、玄默观等人一样，在经济上帮助我，而其中他给我帮助最大。

旺清门事件后，我对国民府上层的感情破裂，同已经反动化的这个团体的军部首脑梁世凤，也长期未得机会见面，可是我一直相信梁司令对我的爱护和信任不会有变化。

所有这一切，都是使我对作为一个人的梁世凤，作为爱国者的梁世凤抱好感的回忆。对于那些可能给我们的合作活动罩上阴影的往事，我就没有去想。我尽量只回忆那些可以使我对我们的谈判抱乐观态度的往事。这也许是一种防御性的本能的心理作用，不愿以可能给谈判的前途罩上阴影的证据来使自己痛苦。

通化等东边道20个县，都由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管辖。于芷山曾被张作霖任命为第30军军长，但是由于1930年6月镇压大刀会叛乱不力失去了张学良的信任。于芷山在东边道的一些重要地点部署了一个旅左右的省防军，以这一地区的最高统治者自居。九·一八事变后，又组织了东边道保安委员会，自任司令，并同关东军首脑取得联系，积极协助了奉天省的傀儡政府。

关东军以于芷山的协助为担保，对这个地区没有投入大兵力，把这个地区的治安交给了独立守备队和伪满军及警察。当时，关东军的大部兵力投入到北满。

唐聚伍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乘这个机会同梁世凤指挥的朝鲜革命军部队一起，包围了通化县城。日本领事馆通化分馆的兴津良郎等日本官员和他们的家属都被包围在内，进退维谷，只等人来救。

关东军司令部虽然接到通化县城被包围、当地日本人处于危险的报告，但是因为全部兵力去了北满一带，只派了100名左右的警察作为救援队，单等于芷山军来支援。于芷山军分成两股从北方和凤城两个方向压向梁唐联合部队。

关东军让板垣参谋长通过广播向被围人员说：“在通化的各位日本人，奉天的支援部队明早将抵达通化，目前请你们顽强坚持。”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国际联盟派调查团来满洲，奉天省一带的反满抗日军在各地威胁日本侵略军和伪满军。因为正是这样的时候，掌握着通化县城的朝鲜革命军和自卫军的士气非常高昂。

反日人民游击队进入通化县城是在6月29日傍晚。

独立军在市内各处贴出“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朝鲜独立！”等标语，热烈欢迎我们一行。数百名独立军士兵和市民在街道两旁，热烈鼓掌挥手欢迎我们。看来，梁世凤是想把反日人民游击队进入通化城作为扩大和发展独立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一行立即分成两拨，刘本草带领的救国军部队，由自卫军司令部代表带路，到中国人家去；我率领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员则到朝鲜人家去分散住宿。

独立军队员们把我们安置好之后，还不想回去，和我们一起谈笑。他们对我们部队的反映出乎意外地好。他们深表羡慕地说，起初听说安图的游击队要来时，以为是些扛着扎枪或火绳枪的土包子，可是今天见了你们，才知道都是英俊的有教养的军队。

这天晚上，我去访问了梁司令家。

梁司令高兴地迎接了我。我先向梁司令夫妇问安，接着向他们转达了我母亲的问候。

“家母迁居到安图以后，也时常提起梁先生。家母一向嘱咐我说，你父亲逝世后，梁司令跟朋友们一起给你父亲办了葬礼，又把你保送到华成义塾，你可不要忘记这个恩情。”

梁司令听后，挥挥手，客气地说：

“我和令尊是义兄弟，还说什么恩不恩呢。想到成柱你令尊对我的鞭策，这个恩可是我终身难忘的。令堂近来好些吗？听说搬到安图后，因心口痛，很受罪。”

“是的，病情好像加重了。近来，卧病的日子更多啦。”

我们的对话，就这样从平凡的寒暄开始了。

我谈了进入通化城时的印象。

“梁司令的几百名部下拥到街上鼓掌欢迎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流下了感激的眼泪。看到独立军士兵的脸色明朗，我们的心情也轻松了。”

“我们的部下，打仗不怎么样，可是从不慢待客人。”

“您太谦虚了。我们在离开安图之前，已听说梁司令部队同唐聚伍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联合，包围通化县城，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县城。”

“那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战果。唐聚伍的自卫军有几万名士兵，要是连一个县城都攻不破，那还有什么脸吃饭呢。”

梁世凤虽然这么说，可还是详细地介绍了围攻通化县城的整个情况。

这天，就谈到这里，在他家住了一宿。我没有说造访的目的，他也没有问及。梁世凤不问我军的远征目的，使我稍感不安，可是我看到他真心款待我，更加坚定了当初认为谈判会成功的想法。

第二天，吃晚早饭，开始正式谈话。

首先打开话头的是梁司令。当时，他向我说的头一句话是这样：

“队长你也知道，现在满洲变成了蜂窝。许多蜜蜂，蜂拥而起，都要蜇日本这个不速之客。唐聚伍、李春润、徐远元、孙秀岩、王凤阁、邓铁梅、王桐轩……这都是东边道的蜜蜂，东满和北满也有许多蜜蜂奋起。我认为这样的时候，我们也应同他们汇合，打得好，定会取胜。队长你看如何？”

他的话，和我们的远征目的相一致。梁司令本人在摸索合作，并主动地向我们提出来，这实在是令人感激的庆幸的事。

我为梁司令能从大局的高度俯瞰整个独立运动的远大眼光，不禁惊叹，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

“梁司令说要联合起来作战，我也同意。老实说，我们来找司令，也是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朝鲜的武装部队联合起来，中国的武装部队也联合起来，朝中两国爱国者和人民打成一片进行战斗，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梁司令微笑着说：

“既然队长有这个想法，我们就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吧。”

“梁司令，时局要求我们团结，可是很遗憾，我们民族内部却还没有实现团结。共产主义者内部也没有团结，民族主义者内部也没有团结，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更没有团结，这样，怎么能对付日本这个强敌呢？”

“这都怪站在左翼一边的人没有搞好政治。听说队长你也属左翼，那你一定更清楚，他们搞过激斗争，失尽了民心。搞什么佃农斗争，把庄稼人都变成了暴君，又搞什么红五月，肃清地主……因为这么乱搞，中国人就不理朝鲜人了。这完全是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的失策。”

这是对共产主义者组织的一切暴力行动感到厌恶的人才会说的话。我认为，他说这些话，并不是因为他敌视工人、农民或同情地主、有产者。在参加独立运动之前，梁世凤本人也是朝不保夕的贫苦农民，饱尝过辛酸。他本是每到年底就受地主逼债折磨的近乎债务奴隶的佃

农，是长年喝着萝卜缨掺稗子熬的稀粥，奇迹般地活下来的贫农的后裔。

我还认为，梁世凤责难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暴力斗争，并不是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思想，也并不是因为他拥护资本主义思想。他嘲笑和批判的，是部分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方式和斗争方法，而不是共产主义思想本身。但是，对方式方法的立场和态度，又不能不影响对思想的认识和看法。很遗憾，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领导群众运动中所犯的左倾错误，招致了令人痛心的后果，使许多向往新思潮的人们失去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我通过同梁司令的谈话，再一次痛切地感到，前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在满洲地区所犯的错误造成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我承认了部分共产主义者在领导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同时，我又想，梁世凤抱有把一切群众斗争都描写成破坏民族团结的有害行为的偏见，是需要帮助他纠正的。

“正如梁司令说的，过去朝鲜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在进行阶级斗争方面严重脱轨，这是事实。老实说，他们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我们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甚至造成了朝鲜人是日本鬼子的走狗这样一种错误认识。不过，梁司令，我认为农民起来反对地主，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梁司令，您曾多年种过庄稼，一定知道，秋收后，地主拿多少，农民究竟拿多少呢。农民拼死拼活种出了庄稼，果实都被地主夺去，连糊口都不能，他们为了活命，才起来斗争，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地说都不好呢。”

梁司令没有再说什么，不知他对我关于群众斗争不可避免的辩白，

感到不中意还是有道理。

那天，独立军部队举行大会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独立军队员中有很多青年在柳河和兴京的时候就从由我们派去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盟员和政治工作员那里受过共产主义影响。这次欢迎会，是由这些青年主持举办的，自然很盛大，又很热烈。通化县城里的许多朝鲜人也参加了欢迎会。

宾主在轮流讲话或唱歌。在欢迎会的各项活动中，都突出地显现出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在个性上的差异。独立军队员们看到反日人民游击队员的洒脱、谦逊、乐观的品质和有节制有气魄又有秩序的队列，表示非常羡慕。他们最羡慕的是，我们的队员唱的革命歌曲和三八式步枪。

有些独立军队员说，“从哪里突然冒出了这么威武的部队呀!”有的还问我们:“能跟你们合作该多好。同梁司令的会谈怎么样啦？”

梁司令说要看看成柱带来的军队，便访问了反日人民游击队。我们的队员欢迎他，又鼓掌，又行军礼，十分热烈。可是，梁司令却作了反共演说，把热烈的欢迎气氛一下子变成了充满敌意的气氛。

“要实现朝鲜独立，首先就不要搞利敌行为。然而，共产党正在干着利敌行为。他们到工厂，就挑起劳资纠纷；到农村，就引起地主和农民的纷争；在家庭又宣扬什么男女平等，使夫妻吵架。动辄就说没收啦、打倒啦等等，播下同族不和的种子，筑起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的壁障。”

我们的同志们听了他的讲话，都愤愤不平。车光秀气得脸色煞白，

愤懑地望着他。

对梁司令贯串着反共论调的演说，我也感到不满意。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作这种演说。

“梁司令，我们不是那种干利敌行为的人。我们是为争取朝鲜民族的解放而战斗的人，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人。要想实现朝鲜的独立，就必须以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为主力进行斗争；像过去那样只靠几个义士和英雄豪杰的力量是不能实现的。”

我这么一说，我们的同志都异口同声地责难国民府。国民府在旺清门杀害了六名爱国青年，难道这不是利敌行为吗？国民府集团在民族面前犯下了这样的大罪，还敢谈什么反对利敌行为，来攻击我们。

这么一来，触怒了梁司令，他大发雷霆，开始谩骂起来。

他的怒气有点过分，有违于礼节。我也不禁愕然了。他为什么忽然失去理智，叱责起我们来，我觉得有点奇怪。是不是我们说的几句话，伤了他的自尊心？不然，是不是有个不愿意合作的人在背后给梁司令说了我们坏话？我觉得他这样发怒必有什么缘由。

我还是耐性地说服他，说：

“先生，您何必这样发怒。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得相处一段时间才知道吗？

“我想，为了互相了解，梁司令的部队和我们游击队需要时常接触。”

对此，梁司令也没有说什么。

梁司令的反共态度虽然是顽固的，但只要不倦地进行说服，还是

可以改变的吧。我抱着这种期待和信心回宿舍来。不相信别人，可以说是一种排他主义的表现，那么，相信别人，就可以说是最好的人道主义。我认为，对国土被霸占的国家的爱国者来说，最高尚的人道主义，就是实现民族团结，用团结了的民族的力量解放父母兄弟姊妹。

我带领诞生刚一个月的部队，千里迢迢来找梁世凤，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可是，会谈破裂那天，通化市的我们的组织员送来情报说，独立军正在策划解除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武装。

梁司令制造这种阴谋是无法相信的,但我们还是急速撤出了通化，以防万一。于是，我们跟刘本草先生也分离了。

反日人民游击队为了避免同独立军发生冲突，没有完成反日合作的迫切任务，就撤离了通化。队伍里笼罩着阴沉的气氛。车光秀在队伍后面打开小本子看着路程图默默地挪动脚步。

“光秀同志，今天你怎么啦，好像跟谁堵气似的？”

我看出他的情绪，故意笑着跟他搭了话。

车光秀正等我搭话似地马上把小本子揣进口袋里，气鼓鼓地说：

“竟到了这个地步，还要我笑不成？老实说，我的心快要气炸啦。流血流汗，千里迢迢赶了来，这个劳苦不是白费了。”

“参谋长，你为什么认为同独立军的谈判失败了呢？”

“不是失败，难道是成功？梁司令不是跟我们合作，反而阴谋要缴我们的械嘛！”

“参谋长，你只看到上层的表情，却没有看到下层的脸色。对我

们游击队，独立军队员是多么惊叹、多么羡慕啊。我是愿意把这看得重于缴械阴谋的。

“重要的不是上层的表情，而是下层的态度。我从中看到了合作的未来。”

我虽然这么说，可是我自己也并不是对合作有胜算的。我只是说出了我的预感和愿望。

其实，我心里也很苦恼。当时我的苦恼就是：虽然国籍不同，但是梁司令和唐聚伍实现了合作，我们和于司令也实现了合作，为什么同一个民族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的合作，竟那么难实现呢，同梁司令的合作，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那时，独立军是不是真地要缴我们的械，这个问题，长期未能核实。因为那是我们的组织员得到的情报，所以我认为不会有错，可是，心里却希望那是毫无根据的情报。即使那是有确实根据的情报，我也丝毫不想责怪梁司令。人的思想是有局限的，要突破这个局限，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积累很多体验的。正因为如此，当时我离开通化的时候，并没有急于下同独立军合作是不可能的结论。相反地，我相信梁司令总有一天会理解我们的真心，走进合作的大门。爱国犹如流向联共这个大海的江河和溪水。

过了好多年，独立军司令崔允龟哗变，率部投靠朝鲜人民革命军。他跟我一起感怀深切地回顾了 1932 年夏天的事。据崔司令说，当时策划缴我们的械的，不是梁世凤，而是梁世凤的一个参谋。本来，梁司令是想跟我们合作的，但是，那个参谋在幕后拿起反共话筒诽谤我们，

最后还同他的亲信一起策划缴我们的械。

崔允龟这段话，完全消除了我们对梁司令的疑惑。听说梁司令为同我们的来往断绝一直感到痛心，他又根本没有参与缴械阴谋，我放下了心。虽然他已不在世了，但是可以再一次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爱国、真正重道义的人，这使我无比高兴。自己认为高尚的人，过了几十年后仍然是高尚的人，对他的良好印象没有沾上污垢，没有瑕疵，那么，再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和满意的事了。

梁司令的过错，是他没有看穿敌人的奸计。他是刚正、耿直的人，却没有觉察到他的参谋在鼻子跟前为破坏同我们的合作搞鬼。而且那个参谋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他也没有看穿他的真意。梁司令无谓的牺牲，也是因为中了敌人的奸计。

梁世凤司令由反共转向联共，是在他临终前夕。当时，独立军的内部非常复杂。密探和被密探收买的爪牙的破坏活动越来越猖狂，脱离部队的落伍分子和逃兵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要求同共产主义者联合的呼声也越来越响亮。

梁司令再也不能忽视共产主义者了。他承认在朝中两国的革命中共产主义者作为主要势力出现并左右大局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便冷静地检查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下了联共的决心。

由于对共产主义的不理解和非本意的敌对感情，未能下决心同我们合作的梁司令，终于转向了联共，这不仅在他本人的生平，而且在独立军的斗争史上，也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梁世凤同杨靖宇采取联合行动这一事实，就可以说明，他反对反共，选择了联共的道

路。他还准备同我们合作。

日本帝国主义者最怕梁世凤部队和我们合作。朝鲜人民革命军和独立军实现合作，这意味着在我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实现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政治军事上的统一。这对敌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日本宪兵、警察机关和特务组织，一直有计划地实施杀害梁世凤、从内部瓦解独立军的阴谋。奉天宪兵队和朝鲜总督府福岛机关也都参与了这个阴谋。“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东边道游击队”也一直监视和跟踪梁世凤。

据传闻，敌人为了杀害梁世凤，拨出了十多万元的秘密行动经费。朴昌海等兴京的密探也参加了这个行动。

敌人制定了引诱梁世凤司令的奸计，派遣了平时同梁司令有联系、协助过独立军的王姓叛徒。有一天，王某去找梁司令说，中国抗日军愿意对独立军提供援助，希望跟你面谈。梁世凤一听中国抗日军要提供援助，就顾不得斟酌，随王某上路前往据说是抗日军所在的大立子。走到半路，王某忽然抽出手枪说：“我不是往日的王明藩了，你要活命，就要向日军投降。”

梁司令大声呵斥王某，拔出武器，这时埋伏在高粱地里的敌人先开了枪，杀害了梁司令。

正如崔一泉所叙述的，“‘宁愿受罚于鸡林（朝鲜），也不受倭王之爵禄’朴堤上的这一忠言”变成梁司令的灵魂，使敌人大惊失色。

有时我想，梁司令如果更早些走上联共的道路，那么，他的命运

就可能不同了。当然，这不过是痛惜他的牺牲的一丝依恋吧。

“我就要死了，不能抗日了，可是你们要活着去找金日成司令。活路只有这一条!”

梁司令给部下留下这一遗言，闭上了眼睛。这与其说是遗言，不如说是冲出了反共壁障的一位爱国者用生命发出的联共宣言。

四年后，曾在通化大街欢迎过我们的300多名独立军队员，遵照这一宣言，在崔允龟司令率领下，为了同朝鲜人民革命军汇合，来到了白头山。那时，我在桦甸跟他们见了面。

桓仁县的朝鲜同胞，把梁司令的遗体掩埋在村子的后山上，做了平地坟，以免遗体被敌人抢去。所谓平地坟，就是指掩埋后不砌坟头，使坟墓和地面一般高。

可是，日本军警终于挖了他的墓，在通化市街枭首示众。

梁司令的遗属也遭到不可言状的残酷迫害。他们忍受不住日满军警的迫害，把梁姓改成金姓，搬到离铁路一千多里的桓仁县的深山沟里，隐居起来。

解放后，我派干部到南满去找来了梁司令的遗属，梁司令的夫人（尹再顺）、梁司令的子女和女婿随那个干部回到了祖国。

“大娘，你失去梁司令，惨遭日本军警的迫害，流离转徙，受了很大的苦啊。”

听我这么一说，尹再顺女士流着眼泪，肩膀抖动不止。

“将军，见到了将军，我心里的悲伤立地消散了。我们被人追赶，谈不上受苦。将军为了赶走日本鬼子，可真受了莫大的苦啊。”

“我忙于打仗，没能给你捎一次信，真对不起你。”

“将军，是我们对不起您。我们虽身居山间僻壤，却听到了将军的消息。我每次听到将军的消息，心里就埋怨我的那个没有跟您去却成了异国冤魂的老头儿啊。”

“梁司令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毫不屈服地进行了斗争的。”

后来，我们把梁司令的儿子梁义俊送进万景台革命学院学习。

4 月南北联席会议时，金九先生曾到革命学院参观，见到梁司令的儿子，感叹不已。

“我连想都没有想到，北朝鲜当局会把独立军司令的儿子也送到这所养育游击队战士子女的学院念书。”

“这所学院里，不仅有游击队员的子女，还有在国内曾参加劳动组合、农民组合进行活动时牺牲的爱国者的子女。只要是为国牺牲的爱国者，不管他曾属于哪一系统，我们都一样对待。”

我这么一说，金九深受感动，说“这所学院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梁义俊毕业后在空军部队任政治干部，战后，死于飞机事故。

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失望。因为我认为梁司令家要绝后了。

幸亏，梁义俊还留下了一个儿子。那小孩名叫梁哲秀。梁哲秀患了小儿麻痹症，成了残废。

我们党把他保送到小学、高等中学和大学，让他跟健康的学生一样，念完 14 年的全部教育课程。在他上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四年期间，他的同学们让他坐在轮椅上，四年如一日地推来送去，扶他上下在 17 楼的教室。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对革命先烈的尊敬，表现为对残废

的烈士子女的温暖的爱。现在梁哲秀已成长为共和国堂堂的作家，在床上写文学作品。

梁哲秀膝下有两男一女，论辈分，他们是梁司令的曾孙和曾孙女。每年到中秋节，他们跟着父母到爱国烈士陵园给曾祖父扫墓。他们还不知道，曾束缚着他们曾祖父一生的苦恼和不幸是什么。

我希望，这些天真的孩子的肩头不再压着反共还是联共这一重担。

五　出于团结的宗旨

部队朝柳河加紧行军。在南满地区，柳河和兴京、通化、桦甸、磐石一样，作为朝鲜独立运动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广为人知。这一地区，有许多前一代的独立运动者，也有许多向往共产主义的新一代的战士。早已广泛为世人知晓的我国独立运动史上的第一所武官学校——新兴讲习所就设在柳河县的哈泥河。

我们把柳河定为我们行军路程中的一个目的地，是为了在这个地区积极开展政治工作，以扩大和加强反日人民游击队的群众基础。我决心在回安图路程上的柳河、三源浦、孤山子、海龙、濛江等地，积极开展活动，以便在这些地区实现群众革命化，并扩大游击队队伍。这也是我们在选择远征南满的道路时制定的战略的一个方面。

远征部队先在三源浦、孤山子、柳河、海龙等地停留，做革命组织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敌人的白色恐怖，这一带的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们多年来流血流汗、辛辛苦苦组建的革命组织，大都遭到破坏或解散。有些组织，因为成员全被逮捕或杀害，简直无法重建。

受九·一八事变冲击最严重的是海龙地区。海龙有日本领事馆，

敌人的魔爪插得比别的地方更深。各地都有人在焦急地寻找组织。

我在所有我们停留的地方，都找以第一个党组织为母体扩大了的基层党组织的成员和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的骨干分子以及农民同盟、反日妇女会、少年探险队的负责人，了解每个组织的活动情况，讨论当前的革命任务和斗争任务。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地区革命组织成员的动向和思想方法存在着几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九·一八事变后开始迅速蔓延的失败主义倾向。

这种倾向首先表现在这样的想法上：日本把满洲也鲸吞了，现在一切都完蛋了。有不少人说：日本曾打败了世界上幅员最大的俄国和中国清朝政府；如今鲸吞满洲，正在窥伺中国关内，跃跃欲试；不知美国军队和英国军队有多强，恐怕抵不过日军；日本也许能征服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的独立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经过中日、俄日两次战争产生的对日军的迷信，这个时候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开了。

有些人还说，能够用朝鲜民族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那不过是纸上谈兵。这种想法发展下去，就会陷入投降主义泥坑，认为既然打不赢敌人，干革命有什么用！

如不克服失败主义，就不能把人民团结起来，就不能发动广大爱国力量参加革命。

我们从部队中选拔在政治、业务上有水平的队员和指挥人员，派他们到群众中以九·一八事变和朝鲜革命的前途为主题，进行了演讲和谈话。

群众最注意听的是抗日武装斗争消息。他们对抗日游击队的规模

和战略战术原则特别感兴趣。我把在刘家粉房作的演说，重讲了一遍，在群众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

在我们的演讲和谈话中，最受欢迎的，是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的故事。同日本一举侵占了广阔的满洲大陆，还制造出伪满洲国相比，消灭一个连的敌人的战果，是微不足道的。可是群众却对这个战斗故事最感兴趣。在日本成了满洲的统治者的时候，刚刚成立的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大白天在大路上歼灭了日军一个连的消息，使人们惊叹不已。

对战斗的每个细节，甚至敌人在我军冲锋面前抱头鼠窜时的具体情景，人们都想知道，为此，没完没了地提问。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场所，三番两次地谈同一个战斗细节。

我把人们对安图——抚松县境附近战斗的反应综合起来，再一次确信：为了让人们相信我们民族能够用自己的力量争取国家独立，需要的不是言论，而是具体行动；重要的是，通过实际战斗来显示出游击队的威力。

在群众的思想倾向中表现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以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成立为背景，在不少青年中开始出现了把武装斗争加以绝对化，过低估计地下革命活动的倾向。他们认为，当敌人的坦克、大炮、飞机疯狂肆虐的时候，一天到晚聚在一起开会，发议论，撒传单，没有什么用；只有拿起枪，尽量多打死一个日本鬼子才是收获，搞地下活动，是根本没用的，便忽视组织生活。

他们还不懂这个道理：武装斗争也是靠通过组织生活培养出来的

骨干分子进行的；如果没有组织这个巨大水库，就不可能组织武装队伍，更无法扩充武装队伍。这也可以说是九·一八事变造成的左派幼稚病的后遗症。

抗日游击队的水库，就是组织；离开了组织，就谈不上革命斗争。如果组织不进行活动，革命这个巨大有机体的生命就将终结。使群众懂得这个道理，并不怎么难。我们有力地向群众说明了，朝鲜共产主义者所以能够在满洲各地组织反日人民游击队，开始武装抗战，完全是因为革命群众很好地进行了组织活动。

南满地区人民动向中的又一个问题，是想用恐怖活动来对付国民府恐怖活动的倾向。当时，国民府的反动派在南满，对共产主义者和要转换方向的革新派民族主义者强化了恐怖活动。

柳河地区的共青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主张，应该同以恐怖活动为业的国民府右派分子决一死战。我们给他们说明了以恐怖活动对付国民府恐怖活动为什么有害。可是他们不大肯接受我们提出的论点。他们说，不拿出力量去压制恐怖活动，而袖手旁观，那就只能带来助长恐怖活动的后果。

我不得不费很长时间给他们说明，以恐怖活动对付恐怖活动的做法，为什么不妥当，为什么这种做法是给革命带来莫大危害的盲动。

国民府杀害爱国者，当然是千秋万代难以洗刷的大罪；我们优秀的爱国者被同族杀害，是我们自己的无处可诉的悲剧。国民府的罪行，将受到我们民族和我们子孙万代的诅咒。你们把国民府谴责为刽子手集团，决心要报仇，你们的这一心情，我当然也可以理解。但是，我

们在磨利报仇的刀之前，应当深入地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幸事件。因为国民府已变成了民族主义右派的巢穴，就把它的成员都看成是坏人，那是不对的。问题在于，日本帝国主义使国民府反动化，派去他们的走卒不断地进行瓦解工作。他们密切注意国民府内的新兴势力革新派，并巧妙地助长了国民府内部的分裂和对立。如果我们以恐怖活动打倒国民府，为之高兴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得到好处的也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因此，我们应该孤立已反动化的国民府上层，同时，揪出潜入其内部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揭露敌人的阴谋。大家都不要忘记，团结是民族复兴的保证。

我作了上述说明，青年们都点头说明白了。

我们帮助南满的同志纠正上述倾向，同时交给了他们下列任务：迅速恢复和整顿遭到破坏的组织，把更多的群众团结在其周围；培养出骨干分子来输送给武装队伍；以经过实践斗争考验的工人、农民出身的青年共产主义者扩大党组织；加强做中国人反日部队的工作。

我们停留三源浦、孤山子、柳河、海龙的时候，有许多当地青年自愿报名参加我们的部队。这可以说，是我们在南满积极开展政治活动所取得的硕果。

要想解决在使柳河地区的革命运动高涨方面的问题，就要充分发挥崔昌杰等被派到这个地区进行活动的第一个党组织成员和共青同盟骨干分子的作用。我们为了寻找一年前就断了联系的崔昌杰的去向而费尽心机的原因也在于此。找到了崔昌杰，我们就可以和他深入地讨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已成现实、我们开始了武装斗争的新的情

况下，在南满地区应如何推动革命深入发展的问题；还可以给他提出具体的工作方向。崔昌杰等于我们派到南满地区的代表。

柳河是崔昌杰根据“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决定进行活动的地区，也是在各方面和他关系很深的地方。崔昌杰是在这里开始了独立军生活的，也是在这里经梁世凤的推荐进入华成义塾的。

华成义塾停办后，崔昌杰回原部队任独立军参事。他以柳河为中心，为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组织扩大到南满的广阔地区，尽了一切力量。他在柳河地区进行活动时，还参加了袭击金川县城日本领事馆分馆的战斗。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队伍得以在柳河、兴京等南满一带迅速扩大，固然有赖于金赫和车光秀的积极努力，但也有赖于可以说是这一地区的主人的崔昌杰的忘我斗争和老练地开展工作的能力。他在可以说是新思潮的禁区的独立军队伍里生活，但他从没有隐瞒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反而主动地在进步的独立军队员中开展意识化活动，把其中的不少人改造成为共产主义信奉者。崔昌杰宽宏大量地大胆地做人的工作，以至他的上级指挥官明知他到离驻地十里的地方去搞了几个月的政治工作，却装作不知道，没有向上报告。

柳河本是受宗派分子和专事反共阴谋的民族主义保守派分子的影响很深的地方。ＭＬ派分子在磐石县拼凑一个叫住民会的团体，来同南满的民族主义团体对抗；在因革新派和保守派的对立而处于分裂前夕的独立军内部，部分向往社会主义的左派人物，同火曜派和汉上派携手，加紧进行组织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玄默观、高而虚等保守派人物，对向往共产主义思潮的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动攻势。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崔昌杰在柳河地区建立了反帝青年同盟，并迅速扩大了队伍。

宗派分子们无理取闹说，驻中青总是在中国的朝鲜青年唯一的组织，又哪来的什么柳河反帝青年同盟。ＭＬ系统的宗派分子为了从内部瓦解柳河反帝青年同盟，派破坏分子打进了这个同盟。他们从磐石地区拉拢了几十名青年集结在大泥沟，拼凑了一个叫棍棒团的恐怖组织，然后向警察提供假情报，说独立军在三源浦策划叛乱，协同警察对反帝青年同盟干部施加暴行。

这时，崔昌杰制止了他们的丑恶行动，从暴行中救出了同盟的骨干分子。

对于宗派分子的挑衅，崔昌杰没有用军事方法加以报复。他待人处事，本来就很大方宽厚。后来，在卡伦和我见面时，他对我说，当时他眼睁睁地看着反帝青年同盟盟员被宗派分子的棍子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竟能不失理性，没放一枪，自己也感到惊异。

我们到柳河去时，最高兴的是车光秀。他想象着同崔昌杰重逢的情况，像小孩一样抑止不住兴奋。和崔昌杰一样，车光秀同柳河也有不同一般的关系。崔昌杰在梁世凤的属下，腰挎六轮子在柳河奔走的时候，车光秀是站在讲台上教孩子的教员。那时，他们两人志同道合，成了同志。

“我崔昌杰眼虽高，可是车光秀，我一见他就被他吸引住了。他

外表看起来好像是个愣头青，里面装的却净是宝贝。他那脑袋里，足有十个卡尔·马克思盘腿坐着哩!”有一次，崔昌杰回想着他同车光秀的初交，开了这样的玩笑。

“我这个崔昌杰要是个小姐，就最先选这个愣头青做郎君的。看样子，这吉林的小姐们都是睁眼瞎子。”

车光秀听着他开玩笑，只是嘿嘿地笑。

在吉林的时候，车光秀还是个未婚男子。崔昌杰常说，车光秀的媒要由他来做。还装得挺神气地说，愣头青骑马去新娘家那天，他给牵马。

他们俩一见面，就毫无拘束地开玩笑，斗嘴，各自说我是哥哥，你是弟弟，要好生侍候哥哥。他们的友情的确是亲密无间的、热烈的，使人人都感到羡慕甚至妒嫉。

他们的友情，在以柳河、兴京、铁岭一带为中心，扩大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组织的日子里，更加深厚了。崔昌杰和车光秀一道，建立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孤山子支部，并以旺清门为中心，在兴京、柳河、磐石等南满的许多县分别组织了称为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启蒙团体。

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使命是，研究并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朝鲜革命的指导理论。这个研究会的活动方法，同现在的函授大学体系相似。在一年里，利用农闲，把青年们叫来，给他们上15天左右的课，另外每几个月进行一次巡回讲课，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学习材料，进行教育。

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靠参考书复习在课堂上学到的内容，然后每

星期进行一次讨论会，如有难懂的，就用书面问答的方法，消化学到的知识。

举行南满青总大会那年秋天，我在柳河听到车光秀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会活动的说明，不禁为其独创性的、崭新的活动方法而惊叹，并把领导这个研究会的三位战友（崔昌杰、车光秀、金赫）评为有胆量、富有创造精神的人。他们通过实践斗争创立的活动方法说明，即使在进行艰苦的地下斗争的情况下，只要肯动脑筋想办法，就能很好地把青年们培养成时代的先觉、历史的开拓者。

我带队向三源浦方向行军，想到就要同崔昌杰见面了，和车光秀一样不禁心潮起伏。

在卡伦建立第一个党组织后，我和他分手已经快两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崔昌杰在柳河、兴京、海龙、清原、磐石等南满的广阔地区建立了党组织，扩大了各种群众团体，并指挥朝鲜革命军的一支队伍，进行了建立常备革命武装力量所需的人力与物力准备。1931 年春，他把朝鲜革命军吉江指挥部改称为东方革命军，任指挥员。崔昌杰的联络员，通知我这个消息时说，他因为同国民府反动派有矛盾而伤脑筋。

从那以后，同柳河的联系断绝了。为此，我暗地里十分担心和不安。我所以感到不安，不只是因为他是天生的冒险家和乐观派，从不顾自身安全，到处乱闯，更因为他是在开始把恐怖活动作为万能手段的国民府里，在国民府的反动派的注视下进行活动的共产主义者。用国民府的眼光来看，他可以说是被监视的对象。

发生旺清门事件的那年年底，国民府的反动派把崔昌杰、崔得亨

等六名青年共产主义者逮捕起来，企图在大牛沟杀害。这个事件，以柳河事件载入史册。

国民府内向往新思想的革新势力，从这个事件以后，更强烈地责难反动派。受害者崔昌杰本人则咬牙切齿，要向法西斯化的国民府上层报仇。

我听到这一消息，曾派朴根源到柳河地区去给崔昌杰转达了如下内容的一封信。

“同国民府的冲突，不论其形态如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要反日的同一民族之间，不能也不应该有流血事件。在旺清门失去了六位同志的时候，我们也不是饮泣强忍下来吗？盼你事事慎重，切忌轻举妄动。”

柳河事件后，以 1930 年 8 月的朝鲜革命党执行委员会会议和代表会议为契机，国民府分裂成两个阵营。玄默观、梁世凤、高而虚、金文举、梁河山等人顽固地主张要固守既定方针，并强迫人们执行这个方针；而高远岩、金锡夏、李辰卓、李雄、玄河竹、李宽鳞等少壮派人士则把朝鲜革命党评为与人民的意志相违背的法西斯政党，并提出了革新的、转换方向的主张：应该解散该政党，改组为代表无产者的阶级革命的先锋，对旅满朝鲜农民进行阶级领导。

由于这种思想上的对立，两派互相为打倒和埋葬对手，展开了血腥的争斗。

国民府派甚至在奉天省政府的谅解下，收买和利用中国官署及军警，大肆展开了肃清反国民府派的恐怖活动。他们暗杀了李辰卓等五

个反对派人物。反国民府派也进行报复，袭击国民府总部，枪杀了四中队长金文举。后来，反国民府派发表脱党声明，为打倒国民府另行组织了称为反国民府委员会的团体。

我担心崔昌杰的人身安全，是来自这种政治背景的。行军队伍走到离三源浦一里来地的时候，我下了快步走的口令。因为要急于见到崔昌杰，我们两条腿好像添上了翅膀。

可是，到了三源浦听到崔昌杰的消息，我们不禁愕然失色。那里的组织员告诉我们他牺牲了。据他们说，崔昌杰在指导孤山子共青支部工作时，被国民府右派抓去，不知去向。听到反日人民游击队到的消息，三源浦共青支部成员朴某来见我们，他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国民府的恐怖分子们把崔昌杰骗到金川县姜家店去杀害了，并散布舆论说因为他是共产党的密探被处决了。有的青年说，崔昌杰在往返海龙——清原间开展活动时，不幸遇害。

不管怎么说，看来，崔昌杰已不在人世，倒是事实。

我激愤到极点，说不出话，流不出泪来。

一向那么热烈、那么热情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健儿，而如今竟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们！这是继我们在安图——抚松县境一座无名的山脊尝到的悲痛后,又一次无情地奇袭我们的心的巨大悲痛。

在武装斗争以反日人民游击队严整的军容登上历史舞台，其枪声在广阔的满洲大地上奏起新时代的序曲的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像崔昌杰那样忠诚的战友牺牲，这对我国革命来说，不能不是令人痛心的损失。

车光秀坐在我身旁流泪，泪水润湿着在炎阳下发蔫的草地。

我为了慰问崔昌杰的遗属，带队向孤山子进发。崔昌杰的爱人带着还不会走路的儿子和小叔子出来迎接了我们。她是一位刚强的妇女。她在我们面前没有流泪。她反而请求我们说，拿起枪打日本鬼子是她丈夫的生平愿望，现在她要继承丈夫的遗志去打敌人，要我允许她参加游击队。

我们改变计划，在崔昌杰的遗属身边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部队离开孤山子的时候，崔昌杰的夫人把我们送到很远。

我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她，便抱起孩子拍了拍他的小脸蛋。刚生出两颗牙的男孩子，长得很像他爸爸。孩子伸出小手摸着我的脸，嘴里叫着“阿爸”、“阿爸”。他的母亲见此情景，第一次流了泪。我也禁不住眼眶发热湿润，便把脸颊贴在孩子的脸上，回身望孤山子村，默默地望了好久好久。

“大嫂，要把孩子抚养好，让他继承父亲的遗志！”

我喉咙梗塞，再也说不下去了。

部队走出孤山子约有五里地的时候，金日龙见我们悲伤过度，便建议鸣枪追悼崔昌杰。大概他以为鸣枪悼念，也许多少能转换我们的情绪。还是饱经风霜的金日龙想得深！

“只听传闻，我不愿意相信他死了。我们连他的遗体都没有看到，怎么能先鸣枪致哀呢！”我说。

我们经过濛江到了两江口，接到了令人惊骇的情报：隐居在抚松

地区的 20 来人的一股独立军,同由七八十个人组成的一支中国人武装部队合作，在策划袭击我们，缴我们的械。这个阴谋的首倡人，正是国民府所属的独立军。他们侦察到由濛江向两江口方向移动的我们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行军路线后，通知中国人反日部队说，这支部队正是共军的主力。独立军协同中国人反日部队先行占据了我们将经过的村庄，在等我们进村。

给我们提供这个情报的是两江口的共青盟员，两江口有很多我认识的组织员和青年。我们一到两江口，他们就告诉了我这个内幕。

这时，游击队员中爆发了打倒国民府恐怖分子，替崔昌杰同志报仇的喊声。有些同志曾经在柳河的青年们呼喊要消灭国民府的恐怖分子，替在南满青总大会时被害于槐帽山山沟的六位烈士和崔昌杰报仇的时候，还和我一起说服过他们。现在连这些同志也找到指挥部来提意见，说我们的克制力也是有限度的，要好好打一仗，打掉他们的坏习气。要打掉他们的坏习气，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从力量上来看，他们是占优势的。

但是，这种力量上的差异，倒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难处，就在于我们要对付不该当做敌人的敌人。为抗日救国这一共同目的而战斗的武装部队互相开火,这只能说是只有 30 年代初的极端混乱局势才能造出的一幅漫画。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同室操戈，是可笑的；中国反日部队和独立军合作，攻击反日人民游击队，也是个怪事。

打起来，当然要分出胜负来。然而，在这类的战斗中，胜者和败者，都难免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不会有人给胜者戴上桂冠，也不会有

人为败者的牺牲流泪。

如果触犯了中国人的武装部队，就有可能给我们的活动造成难以克服的困难。好不容易实现的同救国军的联合战线，就有可能被破坏，那么，我们就又将回到那种蹲在人家后屋，擦枪度日的早期状态。打独立军部队，也会带来与此相同的恶果。如果共产党的部队打了独立军部队，那么，人民就会不理我们，冷眼对待我们。反共分子则会把它当做好机会，大肆诽谤共产主义者。

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枪对枪地进行血战，这是连想都不能想的事。可是，独立军却在松花江对岸，正在准备打这种血战。

当我回忆1932年夏的时候，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件事。当时，为了摸索根据民族团结的宗旨和抗日救国的大义，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的办法，我通宵达旦地绞尽了脑汁。这件事，可能使我的寿命减了十年。

国民府的军队，没有跟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军打过一次像样的仗，而对我们却干出禽兽不如的可耻罪行。对他们的这种行经，我也禁不住满腔愤怒和憎恨。

我同指挥员们一商量，他们也都怒气冲天，异口同声地说，应该让国民府法西斯分子尝尝铁锤的味道。

“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改掉坏习气，再不敢来惹我们。要给他们个厉害，让他们到了地狱，也不敢手沾同胞的血。”

车光秀眼里直冒火，他呼喊说，替被国民府杀害的同志们报仇的时候到了。

这样看来，当时在我们四周的武装部队，都是我们的敌人了。独立军、救国军、土匪、红枪会、大刀会都成了我们的敌人。反日人民游击队所以处于这种逆境，是因为没有像刘本草那样的证人，能够证明我们部队是救国军的别动队。我们通过刘本草，成功地使部队合法化了。可是如果不同刘本草那样有力的证人一起行动，那么随时都有从四面八方受到攻击的危险。

在这期间，于司令的部队已撤出安图，同王德林部队一起退到宁安县一带去了。安图成了自由地区。自卫军没有打过什么大仗，就陆续向日军投降了。当时，部分自卫军早已抛掉反伪满抗日的口号，变成了随日军顾问的指挥棒行动的反动军队。上面提到的那支中国人反日部队所以竟敢下决心要消灭我们这个广为知晓的共军主力部队，是因为他们已沦为受日军指挥的反动军队。

独立军的余党为国民府的反动宣传所骗，变成了睁眼瞎，不了解我们的真心，勾结转向反动的反日部队，向我们挑战。就这个问题，我进行了反复思索。不管对方这个军事集团变得多么像土匪和向右转化，毕竟还是和我们同属一个血统、同属一个民族，而且也曾献身于救国斗争，所以我们不能用军事方法对它进行报复或加以制裁。无论如何一定要用政治方法说服他们。我们是把反日统一战线看得绝对重要的。

于是，我派以朴勋为首的几个同志到独立军驻地二道白河去了。

“朴勋同志，今天你的武器不是枪而是嘴。决不能放一枪，一定要用嘴来说服他们。你善于辞令，举止大方，给人的印象很好，我想

你是可以感化他们，防止同室操戈的。要记住，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千万不要动武。如果我们在这里放了一枪，就有可能葬送同民族主义者的统一战线。怎么样？这项任务可能不合你的脾气，有把握完成吗？”

我这么一问，朴勋笑着挠了挠头说：

“倒是有些棘手，不过，试试看吧！”

我送走了朴勋以后，久久地在松花江畔踱步，心里祈望着今夜千万不要响起枪声。朴勋果真能说服独立军吗？我心里并不是没有忧虑的。

他虽然是个能干的鼓动家，办法多，可是一生气，就不顾一切。他这种像黑熊一样的脾气，使我放不下心。

我明知朴勋的这种弱点，却毫不犹豫地派他到独立军的营地去，是因为我们的部队里再没有能胜过他的活动家。

当时，在这方面能同朴勋比高低的人物，是车光秀。按情理，本应当由车光秀来大显身手。可是，车光秀听到崔昌杰牺牲的消息后，受到的冲击太大，无法控制自己。

“朴勋，你可一定要成功啊！”我心里反复地说，眼睛直盯着二道白河方向。

幸亏，没有发生我担忧的不幸事件。

我们的同志对独立军士兵有条有理地进行说服，并恳切地呼吁爱国力量要团结起来。他们听后深受感动。他们坦率地说，他们对上层的做法也是感到不满意的，只不过采取了隐忍的态度，没有付诸行动。他们并纷纷表示要缴出武器，到我们反日人民游击队里来，跟我们一

道战斗。

虽然独立军的上层还不愿和我们合并，但下层士兵则切身地领会到不应该对抗，而应该合作，把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战斗，欣然同我们携起手来。这是独立军和我军合并的开始。

这样，我们又顺利地闯过了一道难关。由于同梁世凤的决裂，加上崔昌杰的牺牲这一冲动人心的事件，对国民府的憎恨和怨恨重新燃起，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这样的时候，我们为了民族大团结的宗旨，能够发挥出作为20几岁的年轻人是难得的恢弘度量和忍耐精神，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如果当时我们失去理智，为复仇心理所驱，打倒了国民府，或者跟独立军队员动了干戈，那么，我们就不能像今天这样问心无愧地看我们后一代的面孔了。同时，也就不会看到梁司令的300多名部下在数九寒天打着合作的旗帜，来找我们人民革命军的历史画幅的。

世上没有比爱国家爱民族更伟大、更纯洁、更神圣的感情。

可以说，民族团结精神，是爱国家爱民族的感情中成为其精髓的最高灵魂。朝鲜的共产主义者自从为民族解放走上征途的第一天起直到今天，不论在何时何地，毫不动摇地珍视和坚持了民族团结的理念，并为此不惜做出一切努力。

六　同救国军一道

我住在柳河的时候，为了同李红光、李东光取得联系，往磐石地方派去了联络员。我们结束远征南满，走上归途时，他们两人积极地开展了游击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为同保民会等亲日团体的走狗进行斗争，组织了武装赤卫队（一名打“狗”队），到 1932 年 9 月成立了磐石工农义勇军。这个义勇军，由通过夺粮斗争、肃清走狗、夺取武器、反日起义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得到锻炼和检验的朝鲜青年组成。从 1932 年夏起，李红光和李东光开展了建立抗日游击区的斗争。

他们在肃清走狗的斗争中，运用奇妙独特的手法，创造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我要去见他们，并不是单纯地要对他们这些南满地方的主人做礼节上的访问，主要目的是要和他们建立关系，首先要和他们交流斗争经验。

其次，我所关心的问题是，他们对朝鲜革命的前途，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立场。我想就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向他们说明我的见解和立场，也想听听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最重要的是，要就在满洲各地分别开始武装斗争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之间建立联系，保证友邻地区之间的统一步调，实现相互间的合作、

互助和协同的方法等实际问题，同他们交换意见。我还想同北满的金策、崔庸健、李学万、李起东、许亨植等人，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南满和北满是我们的友邻，同时又是侧翼。同友邻怎样实行合作，这是对全面发展武装斗争起重大作用的重要环节和杠杆。

派到磐石的联络员，在我们离开海龙来到濛江的时候，才回到部队来。他报告说，李红光和李东光都出去搞地方工作去了，没有见到，把我写给他们的信，交给了那里的地下组织。

我只好推迟了同李红光、李东光的会晤，在濛江大力开展积极的军事政治活动。我们在濛江提出的总目标是解决武器问题，扩大队伍。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活跃地进行政治工作，同时还必须进行军事外交活动。

在达到这一目的方面，濛江具有一些有利条件。濛江的官吏中，有不少是我在吉林毓文中学时期的同学。他们都是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老老实实只埋头啃书本的书生一样的人，现在他们掌握了濛江的实权。他们在中学毕业后，在国民党县公署工作，日本侵略满洲后，都加入自卫军，各占一个显赫的职位。

濛江还有总部设在通化地方的唐聚伍自卫军总司令部派来的代表。如果由我的同学出面介绍，同这个代表办好交涉，还有可能解决武器问题。了解了这种情况后，我们决定在濛江住下来积极开展对自卫军的工作。

当时，我们部队的指挥员对自卫军的工作不大感兴趣，他们多半都认为，同自卫军接触是冒险。他们说，和同是朝鲜人的梁世凤的谈

判，都因为思想不同而破裂了，要做自卫军的工作，更不用提了。去向他们要武器，根本不可能。况且现在自卫军面临瓦解，有的部队甚至有日本的指导官，正在策划扫荡共产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队长自己要投入那个陷阱，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我对他们说，自卫军里有日本指导官，这用不着那么担心。如果日本指导官有辨别共产主义者的触角，我们就有避开他们的眼睛，进入自卫军指挥部去说服上层人物的胆略。自卫军处于瓦解状态，反而会成为我们易于达到目的的有利条件。他们会想到，与其把枪支交给日本鬼子或土匪，或是扔掉，不如交给抗日的我们。那么顽固的于司令都被我们打通了思想，实现了合作，自卫军还不能说服吗！

指挥员们说，队长同于司令谈判成功，那是千载一遇，碰巧成事。假如刘本草先生不在那个部队里，谈判就不会成功。他们恳求我，对去找自卫军的事，要三思而行。

我对他们说，不去行动，光蹲在窝里是呀非呀地议论，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作风。在使游击队合法化方面，我们确实得到了刘本草先生的很大帮助，可是，把那次谈判成功视为纯属偶然，是不科学的。如果我们不主动地为解决同救国军的关系做出努力，刘本草先生也无法帮助我们。我再三说服指挥员们说，成功与否在于能不能胸有成竹地主动地进行活动。就这样，我只带着一名传令兵到自卫军指挥部去了。

自卫军的兵营，挤满了士兵，大门口，运军需物资的牛马车络绎不绝。

大门岗哨拦住我们，操着山东口音问："你们是什么人？"哨兵的

大眼睛不看我们的脸，只打量我们游击队与自卫军完全不同的军装和帽子上的五角星。

我也学着他的山东口音，用中国话回答他：

“我们是从安图来的救国军别动队。我是别动队队长金日成。我来见你们司令，劳你通报一声。”

“金日成？金日成别动队不是共产党吗？”

另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哨兵嗫嚅着，猜疑地望着我。可能是听人说金日成部队是共产党部队，把它记在心里了。

“我们是于司令的别动队。你连于司令都不知道？”

我显出威风地诘问，那个麻子哨兵说：

“噢，于司令我们知道。他们部队在南湖头缴获了鬼子的机关枪。于司令，他了不起呀。”他说着伸出了大拇指。

看来，还是于司令别动队这个牌子有效用。在中国人反日部队当中这个牌子是很管用的。因此，我们在行军的时候，为了避免同反日部队发生冲突，总是打着救国军朝鲜人别动队这个牌子。

过了一会儿，操山东口音的哨兵从里面引出了一个很有风采的男子。当时的救国军大部分穿着张学良军队时期的军服。可是，奇怪的是跟着哨兵走出来的军官却穿着短袖衣和短裤，脚登布鞋，分头油亮油亮的。

“啊？这不是金成柱主任吗？”

原来，他是毓文中学的同学，外号叫“张大个子”。他叫我主任，是因为我在毓文中学读书时当过图书主任。他在学校时，总是叫我“金

主任”或“成柱主任”，待我很友好。

我们俩握着手，怀着重逢的喜悦互叙了学生时代的情怀。我们是时隔三年重逢的。我后悔出狱后没跟同学们道一声告别话，就匆匆地离开了吉林。那时，抱着为革命牺牲一切个人问题的精神，东奔西跑，因此那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总觉得没有跟老师和同学们道别是一种道义上的负债，心情像吊着铅块似地沉重，感到难过。

见到老张，已经远远地消失在地平线那边的毓文中学时期的种种往事和浪漫的学生气重现于怀，甚至觉得我不是站在军靴杂沓的兵营里，而是回到了丁香花芬芳扑鼻的毓文中学的校园，好像拉着老张的手走出兵营大门就能到北山或松花江边让清风尽情地吹拂似的。这是一种使人感到麻酥酥的乡愁。

老张就像学生时节一样挽着我的胳膊，不时地大声笑着把我带到他的房间去了。

“咱们学校的毕业照上没有金主任，真是遗憾啊!”

他让了坐，说道：

“我们在拍毕业照时，一直念叨金主任的名字呢。都说，你若没有中途辍学，一定是个优等生，得奖的。那个革命有那么大的诱惑力，竟叫你成柱中途辍了学？”

我笑着，愉快地用玩笑话回答说：

“那当然，你还不是抵不住那个诱惑力，才挎上匣子枪当上了自卫军军官的吗？”

老张眨巴着眼睛，拍拍我的手背说：

“那倒是啊。九·一八以前，我们还是一些不识时务的庸人。看到日本打进满洲来了，才从睡梦中醒来。”

“你看，我不是说过吗，人不可能生活在政治之外，对吧？”

“那时候，这话只当耳旁风听的。嗨，真不知道为什么时局这样急转直下，这满洲大地，就像狂风席卷过似的，一片肃杀之气。”

我觉得老张对时局的评价是对的。

在满洲发生的历史进程充满了另人惊讶的变化。这个变化给人的命运带来了难以抵御的曲折。老张这个人，前几年还满怀着远大的抱负，准备到北京大学去攻读历史。但是看到日军侵吞满洲，就抛弃了学生时代想攻读历史的理想，毅然参加了自卫军。

连被誉为文人中的文人、曾专心致志地给学生讲解杜甫诗篇里内含的牧歌式的和悦情感的刘本草先生，也当了救国军的参谋长，去冒枪林弹雨的风险。这是先前能想象到的吗？

“你看，金主任，我也沾了九·一八的光，穿上戎装成了绿林好汉啦。”

老张说着现出了苦笑。

“穿戎装的何止你一人啊。我这不也成了军人辗转到濛江了吗。看，咱们不仅作为同窗，而且作为军人，促膝而坐，谈论局势，不是绝妙的奇缘吗！”

他说，这都是托日本鬼子的“福”，托了他们的“福”，人们好像都变聪明了。

我了解到，濛江的自卫军部队里，除了老张以外，还有好几个毓

文中学的同学。那天，我和他们一直谈到深夜。他们这些一向不问政治，只想立身扬名的人，如今却义愤填膺地谴责日本，嘲讽蒋介石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畸形儿。我看着他们这样谈论，心里深感满意。

我们还讨论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和自卫军共同行动的问题。在自卫军领导班子里的老同学都欢迎我们同他们合作。

这样，我就比较顺利地进入了自卫军，还同驻在濛江的自卫军总司令部代表见了面。

有一天，我受老张的邀请，向自卫军指挥员们作了演说。总司令部代表也在场。

“诸位，让我们共同前进吧！”我一开头就发出了这样有力的号召。

“自卫军和反日人民游击队应当努力采取共同行动。给反日人民游击队贴上共军的标签，加以敌视，是妨碍抗日，帮助日本的行为……

“反日人民游击队和自卫军应当帮助朝鲜人独立军部队，结成联合战线。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离间朝中人民，利用我们的纠纷削弱我们两方，他们想用这种方法统治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无比狡猾的阴谋诡计，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自卫军应该说服大刀会、红枪会等民间武装力量和土匪，制止他们杀害和掠夺无辜的朝中人民，积极地吸收他们参加反日斗争。大大小小的民间武装队，都应当团结成一个抗日救国力量……

“有些反日部队害怕日军的威力，有的退入关内，也有的投降。应该记住，投降和半途而废，是自取灭亡。”

我当时所作的演说，归纳起来大致是这样。

自卫军指挥官都表示热烈的响应。

听了我的演说后，总司令部代表送了我们几十条枪。

我们在濛江驻了两个来月。在自卫军的保护下，我们深入群众做了宣传工作，进行了训练，还选拔身强力壮的青年来扩大了队伍。从安图出发时不过 40 名的队伍，到了濛江增加到 150 名左右。濛江及其附近村落的青年们听到金成柱组织大部队进行活动的消息，陆续来找我们，要求入伍。我们在濛江，就像掌握了主权一样，自由地进行活动。

据派到安图的联络员的汇报，东满的情况也很好。从联络员带来的金正龙的信中了解到，我们留在安图的部队也大有扩大，汪清、延吉、珲春等地也都分别组织了 100 名以上规模的游击队。

我决定，把我们的活动舞台转移到游击斗争从萌芽阶段发展到枝叶繁茂阶段的东满的中心（汪清），在那里同别的县联合起来，开展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在远征南满的过程中，我们吸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根据当前游击队力量还较弱的情况，占据一定的活动据点去进行斗争才更有利，工作效率也更高。

我们把行军路线定为从濛江直抵安图，不经抚松。在途中，几次与土匪和反日部队的散兵游勇相遇。他们看到我们带的新式武器，就想用武力夺取，因而部队经历了几次危险。这时，有一位参议府系统的善良老人像传奇故事中的道人一样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带领我们穿山越岭，平安无事地到达了两江口。这次翻山越岭，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也为我们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作了准备。

我们准备出发时，于司令麾下一个团的主力来到了两江口，那是孟团长部队。孟团长的秘书陈翰章也跟来了。

陈翰章一见我，从老远就张开两臂大步跑过来。

“成柱，好久不见啦!”

他像阔别几十年后的重逢那样，搂着我打转。

在安图和于司令谈判时分别以后，一直没见到他。要论时间，还不过三个月。可是他好像分别了三年甚至三十年似的，以洋溢着深厚友情的目光望着我。

我也同样怀着久别重逢的心情，感到无限的高兴。在人的一生中，三个月不过是短暂的一段时间，可是在我来说，这三个月里好像流逝了漫长的大半生。

常言说，生活中多曲折，多体验，就会觉得岁月长久，我想这是有道理的。

陈翰章把我介绍给孟团长，然后说：

“我们不知道成柱的部队在哪里，四下派人打听过。听说你们从南满回来了，可就是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后来我们听到风声说，在两江口，一支朝鲜共军开始跟独立军合并了。”

“谢谢你的关心，陈同志。我也很想念你呀。你们是怎么到两江口来的？”

“王德林命令我们，要在此地活动到明年春天。怎么样？想不想在两江口和我们一起活动一个时期？”

在一旁听陈翰章说话的孟团长，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

我想到，我们和孟团长的部队在一起，可以使好不容易搞成的同救国军的联合战线进一步得到巩固，于是欣然接受了他们两人的建议。

孟团长的部队是从张学良的正规军哗变出来的，所以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有大炮，有机关枪。这支部队战斗力很强，那些只有几支快枪和大刀标枪的其他救国军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在两江口的期间，得到了孟团长部队的精心保护。

当时，在满洲地方组织起来的大部分反日部队，在日本军的猛烈攻击下，有的瓦解，有的投降归日军指挥。救国军当中没有投降，而且势力较大的是王德林部队。可是，就是他们也在向日军炮火打不到的满洲东部边境东宁和苏联境内退却。反日部队这样土崩瓦解的过程，使我们的不少军政干部对他们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有人说，中国人反日部队的动摇和混乱是无法阻止的，同他们实现联合战线是毫无意义的；有的人说，同反日部队合作，毫无胜算，干脆跟他们断绝关系，由反日人民游击队单独进行战斗。这都是不能容许的危险的想法。

抛弃反日联合战线，意味着把数达几万名的庞大的武装力量推到敌人一边去，意味着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其各个击破反日部队的策略。

反日部队之所以不够坚决，发生动摇，固然是因为领导他们的上层分子有着阶级局限性，但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敌人怀着恐惧心。要阻止反日部队的动摇和毁灭，就必须更积极地做他们的工作，同时需要通过战斗给他们增添胜利的信心。

从这种现实的迫切需要出发，我们在两江口召开了两次有陈翰章、

李光、胡泽民等派到救国军做工作的政治工作员和来自东满各县的军政干部参加的反日士兵委员会，讨论了在同反日部队的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对策。

在会上，先通报了同救国军的工作情况，交流和总结了对救国军做工作的经验，分析了反日部队的动向。

鉴于绝大多数反日部队抛弃抗战，或向安全地区撤退，或投降敌人沦为反动军队，而日军却不受任何阻碍，不断地扩大占领区的情况，与会者们决定，由我们的部队同吴义成部和孟团长部联合起来，攻打敦化县城和额穆县城，以鼓舞爱国军民的士气。

孟团长也欢迎我们的战斗计划。

2000 名救国军部队分为三个组，分头向吉敦线方向、延吉方向和敦化县城方向挺进，我们的部队和孟团长部队一道沿着富尔河东边和大蒲柴河东边的山路到了敦化以南大荒沟附近的树林。我们在这里派侦察组去再次核实高在林送来的情报。

当时，敦化有日本守备队驻守，还有伪满军吉林警备队第 3 旅旅部、4 团、9 团、机场警备队以及日本领事馆警察、伪满警察等庞大的兵力。敌人在各个城门炮楼和领事馆分馆大门部署了严密的警戒网。

9 月 2 日凌晨 3 点，我军同时攻进了敦化县城。我们的部队冲进了南门，胡泽民救国军打开了西门和北门，都攻进了县城。

迅速冲进城里的我军，袭击了敌指挥部，然后一举扫荡了敌军旅指挥部、领事馆分馆和警察分署，沉重地打击了敌军旅分队。战斗的主动权掌握在我军手中。

惊慌失措的敌人，出动两架飞机向我军进行扫射，乱投炸弹。

救国军中发生了混乱。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天亮，形势就会逆转，我军就将受到严重损失。我向陈翰章和胡泽民说明了剧烈变化的战况，提出了新的战术方案，即撤出现在的阵线，以诱引战消灭敌人。

根据这个方案，我们部队占据了县城西南的高地，救国军部队占据官屯子以南的无名高地，以埋伏战消灭了追上来的敌人。救国军士兵看到不利的形势突然变得有利了，便士气高昂地追歼逃命的敌人。

可能是因为日本当局对新闻报道控制很严，当时的报刊对这次战斗没有进行报道。因此，当时的人们都不知道，在亡国 22 周年的初秋，在敦化发生过这样的战斗。

敦化县城战斗，与 1933 年 9 月的东宁县城战斗，在性质上是相似的。敦化县城战斗是我们同救国军联合进行的，东宁县城战斗也是同救国军主力合作，共同计划，共同进行的战斗。就规模来说这两次战斗也很相似。但是，敦化县城战斗的意义在于，它是在朝中人民共同斗争的历史上，朝鲜的抗日游击队和中国的反日部队以协同作战打败了日军的第一次攻打县城的战斗。

“在一举击败了清、俄两大国的日本军事威力面前，我们一些中国人吓得萎缩了，可是今天，从这种萎缩中完全解放出来了。

“在领土获得解放前，精神先得到解放了。”

陈翰章拥抱着我，激动地说道。当时他那噙满泪水的两眼，今天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成柱，让我们在这条路上永远不要分离！”

他紧握着我的手，显得很激动。他所说的这条路，指的就是共同斗争的路。陈翰章一直忠实地履行了他最先提出的这个誓言，直到牺牲。

约一个星期后，我们同救国军一道又袭击了额穆县城。我军在这次战斗中也取得了胜利。虽然这是未被世人广为知晓的战斗，但那时的枪声却留下了悠长的余音。

七　小沙河的秋天

我们一回到两江口，就召集没能参加南满远征的人员，一起总结了游击队建立后半年来的工作情况。会议的主要内容当然是有关南满远征的问题。游击队员们一致认为，在半年时间里，我们的武装队伍得到了迅速壮大和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坚定了通过游击战也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在这次总结会议上，我们为了把游击斗争推向新的更高阶段，给部队提出了如下几项任务：

第一， 要把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根据地转移到汪清地区；

第二， 要进一步深入做好对中国抗日救国军的工作；

第三， 要正确地领导在东满地区开始急剧扩大的游击斗争，加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并牢固地保卫根据地。

在这三个问题中，争论得最激烈的是把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活动根据地转移到汪清的问题。

就这一问题，我们同来自安图、延吉、和龙的军政干部讨论了好几天。

安图的同志们反对把活动据点转移到汪清去。他们为难地说，在安图建立的游击队应当驻在安图，为何到汪清去呢？游击队转到汪清

去，安图怎么办？这是一种没有摆脱狭隘地区观念的质朴的想法。

延吉与和龙的同志们却说，把游击队的始祖和母体安图部队转移到朝鲜人聚居的间岛中心去，不论是从战略意义上看，还是从地理条件上看，都是应当的和适时的。他们提出保证说，如果战斗力最强的安图部队转移到汪清去，延吉、珲春、和龙等邻县游击部队的活动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安图的同志们也都承认，从地理上看，汪清确实是个好地方。首先，汪清离朝鲜很近，是个好处。朝鲜北部六邑地区是刮进了不少“吉林风”的地方，将来可以建成给游击斗争以人力及物力支援的可靠基地。我们可以以六邑地区为跳板去发展国内革命。汪清地区的群众具有高度的革命性和斗争性。这在支援独立军武装斗争史上形成最高峰的青山里战斗和凤梧洞战斗中已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汪清又是北路军政署的活动基地，在这里活动的几百名独立军和武官学校的学生吃的都是这里的人民群众种出来的粮食。

但是，不能因为汪清是好地方，就毫无考虑地转移到那里去。我们深入地讨论了是把安图县建成根据地，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开展游击斗争呢，还是继续同救国军一道进行合法活动，同时悄悄地扩大朝鲜人的部队。对这两个方案，讨论了好几天。

我强调指出，即使我们的活动因为要同救国军采取联合行动而受些限制，也要进一步巩固用鲜血换来的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合法化，向把旅居满洲的朝鲜人当做“二鬼子”的中国兄弟证明我们民族既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又不是他们的斥候，证明被他们认为亲日的朝

鲜共产主义者的武装部队不是亲日的，而是坚决进行抗日斗争的。

我们最后通过了这样的方案：在一定时期内继续跟救国军一同进行活动，保持游击队的合法化，同时要通过实践斗争加强其影响力，以扩大武装队伍，等到各支部队发展壮大后再汇合起来。

之后，我们抽出许多人，派到东满各地。我们派人到延吉、和龙和珲春，向罗子沟救国军部队也派去了好几名优秀的工作员。我们还另组织了一个别动队派到汪清。金日龙留在安图。我们一百几十名的队伍又缩减到 40 名左右了。

我们这样经常抽出人派到别的县去，东满特委的干部们也表示满意。他们说我们的部队是基干部队，曾多次要求我们选拔优秀的同志派到别的地方去，加强各地的游击部队。

我们部队自从离开小沙河，踏上远征南满的征途，已经过了四个月。两江口的江河山野，秋意一天比一天浓了。过了一夜，满地落叶，霜若白盐，预示着冷酷无情的冬天就要到来了。

季节变了，天气冷了，我不由得惦念起病中的母亲。然而，也只能惦念而已，根本抽不出时间去一趟小沙河。我极力按捺着回家探望母亲的殷切心情，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着回家的日期。

当我们向北满开拔的日子快到了的时候，车光秀给我带来一包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药，叫我回家去一趟。他看到我犹豫不决，就指责我说不像金成柱了，若是队长连母亲都不知道照顾，就再也不理我了。

这样，我就向小沙河出发了。

我拿着药包走在路上，心里却担心母亲会不会又责备我为闲事操

心。可是又一想，要是母亲知道这药是车光秀送的，她是会高兴的。

我在小沙河时带去的那一斗小米，一定早吃光了。母亲不能干活，靠什么维持生计呢？虽然母亲说过，活人的嘴结不了蜘蛛网，你只当世上没有我这个母亲和弟弟，不要为家事操心。然而，作为一个人，要忘记亲生的母亲和骨肉兄弟，要不惦念家，决不是像说说那么容易的。

我拎着并不重的晃晃悠悠的药包往家走，不知为什么，离小沙河越近，脚步越觉得沉重。母亲的病是不是加重了？这虽然使我感到不安，但最使我犯愁的是没有完全实现同梁司令携手合作，就从南满回来了。要是母亲知道了，一定会很难过的。母亲身患重病，还那么紧催我去南满，是因为对我这个儿子要去找父亲的至友携手合作，感到高兴和满意。我母亲不喜欢年轻人只主张自己的主义，同独立运动的前辈闹对立。

最担心的是不知道母亲的病情怎样了。我离家的时候，母亲连白开水一样的米汤都消化不了，这些日子若没有好转，现在就会遭受更大的痛苦了。我思绪纷乱，对母亲的病情简直无法想象。

我加快了脚步，却无法拂掉心中的不安，跨过那座熟悉的独木桥时，也没有摆脱这种念头。

过去，每当我跨过这座独木桥时，母亲总是会令人惊异地打开房门看我。也许母亲有能够从脚步声中识别来人是第几个儿子的特殊官能，然而这一天，却出乎意外，房门没有打开，烟筒没冒做晚饭的炊烟，也不见弟弟进进出出地抱柴禾，倒泔水。

我顿时感到浑身的血液像冰块一样凝住不流了，紧张不安地抓住门环拉开了房门，只见屋里空空的。看到母亲的病榻空了，我差点瘫下来。“我来晚了一步”，这个想法闪电般地掠过我的脑际。就在这时候，哲柱不知从哪儿不声不响地走过来，一把抱住了我的肩膀。

“哥，你怎么才来呀!”

哲柱说着，把泪如泉涌的脸偎在我的怀里不住地摇晃，像小孩似地呜呜哭起来了。

这时，小弟弟英柱像一块飞石一样奔过来，一把搂住了我的腰。

我把药包丢在廊台上，紧紧地抱住了两个悲伤痛哭的弟弟。他们的哭声说明了一切，我用不着再问母亲的情况了。为什么偏偏在我不在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不幸呢？难道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连瞅一眼我这个儿子这种最后的幸福都无权享受吗？生在穷人家里，过了一辈子穷苦生活的母亲，一心想着多灾多难的祖国的悲惨命运，面对着丈夫的逝世也咬紧牙关没让自己流泪的母亲，从来没有为自己着想过，把毕生的精力和全部身心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争取他人幸福的事业。

母亲是不是怕我这个儿子为私事而误了大事，怕给我这个干革命的儿子增加负担，才这样过早地辞别了人世？

我抚摩着那天母亲最后一次训诫我时扶过的门框，心中想，即使受到比那次更严厉的指责，如果能看到母亲仍站在这门口，该多好啊!

“哲柱，母亲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吗？”

我这样一问，邻居的金大娘拉开栅门走进院子来，替哲柱说：

“你母亲对我说：‘……我死了以后，我的儿子成柱要是回来，希

望你要像我一样待他。只要日本鬼子还存在，朝鲜还没有独立，你就不要让他迁移我的坟墓。不，干脆不要让他跨进这个院子。不过，我不是夸海口，我的成柱可不是在战斗的道路上走回头路的人。’她这样说着，叫我打开了房门，然后就久久地望着那独木桥的方向。”

金大娘的话好像从遥远的“天国”隐隐约约地传来。但是，那每一句中的深邃而悲痛的涵义我全都听明白了。

我紧紧地抱着两个弟弟，回头朝那个独木桥方向望去，心中极力想象着母亲想念儿子时的心情，想象着母亲没有看一眼亲爱的儿子就与世长辞时的心情。然而还没有迈进想象的大门，我再也忍不住泉涌似的泪水，终于失声恸哭起来。

我哭了半天，抬头一看，只见金大娘泪汪汪地望着我。她的眼光是那样温柔深沉，我差点以为那是我母亲的眼睛。

“大娘，您为照料我母亲，真受了不少苦啊。”

我在心如刀绞的悲痛中恢复了理智，向一直陪伴母亲，精心照料母亲直至她去世的金大娘，表示了谢意。

金大娘更伤心地抽泣着说：

“那算什么苦啊。我没能常来看望她。我们没有照料好，没有人给你母亲梳头发。你弟弟也为革命工作经常不在家。有一天，你母亲叫我给她把头发都剪掉，像小男孩儿一样剃光，说头痒得难受……我听了，不忍心拿起剪子来。你母亲的头发本来多么乌黑浓密呀！我说我不忍剪掉，可你母亲一再求我，说是只要头不痒，就会轻松得像能飞上天似的……所以我就把那么好的头发……”

金大娘说不下去，失声痛哭了。

我心想，要是我没有听到这话该多好！她讲的母亲临终时的情景，使我感到五脏俱裂似的疼痛。母亲为我们这些孩子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而我们这些在她怀抱里成长的孩子，难道连为临终时的母亲梳头发的孝心都没有吗！

过去，我住在抚松的时候，曾看见一个跟我一般大的孩子，背着病重的母亲，从南甸子跑到小南门来，汗流浃背地找医院的情景。那时候，我们大家都称赞他是孝子。现在听了金大娘的话，不由自主地忽然记起了那个满头大汗的孩子。

同他相比，说我是不肖之子，也决不过甚其词。我已过 20 岁了，可我为母亲做了什么呢？我小时候，还给母亲让过热炕头，当母亲从井里打水回来的时候，用嘴哈气热过她冻僵的手，还天天早起，帮母亲喂过鸡，打过水。但是，参加革命以后，我就没有为母亲做过什么。古人说，爱只有由上而下的，没有自下而上的。这句名言好像就是指我而言的。没有自下而上的爱，这话的确是至理名言。我从没有听说过世上有以超过父母爱子之心的孝心孝敬父母的儿女。

“哲柱，母亲没有跟你们说什么吗？”

我想母亲的遗言不会只有那么几句，便问哲柱。

哲柱用手背拭着泪水，声音嘶哑地说：

“母亲要我们好好帮助哥哥。她说，只要我们帮好哥哥，做一个和哥哥一样的革命家，她在九泉之下也能安眠……”

这么说，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为革命消耗了全部精力

的。

我带着两个弟弟走到了母亲的茔地。

母亲的坟墓修在孤独地长着一棵老榆树的斜坡上，坟头已披上了像西爪皮花纹一样的草皮。

我脱下军帽，同两个弟弟一起跪在坟前磕了头。

“妈！成柱来了。请您原谅我这个不肖之子吧。在南满耽搁了些时间，今天才来看您。”

我跪在地上这样默念的时候，哲柱忽然趴在坟头上，用手扒开了草皮。

“你干什么？”我惊异地望着弟弟问。

哲柱没有回答，掉着大滴大滴的泪珠，把我从两江口带来的药全部埋到坟头里。

弟弟的这一无言的行动深深地触动了像烟波一样笼罩在我心中的悲哀。我趴在坟头上悲伤地哭了很久。我从一个革命者回到了一个平凡的自我。

我觉得世上万物都凝固成了这一个坟墓，天下大小事物都缩成了丧失母亲这一出悲剧。然而，头顶上的湛蓝湛蓝的天空，却毫无变化，依然清澈地俯瞰着大地。我们这样悲伤，而天空怎么能如此无动于衷啊！

我就这样失去了亲爱的妈妈。这是亡国史刻上了22个年轮的1932年凄凉的夏天发生的悲剧。如果国家没有沦亡，我母亲一定会多活好些年的。我母亲的病是长期的辛劳造成的，而这辛劳是亡国的厄运所

带来的。

母亲为我们兄弟付出的劳苦是一言难尽的。假若我为母亲所尽的孝心是十，那么我母亲给予我的爱是用千万亿兆也难以计数的。

在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四五名共青盟员在抚松陷入了敌人的包围。我们需要杀开一条路突围，走出县城去，可是我们手里没有武器。于是，我托母亲到万里河去向我们的同志要武器来。

我母亲欣然答应了。

“这点儿事还算什么。我去取来。”

母亲到万里河去，向我们的人要了两支匣子枪，安然无事地回来了。当时万里河的同志们按我母亲的要求，把子弹都推上了膛，一扣扳机就能开火。母亲把匣子枪藏在装有牛排骨的盆子里，顶在头上，大胆地通过了城门。在城门前，警察指着盆问她，“那里面是什么？”母亲泰然自若地回答说，“牛肉”。警察掀开盆上的纸看了一眼，就让她通过了。

我看到子弹推上了膛，拉下了保险纽的枪，吓了一跳。

“妈！差点没出大事。这枪为什么把子弹都推上了膛啊？”

“那是我叫你的朋友推上的。我是想，要是敌人搜查这个盆子，就给他们几枪。顶多不过是两三个家伙吧。他们真要扑过来，我就先杀他一个，死也不赔本嘛。”

母亲的这句话里充溢着只凭我们当时的体验和不成熟的思想方法根本不可能想象的崇高精神。这是对自己儿子的事业没有透彻的理解和完全的赞同，就不能有的勇气和真挚的爱。

在旧安图，我们寄居在马春旭家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同志摆弄手枪，不慎走了火，打伤了我母亲的腿。伤势很重，弄不好，生命会有危险。

从那天起，我母亲便闭门却扫。若有人问，就回答说是早晨出去倒水，不慎跌倒，骨折了。她盖上被子躺在炕上，不让别人看到伤口，只有亨权叔叔背着人护理她。但我母亲从不责怪我们，对那走火的人也没有任何怨气。

这个弄枪走火的朋友实在过意不去，甚至想要自杀。

我母亲听到这消息反而大怒，责备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她说：

“你们用枪还不熟，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男子汉还为这点小事想自杀吗！你们不要胡思乱想，而要多想想如何才能保好密。如果泄露这个秘密，你们就会遭殃，我和房东也会遭大祸的。那样，你们的事业也就没有指望了。”

我母亲对自己腿上的枪伤倒不怎么介意，却生怕我们手里有枪的事传到警察的耳朵里。

马春旭对走火一事也没有外扬。

在我母亲的品质当中，最大的优点是，她爱我的朋友，就像爱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她待我的朋友，就如待我一样。我的同志们到家里来，母亲就给他们工作费。这个工作费的来源，当然是她给人家做针线，洗衣服挣得的钱。木材场的工人和挖人参的季节工人扯下白布，常找我母亲来定做衣服。我母亲给他们做衣服，一天挣七八十钱，弄好了还能挣到一圆。

我家虽穷，但母亲对我的同志却从不小气。扣去买米钱、到外地时用的盘费和房租外，其余的，只要我们的同志到我家来，就全掏出来，或者买挂面和猪肉，给他们包饺子煮面条吃，或者给他们做工作费。

我们的同志们担心说：“大娘！您家的生活也不富裕，您把钱全掏出来给我们，怎么过日子呀？”我母亲回答说：“人不长寿，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命短。”

我的朋友到我家来住几个月，母亲从无怨言，始终不渝地待如亲生儿女。所以在满洲搞过青年运动的人中，凡是到我家住过几天的同志们都把我的母亲叫做“我们的母亲”，而不叫“成柱的母亲”。

说母亲终生给革命者做饭也不言过其实。父亲活着的时候，母亲为服侍爱国者，忙得不可开交，连串门的空也没有。我家住在临江的时候，她每夜都要起来烧火做饭。当我们正要铺上被躺下入睡的时候，父亲的朋友就找到我家来，还开玩笑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睡安稳觉，然后就进到上屋去了。这时，母亲就得起来下厨房做饭。

母亲不仅侍候革命者，而且亲自参加革命活动。母亲开始参加革命活动是我家住在抚松的时候。她从那时起，就加入南满妇女教育联合会白山地区会，在妇女和儿童中进行启蒙工作。父亲去世后，她还做过妇女会的工作。

母亲从一个帮革命的人成长为革命的直接承担者，当然受到了我父亲和我的很多影响，但李宽麟对她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李宽麟住在我家的时候，就把母亲引进了南满妇女教育联合会。

若是我母亲纯粹以母爱对待我，我是不会以如此炽热的感情回忆她的。母亲赋予我的爱，不单纯是母爱，而是真挚的革命的爱。她没有把我只看做自己的儿子，而首先把我看做国家的儿子，并教育我在孝顺父母以前，先要忠于国家。母亲的一生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它在我的心田里灌输了崇高的人生观、革命观。

若说父亲是教育我们要具有即使一代接一代地进行斗争，也要光复祖国的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的导师，母亲则是教育我们懂得一旦开始搞革命，就不要成为人情的俘虏或思想上开小差，而要直到实现目的为止，专心致志地努力奋斗这个道理的好教师。

父母与子女间的爱若是盲无目的的，就不能说它是牢固的爱。只有他们凭依的思想是纯洁而高尚的，这种爱才是永恒的、神圣的。在亡国的岁月里，我与母亲间爱与孝所凭依的牢固的思想基础，便是爱国。我母亲正是为了爱国，甚至牺牲了自己作为母亲要求儿子尽孝的权利。

我在母亲的墓前没立下墓碑就离开土器店沟了。解放后，安图县人民没有忘却我母亲，在她的坟前立下了刻有她名字的墓碑。石碑上还刻有我们三兄弟的名字。

我按母亲的遗言，解放后才把母亲的坟墓同父亲的坟墓一起迁移到万景台来。

我胜利回到祖国后，时局错综复杂，要做的事太多，所以一时顾不得关心埋在异国土地上的父母的坟墓。我们度过青春时期的满洲的山山野野上，不仅埋有我的父母，而且埋有在同我一道闯过刀山火海

时牺牲的无数战友的遗骸，那里还散居着他们留下的子女。我决定，在迁葬那些牺牲的战友的遗骸，把他们托我的子女找回到解放了的祖国江山以前，决不能先迁移父母的坟墓。

就在这样的时候，张哲镐来找我，说服我把父母的坟墓迁移到故乡来。

他说，他要负责迁墓的事，将军则要到万景台去找个适宜修墓的场地。在那些满洲时期与我家有过关系的人中，此时知道我父母坟墓的，只有张哲镐一人。他为迁移我父母的坟墓费了很多心。

我搞武装斗争的时候，敌人为挖掘我父母的坟墓，施出了各种诡计。但是抚松和安图的人民瞒着敌人，直到解放为止诚心诚意地守护和管理了我父母的坟墓。我在华成义塾时期的导师康济河先生，每年到寒食和中秋节就筹备供品，携带家眷到阳地村我父亲的坟墓去祭祀和扫墓。

母亲去世后，我就成了两个弟弟的保护人和家长。然而，革命工作使我无法起到家长和保护人的作用。我将两个伤心悲戚的小弟弟留在只有芦苇起伏的荒凉冷凄的小沙河，踏上去人地两生的北满的长途时，想到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心里不禁怅惘不已。

八　在罗子沟的台地上

日本军队开进安图已只是时间问题了。亲日的地主已经做好了旗子，准备欢迎日本人。救国军不能再在两江口久留。孟团长的部队已接到要向有山有草原的罗子沟、汪清方向撤退的命令。

我们也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决定跟救国军一起撤离安图。这个决定是在两江口召开的士兵工作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总的方向是把活动据点迁移到汪清，但暂时要到撤退的救国军集结的罗子沟去做反日部队的工作。于司令部队也从安图撤到罗子沟去了。

当我们正忙着作去北满的准备的时候，哲柱弟到两江口找我来了。

“哥，我也要跟着哥哥的部队去。哥哥不在，我再也无法待在土器店沟了。”

我还没问他的来意，他却主动地说出来了。弟弟想跟我们部队去，这个心情，我理解。在母亲去世的小沙河山沟里，寄居在别人家，每顿饭都要看人家的眼色，这对感受灵敏的他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不能不是难以忍受的。

“连你也离开了土器店沟，那么英柱怎么办呢？那孩子孤苦伶仃的，受得了吗？”

“两个人都吃人家的饭，太不好意思了。让小弟弟一个人在那儿，

我想还会好些的。”

我虽然认为哲柱的话有道理，却无法答应他的要求。他 16 岁，给他枪，就能跟着部队过军人生活。他的年龄虽小，但个子高，体格也好。不过他的骨头还没长硬，会成为游击队的负担。再说，哲柱负有要在安图地区发展共青同盟工作的重任。

“你要是过两年或三年再提出这种要求，哥哥是会立刻答应的。可是现在无法答应你的要求。就是苦些，孤独些，也还是再忍受几年吧。你要一面给人家当长工，或打短工，一面大力推进共青同盟工作。地下工作的重要性不次于武装斗争，忽视它是不对的。你要先做好共青同盟工作，到时候再参加革命军。”

我从各方面劝导哲柱，以免他纠缠。我把他带到池边的一家小饭馆。屋里冷丝丝的，糊上的纸被风吹得呜呜直响。

我要了酒和菜。桌上摆着两碟冰凉的冻豆腐，中间放一瓶酒。

哲柱看了，立刻眼泪汪汪了。他知道我不会喝酒，所以他似乎已经猜到了这杯酒意味着什么。

“哲柱，你要原谅我这个哥哥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我哪能不想把你带在身边呀。现在要把你留下来，我的心就像刀绞一样。可是，哲柱！我们虽然难舍，还是在这里分手吧。”

我借酒力一口气说出了在神志清醒时很难说出的话，却也忍不住泪如泉涌。

我不想让弟弟看到眼泪，走出了店门。哲柱也放下酒杯跟了出来。

“哥！我知道了。”

哲柱说着从背后靠近我，默默地握了一下我的手。

我就是这样和弟弟分了手，以后就再也没见到他。

每当回想起那阴沉凄冷的池边的秋天时，我总是后悔那天在他轻轻握了一下我的手时，我为什么没能久久地更热情地握住他的手呢。现在想来，也觉得那时的离别是太凄凉了。

如果那时我答应了哲柱的要求,也许他不会在不到 20 岁的年纪就离开人世的。的确，他的一生是像火一样燃烧，像火一样逝去的。

哲柱刚过 10 岁就跟着革命组织跑。他在抚松的时候担任过新日少年同盟的宣传负责人，在小沙河时做了共青同盟区委书记。

哲柱在两江口和我分手后，培育出很多共青盟员，送他们参加了朝鲜人民革命军。他还自告奋勇做艰巨的反日部队的工作。他还同反日部队的士兵一道参加过袭击大甸子的战斗。据说，和他有过联系的杜义顺指挥的反日部队同日军间岛讨伐队打得很英勇。

后来，哲柱身负安图反日部队工作部部长的重任，做驻在延吉县符岩洞藏财村鹿林的徐奎伍反日部队的工作。徐奎伍是个脾气古怪、非常固执的头领，他说是要反日，却又不加分析地敌视朝鲜共产主义者。起初，他也是和朝鲜人相处得很好的。

徐奎伍开始冷待朝鲜共产主义者，是从符岩洞反日妇女会会员们夺回了被他扣下来要做妾的女共青盟员（朝鲜姑娘）以后。这个姑娘是在同演艺队员们一起到反日部队进行宣传工作时被他扣留的。过去，一旦被徐奎伍扣留，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不满足他的要求，是不会无事的。

徐奎伍常用这种方法换女人。

自从妇女会员们夺回这位姑娘后，朝鲜人在徐奎伍部队里就根本站不住脚了。曾和他常有来往、亲密相处的朝鲜人也无法接近他。徐奎伍闹了相思病，指使部下虐待和镇压朝鲜人。

就在这时，哲柱弟带着有高丽医资格的林春秋同志找徐奎伍部队去了。

“听说大人病势很重，我是来探病的。”

哲柱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样恭敬地问候，可是徐奎伍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他不愿意看到朝鲜人，也不愿意同朝鲜人说话。

“我请来了一位名医给您看病。是不是让他看一看？”

徐奎伍听哲柱这么说，心才有些动，说要是名医，就看一看吧。林春秋同志给他扎了几天针，他才高兴地说，我闹偏头痛，疼得要命，多亏林医生把钻进脑袋里的恶鬼都撵走了。哲柱就这样同他建立了关系，合法地留在徐奎伍部队做反日士兵的工作了。

后来，徐奎伍编入我们的方面军被任命为第10团团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直战斗得很好。他过去一直过放荡的生活，说什么没有鸦片和女人就连一天也活不下去。可是他被编入革命军以后还加入了共产党。我以部队的名义祝贺他入党时，他说：“军指挥同志！今天，在我入党的时候，不能不想起您的弟弟。没有哲柱的帮助，我是不会有今天的。”他像讲故事似地谈了哲柱带林春秋同志来给他治病的事以及如何不倦地引导他不脱离反日道路的事。

1935年6月，哲柱在车厂子附近壮烈牺牲了。

我是在镜泊湖畔听到哲柱牺牲的消息的。

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现在我一看到大江或湖水，就要想起弟弟来。

哲柱一阵亡，小弟弟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金正龙一家搬到车厂子游击根据地去后，小弟弟就只好到处流浪，给人家看孩子，当小差，混饭吃。那时关东军为了对我进行“归顺”工作，大肆逮捕与我有关的人，所以他不得不隐姓埋名，假造身世，浪迹东北三省以及中国关内的城市和乡村。他在北京也耽过一段时间。

解放后，我在日警遗留的文件中看到了有关通缉我小弟的资料。

小弟弟在新京啤酒厂做工时，思乡心切，曾回祖国来耽了三个来月。他出现在万景台时，身穿青色西服，脚穿白色皮鞋。

他那一身装束使人感到是那么稳重，仪表堂堂，以至我祖父怀疑，这孩子是不是当上了什么官，自己成家了。那时，小弟弟怕祖父母担心，说他在长春念大学。当时，警察分发出通缉他的照片，所以他回家乡后，也不敢耽在万景台，躲在大姑母家里住了些时候，就又到满洲去了。

反日人民游击队的 40 名队伍离开两江口，经过敦化和额穆，朝南湖头方向，踏着山路北上。我们部队在我曾当过“长工”的那有名的富尔河村进行政治工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敦化县哈尔巴岭附近，同参加敦图线铁路敷设工程的日军运输队进行激战也是这个时候。这场战斗后，我在敦化县头道梁子见到了高在凤。

高在凤离开敌人残酷镇压的四道荒沟，把活动舞台迁移到头道梁

子,在地下组织办的农民学院任教。头道梁子离敦化县城只有 30 里路。

那时，我在头道梁子还见到了高在凤的母亲。

我们把袭击日军运输队缴获的白面分给各家，用它做面食和人民一起吃。这次战斗中缴获的白布，交给了农民学院，让他们给学生做校服穿。

我们部队离开头道梁子重又北上，到官地附近和南湖头地区，做反日部队的工作，然后挺进到汪清地区，了解党、共青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工作情况，同各阶层人士会了面。这可以说是为了在汪清建立活动据点而做的基础工作。

我们到了汪清以后仍没有放松做反日部队的工作。李光的别动队当年为弄几支枪而触犯了关保全部队，我为了找关保全部队，去了梨树沟。可是，关保全已放弃抗日，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老实说，当时我本打算见到关营长，就代汪清的同志们向他道歉，并跟他商量共同斗争的途径,清算过去在朝中武装部队之间暂时造成的纠葛和对立的。

虽然关保全跑了，可是我还是想见见留下的人，便派人去联络。有 100 来名反日部队士兵找我们来了，说要看看在敦化县城打击了日本军队的金日成部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部队。我向他们坦率地承认汪清别动队为了解决武器，触犯了关营长部队的士兵，是不友好的做法，然后就朝中人民的共同斗争和反日部队的使命作了演说。

反日部队对这一演说的反应很好。有个叫靠山的指挥员听了我的演说后说，他本想也和关保全一样放弃抗日的，从今起要走正道了。后来，他按自己的诺言，在反日战线上战斗得很好。曾是汪清的一个

老大难问题的同反日部队的和解，就这样顺利地实现了。

我们为了克服做反日部队工作中的左倾偏向，把他们更多地引进抗日联合战线，在罗子沟召开了反日士兵委员会。那时候，集结在东宁县城的救国军部队正准备经由苏联撤退到中国关内去。我们必须想方设法防止救国军向国境外逃跑，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反日战线里。否则，我们的游击斗争就会面临严重的困难。原来为消灭他们而分散四处的敌“讨伐”力量，就会集中到仅有几百人的我们游击队，一下子窒息我们处于童年期的武装力量。敌我力量对比就会变得绝对不利于我们。

当时，日军计划全部占领满洲的所有小城市，全面加强了对反日武装力量的攻势。他们策划连县城也都占领。

参加会议的有我、李光、陈翰章、王润成、胡泽民、周保中等三四十个人，我和李光代表了我国，陈翰章、王润成、胡泽民、周保中代表了中国方面。

会议主要讨论了关于防止救国军逃走，加强反日联合战线的措施问题。

会议首先检查了汪清游击队的错误。

错误的起因是在汪清部队发生的“金明山事件”。金明山是朝鲜人，原属张学良军的“保卫团”，九·一八事变后，他带领部下的六名中国人，投到了汪清游击队。他是出色的猎手，仗打得很好。汪清部队的同志们看到他投到他们这儿来，都高兴地说滚来了一个宝贝蛋。

一次，他带来的六名中国队员中的一个到敌统治区去执行侦察

任务时，在大坎子的一家饭馆吃了一摞烙饼，没有付钱，因为他没有钱。他回部队后，把这事如实地汇报了。

但是，占据了县党委要职的左倾分子们给他扣上了损害游击队名誉的破坏分子的帽子，枪决了他。县党委军事部采取措施，在汪清处决的中国人队员就有十多人。

同金明山一起来的其余中国人队员，被这种恐怖气氛吓得逃到驻在马村附近的关保全部队去了。关保全听他们说游击队随便枪杀中国人，感到危险，把部队移动到离游击队驻地较远的深山沟里，窥伺着杀害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机会。

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汪清人民手持长矛和棍棒之类原始武器集合到纪念会场。他们带着这些简陋的武器来到会场，纯粹是为了增添纪念活动的气氛。

关保全误认为这是为攻击他们部队作准备，一气之下，枪决了在他手下任参谋长的金银植和同他一起推进对救国军队员的教育和统一战线运动的游击队工作员洪海一、元弘权等几个朝鲜人。这可以说是“挨一棍还一棒”的反击。

后来，放弃了斗争的关保全部队的人开始三三两两地投到敌统治区去。汪清部队以制止关部的投降为名，多次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后来又以他们不肯乖乖地交出武器为由，杀害了关部的几名投降士兵。

从这一事件以后，关保全部队对朝鲜共产主义者开始了野蛮的报复。他们见到被认为是搞共产主义运动的朝鲜青年，就一律抓去枪决。建立还没有几个月的汪清游击队被反日部队包围，付出了许多牺牲。

在同反日部队的关系方面表现出来的这种不成熟和盲目性，急剧地削弱了朝中关系，在朝鲜革命面前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汪清游击队的指挥员们破坏了同反日部队的关系，却还认不清这一错误的严重性，说什么还要报复。与会者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再一次确认了在做救国军的工作中必须遵守的原则和行动准则，并对此取得了一致意见。

我们在会议上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使救国军在满洲大地上站稳脚跟，继续进行抗日。

当时，救国军虽拥有几万人，却自认为没有抵抗日军的能力。他们把日本人散布的“天下无敌”论信以为真，认为世界上没有能战胜日本的力量，没有一支军队能够抵抗日军，因而几乎都抛弃了斗争。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怎样才能不被日军杀死或俘虏，安全地转移到还没有燃起战火的山海关那方面去。

日军在间岛地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王德林部队。如果日军开始对王德林部队发动攻击，罗子沟不久就也会落进敌人的手里。

与会者们决心无论如何要和救国军一起坚守罗子沟。要坚守罗子沟，就要说服王德林，使他不逃到苏联去。救国军的本心是要经由苏联转移到关内去。在反日部队的头领和士兵中，越过苏满国境去，竟成了一种趋势。拥有几万名兵力的李杜和马占山也经苏联逃到关内去了。防止救国军逃走的唯一办法，是同日军打一场漂亮仗，从他们的头脑中清除“皇军无敌”的迷信和恐怖心理。

在与会的人当中，能够说服王德林的人是周保中。周保中受共产

国际的委托任王德林的顾问。

我劝周保中说，无论如何也要说服王德林，使他停止退却，同游击队结成联合战线。

“我们是能够以居住东满的朝鲜人为基础,长期地进行游击战的。问题就是救国军，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说服王德林，让他们在满洲大地站稳脚，继续抗战，直到最后一个人。他们要到苏联去，并不是要到西伯利亚去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要经由苏联逃到关内去。”

周保中摇摇头，说这是很难办到的事。

“你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底细。救国军是一群怕死鬼。是只要日军的飞机飞来撒一张传单，就吓得发抖、抱头鼠窜的窝囊废，根本无法打仗。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卑怯的一群人。要同救国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军队，那简直是一种妄想。”

和周保中一样认为联合是不可能的，不只是一两个人。会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大家对固执地认为不可能联合的人进行了批评。当时，个个都是英雄，都是天才，都是领导人。救国军士兵工作委员会是由到各地去做地方工作的人组成的临时性的组织，所以，没有可称为领导者的人。

可是，会议由我做主席主持，继续开下去。这并不是因为我级别高，而是中国同志们说做救国军的工作，金日成还是老将，推我为主席的。

这就是罗子沟会议，是救国军士兵工作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后，士兵工作委员会便解散了。

我和李光、陈翰章、周保中、胡泽民，根据罗子沟会议的决议，分别负责做王德林部队、吴义成部队、柴世荣部队的工作。吴义成和柴世荣都是王德林的部下。

不久后，到吴义成部队去的陈翰章送来了令人乐观的通报：吴义成同意罗子沟会议的方针。

我在做王德林部队的工作时，日军大举进攻罗子沟一带。敌人认为，如果我们的主力部队同王德林部队形成了联合战线，对他们就不利，便调动大兵力加快了进攻。王德林不想迎战，从罗子沟逃跑了。王德林成千上万的士兵，像被旋风卷走的落叶一样，躲避日军的攻势向苏满国境撤退。

单靠我们仅有几十人的游击队的力量，是无法坚守罗子沟的。所以我们也同救国军一起朝东宁县方向撤退。即使跟到东宁县去，也一定要使救国军回转过来。我们以少数人员边撤边打，吃了不少苦。时令正值寒冷的冬月，反日士兵中也有不少人被冻死了。

我跟着救国军走，一路上不停地对王德林进行说服。那时，如果他听从了我的话，我们就能结成联合战线，在东北地区把抗日武装斗争搞得很好。可是王德林没有听我的劝告，终于经过苏联到关内去了。

我们放弃了同王德林的交涉，改变路线，朝最终的目的地汪清地区进发。从罗子沟出发，跋涉几百里，直到望得见苏满国境的地方，也未能达到说服王德林的目的，只好转回来，我的心情异常忧郁、暗淡。我心想，几万人的救国军都不敢抵抗日军而逃跑了，只剩了 18 人的我们部队将怎么度过这个冬天，用什么妙法闯过这个严峻关头

呢？18 名队员，正如日本人喜欢说的那样，可以说是“沧海一粟”。

部队从 40 名减少到 18 名，是有各种原因的。有阵亡的，有因病掉队的，也有因身体虚弱被打发走的，还有些不愿斗争了，让他回家的。独立军出身的年纪较大的队员和部分农村青年更是难以坚持。

最后留在队伍里的，是在吉林就加入共青组织参加斗争的同志。率领这 18 名队员，闯过生死关头向汪清行军时，我领悟到：一个人只有通过组织生活受到锻炼，才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坚持自己的信念，尽到革命者的道义和责任。

我们在向汪清行军的路上遇到了吴义成的通信员，和他一起行动。他名叫孟昭明。

起初，我们队员们为了弄清他的身分，盘查了他。那时，日本密探到处窜扰，所以我们对身分不明的陌生人，是高度警惕的。孟昭明有根据救国军士兵工作委员会与反日部队的协定发给他的反日会会员证。这个会员证既发给游击队，也发给反日部队士兵。对持有这个证件的人，双方都予以保护和帮助。除反日会会员证外，孟昭明还带着吴义成给王德林的求援信。看了这些证件，我们完全相信他是吴义成的通信员了。

孟昭明去天桥岭是有其缘由的。他说：

“我为了转达这封信到了东宁，可是王德林已经跑了，我扑了个空，只好回来找吴义成，他也只留一个营在老母猪河，自己撤到红石砬子去了。但他留下的那个营也转移到小三岔口（天桥岭）方面去了。我这是去找那个营。就是死也得抗日嘛！”

孟昭明的抗日思想是非常坚决的。他慨叹地说，东北三省没有个能够平定时局的人物，并问我：“队长，您认为是我们赢，还是日本赢？”

“我认为，我们赢。西方的一个作家说，人生在世上不是为了失败，而是为了胜利。你和我现在踏雪行进，还不是为了胜利吗？”

我决心同孟昭明一起去找转移到小三岔口方面去的那个营长。我想，要把联合战线的命运托在这个营身上，无论如何，一定要说服这个营，让他们不抛弃斗争。

孟昭明同我们一起到了汪清，还参加了腰营沟防御战。他是在最艰苦的时候帮助了我们，和我们生死与共的难忘的同行者。1974 年，孟昭明给我来信，感怀深切地回忆了我们在罗子沟台地上相遇时的情景。

我看了那封信才知道，过去在苦难中同我们建立了友情的吴义成的通信员还活着，在敦化合作社从事农业生产。

我记得，我们过的最艰难的关头是在老黑山。直到老黑山，还有救国军同行，尽管他们有些不牢靠，我们也吃了很多苦，却不觉得孤独。可是，他们逃到苏联去之后，在那空旷的台地上只剩下了我们 18 个人。周保中也率领王德林越境时留下的一部分人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就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了。

空中有敌机盘旋，撒传单要我们投降，地面上参加“讨伐”的日军部队从四面包围我们。加上在我国高山地带也罕见的严寒和齐腰深的积雪，使我们根本无法前进。费力积蓄下来的口粮也都吃光了，每

天临时找点东西凑合着充饥。5 月在小沙河穿上的军服也破得露了肉。

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候，我们在罗子沟台地上遇到了一位姓马的好老人，才得以死里逃生，过了这道难关。这天正是大年三十。从思想上看，这位老人没有政治信仰、无党无派，对国民党的政治则加以唾骂。但他也并不信奉共产主义。一句话，他是一个厌世思想浓厚的人。但是，他是一位助人为乐的善良热情的好人。

马老人有两栋房子。我们住下房，上房住着救国军残兵。这些残兵大都是有反苏思想，以苏联是共产国家为理由没有越境才留在满洲的，在这些人当中，还有吴义成留在老母猪河的郭营长的部下。

孟昭明刚放下行李，就说要打探一下救国军的动向，自动找上房的残兵去了。我叫他去探问一下救国军士兵愿不愿意和我们携手共同行动。孟昭明说："在郭营长的部下中，有不少人跟我熟。我先去探探他们的心思，若有希望，再由金队长去正式和他们交涉好不好？"

孟昭明见了那些残兵回来，耷拉着肩膀，神情阴郁地说：

"别说联合战线了，他们这帮人什么也干不了。他们在商量当土匪了。"

马老人也来告诉我们，救国军残兵正在策化解除我们的武装。他说他们准备夺取我们的武器扩大土匪队伍。

事到如今，我们不能不对我们自己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深思了。当成千上万的反日部队士兵在我们四周的时候，我们觉得同日军打起来能很快胜利，可是现在他们都逃跑了，我们的队伍也只剩下 18 个人，便觉得前途茫然了。就是到了汪清，也只有十多支枪，靠这些枪还能

干出什么大事呢！在延吉的武器，顶多也不过几十支枪。真是雪上加霜，那些凶暴的残兵还要夺我们的武器，这事该怎么办？我们来到罗子沟不知名的台地，回汪清的路也渺茫。“这事你打算怎么处理？”我自己问自己。“是放下武器，回去重新搞地下斗争呢，还是即使吃点苦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呢？”

如果说没有过这种动摇，那就等于是歪曲事实，伪造历史了。我不隐瞒也没有必要隐瞒我和我们部队曾有过动摇。

钢铁氧化了也会变。人不是钢铁，比钢铁弱，变异性又大。但是，也可以说人比钢铁刚强得多，因为钢铁不能自行防止氧化，而人具有自行控制和调整自己思想的变化的能力。问题不在于发生动摇，而在于如何克服这种动摇。所以称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具有善于自行调节的能力；所以说革命家伟大，是因为他们是善于从无中创造有，变逆境为顺境的刚毅而具有创造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

那时，我茫无头绪，不知如何是好。哪怕是天塌地陷，也应该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可是现有的队员都是些还不到 20 岁的小青年。可以说我本人也是缺乏经验的。当年在吉林，写传单，做演讲的时候，个个都曾是英雄豪杰，而遇到这种情况却都成了初学者。搞地下工作时办法挺不少，可是在这个杳无人烟的地方，几万名友军都走掉了，只剩些残兵，如何开拓 18 人的前进道路，却是单靠我们的力量难以解决的问题。

上房的那些残兵打算当土匪，我们决不能干那种勾当。只有到有群众组织的地方去，才能有办法，可是朝鲜人居住的村庄据说得走 200

里才有，而且这段路上的每一个山谷都有日军把守。

革命难道就这么艰难吗？原以为只要两三年就可以轻取胜利的我国革命，怎么竟走到这样的险境了呢？吹着号，雄赳赳地从安图出发的我们队伍，难道就要在这个荒凉的山岭上停止前进了吗？

为了建立这支部队，我们曾挨过多少饿，熬过多少个夜晚啊。我没能为母亲送终，和可爱的弟弟们离别，不就是为了这支队伍吗？车光秀、崔昌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不也是为了这支队伍吗？车光秀是到敦化进行侦察时牺牲的。

回顾以往，瞻望未来，我的心情犹如整个地球坠在心上那么沉重。

我正坐在灶口前左思右想，马老人靠近我，轻声问：

“你是负责人吗？”

“是的。”

“一个队长，怎么还流泪呢？”

“可能是因为迎着风走来的关系吧。”

我这样支吾过去。其实，我并不是因为风，而是因为对未来的担忧才流泪的。

老人捋着长须，端详我好半天，才说：

“你是担心住上房的那些人作恶吧，不要太担心。晚上我把你们带到好地方去，你们就在那儿好好歇几天吧。歇个 20 来天，边学习，边补养补养，脑筋就会像诸葛亮那样灵了。”

半夜，马老人摇醒熟睡的我们，给我们吃了准备过年吃的饺子。然后把我们带到了足有50 里路的深山中的一个窝棚。窝棚在葱郁的林

中，连飞机也发现不了。

窝棚不大，只能铺一张草席，旁边连着个小库房。库房里放着马老人下套套来的冻狍子和兔子，还有小麦、玉米和小磨。

“屋子虽窄，垫上草，还能将就着过日子。这样就能闯过这一关了。你们就躲在这里，好好补养身子吧。外边的消息，由我每隔几天来告诉你们。你们走的时候，我还给你们带路。”

老人说着在灶坑里生上火。我们都感激得流下了热泪。在这荒凉寂寞的台地上，遇到诚挚的马老人这样的恩人，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幸运。队员们高兴地开玩笑说，“老天爷”在保佑我们。

我们在窝棚里待了半个多月，边休养，边学习，还出去猎狍子。

窝棚里有不少马老人的书。有小说、有政治书籍、也有伟人的传记。马老人虽然在深山里以打猎为生，学识却很渊博。很多人争相传阅这些书，因此书边都起了毛，磨破了。

大家把书读完了，就一定要发表读后感，或者定个题进行争论。各自都援引经典作者的论断。马克思怎么说，列宁又怎么说，力求用来论证自己的主张。当时，人们都能背几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点和著名作家的名句。当时青年们只要聚到一起，对孙中山也要进行批评。崇拜某人是一种时髦，批评人们都崇尚的伟人也是一种时髦。

那时是每个人都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人都自以为是伟人，是英雄豪杰。

我们在这个窝棚里就今后的行动方向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是解散队伍各自回家呢，还是去找汪清的朝鲜人村庄，把那里的别动队集

结起来扩大队伍，继续进行斗争？

大家都表示决心，要继续进行斗争，唯独在海龙入伍的那个同志坦白地说，他身体虚弱，无法和我们一起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以这个同志的体力，搞武装斗争有困难，这倒是事实。

我们对他的坦白没有挑剔，也没当做问题。

“要是不能跟我们去，最好在这里直截了当地说出来。革命是不能勉强的。革命是不能靠强权或威逼来进行的。所以，要走就走，要想继续进行斗争就留下来进行斗争。”

我作为对部队负责的指挥员阐明了我的见解后，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各自下决心。

几天后，我们重新聚在一块，听取了队员们的决心。我们一行中有 16 名同志发誓说，就是献出生命，也要继续进行革命。

其余两个人请求允许他们离开部队。来自海龙的那个同志这次也说，他身体虚弱，不能进行武装斗争，请我们允许他回家去，还希望我们不要把他看做是怕死鬼。他说因为身体虚弱不能继续进行斗争，我们也不能无视他的要求。

我对他说，如果你跟我们走有困难，就回家去吧。我们不责怪你。不过，现在你这个样子是不能回去的。衣服都破得像个叫花子了，弄成这个样子，怎么好意思去见父母呢。你要走，也得到朝鲜人村庄，弄些盘费，做身新衣服穿上再走。

另一个同志说要到苏联去学习。

“你盲目地到苏联去，又没有保证人，谁知道他们那儿是叫你念

书呢，还是叫你劳动。先到汪清去工作一段时间，等和那里取得联系后，带着组织的介绍信去不是更好吗？”

两个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愿意按我的话去做。

后来，我们由马老人带路，安全地离开了罗子沟台地。马老人一直把我们带到汪清县转角楼。他真是一位待人亲热的忠厚的老人啊。几年后，当我们在根据地内外痛歼敌人的游击斗争蓬勃开展的时期，我带着一些布和粮食到罗子沟台地找他。可惜，那时马老人已经离开了人世。

60 年前的马老人的形象，至今仍活生生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有一次，我曾指示作家们以这位老人为原型创作一出歌剧或话剧。有关这位老人的传奇般的故事，是创作歌剧或话剧的很好的素材。

那年冬天，我们在罗子沟台地没有饿死，没有冻死，也没有被打死，可以说是奇迹中的奇迹。我现在还常自问，那时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我们能够经受住考验重新站起来？是什么力量，使我们没做失败者和落伍分子，而成为胜利者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呢？每次我都无比骄傲地回答：“那是对革命的责任感。”如果没有这种责任感，我们就会陷在雪坑里再也起不来了。

那时，我觉悟到如果我们半途而废，朝鲜就再也不能复兴。如果当时我们想的是即使我们死了，也会有人拯救朝鲜，那么我们就可能被埋没在罗子沟台地的雪崩中，永远起不来了。

注　　释

[1]　庚申年大“讨伐”：1920 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他们收买的土匪集团制造珲春事件，以此为借口在间岛一带对朝鲜人进行的大屠杀。

[2]　青山里战斗：在间岛一带进行活动的朝鲜独立军部队于 1920 年 10 月在中国吉林省和龙县青山里消灭了大批日本侵略军的战斗。

[3]　凤梧洞战斗：1920 年 6 月洪范图属下的朝鲜独立军在中国吉林省汪清县凤梧洞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的战斗。

[4]　崔德新（1914～1989）：金日成主席曾念过书的华成义塾塾长崔东旿之子。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朝鲜后流亡中国，任光复军军官。光复后在南朝鲜历任伪外务部长官、军长、驻西德大使等职。朴正熙执政时期流亡美国，后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定居，任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委员长、天道教青友党委员长等职。

[5]　李相和（1901～1943）：庆尚北道大邱人。朝鲜的著名诗人。早期属资产阶级文学流派，三·一人民起义后加入进步文学团体朝鲜无产阶级文学同盟（简称卡普）。代表作有《春天也到被夺走的田野上来吗》、《海之歌》、《等待暴风雨的心》等。

[6]　崔曙海（1901～1932）：咸镜北道城津（今金策市）人。自小自学，爱好文学。有一个时期在满洲流浪。归国后，创作了《故国》、《出走记》、《饥饿与杀戮》、《朴石的死》等许多小说。1925年参与朝鲜无产阶级文学同盟（简称卡普）的创立。

[7]　罗稻香（1902～1927）：汉城人。任《启蒙》、《时代日报》记者，并从事创作活动。早期属资产阶级文学团体，三·一人民起义后开始写批判当代社

会的作品。作品有《佣工之子》、《在发现自己之前》、《水碓》、《哑巴三龙》等 20 多部短篇小说和 3 部长篇小说。

[8] “惠山事件”：日本军警于1937年秋和1938年为了搜索和镇压朝鲜的革命组织和革命者而在鸭绿江沿岸一带进行的两次大逮捕事件。

[9] 六邑：咸镜北道豆满江沿岸六个郡的郡治，即茂山、会宁、钟城、稳城、庆源、庆兴的总称，是李朝时期负责边防的金宗瑞将军曾开拓为六镇的地方。

[10] 统义府：20 世纪 20 年代初在中国东北桓仁县，由韩族会、光复军总营等几个团体合并而成的朝鲜独立运动团体。

[11] 《东国兵鉴》：1451 年编纂的朝鲜的兵书。

[12] 《兵学指南》：1787 年编纂的朝鲜的以训练法为主的兵书。

[13] 壬辰卫国战争：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历时七年（1592～1598）的战争。亦称壬辰倭乱。日本的丰臣秀吉调动 20 万大军发动了侵略战争，但朝鲜人民击退侵略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14] 金佐镇（1889～1930）：忠清南道洪城人。1913 年加入大韩光复团。流亡满洲后，与徐一等一起组织北路军政署。担任新民府的负责职务，从事反日武装活动。

[15] 许浚（1545～1615）：朝鲜名医，著有《东医宝鉴》（五篇二十五卷）。